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重向度

陈万军*, 张永芳

(蚌埠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道德教化、政治引导、创新激励功能。在价值上它赋能大学生传承爱国主义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培育自强进取精神、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弘扬笃学践行作风等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应在“责任人: 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主阵地: 融入课堂教学; 演练场: 融入社会实践; 驱动力: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新赛道: 融入数字技术”上下功夫, 凝聚两者“双向奔赴”、互通互融、共进共赢的育人合力。

关键词: 功能; 价值; 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5)06-0001-06

Function, Value and Path: Triple Dimen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HEN Wan-jun*, ZHANG Yong-fang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s rich nourishme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ts integration into such education demonstrates multifaceted functions including moral edification, political guidance, and innovative inspiration. In terms of value empowerment, it fosters the inheritance of patriotic sentiments, strengthen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cultivates self-improvement ethos, facilitates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diligent learning with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s core values and behavioral guideline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olleg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ross five key dimensions: Responsibility Bearers: Enhancing faculty's traditional cultural literacy; Main Front: Embed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lassroom instruction; Practice Ground: Incorporating cultural elements into social practices; Driving Force: Infusing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 traditional values; New Frontier: 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consolidating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two in “two-way rush”,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win-win development.

Key words: function; value; pa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收稿日期: 2025-02-1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2D207); 蚌埠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23SK02zd); 蚌埠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3kcszsfkc3)。

作者简介: 陈万军(1985-), 男, 安徽天长人, 讲师, 硕士。E-mail: chenwanjun5188@126.com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蕴含的哲学观念、人文精神、审美意识、教化思想、行为规范等理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1]因此,高校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积极作用,也可以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广度和深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定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中华传统文化指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它以老子、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道文化为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有利于推动当代社会发展和进步、长期发挥正能量的文化。”^[3]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专业设置起步较晚,诞生于1984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延绵不绝,得以发扬光大,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其本身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扬弃糟粕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正向教育功能。

1.1 道德教化功能

中华民族以重视道德著称于世,道德在中国文化之中,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品德、行为、修养等方面,而且还渗透到国家、社会各个方面。正所谓:“德者,本也。”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大学》列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不同层面的道德修养目标。道德教育是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其“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4]古代社会设置“庠、序、塾、书院”等教育机构对全社会进行有组织、有纪律、有目的的思想教育活

动,安排专门的教育工作人员,对民众思想进行教育,以教化人,使民众心服、行服;在个人层面注重“学思省”并用。孔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不断地时刻反省,才能改正自身问题,将道德修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塑造出真正的君子德行。“立德树人”作为高校安身立命之本,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德育教育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一,事关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健全,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个人道德修养的培育观和践行观,能够培养大学生的道德价值理念,帮助他们塑造个人品德,促进个体的品格发展。

1.2 政治引导功能

政治引导指在调研、分析、掌握社会成员思想情况基础上,通过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批判错误的政治观点,支持正确的政治观点,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确保社会全面稳定与良好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为政以德”“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礼法并施”的政治主张和“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通过政治引导培养并服从统治与治理需要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之一就是一定的阶级、政党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来培养政治情感,涵养政治理想,形成政治认同,站稳政治立场,最终实现政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广大青年中加强和改进理论武装工作,引导广大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从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生追求。”^[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理想追求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引导,不断提高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又红又专”成为大学生最鲜明的政治底色。

1.3 创新激励功能

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不竭动力。儒家思想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不断更新、追求进步的创新精神。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则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不断创新以适应环境变化。《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为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周易·杂卦》记载:“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指要顺应时代发展、形势任务的需要破旧立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以及

众多农业、医学和工程技术的创新,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体现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精神。从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到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清时期的科举制,体现了制度治理方面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6]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充满激情和活力,接受新事物快,富有开拓和创造精神,是活力与激情迸发的一代。他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精神的滋养下,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和锐意进取的激情得以点燃,激励他们不断进取、勇于探索、追求理想、实现人生价值。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赋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源泉,蕴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民族观和价值观,它强调了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使命感。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大学生对中国的历史典故、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艺术形式等进行学习和体悟,才会在情感上对其所蕴含的智慧、美德和成就产生价值认同,进而在行为上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范和价值观,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

2.1 仁人志士价值情怀赋能大学生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种深植于中华儿女心中的情感和信念,是人们对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从孔子“君子忧道”,到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再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现出的忧国情怀;从祖逖“闻鸡起舞”,到岳飞“精忠报国”,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出的报国决心;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现出的为国而死之气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传承历代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怀,教育引导大学生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大好河山和骨肉同胞,增强国防观念,维护祖国统一,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2.2 历史文化价值赋能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领域,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出现“百家

争鸣”,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文学方面,《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科技方面,《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7]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8]的价值理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可以强基固本,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能够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自强底气,在思想上形成高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3 积极向上价值观念赋能大学生培育自强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自觉进取、奋勇拼搏、永不停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历代提倡和传承的一种优秀品质,它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秉持自信自强、积极进取的信念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获得成功。《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了自强不息的重要性。《道德经》有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体现了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精神。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即使年老体衰,也要有雄心壮志,继续奋斗不息的决心。《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载:“有志者事竟成。”强调了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就一定能够成功。人在一帆风顺时要保持自强进取精神,在遭遇挫折时更要克服困难积极奋进,司马迁受宫刑而著《史记》,屈原流放而作《离骚》,孙子膺脚所修《兵法》。近代以来,国家蒙难、民族蒙辱、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强进取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伟业。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挖掘和阐释自强进取的内涵和外延,培养大学生勇于竞争、勇于进取,树立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养成坚毅勇敢、自信自强的优秀品格,铸就时代新人人格品质。

2.4 以“和”为贵价值准则赋能大学生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和”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指矛盾的对立统一以及多种事物的和谐相处。“和实生物”,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太和”,

即万物各正性命,不相悖害,是谓太和。“中和”,即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9]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上,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倡导和睦共处,利益协调,促进社会和谐;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强调“以和邦国”倡导和平共处,反对分裂和对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对和谐相处最好的诠释。大学生作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申并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谐思维,遇到矛盾纠纷时,多一份以心换心的行动、多一点以和为贵的坚持,学会换位思考、换位做事、换位做人,做到身心和谐、心理健康、尊重人际交往差异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与社会、人与群体之间的良好互动。

2.5 “知行合一”价值理念赋能大学生弘扬笃学践行作风

中华民族历来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注重知行合一,重视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探讨,具有求真务实、笃学践行的优良传统。“笃学”出自《论语·泰伯》:“笃行好学,守死善道。”诠释了学习的专注和坚持;“践行”出自《朱子语类》卷九:“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阐释了理解和实践的重要性。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又指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他既强调学到知识后要按时温习并实践练习,又强调实际行动比言语更为重要。在笃学上,《礼记》记载:“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提倡不断学习,永不满足,同时在实践中坚持不懈,不因困难而退缩;在践行上,《画禅室随笔——卷二》记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人们既要广泛阅读书籍,又要亲自去体验生活,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练就过硬本领。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青年的素质和本领直接影响着实现中国梦的进程。”^[10]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功能和个体性功能,鼓励大学生学习并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笃学观和践行观,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激发自己的潜能,积极主动地参加社会实践,崇尚敏而好学、知行合一,摒弃浮于表面、华而不实的作风,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的伦理道德体系,其文化底蕴和时代价值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更能提升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和道德修为,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3.1 责任人: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高校教师既是教学内容的开发者,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执行者,更是学生文化引领和思想塑造的责任人,其传统文化理论水平、自身道德修养以及人格魅力直接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质效,因此,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首要环节。首先,高校在教师招聘时,将传统文化综合素养纳入考核标准之中,从源头上鉴别录用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人才。其次,鼓励教师主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以身作则,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行为、规范等要求,把传统文化中精华元素运用到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最后,组织教师参加传统文化培训会、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和指导,引导教师主动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改革、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授课内容,“在教学中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世界发展形势、国家重大政策方针、社会热点问题等,将其中的智慧同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串联’”^[11],激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力。实现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提质增效,可以更好地提高其传统文化教育能力和融入课堂的教学水平。

3.2 主阵地:融入课堂教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二是融入其他课程教学。在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要发挥思政课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阵地、主渠道核心作用,思政课老师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为重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大学

生成长规律,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丰富教育内容,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讨论教学、体验式教学等多种方式,讲清楚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灿烂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阐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阐明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六尺巷”为思政内容为例,思政课老师可以设计系统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教案,贯穿整个思政课教学,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时,引入六尺巷双方让出个人利益成就公共利益,体现个人服从集体原则;讲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时,讲好六尺巷的主人公张英及其“桐城派”对传统文化的贡献;讲解思想道德与法治时,借机解读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关系;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时,结合“枫桥经验”,提炼人民群众关于共建、共治、共享智慧活水,通过协商化解矛盾;讲解形势与政策时,以“和为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包容合作替代零和博弈。在融入其他课程教学方面要发挥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实效。一方面,在专业课教学内容中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传统文化知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专业课相通,既能提升学生的专业情怀,亦可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种类与比重,拓宽选修课的覆盖面,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多维度、多视角向学生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持续增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使其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3.3 演练场:融入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国情的途径,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练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2]在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应坚持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原则,“实现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理论课程和以习得行为为主的实践课程彼此支撑、相得益彰。”^[13]一是融入第一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思想政治课和专业课教学中设有教学实践环节,教师结合所教课程设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教学实践,比如,在《军事理论》授课中,可以围绕国防教育开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专题实践教学,组织同学们观看学习陈祥榕烈士事迹和珍贵影像,谈心得体会,特别是退伍的大学生更要现身说法。二是融入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实践教学方式方法,以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校级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挑战杯等学科竞赛为抓手,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公益项目、社会调查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以此弥补理论教学说教化、抽象化、模式化等不足之处,增强实践教学的体系化、过程化和基地化优势,让大学生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三是融入主题实践活动。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指导,一方面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动,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民俗活动、传统工艺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如,春节贴对联吃团圆饭、元宵节猜灯谜赏花灯、中秋节赏月吃月饼、重阳节登高赏菊插茱萸,学习泥塑、剪纸、刺绣等传统手工艺,让大学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开展“爱我中华”主题实践活动,带领大学生走进博物馆、文化馆、革命遗址、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专题文化研学活动,在文旅中感知中华文化,同时结合主题党日团日活动在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各种纪念日和纪念活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3.4 驱动力: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物质与精神、制度与行为的有机融合,既通过显性的环境与活动呈现,也通过隐性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渗透。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时要吸收并“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正气、正义、正面、正向的精神实质和能量,”^[14]发挥其显性和隐性推进剂与驱动力价值功能,让大学生在日用而不觉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沁润。一是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现有资源,结合校史、校徽、校训、校歌和优秀校友人物史的整理与研究,发挥“身边人身边事”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另一方面要营造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校园文化场所。结合学校的历史,提炼符合学校气质的传统文化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并把他们融入校园景观和建筑设计中,把教学楼、雕塑、食堂、实验室、“一站式学生社区”打造成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舞台。二是融入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生处、团委、学生会、大学生艺术团等作用,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团建设,支持学生成立中华诗词、茶艺、曲艺、书法、绘画、民族音乐舞蹈等社团,定期邀

请非遗传承人、文化专家进校园、进课堂,举办“传统文化月”活动,鼓励学生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打造校园文化品牌,丰富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要运用好校园文化互动性和渗透性功能,把学校各种典礼、庆典,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园文化庆典等与爱党爱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让大学生体悟浓郁的家国情怀,同时学校的广播站定期播放传统文化的音频内容,如,相声、评书、经典诵读、民族音乐等。学校的校报、学报、社团期刊可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栏,刊发阅读笔记、理论文章、名家访谈等内容,拓宽大学生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半径。三是融入外部互动环境建设。高校要积极开展和文旅投局及文化企业合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书斋”,通过横向纵向项目合作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举不仅可以助力高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和思想文化效益,还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习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5 新赛道:融入数字技术

新时代大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互联网已然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5]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正加速推进,同时不断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动态演进,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赛道。一是数字技术可以根据大学生的兴趣爱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动漫、视频、直播、文本、图片、音频、H5等数字化形式呈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活”起来;二是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化、网络化、共享化、仿真化、跨时空化、精准化等特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由单向理论输送向多元互动转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式“靓”起来。比如,利用虚拟现实(VR)和现实技术(AR)能让历史人物“动”起来与人对话交流,能让传统建筑物变得立体可感、精致细腻;三是发挥数字技术对互联网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预测、传播和存储等强大功能,及时掌控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利用学习通、抖音、B站、小红书、中国大学

生在线、大学生慕课 mooc、知乎、易班、学习强国等网络学习交流平台上第一时间为大学生释疑解惑并解决实际困难,针对社会热点问题,设置主流意识形态话题与大学生互动,与网络红人、意见领袖合作,通过粉丝效应,引导大学生辨析真伪、独立思考,在批判各种错误言论、错误观点和不正之风中坚定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 光明日报,2015-12-31(1).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M]. 7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371-1372.
- [3] 郑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2.
- [4] 习近平.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N]. 人民日报,2014-09-25(01).
- [5] 习近平.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N]. 光明日报,2018-07-03(1).
- [6]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1).
- [7]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32.
- [8]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4)[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670.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5.
- [10] 习近平. 论教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28.
- [11] 陈庆庆,李祖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创新[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6(4):123-128.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5.
- [13] 王增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J]. 教学与研究,2024(6):36-45.
- [14] 王伟光. 以体系化学理化为着力点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N]. 人民日报,2024-10-17(09).
- [15] 习近平.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 人民日报,2023-05-30(1).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之僭越、失序与异化

—— 基于智能手表技术的思考

钱 益

(宿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揭示智能手表技术演进过程中资本逻辑对生命政治领域的数字化重构机制。通过分析智能手表引发的技术越界、伦理失范与商品异化三重矛盾,阐明其本质是数字时代中物的增值逻辑与人的价值异化的新型表现形态,并论证了生物监测技术的具身化如何导致用户认知自主权的转移,算法控制体系如何重构福柯提出的规训机制,以及数据劳动异化如何形成剩余价值剥削的数字化路径,由此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拓展至可穿戴技术批判领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构建了包含数据主权规制、技术民主化改造与劳动价值重构的三维解决方案,为数字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异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07-05

Transgression, Disorder and Alie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Critique by Smartwatch Technology

QIAN Yi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Anhui)

Abstract: Grounded in Marxist technological critique, it uncovered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apital logic digitally reconstructs the biopolitical sphere in the evolution of smartwatch technology. By examining three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to smartwatches, technological transgression, ethical anomie, and commodity alienation, it revealed their essence as a new form of value augmentation for objects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valu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s: How biometr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facilitates the transfer of users' cognitive autonomy, how algorithmic control systems reconfigure Foucauldian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and how data labor alienation creates digital pathways for surplus value extraction, thereby extending Marxist alienation theory to the critique of wearable technologies. Employ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tudy proposed a tripartite solution involving data sovereignty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labor value reclamation, offering a critical yet constru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technology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ism; technology; ethics; alienation

智能手表的技术迭代在本质上给技术哲学做了时代注脚。当精密传感器替代机械齿轮、算法协议重构人机交互界面时,这一可穿戴设备已然突破人们的传统计时工具的认知框架,演变为深度介入人

类生命政治的数据终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探讨数据主权规制、技术民主化改造与劳动价值重构的三维解决方案,或许可以为数字技术哲学研究提供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理论认知。

收稿日期:2025-04-17

作者简介:钱益(1985-),女,安徽宿州人,助教,硕士。E-mail:411474946@qq.com

1 技术僭越的临界状态

1.1 技术具身化与认知解释权的双重让渡

相较于传统机械表依赖齿轮转动这一物理机制来呈现时间,当代智能手表则通过基于 PPG(光电容积脉搏波)技术的传感矩阵,实现了对皮下血管容积变化的毫米级解析^[1]。这一技术跃迁不仅重构了人类对生命体征的认知范式,更在实际操作和存在论层面完成了一场双重革命。在应用层面,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呈现出对技术的差异化依赖。在哲学维度上,中医“望闻问切”所代表的具身认知传统,被解构为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模型。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变,在用户每日滑动指尖查看健康数据的细微动作中悄然发生,印证了斯蒂格勒关于技术系统从工具属性升维为具身认知扩展载体的理论预言。

斯蒂格勒的“代具”(prosthesis)理论^[2]在此获得了现象学诠释:技术的外在性并非简单的空间外置,而是源于人类存在论层面的构成性缺陷,是一种生存论的必然。科学技术介入的悖论在于:设备提供的健康评分成为自我认知权威标准之际,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正被异化为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点集。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勒的理论在此还显现出与马克思分工批判理论的深层共鸣:技术代具对认知能力的弥补,在实质上是资本权力对认知劳动进行的技术分工重组。PPG 传感器和算法的耦合,将血管活动的整体性感知分解为光电信号采集、波形特征提取、病理风险预测等精细分工环节。这种技术分工的精细化程度,已远超 19 世纪的工厂流水线,将人类的活动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深入到神经元层面。

海德格尔对技术“促逼”本质的批判^{[3]12-16}在此具象化——技术系统采用标准化指标,将生命简化为可操控的“持存物”。智能手表的双重辩证性由此凸显:它既是弥补人类生物监测能力不足的“解药”(如预防心脏猝死),也是引发数据依赖和主体性危机的“毒药”。这种矛盾深刻揭示了技术代具的本质困境:它既是人类超越生物学限制的阶梯,亦是资本权力重构生命政治的通道。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3]16-20}采用技术分工将生命标准化,其结果是人类不仅失去了对身体的解释权,更在认知维度重演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悲剧。

1.2 技术规训网络与存在论危机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揭示的“座架”概念,在智能手表的技术演进中获得了微观且具身的

印证。这种数字化规训网络已突破传统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闭环系统。医疗资本的介入更强化了技术座架的支配性:技术系统借助神经奖励机制(如目标达成时的震动反馈)重塑人类行为模式,进而将生命简化为可调控的实体。

智能手表的久坐提醒与体能训练闭环,构建起了数字化分工体系的规训矩阵。它将连续的生命体验分割为运动时长、站立次数、卡路里数值等可管理单元。这种技术分工所带来的时间管理方式,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分工现象在数字领域的体现:用户为了填满智能手表上的三色圆环而进行的强制性运动,与流水线工人日复一日重复单一工序的异化劳动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算法设定的健康标准,实质是资本权力通过技术分工对生命政治的重构,正如马克思所言:“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4]

当下,智能手表驱动的步数竞赛将健身目标异化为数字游戏。用户在追逐虚拟徽章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完成了从身体主体到数据客体的存在论蜕变,构建起“健康焦虑-行为矫正-数据优化”的规训闭环。这种技术规训的隐蔽之处在于其借助量化指标的客观伪装,悄无声息地将资本意志转化为用户的自我选择。

1.3 社会文化层面的异化延伸

当健康被量化为设备屏幕上跃动的参数时,对生命复杂性的本体论感知正经历系统性衰退。消费主义将血氧饱和度等生物指标异化为身份符号,完成了鲍德里亚所指的符号价值生产循环^[5],催生出单一化的生活范式。技术系统在责任上的缺失,则进一步构筑了一个不易察觉的伦理迷宫。例如,当睡眠周期数据成为风险评估指标时,算法的缺陷便可能扭曲个体对生命的认知。技术中立性的神话,掩盖了制造商、保险公司与用户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这种技术资本主义的共谋机制,最终将人类降格为数据增值链条的被动节点——不仅在物理层面承受运动损伤风险,更在哲学层面经历“存在遗忘”的双重剥夺。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对个体主体性的超越并非突变事件,而是通过持续性积累突破人类自主性的临界阈值的过程。当用户日均查看健康数据的频次超过生理感知的频次,当设备震动提示逐渐取代身体本能反应,并成为行为决策的主导因素时,技术系统便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殖民化进程。

1.4 主体性消失的技术辩证法

智能手表的技术控制,本质上是数据殖民主义的微观实践。其高频生物监测构建的并非简单的数字镜像,而是对生命体验的渐进式改写。随着数据积累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解释权的临界阈值,个体主体性便会陷入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坍缩过程。这一认知迁移的辩证性在于:技术系统通过持续的数据渗透,将具身感知的独特性转化为可计算的同质化指标,最终使主体沦为数据流中的可置换节点。

技术控制机制遵循递归强化的辩证法则。算法利用动态调整的反馈回路,将用户行为导入自我优化的漩涡。初始阶段的工具性辅助,逐渐演变为认知框架的强制性重构。这种控制强度的非线性增长,其本质是技术理性对个体主体意志的渐进式殖民。用户在中多巴胺奖励机制的引导下,无意识地将算法所设定的虚拟目标内化为自己生存意义的核心参照。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在此获得技术时代的演绎:用户在追求健康自主性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臣服于技术系统。然而,这种所谓的“自主”实则早已被技术分工所预设。心率区间计算模块由生物工程师设计,卡路里算法由营养学家开发,用户的选择自由不过是在分工体系划定的狭窄通道中进行的虚假确认。

个体主体性的消逝,是通过三重技术暴力得以实现的:一是生物特征的符号化剥离,即将身体降维为数据集合;二是行为模式的算法化重构,即将选择简化为概率计算;三是价值体系的指标化置换,即将意义坍缩为统计参数。这种存在论替代标志着技术“座架”的最终完成。当生命管理权让渡给技术系统时,人类不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而是沦为技术持存物链条中的标准化组件。斯蒂格勒的警示在此具象化:我们既依赖技术工具弥补生物性缺陷,又在技术代具的扩张中遭遇存在根基的瓦解。

2 伦理失序的多重挑战

2.1 隐私边界的消融与社会信任的解构

现代技术正以分子化方式瓦解隐私的物理与情感边界。智能穿戴设备通过高精度传感器持续捕捉心跳、呼吸甚至情绪波动,将人体转化为实时更新的数据流。这种全景敞视式的监测,不仅使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更在根本上重塑了人际关系的本质。父母借助智能手表的定位功能实现对子女的全天候数字监控,传统基于信任的情感联结逐渐被数据验证机制取代。

技术赋权的华丽外衣之下实则暗藏着控制体系的精心建构。复杂的权限设置和默认勾选条款,迫

使人们在便捷性与隐私权之间做出非自愿的妥协。更严峻的是,这种数据攫取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体力劳动者因工作性质被迫开放生物数据权限,而高端群体可运用技术手段保护隐私。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平权的理想面临挑战,算法黑箱问题日益凸显,这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隐形推手。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重构技术伦理的底层逻辑。这要求在硬件设计中嵌入用户主权意识,采用立法明确数据采集的边界,并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数字权益保护机制。技术发展的终极目的不应是无限扩张的监控能力,而应是帮助人们在数据化浪潮中守护人性的完整与自由。

2.2 算法霸权与认知阶层的分化裂变

智能手表的算法系统在重塑人类社会的认知权力结构。当健康管理算法将复杂的伦理判断简化为程序化的行为指令时,技术便悄然接管了道德决策权。医学诊断的专业性让位于智能手表的即时数据反馈,临床经验的价值被算法输出的客观性消解,形成一种新型的数据权威主义。

此外,技术黑箱的不可知性加剧了社会认知的分化。算法系统因其封闭性设计,天然地构筑起一道理解的高墙。技术精英群体能够穿透表象、洞察算法逻辑,而普通大众则陷入被动接受数据结论的认知依赖。这种分化进而催生了一种新的阶层划分,即以算法解读能力的高低来界定认知阶层。当健身数据成为个人价值的衡量尺度,当健康评分取代对生命质量的真实感知,技术系统便完成了从工具到价值裁判的角色蜕变。

2.3 代际伦理的结构性冲击

智能手表的技术设计差异正在加剧代际关系的不平等。一方面,老年设备繁琐的操作界面与儿童产品直观便捷的交互设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技术适配上的代际鸿沟已悄然演化为数字时代的一大伦理挑战。当老年群体因操作障碍被迫放弃设备核心功能,其健康数据缺失直接导致医疗资源获取劣势——医疗系统对智能数据的依赖性,实质构成了对技术弱势群体的制度性排斥。

另一方面,技术营销策略正在扭曲传统家庭伦理的本质。所谓数字孝道将子女关怀异化为设备购买行为,通过数据绑定机制把亲情互动降维成可量化的孝心指数。商品化操作带来了双重负面效应:它不仅削弱了代际间情感交流的独特性,而且利用老年群体在技术认知上的局限,使他们成为了数据产业链末端的被动接受者。

3 技术异化的三重维度

3.1 资本逻辑主导的双重异化机制

马克思批判商品的异化,在智能手表产业中呈现出双重特征。知名品牌推出蓝宝石黄金材质的“非凡大师”智能手表(售价2万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背离^[6]获得数字时代的完美注脚。这种异化机制通过功能迭代到符号营销再到需求制造,促使资本循环不断深化。智能手表行业的更新周期已经从传统手表的年份缩短至月份,这既反映了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也揭示了资本如何通过不断推动产品迭代来控制消费节奏,这与马克思揭示的劳动产品异化形成跨时代的呼应。当运动不再是生命活力的自然表达,而是维持健康评分的强制任务时,人的主体性便被技术系统彻底客体化了。

3.2 符号消费与劳动异化的螺旋嵌套

智能手表的高端化进程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双重异化逻辑。技术产品经过精心设计的符号价值包装(例如与奢侈品牌联名、将技术参数作为身份标志),将原本的使用价值转化为承载文化资本的形式,实现了鲍德里亚所述的“符号消费”的升级。这种消费模式的本质在于,资本利用技术赋能进行符号生产,从而诱导用户参与无偿的数字劳动。在社交媒体上,用户的穿戴展示和互动分享等行为,表面上看似自主的文化表达,实则是在为品牌符号增值提供无偿的内容创作素材。

劳动异化在此呈现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在物质生产端延续着传统剩余价值剥削模式;在消费端,用户为维系符号消费塑造的理想人设,被迫进行自我规训,使身体沦为符号再生产的工具。这种双重异化构成了一个闭环结构:劳动者既是被剥削的数据生产者,又是符号价值的消费者。

3.3 异化再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

随着智能手表技术的不断革新(如高性能处理器、心率监测、血氧检测等前沿技术的引入)和用户体验的持续优化,智能手表作为连接个人健康与科技生活的桥梁,也加速了社会关系的系统性物化进程。当技术系统将家庭互动量化为家庭健康指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判的物化意识^[7]在此获得了数据具象。人类用数据构建的“第二自然”取代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传统伦理中不可通约的情感联结被异化为可计算、可优化的数据指标,这种数据拜物教将算法生成的统计规律视为超越社会历史的客观真理,完美再现了卢卡奇揭示的商品关

系转化为事物本身的属性的异化机制。亲子互动不再是情感交融的桥梁,反而沦为算法评估体系中的冰冷绩效参数;代际关怀被重构为数据达标率的博弈,生命经验的质态丰富性被压缩为可交换的数值符号。这正是物化理论中质的范畴被量的范畴彻底殖民的当代完成形态。

更深层的异化体现在时间秩序的资本重构中。技术系统通过“屏幕使用时间”“睡眠质量评分”等指标,将连续的生命体验切割为可管理的离散单元。这种现象印证了社会加速理论的核心命题:技术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时间稀缺性的焦虑,将人类卷入效率至上的生存模式。当劳动者为提升系统评分而采取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如药物干预心率),马克思所指的类本质异化便显现出数字时代的特殊形态:人类为满足技术设定的健康标准,与自身的生物性和主体性发生根本性疏离。

这种全面物化的终极后果是社会存在方式的技术重构,对时间的物化认知使人类陷入“伪主体性”的生存状态。看似自主的时间管理,实则将技术系统建构的数据时间误认为“第二自然”的必然规律。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在此叠加:人类不仅与劳动产品异化,更在认知层面将技术系统制造的数据秩序视为不可违抗的自然法则。

4 超越异化的路径探索

4.1 技术伦理的刚性约束框架

首先,需在法律层面确立数据主权的法理框架。建立生物数据信托制度,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受托管理数据,用户保留终极控制权;厂商调用数据须经“双重授权”——既需个人明确同意,又需通过伦理委员会的技术必要性审查。然后,将“最小干预”准则转化为工程设计标准。设置健康建议的冷静期,保留用户拒绝算法建议而不受功能惩罚的权利。针对老年人与儿童群体,实施差异化保护措施,如默认关闭非核心数据采集、以地理围栏替代实时定位追踪,并将这些标准纳入行业准入规范。

其次,构建预防性立法与协同治理框架。在立法层面,将未经授权的生物特征分析、情绪数据商业化等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畴,构建数据滥用黑名单体系,对违规企业采取包括产品禁售、算力配额削减在内的多项新型惩戒措施。在监管机制上,组建多层级技术伦理委员会,对智能手表功能实施分级管理:基础功能实行备案制,医疗级功能需通过临床伦理审查,并建立年度动态评估机制监控算法迭代的价值观偏移风险。同时推行行业自律机制,强制企

业定期披露数据使用图谱与算法影响报告,开发公众参与的监督平台,通过众包模式收集技术滥用线索,形成政府、行业、公众协同治理的立体网络。

另外,强化技术伦理能力建设是长期根基。在教育体系中嵌入数字公民素养课程,培养公众的数据主权意识与算法批判能力;在社区层面设立数字权益工作坊,帮助弱势群体掌握数据权限管理技能。促进高校科研评价体系融入技术伦理考量,并提供资金支持用于研发开源数据管理工具。

最后,通过动态平衡机制实现价值分配正义。建立数据收益反哺基金,将企业数据商业化收益按合理比例用于用户补偿与伦理技术研发;引入“伦理影响债券”机制,要求企业为高风险功能预存保证金,用于潜在损害的补偿与修复。

这种“制度约束-技术赋能-公众参与”的三维架构,既释放健康监测技术的普惠价值,又构筑抵御数据异化的“人性防火墙”,为智能穿戴设备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性伦理制度性保障。

4.2 商业逻辑的价值定向

技术创新应回归真实需求,鼓励企业将研发资源聚焦于适老化、无障碍等普惠功能的开发。例如打造以语音交互为核心的老年友好模式,以及为视障用户量身设计的触觉反馈运动指导功能。建立技术人性化评价体系,对聚焦实用功能、促进健康生活的产品给予政策扶持,抑制符号化、奢侈化的技术异化演进方向。

构建可持续的消费生态,推动厂商建立设备回收与数据删除机制,延长产品使用周期,减少电子垃圾污染。倡导功能适度的消费理念,借助教育手段引导消费者理性审视技术参数,以免被资本营造的升级焦虑所裹挟。

与此同时,激励技术共享与开源协作,进一步降低技术壁垒,加速智能手表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使更多人能享受到技术革新带来的福祉。通过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智能手表行业向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4.3 主体性的本真复归

重建身体感知的自主性,需要警惕对技术系统的过度依赖,保留身体本能的认知权。鼓励用户定期进行技术断联,借助传统手段来感知诸如疲劳、压力等身体发出的信号,在算法建议与自我判断之间建立平衡。医疗机构应加强对智能手表数据的专业解读,帮助用户建立科学的健康认知,以免陷入对数据的盲目崇拜。

当代可穿戴设备构建的全球生物传感网络与分

布式数据流动,正为新型社会关系的萌芽孕育着技术基础。技术的终极价值在于拓展人类自由,而非强化控制。设计智能手表的功能时,需始终追问:这是否真正有助于增强人的自主性? 又是否充分尊重了个体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正如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言:“未来文明的任务是发展一种新的人格和社会形式,使机器的成就与生命环境协调……机器的终极使命是服务于人的转化。”^[8]

倡导理性消费与价值观重塑,这就要求在消费热潮中倡导理性消费,避免盲目追求技术升级与符号价值。通过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重视产品的实用价值而非单纯的技术参数或品牌符号。倡导用户依据个人需求及偏好选择产品,避免被消费主义潮流左右,重夺回对生活 and 健康的掌控权。

5 结论

智能手表的演进历程本质是技术资本主义发展的微观映射,其从计时工具向数据终端的转型,深刻揭示了商品逻辑向数字领域的结构性迁移。贵金属材质的表壳演变为阶层符号,卫星通信功能转化为圈层准入机制,《资本论》揭示的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规律正在数字界面重演。综上所述,对智能手表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不仅揭示了其内在的异化困境,更为我们提供了超越异化的探索路径。将这些理论思考转化为实践行动,有助于我们实现从技术异化到技术解放的范式转换,推动智能手表技术乃至整个科技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徐成喜. 光电容积脉搏波技术在可穿戴医疗设备中的应用及其未来发展[J]. 现代仪器与医疗, 2024(3): 58-63.
- [2] 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M]. 裴成,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80-120.
- [3] 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2-20.
- [4]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5.
- [5]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91.
- [6]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6-61.
- [7]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43-157.
- [8]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80-300.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探析

石柏胜^{1*}, 楚琳¹, 郭红超², 凌建宇¹

(1.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 安徽 亳州 236800; 2. 亳州学院 教育系, 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以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为研究视角,对其民族价值观的形成渊源、多维度呈现、艺术表现、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进行分析,由此可知: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价值观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现实;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阶级解放的核心诉求、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和国际主义的开放视野是其民族价值观的多维呈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以及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是其民族价值观艺术呈现的鲜明特征;其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努力重构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建构,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蒋光慈;民族价值观;思想渊源;内容呈现;艺术表现;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12-06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Values Embodied in Jiang Guangci's Literary Works

SHI Baisheng^{1*}, CHU Lin¹, GUO Hongchao², LING Jianyu¹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236800, Anhui;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236800, Anhu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ional values embodied in Jiang Guangci's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formative origins, multidimensional presentation, artistic expressi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ational values in Jiang Guangci's works stem from the profound influences of Marxist theor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realities of his era. Their multidimensional presentation includes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core pursuit of class libe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with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n internationalist open vision.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ir artistic expression lie in the combination of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the unity of politicality and artistry, and a unique narrative structural model. His integration of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long with his efforts to reconstruct national cultural values, holds significant inspirational meaning for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Jiang Guangci; national values; ideological origins; content presentation; artistic expression; contemporary value

蒋光慈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他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更是革命文

学的先驱者。他创办革命文学团体,主编革命文学刊物,创作了大量的新诗和小说,致力于唤起民众觉醒。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蒋光慈以“革命加恋

收稿日期:2025-07-28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2023AH052252,2023AH052267);亳州学院科研启动项目(BYKQ202213)。

作者简介:石柏胜(1970-),男,安徽淮南人,教授,硕士。E-mail:296912900@qq.com

爱”的创作模式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开创了革命文学的新范式^[1]。近年来,随着对红色文化研究的深入,蒋光慈及其作品重新引起学界关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学风格、革命主题或个别作品分析,而对其作品中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尚缺乏系统探讨。实际上,蒋光慈文学作品通过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映,呈现出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相结合的新型民族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思想,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将民族解放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现代民族观。

本研究通过文本分析和历史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的思想渊源、内容呈现、艺术表现及其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探讨蒋光慈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将民族危机、阶级压迫和革命理想融合转化为其民族价值观念的重要内涵,以回应时代课题,揭示其当代价值。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蒋光慈的革命思想意义和文学成就,也能为我国当代民族价值观的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重要启示。

1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思想渊源

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多种思想资源交汇融合的结果。深入考察其思想渊源,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其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民族价值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蒋光慈于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苏联期间,他深入研究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对帝国主义批判的立场,使蒋光慈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的危机和出路。在诗集《新梦》中,他明确表达了对世界革命、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强烈挚爱的思想情感。这种国际主义视野和阶级立场成为其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对蒋光慈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他将文学视为战斗的武器,认为“革命的作家不但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而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的生命”^[2]。这种文学观念使其作品不仅超越了单纯的审美追求,而且主动承担起唤醒民众、推动民族解放的使命。

1.2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位革命作家,蒋光慈思想深处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安徽霍邱老家的成长经历使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其作品中时有显现。尽管他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念仍然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其创作中。在《哀中国》中,他写道:“我的悲哀的中国/我的悲哀的中国/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你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3]104}这种对祖国山河的深情赞美,与传统文人笔下的爱国情感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然而,蒋光慈并非简单重复传统的爱国表达,而是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他将对国家的热爱与对劳动人民的关怀相结合,将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统一,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民族观念的创造性转化。

1.3 时代现实的影响

蒋光慈生活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人民苦难都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1925年前后,他在中国各地目睹了“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3]104}的现实,这种民族危机感直接影响了其创作。《哀中国》中的诗篇大多写于1925年前后,热爱祖国、反帝反封建、诅咒阶级压迫、呼唤自由、歌颂斗争是诗集的主要主题。现实的教育使蒋光慈认识到,单纯的哀叹不足以拯救国家,必须唤起民众的斗争精神。他在《血祭》中表达了一种以斗争求解放的民族价值观:“顶好敌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以机关枪打去。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4]这种重视斗争和反抗的意识,是其民族价值观区别于温和改良派的重要特征。

2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多维度呈现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并非单一维度的爱国表达,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价值体系。通过对其作品的整体考察,研究发现其民族价值观至少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阶级解放的核心诉求、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以及国际主义的视野。这四个维度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是基础,确立了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历史方向;阶级解放诉求是核心动力,将民族命运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是实践路径,通过新文化塑造民族精神主体;国际主义视野提供全局观照,使民族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动。

四个维度层层推进,共同构成了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统一、本土实践与国际视野交融的辩证价值体系。

2.1 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

在蒋光慈的文学创作中,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构成了其民族价值观最为鲜明、最富战斗性的核心维度。作为中国早期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光慈自觉地将其文学实践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结合,通过饱含激情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沉重压迫,并竭力唤醒民众沉睡的民族自觉与反抗精神。这种强烈的、一以贯之的反帝反封建诉求,可谓是其文学作品最为鲜明的价值底色与思想主题。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并非表现为空洞的批判口号,而是植根于对具体社会苦难的深刻描绘与根源剖析。在诗歌《余痛》中,主人公“王老儿”血泪控诉自己被“洋鬼子”害得家破人亡,通过作品蒋光慈并非只是哀叹于“王老儿”个人的偶然悲剧,而是将其个人命运与民族危难直接挂钩,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与军事侵略是近代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总根源。“《血祭》为纪念五卅流血周年而作,《我要回到上海》《血花的爆裂》等诗都以反帝为主旨,召唤人民以新的方式‘拿起枪柄’与内外敌人斗争。”^[5]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创作则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势力的腐朽与反动。《少年漂泊者》描写了农民在封建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境遇;《逃兵》揭露了旧军阀发动的不义之战给普通士兵带来的血肉痛苦与心灵创伤;《徐州旅馆之一夜》更是通过一个微观的社会切片展现了军阀混乱时局下底层民众生活的痛苦与无助。这些作品通过对一个个鲜活个体命运的真实书写,有力证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并非虚无缥缈的“命运”使然,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种揭露从根本上打破了“天命论”的桎梏,启迪民众认识到唯有通过自身的反抗与斗争,才能改变现实,获得解放。

蒋光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并未止步于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控诉,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文化批判与思想启蒙的深层维度。他敏锐地察觉到,维护旧秩序的除了枪炮和枷锁,还有一套麻痹人民意志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诗作《耶稣颂》中,他以犀利的笔法戳穿了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用的宗教虚伪性,斥其“反抗是罪恶”“穷富由天定”“忍耐是良方”等教旨^[4],在本质上是为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披上神圣的外衣,旨在让被压迫者安于现状、放弃反抗。这种对文化领域的深刻批判,极大深化了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彰显了蒋光慈民族价值观的革命彻底性。

2.2 阶级解放的核心诉求

在蒋光慈的文学创作中,民族价值观的呈现并非孤立和抽象的,其最突出、最核心的特点在于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底层劳苦大众的阶级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蒋光慈看来,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其深层根源在于内部严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势力则与国内的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因此,民族问题在本质上就是阶级问题,唯有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多重大山,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这种将民族命运与阶级命运相统一的深刻认知,构成了蒋光慈文学作品民族价值观的思想基石。其代表作《哀中国》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阶级解放的核心诉求。诗人面对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惨状,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对阶级压迫现实的强烈不满与尖锐批判。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我愿跑到那昆仑之高巅,/做唤醒同胞迷梦之号呼;/我愿倾泻那东海之洪波,/洗一洗中华民族的懒骨。”^{[3]105}这里的“唤醒迷梦”与“洗刷懒骨”,绝非简单的民族性改造呼吁,其深层所指是唤醒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意识,激发他们从麻木、顺从的奴隶状态中觉醒过来,认识到自身苦难的阶级根源,并奋起抗争。这种呼唤超越了单纯的斗争口号,蕴含着对广大民众进行阶级意识启蒙的强烈政治期待。

蒋光慈并没有让这种呼唤仅仅停留在诗歌表达的情绪层面,而是“凭个人的热情,按阶级论文学观念、按他理解的中国革命斗争现实来演绎他的人物故事”^[6],并通过文学叙事将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为一场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在《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等小说中,蒋光慈有意将笔下的叛逆者、革命者置身于二七大罢工、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 20 世纪 20 年代风起云涌的真实革命洪流之中。小说通过描写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地参加斗争,艺术地再现了工农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与不断壮大,昭示了只有他们才是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真正历史主体。这种鲜明的阶级视角使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价值观与当时资产阶级倡导的民族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它否定了试图通过改良或依附某一强权来实现民族独立的幻想,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内部存在的阶级对立与利益冲突,从而将民族解放的诉求牢牢锚定在最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价值观因其革命的彻底性和人民性,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方向,也使其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左翼文学早期探索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2.3 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在彰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追求阶级解放的同时,亦表现出对现代民族文化重构的深刻参与。这一重构并非简单的文化复归或传统接续,而是在革命话语的激荡下,对民族精神内涵与表达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它一方面赋予“民族”以鲜明的阶级性与革命性导向,另一方面则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谱系中,重新锚定民族文化的坐标,使其既葆有本土特质,又汇入国际革命的洪流,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政治价值。

蒋光慈革命文学蕴涵的民族文化重构观念,首先体现为对“人民性”与“革命性”的价值重铸。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民族”不再是一个抽象而整体的概念,其主体被明确界定为受压迫、求解放的工农大众。例如《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广大农民,《短裤党》中奋起反抗的工人群众,这些人物群像承载着崭新的民族精神——一种敢于打破枷锁、主宰自身命运的战斗品格。蒋光慈革命文学强力摒弃了为旧统治阶级所垄断、常常与封建礼教纠缠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写法,转而歌颂劳动人民质朴、坚韧、敢于反抗的革命品质。这种对民族文化主体的重新定义与对民族精神的阶级性升华,打破了以往传统本位的历史叙事,使民族文化重构奠基于阶级斗争、人民解放的诉求之上,从而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其次,这一重构过程亦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革命化运用。蒋光慈并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试图从中择取出具有阶级性与斗争性的元素,予以改造和转化。他时常有机借用、化用古典文学的意象或语言节奏,为其注入全新的革命内涵。例如,其作品中常出现的“风暴”“雷霆”“烈火”等意象,既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传统意象一脉相承,又被赋予了摧毁旧世界、迎接新生活的鲜明革命象征意义。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革命文学创作上既建立起与无产阶级大众读者的连接,又实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展现出革命文学创造性地吸纳传统文化资源以构建自身话语品格的努力。再次,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始终秉持着阶级立场上的民族自信,致力于构建一种“革命的民族形式”。他一方面积极译介、学习苏俄等国革命文学的经验,另一方面,又不懈探索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来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的小说力图贴近无产阶级大众的审美习惯,语言追求通俗明快而又充满激情,叙事结构注重情节与冲突,这些都是其探寻革命文学民族化形式的实践。其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既具有无产阶级革命

思想高度,又能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所感动的文学形式,从而使革命文化真正在民族的土壤中扎根生长。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是其整个民族价值观有机而深刻的组成部分。它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守成或简单的欧化倾向,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阶级观点重新审视和淘洗传统文化,并以革命实践的需要为依归,致力于构建一种崭新的、属于人民大众的、革命化的民族文化。这一重构努力,不仅为其反帝反封建、阶级解放与国际主义的诉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载体与情感凝聚力,也为中国左翼文学处理民族性与革命性、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早期范式。

2.4 国际主义的开放视野

蒋光慈文学作品中澎湃着炽热的民族情感与革命激情。然而,他强烈的民族价值观念并未导向封闭、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始终秉持着一种宏大的国际主义开放视野。

蒋光慈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绝非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孤立进程。他深刻地洞察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一种国际性压迫,中国的问题是世界性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革命必然也是世界革命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思想在其早期诗集《新梦》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呈现。在《莫斯科吟》里,他歌颂“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轰冬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7]10},盛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7]10},并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个光辉的参照系,为所有被压迫民族指明了一条可行的解放道路。他对革命领袖列宁的歌颂,同样超越了国界。在《临列宁墓》中,他赞颂列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领”,是“伟大的红星”“光亮的明灯”^[8],其光辉普照世界,而非独耀一邦。这象征着革命真理的普遍性,其精神遗产属于全人类的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在《太平洋中的恶象》等诗中,他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国际帝国主义,并发出了跨越国界的呼吁:“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罢,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8]这里的“我们”不是仅指中国人,而是包括了所有在帝国主义铁蹄下呻吟的“远东”人民,这是一种清晰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阵线意识。最能体现其国际主义精神自觉的,是他在《文学专号》创刊号上发表的序诗。诗中激昂地宣告:“我们要联合全世界命运悲哀的人们,从那命运幸福的人们之宝库里,夺来我们所应有的一切!”^[9]这段话极具理论深度和革命感召力。它清晰地划分了“我们”(全世界无

产者和被压迫者)与“他们”(国际资产阶级和压迫者),并将民族斗争的最终目标定义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全球范围的资源与命运再分配。这使得他的民族主义不再是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最高单位的民族主义,而是以民族解放为当前任务、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最终导向的新型价值观。

总之,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价值观具有国际主义的开阔视野。他坚信中华民族的真正解放,必须融入到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共同斗争的洪流之中。这种将民族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相连接的价值观,不仅使其作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辉,也为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民族认同与世界公民责任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和思想启示。

3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艺术表现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也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得以呈现。考察其民族价值观的艺术表现特色,有助于我们理解它是如何被有效呈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3.1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蒋光慈的文学作品既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又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这种艺术特点使其民族价值观的呈现既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又具有理想的光辉。一方面,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国的苦难现实。《哀中国》中的诗篇描绘了“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3]¹⁰⁴的民族危机景象。《少年漂泊者》则以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展现农村青年汪中父母被地主逼死后,他不愿屈服于地主,四处漂流,饱受苦难的经历。这些现实描写使其民族价值观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蒋光慈又是一位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乐观作家。他认为:“倘若厌弃旧社会,而又对于将来社会无希望的,也不能做革命文学家。”^[2]他始终抱着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进行创作,这与革命低潮时期很多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悲观、彷徨情绪相比,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亮丽色彩。在《短裤党》中,工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上海政局却随着北伐军的临近而越来越有利于工人阶级,人们倍受鼓舞,斗志昂扬地准备下一次起义。这种乐观主义情绪使其民族价值观具有积极向上的感召力。

3.2 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蒋光慈将文学视为战斗的武器,强调作品的政

治意义,但他并非忽视艺术性。相反,他努力在作品中实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就使其民族价值观的表现既具有思想上的深刻性,又具有艺术上的感染力。钱杏邨曾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一书中评价其诗集《哀中国》“表现了有希望的青年对于萎靡不振,军阀专横的故国的哀愁和社会的诅咒”,“宝藏着伟大的光明的希望的前途”^[4]。这一评价既肯定了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也间接承认了其艺术成就。蒋光慈的诗歌艺术风格独特:“感情奔腾,气势豪放,深沉的内在节奏和强烈的思想旋律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富于那个时代精神的感染力量。”^[10]这种艺术特点使其民族价值观的表现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充满了情感的冲击力和艺术的感染力。即使是在表达悲愤之情时,也保持着艺术的张力,如“哎哟!我的悲哀的中国啊!/我不相信你,永远沉沦于浩劫,/我不相信你无复兴之一日。”^[10]

3.3 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在小说创作中,蒋光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为其民族价值观的表现提供了有效的形式载体。他的小说大多遵循“恶势力迫害——人民反抗——暂时失败——光明未来”^[2]的叙事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也表明了对革命进程的理解和期待。在《少年漂泊者》中,农村青年汪中尝尽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后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虽然他在战场上牺牲了,却获得了另一种新生。《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经历了糟蹋身体以报复社会的迷茫绝望期之后,最终在工人群众中洗涤了自己,走向光明。《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农民自卫队虽然遭受敌人重创,领导人李杰牺牲了,但他们最终成功突围到“金刚山”入伙,胜利就在前方。这种叙事结构模式的创新为革命文学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被后来研究者称为“蒋光慈模式”^[11]。这种叙事结构模式所表达的革命故事情节,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也为当时苦于找不到出路的青年指明了人生方向,他们受此影响纷纷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从其民族价值观表现的角度来看,蒋光慈初步建构的这种革命文学叙事结构风格,不仅鲜明反映了其反帝反封建民族意识和追求阶级解放的民族价值观内容,而且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弘扬的集体主义、英雄人格、乐观精神等民族价值观内容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4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蒋光慈虽然生活在 20 世纪初,但其文学作品所

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入研究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价值观体系。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不仅开创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实际相结合的先河,为后来的革命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文学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许多青年正是通过阅读蒋光慈的《新梦》《少年漂泊者》等文学作品树立了反帝反封建和阶级解放的民族观念,从而积极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从当代价值视角来看,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建构具有启发意义。在民族复兴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既需要坚持民族立场,又需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持开放的国际视野。蒋光慈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展示了一种平衡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可能途径。二是其关注底层人民命运的阶级视角,为当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历史参考。蒋光慈始终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为其呐喊和斗争。这种关注阶级解放、关心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其民族文化的重构努力,即通过革命文学创作积极探索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蒋光慈革命文学作品既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弊病,又汲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资源,呈现出一种兼具阶级斗争和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表达。这种文化自觉与创新意识,对当前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示范作用。蒋光慈的探索启示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开放包容与自我革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需要从蒋光慈等革命先辈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建构一种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视野,既关注国家命运又关怀人民福祉的民族价值观。

5 结论

蒋光慈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其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念具有丰富内涵和

独特品质。这种民族价值观的形成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峥嵘岁月、阶级斗争的时代现实的深刻影响。其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为基础,阶级解放诉求为核心动力,革命文学中的民族文化重构为实践路径,国际主义视野为全局观照,共同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民族价值观念体系。在民族价值观的艺术呈现上,蒋光慈的文学作品通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以及叙事结构的创新,使其表达既具有思想上的深刻性,又具有艺术上的感染力。

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深入研究和探讨蒋光慈文学作品蕴含的民族价值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也能为我国当代民族价值观的建构提供历史经验和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 [1] 张茜. 辨认远去的身影:蒋光慈“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回溯[J]. 唐山学院学报, 2024(5): 67-74, 88.
- [2] 潘应. 论蒋光慈小说的叙事结构[N]. 皖西日报, 2023-11-23(6).
- [3] 蒋光慈. 蒋光慈文学精品选[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
- [4] 张大明. 《哀中国2》的简介——文学辞典[Z/OL]. (2025-07-11) [2025-08-29]. <http://ld.newdu.com/21658.html>.
- [5] 谢昭新. 论俄苏文学对蒋光慈文学创作的影响[J]. 江淮论坛, 2010(2): 153-160.
- [6] 姚玳玫. 1925-1931: 阶级论美学的初期实践——以蒋光慈小说为考察中心[J]. 文学评论, 2016(4): 35-45.
- [7] 余学玉, 江琼. 皖西现代作家研究[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7.
- [8] 陈红梅. 《新梦》: 中国革命文学的先声[N]. 文艺报, 2018-09-17(7).
- [9] 彭琼, 潘松. 蒋光慈诗中的先锋战歌[N]. 学习时报, 2023-12-15(A3).
- [10] 佚名. 蒋光慈与《哀中国》[EB/OL]. (2016-04-28) [2025-05-12]. https://www.sohu.com/a/72234112_220012.
- [11] 彭正生, 宗珂. 《少年漂泊者》与革命文学的蒋光慈模式[J].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38-42.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藏山稿外编》成书考

薄晓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文理学院/文化艺术学院,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以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藏山稿外编》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学与版本学的视角,分析其编纂时间、编纂动机、选录标准及篇目来源。研究表明,《藏山稿外编》的编纂时间在康熙九年(1670)八月十五日之后至十一月之前;编纂动机具有多重性,包括对《悬榻编》的补遗、对诸多小说的保存及对丧子巨痛的排遣;选录标准偏重于收录小说类作品及反映世道人情的奇文;篇目主要源自《悬榻编》,且在选录过程中遵循了“以类相从”原则。此研究为清初遗民文言短篇小说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分析视角。

关键词:《藏山稿外编》;《悬榻编》;徐芳;“以类相从”;成书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18-12

Compil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Hand-Copied Version of *Cangshanggao Waibian* Held by the Nanjing Library

BO Xiaojing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Culture and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t Karamay, Karamay, 834000, Xinjiang)

Abstract: It conducted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in this paper into the compil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hand-copied version of *Cangshanggao Waipian*, held by the Nanjing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 it analyzed the compilation timeline, motivations, selection criteria, and sources of the entries in this manuscript.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Cangshanggao Waibian* took place between August 15th and November of the ninth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1670). The motivations behind its compilation were multifaceted, encompassing the supplementation of *Xuantabian*, the preservation of numerous novels, and the alleviation of the author's profound grief over the loss of a child. The selection criteria leaned heavily towards including fictional works and extraordinary narratives that reflected societal conditions and human sentiments. Most of the entries in this manuscript originated from *Xuantabia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grouping by category during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is study will offer a fresh case study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collec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short stories by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loyalists.

Key words: *Cangshanggao Waibian*; *Xuantabian*; Xu Fang; grouping by category; compilation and formation

徐芳(1618-1671),字仲光,明建昌府南城人,崇祯十四年(1641)任泽州知州,隆武元年(1645)任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隆武二年(1646)任翰林编修,入清后不仕,于南城麻姑

山系籍为僧^[1],隐居于南城荷叶山中,以堪輿术为治生手段。《藏山稿外编》为徐芳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编纂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孤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当前对于明遗民徐芳的现存著述,仅《诺皋

收稿日期:2025-05-17

作者简介:薄晓婧(1991-),女,内蒙古赤峰人,讲师,博士。E-mail:1259353486@qq.com

广志》的成书过程受到学者们的专门探讨,而徐芳编纂的另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藏山稿外编》,相较于可能由杨复吉选编的《诺皋广志》,不仅在数量上远胜后者十倍之多,更为珍贵的是,还收录了徐芳人生最后几年的作品。因而《藏山稿外编》的成书,同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当前学界对于《藏山稿外编》成书问题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编纂时间

关于《藏山稿外编》一书的编纂时间问题,目前

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我们需要考证徐芳编纂此书的时间上限及下限。

1.1 时间上限

1.1.1 《藏山稿外编》中记录的各篇作品写作时间

马晴在《藏山稿外编·出版说明》中做出如下推测:“结合《藏山稿外编》记录的时间推测,南京图书馆藏《藏山稿外编》应是徐芳于去世前在扬州游历时,赠与郑侠如或郑侠如据徐芳稿本抄写。”^{[2]2-3}可见,《藏山稿外编》所载作品中记录的时间,尤其是该篇作品的写作时间,可以作为研究此书编纂时间的一个重要线索。具体详见表1。

表1 《藏山稿外编》所载作品情况

篇目	写作时间	册次	篇次/每册总篇数
《樵城箕仙纪》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	8	1/24
《李卓吾让骂者》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冬	19	16/23
《鬼搏地师》	康熙元年壬寅(1662)夏	24	17/17
《藏金化水记》	康熙四年乙巳(1665)	14	26/31
《猪斋公记》	康熙五年丙午(1666)秋	19	2/23
《鬼化虎记》	康熙五年丙午(1666)	8	18/24
《再生梦纪》	康熙七年戊申(1668)正月	4	12/17
《地震非一》	康熙七年戊申(1668)	22	24/41
《人指猪》	康熙八年己酉(1669)六月十五日夜	22	32/41
《震雷续记》	康熙九年庚戌(1670)	10	11/13
《许太翁考终记》	康熙九年庚戌(1670)	6	23/23
《人头蟹》	康熙九年庚戌(1670)	20	7/28
《嗜鳖纪报》	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十五日	20	8/28

据表1可知,《藏山稿外编》中载录的作品写作时间并不一致,先后的时间跨度有十余年之久。苗蕃《祭徐仲光文》云:“康熙庚戌十一月廿四日,仲光先生卒于祁门舟次。”^[3]康熙九年庚戌(1670)——徐芳人生的最后一年,他仍旧进行创作。

康熙九年庚戌(1670)三月,徐方舟行至南昌,遇见同郡人杨文升,听其讲述邻人梁仁圣被雷所击的异事,于是据此作《震雷续记》。此文载:“予庚戌三月过章门,遇乐安杨文升,言其邻人梁仁圣为雷所震事甚异。”^{[2]182}

康熙九年庚戌(1670)春,徐芳观阅汤来贺(号惕庵)所著的《内省斋文集》,并为之作序^[4]。此文集中有《许仲容封翁传》一文,描述了许明贤的品行及其去世时的异事。通过阅读此文,徐芳对许明贤有了初步的认识。不久,徐芳前往扬州,结识了许明

贤之子许承宗、许承宣及许承家。通过与三人的交往,徐芳进一步了解到许明贤逝世时的奇异场景,遂作《许太翁考终记》一文:

维扬许太翁仲容先生,笃行君子也。生平诚恻端谨,言动不苟,而乐善好施,人皆庄而式之。三子,长念修,太学。仲力臣、季师六皆夙负文章名。而师六举丙午南省乡试;力臣以诸生贡,入太学,门第显盛……昨岁己酉四月……于是扬之人竞传太翁死而神……近读予友汤惕庵所为翁传,行至高,其称说不无近怪,颇疑之。及游广陵得交念修、力臣、师六三君……而三君间为予述翁生平与所以训于后者……其事足以劝也,为志而广之,以信惕庵之说。^{[2]114-116}

许明贤,字仲容,明末清初著名徽商,生有三子:长子许承宗,字念修;次子许承宣,字力臣;幼子许承

家,字师六。

约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初,徐芳从许承家处听闻吴翁梦人头蟹事,遂作《人头蟹》一文。《人头蟹》云:“予友许师六与此翁善,述其异。”^{[2]382}徐芳还从许承宣处听闻仪真某生嗜蟹得报异事,遂于八月十五日在扬州旅舍创作《嗜蟹纪报》一文。其文曰:“此旬日内事,予友许力臣语予……庚戌中秋日,记于广陵旅次。”^{[2]383-384}

《许太翁考终记》《震雷续记》《人头蟹》《嗜蟹纪报》四文皆是徐芳在旅途中创作,分别被《藏山稿外编》第六册、第十册、第二十册、第二十册收录,四者皆作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

1.1.2 《藏山稿外编》的抄录方式

康熙九年庚戌(1670)是否为徐芳开始编纂《藏山稿外编》的时间,这个问题还要结合徐芳抄录《藏山稿外编》的方式来论定。《藏山稿外编》或为徐芳边创作边抄录,或为徐芳创作完所有作品之后再进行抄录,而具体是哪种抄录方式,需要根据以上四篇作品在相应书册中的篇次进行论证。

《许太翁考终记》一文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六册内,第六册总共二十三篇作品,而此文正位于最后一篇。可见徐芳抄录此文的时间具有以下两种可能性:或其早已抄录好第六册中的二十二篇作品,由于此文写作时间偏后而后抄录进去,从而成为最后一篇作品;或其按照编纂好的顺序对这二十三篇作品进行抄录,此文恰好是第六册最后一篇。

《震雷续记》一文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十册内,第十册共有十三篇作品,此文位列第十一篇。此文后面的第十二篇、第十三篇作品分别为《异梦记》《兵荒册记》,此二文中未载录异事发生的时间或作品的写作时间,无法明确此文写作时间在《震雷续记》之前抑或之后。因而,《震雷续记》如同《许太翁考终记》一样,其抄录时间亦有两种可能性。

《人头蟹》《嗜蟹纪报》二文皆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二十册内,第二十册总共有二十八篇作品,此文分别位列第七篇及第八篇。根据列于此文之后的作品的写作时间,基本上可以明确《藏山稿外编》的抄录方式。第十篇作品为《鬼畏戒牛人记》,此文曾收录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刊刻的徐芳文集《悬榻编》卷六中,篇名为《鬼畏戒牛人纪》。《藏山稿外编》第二十册中第十篇作品的创作时间不晚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而第八篇作品的创作时间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十五日,可见徐芳并未按照作品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抄录。据此可以推测,徐芳当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十五日后将他

十余年来所创作的作品进行编选,最后一一抄录。因此《藏山稿外编》编纂时间的上限为不早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十五日。

1.2 时间下限

为了确定徐芳编纂《藏山稿外编》的时间下限,我们需要将这一时间与康熙九年庚戌(1670)秋徐芳在扬州客居的经历相结合来进行综合考量。徐芳至扬州后,除结识许承宗、许承宣、许承家三兄弟外,还与郑侠如、孙枝蔚、汪楫、吴嘉纪等人相往还。

郑侠如请徐芳为其词集《休园诗余》作序,序文云:“(郑侠如)近复出其所制诗余数十首示予……康熙庚戌秋,盱江年同学弟徐芳拜手书。”^[5]从序文中,我们了解到徐、郑二人曾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秋相会。由于《藏山稿外编》第一册题有“邗上郑侠如士介阅”字样,说明徐芳曾将此书稿本交予郑侠如观阅。然而在《休园诗余序》一文中,徐芳并未谈及此事,且目前也未见其他文献资料有相关记载。因此我们推测,徐芳将《藏山稿外编》稿本交予郑侠如观阅的时间,可能是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秋,亦有可能是在同年冬。

徐芳在扬州期间曾结识汪楫,此时徐芳之弟徐藻(字叔采)在侧。汪楫听闻徐藻之母饶氏寡居二十余年并苦心抚育其子一事,于是作《林中鸦为徐叔采》^{[6]707}一诗。徐芳乘船离开扬州之时,汪楫前来送别并作《长歌答徐仲光先辈》一诗:“葛巾野服只疑老,岩谷交臂偏作江南行……莼羹鲈秋风远,君挂归帆余亦返。”^{[6]707-708}在汪楫诗集《山闻诗》中,此诗之后有《庚戌初冬松魏冰叔还章江触绪怀人遂成十首》一诗,此诗之前有《雨中同唐耕坞舍人、施愚山少参、刘公献考功、程穆倩、孙无言、豹人诸子泛舟红桥》一诗。孙枝蔚《溉堂集》卷三中的诗歌列入“庚戌五言律诗”之下,载有诗歌《五月雨中,汪舟次招同唐祖命舍人、施愚山少参、刘公献考功、穆倩、无言泛舟至红桥,各赋二首》^[7]。据以上材料可知,康熙九年庚戌(1670)五月,施闰章与汪楫、孙枝蔚等人曾于扬州红桥泛舟,并在当场各赋诗两首。由此看来,汪楫《山闻诗》所载诗歌大致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长歌答徐仲光先辈》的写作时间不晚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初冬,初冬即农历十月,因而徐芳离开扬州的时间不晚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十月。据此推知,徐芳编纂《藏山稿外编》的时间下限不晚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十月。

综上,《藏山稿外编》的编纂时间上限为不早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十五日,下限为不晚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十月,其编纂时间为康熙九年庚

戊(1670)八月十五日后,同年十一月之前。

2 编纂动机

关于《藏山稿外编》的编纂动机,大致可以根据此书的命名、观阅此书的人士及徐芳的丧子经历来推断。

2.1 对《悬榻编》的补遗

《藏山稿外编》中的“外编”一词,意为正书以外带补遗、补缺性质的别编。《藏山稿外编》之名与徐芳文集《藏山稿》密切相关。《藏山稿》有十二卷,其中部分作品被徐芳知己苗蕃编选、刊刻为《悬榻编》。

在《悬榻编》刊刻后,其中收录的小说尤为受人青睐。时人钱谦益、方以智、文德翼等对此赞赏有加。钱谦益认为这些作品“纪物变”,其喜者、怒者、哀者、诡谲者皆有妙处^{[8]400};方以智视之为《南村辍耕录》缀集,称其“申因貳之报,以醒挽近之声聒”^{[8]396};文德翼将之比作《诺皋记》及《夷坚志》,认为其“莫不令人濯魄而洞心”^{[8]398-399}。于是,徐芳有意将更多的小说合为一集,以补《悬榻编》之遗,使其发挥出更大的教化人心的作用。至于为何不将这个小说集命名为《悬榻外编》,而是《藏山稿外编》,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这与徐芳平时对其文集的称呼有关。《悬榻编》一书为苗蕃命名,徐芳则更习惯称其旧名《藏山稿》;其二,《悬榻编》由苗蕃选编、评点、刊刻,书名是为了纪念苗蕃、徐芳二人如同陈蕃、徐稚一般的知己之情。而徐芳自编的小说合集,苗蕃并未参与其中,因而此书的命名与《悬榻编》无关。

徐芳补遗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藏山稿》中未被《悬榻编》选编的作品;二是苗蕃在选编《悬榻编》时,曾拟定《悬榻编》目录,最终目录中虽有篇名但正文未见刊载的作品;三是徐芳在《悬榻编》刊刻后的新作。

关于第一种,《悬榻编》刊刻时间为康熙六年(1667)丁未,《藏山稿外编》中写作时间在此之前的作品,当为未被苗蕃选中的《藏山稿》中的作品。如《鬼搏地师》写作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藏金化水记》写作于康熙四年乙巳(1665);《猪斋公记》写作于康熙五年丙午(1666)。

关于第二种,《悬榻编》第一卷前有全书的总目录。其目录中的部分篇目未见书中载录。主要有:卷五目录中的《象还米价》《樵避端午》《牛知七夕》《鱼知善地》四文,卷六目录中的《善人免厄纪》。徐芳在《藏山稿外编》中对此进行补遗,第十九册载有

《象还米价》《鱼择善地》《牛知七夕》《樵知端午》四文,第二十三册所载第一篇作品为《善人免厄记》。

关于第三种,《悬榻编》刊刻后,徐芳的新作主要有:《再生梦纪》,写作于康熙七年戊申(1668)正月;《人指猪》,写作于康熙八年己酉(1669)六月十五日夜;康熙九年庚戌(1670)所作《震雷续记》《许太翁考终记》《人头蟹》《嗜鳖纪报》等。

值得注意的是,徐芳并非将《藏山稿》中的全部小说编入《藏山稿外编》之中,只是选择部分小说编入。有数篇《悬榻编》所载录的小说未被徐芳选入《藏山稿外编》之中,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未选入作品

卷次	作品名
卷三	《鹤复仇记》《孝童记》《半面人记》
卷四	《海雷记》《盱二绅记》《太行虎记》《放鱼小记》 《雷州盗记》《峰蒲记》《义犬记一》《义鸡记》 《潘余合璧纪》
卷五	《辛巳纪梦》《猴梨园》《蚁队长》《蛙教授》《雀先生》 《犬春》《虫》《鼠窃》《漏捕》
卷六	《七义赞》《雷剥皮》《雷字》《陈进士奇报记》 《蛛皮》《城门前谶》《壁中刀钱》《肉身不坏》 《遥神巧隐》

由表2可知,《藏山稿外编》的补遗并非是收录徐芳所作全部小说,而是有选择地收录大部分小说。

2.2 对诸多小说的保存

徐芳一直以来心怀存国史之念,他将文集命名为《藏山稿》正含此意。苗蕃在谈及《藏山稿》时曾言“藏山留副今迁史”^[9],意为徐芳心怀司马迁一般的志向,为了达成如同司马迁一般“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目的,以《藏山稿》作为书名,期望其中的诸多史料能够流传后世。

明末清初战乱不断,贼寇常常出没。徐芳曾对曾二槐说:“入闽之后,穷窘益增,行者栉于冠盗,无尺布之余,居者括于兵戎,无粒米之积。”^[10]不仅徐芳的钱财衣食在此时被抢夺一空,而且顺治三年丙戌(1646)以前的创作亦为贼寇所毁,他曾与钱谦益谈及此事:“丙戌以前小有呖语,皆毁于寇……所可存者,才得十册,名曰《藏山稿》,散在白下诸知己处。篋中随携,仅存二册。”^{[8]555-556}

为了确保现存手稿不会遭到毁坏或遗失,徐芳采取了预防措施,将《藏山稿》分散存放于南京好友处,而自己仅随身携带两册手稿。正因如此,《藏山稿》中的部分作品才得以避免失传。其友人周亮工

将徐芳六十余篇文章收录在《尺牋新钞》《结邻集》《藏舛集》《赖古堂文选》《瑞木纪》等著作中,从而使徐芳部分书信、散文被保存下来。晚清时人翁同龢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初九日(1903 年 6 月 4 日)在日记中写道:“看《赖古堂尺牋初编》,从金门借得,是当时习气,内徐芳(仲光,南城人,有藏山初二集)数通,奥折清快,别成小品文字,在第六卷。”^[11]翁同龢正是通过周亮工选编的《尺牋新钞》了解到徐芳其人其文。

徐芳常年隐居于南城荷叶山,在山中也存有部分《藏山稿》手稿。《(乾隆)建昌府志》卷三载有此事:“荷叶山在西南七十里,明徐芳少时读书山中,藏稿山中。”^[12]事实上,荷叶山作为一处小县城中的山峰,徐芳的诸多著作很难长久地保存于此。康熙五年丙午(1666),徐芳在给方以智的书信中言“而自去夏之后,地方多盗,山居单弱,数月不获安枕”^[13]。可见徐芳虽身在荷叶山,但仍然担忧盗贼入山侵扰。

约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徐芳前往扬州见到许氏三兄弟后,八月十五日依然进行创作,此时尚未编纂《藏山稿外编》。不久,徐芳结识郑侠如,编纂了《藏山稿外编》,并将此书稿本交给郑侠如观阅。现存于南京图书馆的抄本《藏山稿外编》题有“邗上郑侠如士介阅”字样,可知此抄本最初被郑侠如收藏。正是由于郑侠如收藏,此书才得以保存至今,并未如同徐芳诸多诗集一样早已亡佚。

郑侠如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中乡试副榜^[14],徐芳是年亦中举,因此郑侠如被徐芳以同籍呼之。徐、郑二人交游的具体时间不可考。许承家与郑侠如为三代姻亲关系,郑侠如为其四舅、郑为光为其表兄,他常在郑侠如的休园中参与酬唱。许承家《郑中翰四十寿序》云:“吾许与长龄郑氏……凡三世姻云。盖两姓婚姻之多,殆未有如许与郑者也。犹记余少时追随舅氏良久,及长,遂与表兄晦中公共研席往来辨析,极一时唱酬之乐。”^{[15]515}许承家还在《重葺休园记》中言“于是来休园者,皆宇内名人,或相聚击筑歌诗,或与筹画世务”^{[15]493}。由此看来,徐芳到达扬州与许家三兄弟结识后,或经许承家的推荐前往休园与郑侠如会面。汪楫《长歌答徐仲光先辈》云:“江南贤主罗嘉宾,割鲜漉酒弹琴箏。”^[16]此句诗中的“江南贤主”当指郑侠如,徐芳作为嘉宾之一,与众人在休园一同饮酒听曲。

由于徐芳在当时诗坛上与李雯齐名,常与聂芳等人倡和,还曾在延津浦开诗坛讲诗,当时名士对其诗多有赞誉。黎士弘赞其诗清风肆好^[17],文德翼称

听其说诗精爽数百年^{[8]399}。徐芳诗集甚多,有《松明阁诗选》《荒径草》《砌蛩吟》《傍莲阁草》《蹈海吟》《行脚篇》《客吟》等。此外,徐芳还为苗蕃、方文、林之蕃等人诗集作序。此时郑侠如请徐芳为其词集作序,徐芳阅后赞其道寓于词,因而作《休园诗余序》。郑侠如雅好藏书,休园内有藏书室丛桂堂,内藏诸多珍稀书籍。徐芳进入休园参与文人诗会、雅集时,当对此藏书室有一定的了解。徐芳为防止所作诸多作品遗失,于是将四百六十五篇作品编纂为《藏山稿外编》,交予郑侠如观阅,进而郑侠如抄录后收藏此书抄本。

2.3 对丧子巨痛的排遣

康熙八年己酉(1669),徐芳长子徐一麟卒,时年二十二岁,徐芳为此悲痛至极,曾一度停止正常的出行活动。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芳早已约好此日与施闰章同游麻姑山,最终徐芳未能成行,为此施闰章作《麻姑山中迟徐仲光不至》一诗。《施愚山先生年谱》卷三:“(康熙八年己酉十一月)廿五日……又有《麻姑山中迟徐仲光不至》。”^[18]此后,苗蕃以孔子丧子后不曾以车为椁来劝解徐芳,徐芳从而决定恢复正常出行,在次年前往扬州。苗蕃《祭徐仲光文》载:“无何,有西河之不幸,予譬以东门之未尝,至矧请车为椁,不可徒行……公解颐而起,放舟维扬。”^[3]

徐芳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到作品之中,以排遣内心的悲痛,寻求精神的慰藉。根据徐芳这一年创作的《震雷续记》一文的内容,可管窥一斑。

《震雷续记》讲述了杨文升邻人梁仁圣被雷所击之事。梁仁圣在赡养其母时,藏匿了丰盛的食物,仅提供脱粟饭给其母,其母为此常常呼天吐愤。一日,两雷忽然从户外轰向梁仁圣。其母不仅脱下中衣裹住梁仁圣头部,还向上天祈求赦免其子。最终雷轻微击伤其母左臂,梁仁圣得以免死。徐芳在文后评道:

愚山子曰:以予所闻,震雷之异如仁圣者多矣。或以为事近于琐,夫人生之罪莫重不孝,而父母之情常隐忍护惜,不肯尽发其状。非弑逆大故,其庭列而罹于法者,十且不一二矣。夫人刑所阙,宜有天以补之,雷之介介焉所索,若专于不孝者,意在此也,然他日之所击快在于死,此举之妙更在不死。夫雷之所以必索不孝而殛之者,以其得罪于父母也。今既已怜而为之请矣,奈何必伤其母之心,以毙之乎……其全仁圣而小摧母之肱者,又若怪其不能割爱而终护之。

夫一老嫗之力,其不能与雷争,明矣,使雷必击仁圣,奚难?掣其母去之,置之拥翼不及之地,而加之斧哉,而竟舍之以去,明其为母全是子也。若曰:“吾之加诛于子,以不孝也,母既不终恨之,则我亦固可以舍之矣。”于是恩威生杀,不操于天,而还操于其母,凡是者,天之所以教也。夫诛不孝,常也。将诛而复赦之,则异甚,吾故于所闻,为之备纪,以梁嫗事终焉。^{[2]183-184}

徐芳此前所作关于雷震的作品,内容多为不孝子被雷击毙。而《震雷续记》则与此类作品不同,当与徐芳此时的心境有关。在不久前徐芳经历了丧子之痛,此时听闻梁母护子之事,亦触及护子之情。徐芳认为,故事中的雷之所以不击毙梁仁圣,是为了不伤其母之心,为母全子。梁仁圣的生死并非操控于上天之手,而是操控于其母之手。徐一麟之死使徐芳伤心至极却无力回天,只能借这个故事抒发对其子去世的悲痛之情及甘愿以身相护之念。

苗蕃在《祭徐仲光文》中曾提及徐芳“穷愁著书”,可见著书是徐芳排解愁苦的一种方法。徐芳编纂《藏山稿外编》的时间正处于其子去世不久,前往扬州是徐芳排遣悲痛的方法之一。因而在扬州编纂《藏山稿外编》亦是徐芳排遣悲痛的方法之一。

概而言之,《藏山稿外编》的编纂动机有三:一为对《悬榻编》的补遗;二为对诸多小说的保存;三为对丧子巨痛的排遣。徐芳在其长子去世的次年前往扬州,从《藏山稿》中选出一生所作的大部分小说,编为二十四册,对《藏山稿》的选本《悬榻编》进行补遗,以期发挥更大的教化功用。之后,徐芳将稿本交予郑侠如观阅。郑侠如抄录后将抄本收藏,从而保存了徐芳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

3 选录标准

徐芳从其总集《藏山稿》及别集《悬榻编》中选取小说四百六十篇,说类文一篇。另外,还从所作诗歌中选取四首,编成《藏山稿外编》一书。从整体上看,其选录标准为:偏重于选录小说类别,极少选录散文、诗歌等文人别集中的常见内容;偏重于选录反映世道人情的奇文,极少选录内容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

3.1 偏重于选录小说类别

《藏山稿外编》中的说类文《戒牛说》一文与诗歌《和岐亭戒杀诗》四首,皆收录在此书第二十册之中。此册内容主要与戒杀生、戒食肉有关,尤其是与戒杀牛、戒食牛肉有关。而《戒牛说》《和岐亭戒杀

诗》正与此主题相关,这说明徐芳选录这五篇作品的意图是为了进一步劝诫众人勿杀生食肉,对此册其他作品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也就是说,这五篇作品仅为徐芳随手附录,并非是此书的主体内容,而是附属内容。至于此书选录的四百六十篇小说,才是主体内容。

3.2 偏重于选录反映世道人情的奇文

钱谦益称徐芳“作为文章奇诡感荡”^[19],可见在钱谦益看来,徐芳的作品非常奇诡。《藏山稿外编》中有一些篇目直接带有“奇”字,如《双梦奇合纪》《闺中奇梦记》《王孝廉奇报记》等。《藏山稿外编》中作品的奇诡之处在于无论是志人还是志怪,皆与世道人情相关。徐芳在写志人小说时,侧重人物的一段异事,如再生、夙因、德报、前定、还魂、传箕、免厄、冥谴等。徐芳所写科举故事,不谈才华,不写风月,只注重品行。品行佳则科举得意,有鬼神暗中相助,品行劣则科举失利,有鬼神施以惩戒。徐芳所写动物不仅赋予其忠孝节义等人的节操,还令动物具有神奇的能力,能够向人类报恩与报怨。由人转世化生的动物则入寺庙修行,举止如得道之人一般。以上奇事皆与世道人情相关。正如苗蕃在徐芳《善行益算纪》一文文末评道:“文关世道,每于结处见奇。”^{[8]620}同时代的笔记体小说《原李耳载》亦以生活中的常事、常理见奇,许道基《原李耳载序》云:“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唯于伦常日用间无可见奇者,得其奇志之……得其奇而不累于理者志之……而后至奇以见。”^[20]

4 篇目来源

在徐芳的著作中,《悬榻编》《藏山稿外编》及《诺皋广志》皆收录小说。《藏山稿外编》中的部分篇目与《悬榻编》和《诺皋广志》存在篇目重合。

《悬榻编》作为《藏山稿》近十分之一内容的刊刻版本,其中收录了一百二十八篇小说。由此可推测,《藏山稿》所收录的小说数量至少达到数百篇之多。而在《悬榻编》刊刻后的三年,徐芳编纂了《藏山稿外编》,收录四百六十篇小说,其中有九十九篇与《悬榻编》中的篇目相重合。这一现象说明《藏山稿外编》的篇目主要来源于《藏山稿》与《悬榻编》。

《诺皋广志》作为徐芳的另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收录四十四篇小说,而《藏山稿外编》中有三十五篇与之重合。《诺皋广志》与《藏山稿外编》皆为徐芳所著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们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

4.1 《藏山稿外编》篇目非源自《诺皋广志》

《诺皋广志》收录四十四篇作品,有九篇未被《藏山稿外编》收录,有三十五篇被《藏山稿外编》收录。对于这三十五篇作品,《藏山稿外编》未按照《诺皋广志》所载顺序收录。如《诺皋广志》第十七篇为《康进士夙因》,第十八篇为《史状元前因》,而在《藏山稿外编》第十六册中,《康进士夙因记》列于第十七篇,《史状元前因》却列于第五篇。

关于《藏山稿外编》篇目来源是否与《诺皋广志》有关这个问题,需要先确定《诺皋广志》编纂、刊刻的时间在《藏山稿外编》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前者,《诺皋广志》当为《藏山稿外编》的篇目来源之一。如果是后者,《诺皋广志》则并非《藏山稿外编》的篇目来源。

《诺皋广志》现有版本为《昭代丛书》(丁集新编)本,《昭代丛书》由张潮、杨复吉、沈懋德陆续编成。张潮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至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编成《昭代丛书》甲、乙、丙三集,并将之刊印。杨复吉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至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编成丁、戊、己、庚、辛五集,但无力刊刻。沈懋德补编甲集至辛集六十种,于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刊刻。之后沈懋德续编壬、癸二集,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刊刻。最后沈懋德将之前抽换替出的六十种编为别集,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刊刻^[21]。

《昭代丛书》(丁集新编)共有三十七卷,《诺皋广志》列入新编卷第十七,由杨复吉编辑,杨复吉之孙杨揆嘉校字,沈懋德于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将之刊刻。杨复吉《诺皋广志跋》云:“乙未秋日,震泽杨复吉识。孙揆嘉肇初校字。”^[22]“乙未”即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本《诺皋广志》书名后,题有“南城徐芳仲光著”之句。杨复吉所辑《诺皋广志》的来源,则有两种情况:一为徐芳曾编纂文言短篇小说集《诺皋广志》,杨复吉据此进行编选;二为徐芳未曾编纂文言短篇小说集《诺皋广志》,杨复吉据徐芳其他著作进行编选。

关于第一种情况,目前尚未有文献记载徐芳曾编纂过文言短篇小说集《诺皋广志》。方志所载徐芳著述主要有《砌蛩吟》《傍莲阁草》《行脚篇》《憩龙山房制艺》《藏山稿》《悬榻编》,前三部为诗集,后三部为文集,并未提及徐芳所著小说集。目前未见《南城县志》提及《诺皋广志》,这说明此书在徐芳生前极有可能未曾刊刻。《(乾隆)南城县志》卷八载:“邑令苗蕃选其十之一,梓曰《悬榻篇》。其《憩龙山房制艺》及《砌蛩吟》《傍莲阁草》《行脚篇》《藏山全

稿》,宇内争传诵焉。”^[23]这说明在康熙六年(1667)丁未之前,徐芳的著述《憩龙山房制艺》《砌蛩吟》《傍莲阁草》《行脚篇》《藏山稿》已受到众人争相传诵。《悬榻编》卷三有“诺皋广志”这个类别名,假若“诺皋广志”不是《藏山稿》中的一个类别名,而是一部小说集之名,那么此书不可能籍籍无名,而是应当与《憩龙山房制艺》《藏山稿》等书一般被众人争相传诵。

康熙六年(1667)丁未,《悬榻编》刊刻。康熙九年庚戌(1670)十一月前,徐芳编成《藏山稿外编》。在康熙康熙六年(1667)丁未八月十三日后、康熙九年庚戌(1670)十一月前这段时间,徐芳或许曾编纂《诺皋广志》,但少有人知。自徐芳去世后,其著述仅刻本《悬榻编》及抄本《藏山稿外编》存世,其余著述皆已亡佚。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距离康熙九年庚戌(1670)有一百零五年,未经出版、未被徐芳好友收藏、少有人知的《诺皋广志》,当如同曾被众人传诵的《憩龙山房制艺》《砌蛩吟》《傍莲阁草》《行脚篇》《藏山稿》一样,早已亡佚,基本上《诺皋广志》的抄本不可能被财力有限、无法刊刻《昭代丛书》五集的杨复吉获得,并将之列于《昭代丛书》(丁集)中。

纵使徐芳在《悬榻编》刊刻后编纂过《诺皋广志》,但不久后徐芳去世,《诺皋广志》抄本未能得到妥善保存,当很快被时间湮没,难以在百余年后被杨复吉所见。由此看来,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诺皋广志》当由杨复吉据徐芳其他著作编选而成。《藏山稿》在乾隆年间当早已亡佚,《藏山稿外编》仅有孤本被郑侠如及郑氏后人收藏,在乾隆年间当未被众人所知,且《诺皋广志》虽有三十五篇与《藏山稿外编》重合,仍有九篇未被《藏山稿外编》收录,基本上杨复吉难以知晓《藏山稿外编》的存在。结合《诺皋广志》的作品全部与《悬榻编》篇目重合,可知杨复吉当是据《悬榻编》选编《诺皋广志》。

《诺皋广志》中的四十四篇作品,皆涵盖在《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作品、卷四“记”类作品之内。《悬榻编》卷三目录中的“诺皋广志”之名、《悬榻编》卷四目录中的“记”之名,分别如图4、如图5所示:

《诺皋广志》中的作品排列顺序与《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卷四“记”类作品顺序相同,如表3所示。



图4 《悬榻编》目录中“诺皋广志”之名



图5 《悬榻编》目录中“记”之名

表3 两种版本中的作品排序情况

《诺皋广志》目录	《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 作品目录	《义犬二》 《义鸡》 《怪病》 《怪病二》 《怪病三》 未载录 未载录 未载录 未载录 未载录 未载录	《义犬记二》 《义鸡记》 《怪病记一》 《怪病记二》 《怪病记三》 《游铸仙岩记》 《柳园纪事》 《重游苦竹馆记》 《游四明庵记》 《游龙潭寺记》 《游迎仙峰记》 《潘余合璧记》
《鹤复仇》	《鹤复仇记》		
《鬼赴讯》	《鬼赴讯记》		
《孝童》	《孝童记》		
《寒空僧》	《寒空僧记》		
《诉冤》	《邹令诉冤记》		
未载录	《神兵记》		
《神钺》	《神钺记》		
《十八公》	《十八公记》		
《半面人》	《半面人记》		
《冰莲》	《冰莲纪异》		
《王商异术》	《王商异术记》		
《天上十科》	《天上十科记》		
《马氏诫世篇》	《马氏诫世篇记》		
《柳氏之报》	《柳氏之报记》		
《城门鬼火》	《城门鬼火记》		
《蟹报冤》	《蟹报冤记》		
《骡报怨》	《骡报冤记》		
《康进士夙因》	《康进士夙因记》		
《史状元前因》	《史状元前因记》		
《马秦二生夙因》	《马秦二生夙因记》		
《绣衣僧》	《绣衣僧记》		
《报恩僧再生》	《报恩僧再生记》		
《飞鳌峰石书》	《纪飞鳌峰石壁字》		
《神告罗文肃公元》	《神告罗文肃公元》		

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涉及百姓起义抗清的《神兵记》未被收录外,《诺皋广志》收录了《悬榻编》卷三中“诺皋广志”类的全部作品。同时这些作品的收录顺序与《悬榻编》“诺皋广志”类作品的目录顺序相一致。此外,《诺皋广志》还收录了《悬榻编》卷四中的部分“记”类作品,这些作品几乎皆为志怪小说,且它们的收录顺序亦与《悬榻编》卷四“记”类作品的目录顺序相符。

由此可以推断,杨复古是在《悬榻编》卷三的“诺皋广志”类作品和卷四的“记”类作品中,挑选出四十四篇作品,并按照这些作品在《悬榻编》中的排列顺序进行了编排。最后杨复古选择了《悬榻编》

卷三目录中“诺皋广志”这一类别名作为这部选集之名。

约在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杨复吉编成《诺皋广志》。由于《诺皋广志》一书编纂时间远在《藏山稿外编》编纂时间之后,因而《藏山稿外编》的篇目来源仅与《藏山稿》及《悬榻编》有关,与《诺皋广志》无关。

4.2 源自《悬榻编》中的诸多类别作品

徐芳在编纂《藏山稿外编》时,主要依据《藏山稿》进行作品选编,同时他也参考了《悬榻编》。尽管《悬榻编》中的作品最初源自《藏山稿》,但在刊刻过程中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因此徐芳在编纂过程中同样选录了《悬榻编》中的作品。由于《藏山稿》早已亡佚,因而本文主要探究《藏山稿外编》源自《悬榻编》的篇目。《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卷四“记”、卷五“纪事”“杂纪”、卷六“铭赞篇”“荷山外纪”中共收录一百二十八篇小说。“诺皋广志”“荷山外纪”与“记”“纪事”“杂纪”“铭赞篇”等并列,皆为《藏山稿》及《悬榻编》中作品的类别之名,非为徐芳所编小说集之名。

4.2.1 源自卷三“诺皋广志”类作品

在《悬榻编》目录中,卷三包含“传”“诺皋广志”这两种类别之文。其中“传”类作品有《都御史方贞述先生传》《奇女子传》《柳夫人传》(目录中为《柳夫人传》,书页内为《柳夫人小传》)等九篇。其下为“诺皋广志”类作品(见表4),在《柳夫人传》篇目下首、《鹤复仇记》篇目上首题有“诺皋广志”四字,即自《鹤复仇记》至卷三末篇《李卓吾让骂者》二十六篇,皆为“诺皋广志”类作品。《藏山稿外编》中共有二十三篇作品源自《悬榻编》卷三的“诺皋广志”类,占据了此类作品的88%。

表4 两种版本中的“诺皋广志”类作品分布

《悬榻编》卷三 “诺皋广志”类 作品篇目(部分)	《藏山稿外编》篇目 (册次篇次)
《鬼赴讯记》	《鬼赴讯记》(第二十四册第十二篇)
《寒空僧记》	《寒空僧记》(第十一册第一篇)
《邹令诉冤记》	《邹令诉冤记》(第十八册第一篇)
《神兵记》	《神兵记》(第三册第六篇)
《神钺记》	《神钺记》(第十一册第三篇)
《十八公记》	《十八公记》(第十六册第四篇)
《冰莲纪异》	《冰莲纪异》(第三册第十二篇)
《王商异术记》	《王商异术》(第十二册第二十五篇)

《天上十科记》	《天上十科记》(第九册第三篇)
《马氏诫世篇记》	《马氏诫世篇》(第二十三册第九篇)
《柳氏之报记》	《柳氏之报》(第二十三册第八篇)
《城门鬼火记》	《城门鬼火记》(第二十四册第十三篇)
《蟹报冤记》	《蟹报冤记》(第十八册第十五篇)
《骡报冤记》	《骡报怨》(第十八册第十六篇)
《康进士夙因记》	《康进士夙因记》(第十六册第十七篇)
《史状元前因记》	《史状元前因记》(第十六册第五篇)
《马秦二生夙因记》	《马秦二生夙因记》(第四册第十七篇)
《绣衣僧记》	《绣衣僧记》(第十六册第十三篇)
《报恩僧再生记》	《报恩僧再生记》(第十六册第十四篇)
《纪飞鳌峰石壁字》	《纪飞鳌峰书石事》(第八册第二十一篇)
《神告罗文肃公元》	《神告罗文肃公元》(第十六册第八篇)
《纪李龙孙改名事》	《纪李龙孙改名事》(第十七册第五篇)
《李卓吾让骂者》	《李卓吾让骂者》(第十九册第十六篇)

据表4可知,《藏山稿外编》源于《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的二十三篇作品,抄录于第三册、第四册、第八册、第九册、第十一册、第十二册、第十六册、第十七册、第十八册、第十九册、第二十三册、第二十四册之中。徐芳在抄录这些作品时,并未遵循《悬榻编》中作品的排列顺序,而是根据作品的类别进行了分册抄录,如《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作品中的《鬼赴讯记》与《城门鬼火记》,皆被徐芳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二十四册之中,此册主要收录鬼神类作品。再比如《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作品中的《马氏诫世篇记》与《柳氏之报记》,皆被徐芳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二十三册之中,此册主要收录果报类作品。此外,徐芳在抄录同一类别的作品时,也未完全遵循《悬榻编》中作品的排列顺序,如《悬榻编》卷三“诺皋广志”类作品中的《十八公记》《康进士夙因记》《史状元前因记》《绣衣僧记》《报恩僧再生记》《神告罗文肃公元》等篇章,在《藏山稿外编》第十六册中的排列顺序则为:《十八公记》《史状元前因记》《神告罗文肃公元》《绣衣僧记》《报恩僧再生记》《康进士夙因记》。

4.2.2 源自卷四“记”类作品

《悬榻编》卷四下题有“记”字,仅收录“记”类作品。“记”类作品包括散文、小说,二者混杂排列,所载作品篇目最后一字为“记”字,如《傍莲阁记》《义鸡记》《游龙潭寺记》等篇章,仅有《柳园纪事》篇未带有“记”字。卷四共有三十四篇作品,《藏山

稿外编》共有十四篇作品源自《悬榻编》卷四的“记”类,占据此类作品的41%(见表5)。

表5 两种版本中“记”类分布

《悬榻编》卷四 “记”类作品 篇目(部分)	《藏山稿外编》篇目 (册次及篇次)
《许翁还金记》	《许翁还金记》(第一册第一篇)
《三足虎记》	《三足虎记》(第八册第十九篇)
《换心记》	《换心记》(第十三册第一篇)
《梦花潭记》	《梦花潭记》(第十三册第六篇)
《海舟记》	《海舟记》(第十三册第五篇)
《汴州雷记》	《汴州雷记》(第二十二册第十一篇)
《化虎记一》	《化虎记》(第八册第十五篇)
《化虎记二》	《化虎记二》(第八册第十六篇)
《神化虎记》	《神化虎记》(第八册第十七篇)
《鬼化虎记》	《鬼化虎记》(第八册第十八篇)
《义犬记二》	《义犬记》(第二十一册第一篇)
《怪病记一》	《怪病记一》(第十二册第二十二篇)
《怪病记二》	《怪病二》(第十二册第二十三篇)
《怪病记三》	《怪病三》(第十二册第二十四篇)

徐芳在编纂《藏山稿外编》时,特意将《悬榻编》卷四“记”类作品中的首篇作品《许翁还金记》安排在第一册的开篇,表明他十分重视这篇作品。《藏山稿外编》收录了源自《悬榻编》卷四“记”类的十四篇作品,这些作品分布于第一册、第八册、第十二册、第十三册、第二十一册、第二十二册之中。

在第八册的编排上,《藏山稿外编》展现了一种“以类相从”的抄录方式。徐芳在抄录《化虎记一》《化虎记二》《神化虎记》《鬼化虎记》之后,将远在这四篇作品之前的《三足虎记》置于《鬼化虎记》之后,这种编排方式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将多篇同类型的作品排列在前,而单篇同类型作品则紧随在后。

4.2.3 源自卷五“纪事”“杂纪”类作品

《悬榻编》卷五包含“书”“杂著”“纪事”“题跋”“杂纪”这五类作品。其中“纪事”“杂纪”这两类收录了小说。《悬榻编》卷五的“纪事”类作品共有六篇,其中五篇被收录于《藏山稿外编》中,占比为83%。而此卷“杂纪”类作品共有十三篇,其中也有五篇被《藏山稿外编》收录,占比为38%(见表6)。

在《悬榻编》卷五的“纪事”类作品中,《辛巳纪

梦》虽为首篇,却并未被徐芳选入《藏山稿外编》。徐芳选择了此篇之后的四篇作品,并将它们分别列入《藏山稿外编》的第七册、第八册、第十六册及第十二册之中。对于同为科举类作品的《卯闰纪事》与《纪王给谏失元事》,徐芳并未将它们抄录在同一册中。他创作了大量的科举类作品,这些作品被分散列入《藏山稿外编》的第七册至第十一册之中。因而《卯闰纪事》《纪王给谏失元事》等篇章可能因编排需要而被分散到了不同的书册之中,而非按照同一顺序进行抄录。

表6 两种版本“纪事”“杂纪”类作品

《悬榻编》卷五 “纪事”“杂纪”类 作品篇目(部分)	《藏山稿外编》篇目 (册次及篇次)
“纪事”类	
《卯闰纪事》	《卯闰纪事》(第十册第一篇)
《纪王给谏失元事》	《纪王给谏失元事》(第七册第三篇)
《纪秦生岳庙失明事》	《纪秦生岳庙失明事》(第八册第二十二篇)
《纪瞿辉老僧梦》	《纪瞿辉老僧梦》(第十六册第十六篇)
《木中瑞像纪》	《木中瑞像记》(第十二册第十一篇)
“杂纪”类	
《象还米价》	《象还米价》(第十九册第二十篇)
《樵避端午》	《樵知端午》(第十九册第二十三篇)
《牛知七夕》	《牛知七夕》(第十九册第二十二篇)
《鱼知善地》	《鱼择善地》(第十九册第二十一篇)
《天风揭榜》	《天风揭榜》(第十二册第二十一篇)

在《悬榻编》卷五的“杂纪”类作品中,虽然《象还米价》《樵避端午》《牛知七夕》《鱼知善地》这四个篇目出现在目录之中,但书内并未收录这四篇作品。这意味着在苗蕃刊刻《悬榻编》之前已经删去了这部分内容。然而徐芳对这四篇作品颇为重视,他依据《藏山稿》中的原文,将它们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十九册目录中。尽管徐芳对这四篇作品的顺序进行了些微调整,但它们依然被列在一起,保持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4.2.4 源自卷六“铭赞篇”“荷山外纪”类作品

《悬榻编》卷六包含“文”“铭赞篇”“荷山外纪”这三类作品。其中“铭赞篇”“荷山外纪”这两类收录了小说。“铭赞篇”这个类别包括“铭”类、“赞”类及“篇”类。“铭”类收录两篇铭文,“赞”类收录一篇赞文,“篇”类收录两篇小说。《藏山稿外编》有

两篇作品源自《悬榻编》卷六“铭赞篇”类作品,占据此类作品的 40%。“荷山外纪”类细分为“纪报一”“纪报二”“纪异三”及“纪梦四”四个子类别,其中“纪报一”收录十九篇作品,“纪报二”收录十篇作品,“纪异三”收录十八篇作品,“纪梦四”收录十一篇作品。“荷山外纪”类共收录五十八篇作品。在《藏山稿外编》中,共有五十篇作品源自此类别,占比为 86%(见表 7)。

表 7 两种版本“铭赞篇”“荷山外纪”类作品

《悬榻编》卷六中的“铭赞篇” “荷山外纪”类 作品篇目(部分)	《藏山稿外编》篇目 (册次及篇次)
铭赞篇	
《倚伏篇》	《祸福倚伏篇》(第九册第一篇)
《退福篇》	《退福篇》(第六册第一篇)
荷山外纪·纪报一	
《汝州妇记》	《纪汝州妇事》(第六册第七篇)
《人化牛纪》	《人化牛记》(第二十一册第十篇)
《活地狱记》	《活地狱记》(第十五册第八篇)
《纪王广文事》	《纪王广文冥谴事》 (第二十三册第十一篇)
《纪金陵焦公子事》	《纪金陵焦公子事》(第七册第四篇)
《剪径自杀》	《剪径自杀记》(第六册第九篇)
《淫为首恶》	《淫为首恶记》(第二十三册第十四篇)
《天火纪》	《天火纪》(第六册第八篇)
《雷震不孝一》	《雷震不孝一》(第六册第十八篇)
《雷震不孝二》	《雷震不孝二》(第六册第十九篇)
《雷震不孝三》	《雷震不孝三》(第六册第二十篇)
《雷震逆子》	《雷震逆子纪》(第六册第十一篇)
《雷震劣生》	《雷震劣生纪》(第六册第十二篇)
《雷震剽神脏盗》	《雷震剽神脏盗纪》(第六册第十四篇)
《雷震盗鸭人纪》	《雷震盗鸭人纪》(第六册第十五篇)
《纪金鸡峰神报事》	《纪金鸡峰神报事》(第二十二册第一篇)
《纪将乐张孝廉事》	《张孝廉纪报》(第二十三册第十三篇)
荷山外纪·纪报二	
《台阁子孙记》	《台阁子孙记》(第一册第九篇)
《心相记》	《心相益算记》(第一册第十篇)
《善行益算纪》	《善行益算记》(第一册第十一篇)
《善人免厄纪》	《善人免厄记》(第二十三册第一篇)
《善气弥祸》	《善气弥祸》(第二十三册第六篇)

《焚廩独免》	《焚廩独免记》(第二十三册第二篇)
《鬼助中式一》	《鬼助中式一》(第九册第八篇)
《鬼助中式二》	《鬼助中式二》(第九册第九篇)
《鬼助中式三》	《鬼助中式三》(第九册第十篇)
荷山外纪·纪异三	
《鬼畏戒牛人纪》	《鬼畏戒牛人记》(第二十册第十篇)
《试题豫知》	《试题豫知》(第十七册第八篇)
《岳神召守》	《岳神召守》(第十二册第二十篇)
《白衣救难一》	《白衣救难》(第十二册第十六篇)
《白衣救难二》	《白衣救难二》(第十二册第十七篇)
《邪不胜正》	《邪不胜正》(第十四册第二十二篇)
《钱司李附箕》	《钱司李附箕》(第十九册第一篇)
《樵城箕仙纪》	《樵城箕仙纪》(第八册第一篇)
《箕仙用药》	《箕仙用药》(第十二册第十篇)
《箕仙题海棠》	《箕仙题海棠》(第十二册第九篇)
《兔救妇难》	《兔救妇难》(第十二册第十八篇)
《蓝衫鬼拜主司》	《蓝衫鬼拜主司》(第九册第十二篇)
《豕宰鹤中丞虎》	《豕宰鹤中丞虎》(第十二册第十四篇)
《方伯龙富翁牛》	《方伯龙富翁牛》(第十二册第十五篇)
荷山外纪·纪梦四	
《异梦记》	《伎诚》(第十册第八篇)
《三酉堂记》	《三酉堂记》(第十五册第九篇)
《双梦奇合纪》	《双梦奇合》(第六册第二十二篇)
《刘生自诉得隽事》	《纪刘生自诉得隽事》(第七册第十二篇)
《戊午解元》	《戊午解元》(第八册第二篇)
《梦无字》	《梦无字》(第八册第三篇)
《一夜发白》	《一夜发白》(第八册第四篇)
《梦个字不字》	《梦个字不字》(第八册第九篇)
《冥中重朔望斋》	《冥中重朔望斋》(第十四册第三十一篇)
《司生奇梦记》	《司生奇梦纪》(第十七册第七篇)

在《悬榻编》卷六的“铭赞篇”类作品中,徐芳将“篇”类的全部作品抄录在《藏山稿外编》中,分别列为第九册、第六册的首篇。在《悬榻编》卷六的“荷山外纪”类作品中,“纪报一”类作品主要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六册及第二十三册内,“纪报二”类作品主要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一册、第九册及第二十三册内,“纪异三”类作品主要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十二册内,“纪梦四”类作品主要抄录在《藏山稿外编》第八册内。由此可见,《藏山稿外编》第一

册、第六册、第九册、第二十三册主要收录“纪报”类作品,第十二册内容主要收录“纪异”类作品,第八册主要收录“纪梦”类作品。

总之,《悬榻编》共收录一百二十八篇小说,《藏山稿外编》共有九十九篇作品源自《悬榻编》,所占比例高达84%。《藏山稿外编》有近20%的作品篇目源自《悬榻编》,尤其是源自《悬榻编》中的“诺皋广志”“荷山外纪”“纪事”“记”“篇”“杂纪”等类。徐芳在编纂《藏山稿外编》时,主要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并未严格依照《悬榻编》中小说的顺序进行抄录。《藏山稿外编》共二十四册,其中有十二册的首篇作品直接选自《悬榻编》,它们分别为:《许翁还金记》(第一册)、《退福篇》(第六册)、《樵城箕仙纪》(第八册)、《祸福倚伏篇》(第九册)、《卯闰纪事》(第十册)、《寒空僧记》(第十一册)、《换心记》(第十三册)、《邹令诉冤记》(第十八册)、《钱司李附箕》(第十九册)、《义犬记》(第二十一册)、《纪金鸡峰神报事》(第二十二册)、《善人免厄记》(第二十三册)。而其余十二册的首篇则主要源自《藏山稿》中除《悬榻编》外的其他篇目。

综上,《藏山稿外编》的编纂时间为康熙九年庚戌(1670)八月十五日后,同年十一月之前。此书编纂动机主要是徐芳对《悬榻编》的补遗、对诸多小说的保存及对丧子巨痛的排遣。《藏山稿外编》有近20%的作品源自《悬榻编》中的“诺皋广志”“荷山外纪”“纪事”“记”“铭赞篇”“杂纪”等类。

参考文献:

- [1] 祝廷锡. 竹林八圩志[M]. 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1932.
- [2] 徐芳. 藏山稿外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 [3] 李人镜. 南城县志[M].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1873.
- [4] 汤来贺. 内省斋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84-586.
- [5] 冯乾. 清词序跋汇编:第一册[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112-113.
- [6] 汪楫. 山闻诗[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7] 孙枝蔚. 溉堂集(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11.
- [8] 徐芳. 悬榻编[M]//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89册. 合肥:黄山书社,2015.
- [9] 苗蕃. 瀑音[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0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693.
- [10] 周亮工. 结邻集(上)[M]//周亮工全集:第12册.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79-380.
- [11] 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6)[M]. 北京:中华书局,2006:3451.
- [12] 孟昭. 建昌府志[M].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1759.
- [13] 徐芳. 悬榻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6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88.
- [14]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212.
- [15] 郑庆祐. 扬州休园志[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1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16] 汪楫. 山闻诗[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一百四十四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07.
- [17] 黎士弘. 托素斋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3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554.
- [18] 施念曾. 施愚山先生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4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91.
- [19]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902.
- [20] 李中馥. 原李耳载[M]//全清小说(顺治卷):第2册.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189.
- [21] 张潮,杨复吉,沈懋德,等. 昭代丛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
- [22] 徐芳. 诺皋广志[M]//全清小说(顺治卷):第6册.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49.
- [23] 范安治. 南城县志[M].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1752.

潘光旦《书〈冯小青全集〉后》辨误 ——兼论《小青仙事》的内容与价值

郑永辉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潘光旦所见的《冯小青全集》,事实上为上海图书馆藏《小青仙事》中《愁里句》的截抄本,因而据此写成《书〈冯小青全集〉后》一文产生了诸多讹误。按《愁里句》所显示的内容,该书为明代裘可知名通过降乩冯小青,在降乩过程中所作的诗文合集,并不存在潘文中提到的真伪和托名问题。《小青仙事》是明末裘可知名降乩小青,与其友人杜骥唱酬的诗集《愁里句》《小青仙集》的合刊本。这部乩诗别集不仅文学性强,而且呈现了科举视野下以扶乩为媒介的接受模式,与鬼神视野下以扶乩为媒介的地域文化书写,对于乩诗与文学之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潘光旦;冯小青;辨误;乩诗;《小青仙事》

中图分类号:G256.2;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28-07

Correction of Errors in Pan Guangdan's Aft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Feng Xiaoqing: A Discussion on the Content and Value of Xiao Qing Xian Shi

ZHENG Yongh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Fujian)

Abstract: The Complete Works of Feng Xiaoqing seen by Pan Guangdan is actually a truncated copy of Chou Li Ju from the Xiaoqing Xianshi collection housed in the Shanghai Library. Consequently, the article After Read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Feng Xiaoqing written based on this copy contains numerous error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displayed in Chouliju,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essays written by Qiu Kezhi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anneling Feng Xiaoqing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re is no issue of authenticity or pseudonymization mentioned in Pan's article. Xiaoqing Xianshi is a combined edition of Chouliju and Xiaoqing Xianji, a poetry collection composed by Qiu Kezhi and his friend Du Ji during the channeling of Xiaoq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is separate collection of channeling poems not only possesses strong literary qualities but also presents an acceptance model through the medium of channe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s well as regional cultural writing through the medium of channe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hosts and gods. It holds significant documentary value for research on channeling poems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Pan Guangdan; Feng Xiaoqing; identify errors; Ji (乩) poetry; Xiaoqing Xianji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近代著名学者,与叶企孙、陈寅恪和梅贻琦并称“清华四哲人”,在文学、诗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均有非凡的成就。潘光旦生平著述颇丰,如

《人文史观》《中国之家庭问题》《守住灵魂的底线》《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影响至今。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成名作《冯小青考》,经过数年的订补之后,编成《冯小青——一件

收稿日期:2025-06-03

作者简介:郑永辉(1994-),男,福建厦门人,博士研究生。E-mail:18950899347@163.com

影恋之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现代史学术上绕不过去的经典”^[1]。这部书是潘光旦继清代钱谦益、陈文述、近代陈寅恪之后，对于明代冯小青本事考证、现象阐释最为详瞻系统且新颖独到的专著。但是，在《冯小青——一件影恋之分析》出版后，1935年潘光旦在《人间世》第29、30期上又发表了《书〈冯小青全集〉后》一文，花费极大的气力考证所见的《冯小青全集》抄本为伪作，并推论伪作者的情况。事实上，《冯小青全集》并非作者刻意“作伪”，而是该书是《小青仙事》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潘光旦因客观因素的限制，即所见抄本不全，才得出了“作伪”“托名”等的错误推论。

1 《冯小青全集》的考证与《小青仙事》

潘光旦《书〈冯小青全集〉后》（下文简称“潘文”）一文，今《潘光旦文集》第九卷、《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两种出版物均有收录。按是文前言云：

去冬在沪，刘崇本、刘大杰二先生为言其友人某君处有抄本之“冯小青全集”一种，较旧所知者多五六倍，可为罗致，俾得断其真赝，为小青考证工作中多添一分资料。及余北归未久，此项抄本亦即寄到，启视之，果赫然一“冯小青全集”也！

“集”中凡诗七十三首，词八首，赋一首，皆为曩所未知者。曩所知之《焚余》稿别附于后。诗七十三首中，计古风一，五绝六，五律二，七绝五十四，七律十。篇末又附有杜某、裘某之和韵诗若干首。“集”为售抄本无疑，抄手崇拜小青，至五体投地，故于密加圈点以外，于每一作品后必有揄扬惟恐不力之谀辞焉。

此“全集”之为贗鼎，证据不止一端，大要可归纳为三，一曰地理不类，二曰人物不伦，三曰诗品不称。请分别言之。^{[2]81-82}

其中“售”应为“手”误，《潘光旦文集》《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均同。据此，潘光旦在通过友人转寄见到的《冯小青全集》并无序、无跋、无题署，又因篇末有杜某、裘某的和韵诗，所以依此集之名默认正文内容属小青，而集中之内容涉及的地理、人物、诗品和《小青传》《焚余草》所显示的信息不吻合，花费五千余字的篇幅论证《冯小青全集》为“伪作”，且推断作伪者：

然则“冯小青全集”果出何人手笔耶？曰手笔，我不知，若曰何人负一般贗造之责任，则我敢曰，至少杜允良为负责之一人。有有力之证据二焉。一曰交谊之密与和诗之多，上文已

加讨论。二曰“全集”后之附录。附录中有“和《焚余》绝句韵”十首“和赏雪二绝”“和斋中梅花”一首，“和芦汀孤雁”一首——下皆署“杜骥”姓名。末又有“和《焚余》次允良公韵”十首，作者为裘可知。由此可知“杜骥”即“杜允良”，骥为良马，故名“骥”，字“允良”。不特小青和杜某之诗，杜某亦和其诗，甚至共游观山，同舟赏月，交谊之切，不言可知。交谊既可以伪造，诗词又何尝不可以虚构？测其所以作伪之动机，当不出二端。崇拜小青，至于为所颠倒之程度，一也。思欲附小青之名，以垂于后世，二也。彼其意盖欲使后世不察者读之曰，杜某诚何修而得此！其作回文诗而使小青和之，则几欲以苏蕙比小青，而以窦滔自况，居心愈不可问矣。^{[2]90-91}

《冯小青全集》中和作的杜骥、裘可知被迫成为了“作伪”者。潘光旦所见的《冯小青全集》抄本，今未见有藏家、藏馆、目录书著录，应已散佚。即便未散佚，按潘光旦的学养和潘文的逻辑，足以让人信服。不过笔者在编著《冯小青集》搜罗文献时，注意到上海图书馆藏有《小青仙事》刻本一种，托友人到馆访书，才得以了解《小青仙事》《冯小青全集》两书之间的关系，和潘文的误判。

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刻本《小青仙事》实际上是《愁里句》和《小青仙集》两种扶乩诗集的合刻。卷前有《〈小青仙集〉目次》，与《小青仙集》的实际内容进行对比，可知《目次》所列的篇目为《愁里句》的内容，《小青仙集》则无目。《目次》情况如下：

元宵 写恨四首 杜允良孝廉书舍 忆小六娘 冬日重过孤屿 早春答梁大行 即景三首 题竹香斋 玉泉 龙头石 题西湖南山馆写怀二首 周斗三邀董次公乔千里张梦珠凌巨先陆梦鹤张幼青集黄元辰绮石斋次梦鹤韵 富春八景八首 又蝶恋花词八首 孤山林处士 过修竹山房 行踪 慰裘玉清思亲二首 富春山中夜月 修竹山房门咏 冬夜游观山 中秋船留饮月 冬至 冬过观山 咏雪 试茶 梅花 观梅有怀 斋中梅花 白梅 红梅 玉蝶梅 落梅 初雪 雪里望子陵钓台 赏雪二首 雪霁 雪竹 风竹 月竹 雨竹 盘山松 芦汀孤雁 幽怨 桃 映水桃 勉周汝佩 赠钱塘张斗山父母 雨中看梅 江中新沙 西湖早春回文三首 西湖古风 焚余 杜允良和韵 裘玉清和韵^[3]《小青仙集》目次 1a-2b

将此《目次》与潘文中所举诗对比，其文“地理不类”一节云“‘集’中有关于孤山之诗二首，一曰‘冬日重经孤屿’，二曰‘孤山林处士’，诗题及词意均颇不类。”^{[2]82}“七律一首，题为‘盘山松和陈水

部’”^{[2]82}“‘集’中写景之作居十之七八,而风景之有地点可指者又十之七八在富阳。计‘富春八景’十六首,八绝句,八《蝶恋花》词。又观山二首,富春山一首,钓台一首,新沙一首。而与西湖有关者反少,仅得七首:三为西湖早春,二为孤山,一为‘西湖南山馆’,一为玉泉”^{[2]82},仅《冬日重经孤屿》“经”与“过”不同,应为抄手误抄;“人物不伦”一节云“‘集’中各篇所及同时人物多至二十余人,依次数之,为:张太史,杜允良孝廉,小六娘,梁大行,洪载之,周斗三,董次公,乔千里,张梦珠,凌巨先,陆梦鹤,张幼青,黄元辰,裘玉清,桂浚源,刘元成,陈水部,张大涤右史,周汝佩,张斗山,曹孝廉,周朗园中翰,崔使君,陆孝廉,顾上舍,龚上舍”^{[2]83},《目次》中题为缩写,检正文题目,潘光旦所列二十人均在列;“诗品不称”一节涉及的《富春八景》《写恨》《写怀》《幽怨》《芦汀孤雁》,则均在《目次》中。《目次》之外,《愁里句》后尚有《小青仙集》,其中收录近百首诗作,总数远超潘光旦所见抄本《冯小青全集》,且《小青仙集》中的诗作,潘光旦在其论著中均未引用过,可知潘光旦所见抄本实际上为《愁里句》的截抄,故潘光旦所见也仅此而已。

抄本的抄者在抄录《小青仙事》时,或出于偷懒心理,或出时间紧迫,或者其他原因,并没有将刻本抄录完整,略去其中的序和题署,又更易书名,导致读者误解,花费诸多工夫进行考证推测;也有可能《愁里句》存在单行本,抄者抄录的单行本原未有序。《小青仙事》刻本卷前有龚五《〈小青仙集〉序》一篇和草字上版杜骥《〈愁里句〉序》一篇,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了《小青仙事》编成始末。前者原文云:

谷永有言:“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夫永谄附王氏,犹知辟异,而况学为儒宗者乎?余少不喜方术,即纬候之部、钤诀之符,探抽冥蹟,参验人区,奚存弗论。至寿光之効众魅、刘根之聚群真,尤近于诞矣。然历考记籍,幔亭之会,东幄奏“宾云左仙”之曲,西幄奏“宾云右仙”之曲,魏子骞以下,霞骞凤驭,逾十数许。承华殿上弹八琅之璈,吹云和之笙者,又不胜数也。它若蔡经、羊权,亦皆得亲炙容光,且赠诗论道以去。所谓较而论之,其有必矣。叶令思始虽不信,及亡妄见形,庙神答拜,乃叹曰:“世间定无所不有。五经虽不载,不可便以意断也。”玉清裘子,伟岸负奇。嵩斋先生试富春,尝拔之冠通邑。今从淞泖归,以乩仙决利钝,多奇中。凡名在丹台、

身栖玄圃者,随请辄至。所梓《愁里句》,则小青附乩作也。诗清婉有致,真不似从人间来。此女淑慧,故应高举出空,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杜孝廉允良爱其诗而梓之。余谓此太霄琅书也,吾辈当铸金为简,刻玉结篇,千亿万无复疑矣,毋谓不遵法言,绝而不语也。——西湖畸人龚五 题于参寥泉阁上^[3]序一

龚五 为杭州府仁和县人,字华茂,举贤良方正,官至顺昌知县,与仁和张墉以古学闻名当时,曾参与游之光《今古四六汇编》的编辑工作。潘文中所列集中可考者洪吉臣、陆运昌、陆浚源,三人均为天启、崇祯间人,则《小青仙事》结集的时间在明末清初。文中“叶令思始”,《钱塘县志》《富阳县志》明末清初均无叶姓知县,失载。“玉清裘子”即潘光旦所言的“裘某”,按卷首的题署“东安裘可知玉清甫订辑”,可知其名和郡望。《东安县志》无传,裘占籍富阳,《富阳县志》亦无传。《书〈冯小青全集〉后》考云“《富阳县志·选举表》,有裘可止,天启七年(1627)岁贡,《杭州府志》作裘可正。《富阳志·人物》,明末又有一裘可敬。裘可知虽不可知,殆为可止或可敬之同族,则可由排行推而知也。”^{[2]91}

今见陆樛《富春西邨陆氏宗谱》“陆文宰”条载“生于嘉靖辛亥年五月初八日辰时,卒于万历己亥年七月十一日酉时。生二子:思诚、思谿;四女:长适鹿山陈达道,次适西门知州周羔之子中书兆斗,三适县前邑庠生裘可知,幼适临湖同马卿邦良之子监生之骥”^[4],即其人。据此结合施闰章《螭斋诗话》“小青”条转述陆圻(陆运昌为其父)语^[5]及潘文所考三人,可知裘氏与陆氏为姻亲,因此而对于小青故事极为熟络且一往情深。嵩斋,其人疑为复社成员孙谷,字子穉,号嵩斋,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

上引序的末尾交代了《小青仙事》中《小青仙集》《愁里句》两种诗集的结集情况,即这部诗集结集、刊刻于裘可知从松江府返回杭州府时,而且是一部特殊的别集——小青降乩诗集。何谓降乩诗集?所谓的降乩即扶乩,又作“扶箕”,有多种别称,如扶鸾、降鸾、飞鸾(鸾或作鸾、栾)等,是一种通过灵媒(灵媒可以是无生物,也可以是生物,如箕、人等)降灵的占卜活动,这种信仰活动至晚产生于南朝时期,在明、清时特为流行。《小青仙事》是裘可知以自身为灵媒,降灵冯小青,并在降灵后,以冯小青的身份与他人进行诗歌唱和作品的合集,所以称为“降乩诗集”。龚五跋序外,杜骥的《〈愁里句〉序》把结集

过程和命名由来交代得更清楚:

辛未文战既败,埋首蓬窗,鲜有知己者,通暄问冷,日惟一段愁光景,接依心目而不舍去。予尝抚几叹曰:“知我者愁乎?亲识故旧皆与我有疎有密,独此愁入我之衷肠以居,随我坐卧行止而日用取之无尽焉。我舍愁,其何与归迹?”壬申,随家大人往来富春,闻有青衿士毓清裘君能请仙,得一小青女仙临觐上,善吟诗工词赋,予延之故舍书室中,果见其妙,就策拈题,挥写如流,一刻数十首,皆天际想,非凡人所可到。予亦间与分韵赓和,如彼此覩面,其为诗,意味旷远,声音鲜莩,遇愁苦题尤亲切婉至,情辞双美,其多叙生前,盖仙而曾谪人世者廿载,能以愁生,复以愁死者也。予与裘君约梓其稿,幸会李青莲降觐,题其编曰“愁里句”。异哉。惟小青而后能愁,惟青莲而后知小青之诗之愁也。古人有四愁,有九愁,有二分愁,有百种愁,扬子云有畔牢愁,庾信有万斛愁,皆前贤韵士,多愁无论已。尝记曹娥之齐,鬻歌假食,既去,余音绕梁三日、逆旅或辱之,娥漫声哀哭,一里为之悲愁。甚哉。愁之为道,不言而喻,感而遂通,神之为也。今试取小青诗读之,见其悲影满怀,兴致淋漓,是愁谱也。委地千行,逍遥四注,是愁趣也。托物比兴,因情写景,是愁缘也。激发不可明言,别得而端庄又不能,是愁谛也。抽题分韵,更唱迭和而相应如诉,是愁多也。一字一情,连篇皆倩宛转如睹当日,是愁之多写生也。如折铍物,余音袅袅,使人倾耳会心,是愁之多作记也。可以歌,可以泣,可以兴,可以怨,畅所欲言,是愁亦有快心处也。得之心,应之手,传之骚人,咏之闾巷,千载如生,是愁亦能成不朽也。然则青莲谓小青诗为愁里句,予直谓小青为愁里仙也。——壬申嘉平月古魏杜骥题并书序二^[3]

壬申嘉平月为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古魏为河北大名县古称,《大名县志》未立传,但《(咸丰)大名府志·选举》“举人”条载“杜斗愚,清丰人,任富阳知县,殉难”^[6]卷十二 31b,又天启丁卯下有“杜骥,清丰人”^[6]卷十二 34a,且《明史·吉孔嘉传》“(崇祯十五年冬,即公元1642年,清兵临城)清丰破,教谕曹一贞、训导董调元皆死。乡官吏部郎中李其纪、黄州推官吕鹤举、富阳知县杜斗愚亦死之”^[7],序中杜骥又自云“随家大人往来富春”,与杜斗愚的行迹吻合,则杜骥为杜斗愚之子,且应同其父一同殉难,故明末清初文献罕见其名。如上,杜骥实

有其人,潘文“而‘杜骥’之姓名则出假托”之说误。此序相比于龚序更为具体,明确说明了此集的编成始末,即杜骥在崇祯四年(1631)乡试失利后的次年,随其父到富春县,遇到以能降乩小青闻名的裘可知,邀其入室降乩题诗,得其诗后,大为赞叹,于是结交为友,交游的同时酬和作诗。其间有李白偶然降乩,题唱和稿为“愁里句”,故二人在编辑的时候决定以此作为书名并作序。或李白降乩、《愁里句》编辑完成之后,小青降乩活动仍在进行,又产生了不少诗作,于是另外结集为“小青仙集”,最后定稿合刻,《愁里句》在前,《小青仙集》在后,总名为“小青仙事”。《小青仙集》中有两首诗题为《壬申中秋为杜允良作船头饮月》和《癸酉正月初二日降》,壬申为崇祯五年(1632),癸酉为崇祯六年,结合《愁里句》的《目次》,也就是说扶乩活动从五年秋天进行到次年正月,所以两种合并刊行的时间最早在崇祯六年的春天。综上,潘文中的所有推论和猜测均可驳正定案。

2 《小青仙事》的内容与价值

2.1 《小青仙事》的内容

上海图书馆藏清刻《小青仙事》不分卷一册。卷前龚五《〈小青仙集〉序》钤有朱文方印“上海图书馆藏”“华亭封氏蕙进斋藏书印”,卷首题署处钤有朱文方印“上海图书馆藏”“进甫氏”、白文方印“?晋”。两篇序后为《目次》(见上),《目次》后为正文。卷首完整题署为“魏博杜骥允良甫评点。东安裘可知玉清甫订辑”^[3]小青仙愁里句1a。正文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版心上订板框刻“小青仙集”,下方刻页码。天头刻有杜骥评点,好句旁有圈,应为杜骥所加,天头眉批评点呼应。全书的内容,包括《愁里句》和《小青仙集》两种。第一种为《愁里句》。该书卷前有《〈小青仙集〉目次》(虽然标的是《小青仙集》的目录,实际上为《〈愁里句〉》的目录,见上)所示诗七十首,词八首,其中《焚余》(《焚余》为冯小青广为流传的诗文作品集,与传世本无大异同)《杜允良和韵》《裘玉清和韵》三题未计在内,《焚余》为冯小青《焚余集》内收录的内容,和韵诗各十四首,《目次》外又有《雪赋》一篇,部分诗作后有杜、裘二人和作,赅备诸体。第二种为《小青仙集》。《小青仙集》部分没有目录,紧接《愁里句》内容之后,而且也没有任何评点文字,仅收诗体,共近百首。《小青仙事》所收诗文涉及的题材则主要有咏物山水、交游纪行、本事感怀三种,佳作不少。

咏物山水类如七绝《龙头石》:

昂首清霄滚碧流,鲸音相应吼寒秋。风生两峡云烟绕,隔断红尘十二洲。^{[3]小青仙愁里句3b}后二句杜骥加圈,眉批云“诗多清婉,此复奇峭”。首句从视觉入手,写龙头石的形势,“昂”字写出石头朝天,“滚”字写龙头承水,且水势高,所以能“滚”,“滚”则四溅,四溅则水雾弥漫,所以此处用“清”而不用“青”;次句承上句听觉描写而来,写听觉和体感,因水势高,故与龙头石接触后能发出巨大的响声,“鲸音”由此而来,同时,水石相击打形成的水雾,给人带来清凉之感,所以形容为“吼寒秋”,这句非常巧妙地用表示声音的动词“吼”字绾合听觉语词“鲸音”和感觉语词“寒秋”,形成具有字面逻辑、又有如上所述客观自然逻辑的通感处理。七绝一体,最难的是从第三句转出境或者篇意更进一步的结句,而这篇乱诗就做到了。第三句延续第一句的视觉和第二句感觉描写,转向龙头石所在环境的立体描写,从而转出结句对第三句的比喻性升华。“十二洲”,通“十二州”,出自《史记·五帝本纪》裴驷集解引马融语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8],乱诗用“隔断红尘”领出,一下子把人间境界置换成超出尘外、凡人不可及的神仙世界,这种置换实际上是一种比喻,又不需要喻词做为中介,非常自然地让读者感受到与固有泉石印象之间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即能给读者带来平平描述泉石绝句所不具有的审美体验。

交游纪行类则如五律《周斗三邀董次公乔千里张梦珠凌巨先陆梦鹤张幼青集黄元辰绮石斋次梦鹤韵》:

清斋烹绿醕,怪石若生馨。醉客文多锦,楼妆晚未娉。晚生不至。云含梅影白,雨带竹香清。红炉同瑞色,冷暖共冥冥。^{[3]小青仙愁里句4a}此首杜骥八句全书加圈,眉批评云“天际云璈,固非凡韵”^{[3]小青仙愁里句4a}。其中涉及的人物,有董次公、凌巨先、陆梦鹤、张幼青、黄元辰五人可考,其中陆梦鹤即潘文所考三人之一陆运昌。陆运昌字梦鹤,钱塘人,崇祯七年进士(1634)。董次公为董守谕,次公为其字,鄞县人,天启四年(1624)举人;凌巨先为凌萃征,字聚吉,萃征为其号,别号括庵,钱塘人;张幼青为张岑,幼青为其字,钱塘人;黄元辰名不详,以字行,杭州府举人,在钱塘县有池上轩、绮石斋,疑为万历十六年(1588)钱塘举人黄日昇。以上诸人,均为当时杭州府名流。这首诗写的是早春时节,裘可知诸人雅集的场景。首联写诸人雅集的地点和所进行

的活动,即诸人在怪石环绕的环境下煮酒痛饮,用“清”“烹”“若”三字形容词定下全篇幽适的基调,“馨”“烹”字暗示下文的“竹香”“红炉”,为下文幽适意境的进一步推进做铺垫。颈联出句承上联“烹绿醕”而来,而在座文、酒皆足,文人风流只欠美人侑觞歌舞,又由此转出对句所邀妓晚生的缺席,用想象的楼妆场景带出,极为自然,为这一原本风流自适的意境添加了些许遗憾的感觉。为消解这种遗憾,诗笔又将视野从想象拉回现实场景的描写,颈联承接首联的铺垫,而且上联的想象意象楼妆给读者带来视野在高处的错觉,因而颈联出句衔接以属于空间中高处意象的云时并不突兀,十分流畅,完成雅集整体空间的刻画,作者处置虚、实意象的工夫于此可见不凡。末联则将上联雅集整体空间转向雅集焦点,即诸人所在的酒席的近景局部视野描写,而其中的“炉火”“冷”则从首联“烹”字的铺垫和上联出句的“雨”而来,营造出一种冷暖相宜的和谐意境,颌联的遗憾之感也被消解掉,与首联的定调营造相比,明显更上一层,作者高明的章法布置技巧也于此可见。

本事感怀诗,即作者对于《小青传》中人物、情节生发的题咏,如七绝《忆小六娘》:

点水飞霞作舞衣,清江膏沐照香颀。霜寒芦管飘心曲,别后相逢愁更肥。^{[3]小青仙愁里句2a}杜骥于“霜寒芦管飘心曲,别后相逢愁更肥”一句旁加圈,眉批评云“愁肥倩极”^{[3]小青仙愁里句2a}。小六娘为《小青传》中杨夫人之女,冯小青《与杨夫人书》中云“畴昔珍赠,悉令见殉。宝钿绣衣,福星所赐,可以超轮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忧无伴。附呈一绝,亦是鸟死哀鸣”^{[9]20},可知此人是一位早于冯小青去世的女子。首句写作者,也就是乱仙小青通过灵媒重游西湖见到的美景:晚霞浮于湖面,清风吹来,随波荡漾,仿佛舞者的起舞时随之飘逸的舞衣。次句承上句湖水意象而来,写乱仙临湖自鉴。临湖自鉴也有本事,《小青传》云:

又言姬好与影语,或斜阳花际,烟水空清,临池自照,对影絮絮如问答。婢辈窥之,则不复尔。但微见眉痕惨然,似有泣意。今览集中第四绝,知此语非妄也。余向欲刊其诗,因与生有微戚,未敢著录。^{[9]34}

其中所云“集中第四绝”,即广为传颂的名句“瘦影自临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冯小青生前照影的这一行为,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分析》一书就是围绕这一现象,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事实上,这一行为另

有来处。按《小青传》和《焚余集》中所呈现的信息,冯小青笃信佛学,故照影这一行为应本于佛教观河典故,出自《楞严经》卷二: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

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

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耄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后全灭。^[10]

乩仙小青已然是超越生死的存在,却模仿生前的行为,对生前的青春容貌和生命体验显示出无比留恋之情。有趣的是乩仙小青通过灵媒裘可知重游西湖,到湖边通过湖水照影,看到的不是降乩媒介裘可知而是“膏沐”“香颀”的自己。第三句“霜寒芦管飘心曲”,承第二句湖水照影回忆生前而来,因回忆而想起同样红颜薄命的故人小六娘,勾起感伤,至此才开始入题。末句,乩仙小青能通过裘可知再游西湖,却不能与小六娘同行,与她重逢的只有小六娘的孤坟,使她更加惆怅,故云“别后相逢愁更肥”。愁本来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抽象范畴,而肥瘦是生命具象变化的特征,乩仙小青用一“肥”字把抽象的愁具象化,巧妙而且新颖,颇见诗家炼字功力。

除上所举作品外,诗部尚有不少佳作,不赘举。词部的《蝶恋花词八首》也清丽可读,如《花坞斜阳》:

绣茵窝里红将暝。樵牧归来,映带桑榆境。山岭残霞浑织锦,丹炉炼就非凡景。千峰紫翠眸难尽。鸦背分金,阵阵皆舒羽。几处人家烟未□,西山顶挂胭脂影。^[3]小青仙愁里句^{6b} 杜骥全篇加圈,眉批评云:“不减王勃落霞孤鹜齐飞之句。鸦背分金,谁人能道。”赋部《雪赋》一篇,手笔亦自不俗,可摘出的佳句如“青山尽老,朱户皆寒”“疎梅添玉,绿竹生姿”,杜骥评云“随景摘词”^[3]小青仙愁里句^{18a};“飞鸟悲空,枝头愁抱。太空作太素之文章,大地起阳春之佳境”,杜骥评云“烟云聚美”;“梅有知心,松无苦貌。江腴

有韵,不嫌瑞色盈眸;山窟无樵,惟见琼瑶绕谷”^[3]小青仙愁里句^{18b},杜骥评云“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等等,诸如此类。《小青仙事》涉及的内容,大抵不出以上范围。

2.2 《小青仙事》的价值

首先是科举视野下以扶乩为媒介的接受模式呈现。扶乩,又称“飞鸾”“扶鸾”“扶箕”,是民间泛宗教的一种活动,“是一种古占卜法,卜者观察箕底动静来断定所问事情底行止与吉凶,后来渐次发展为书写,或与亡术混合起来。不借箕底移动,径然用口说出或用笔写出底也有”^{[11]8}。扶乩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文学创作结合,出现了不少乩诗、乩文。乩诗结集并刊行的记载,今见存最早为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

景吻中,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12]

此集今已不存,无法窥见其面貌。然而,在扶乩活动的诸多内容中,以诗文创作作为内容并不占主体地位,占据主体地位的则是以询问科举相关事宜为目的:

文人扶箕大概起于宋朝,而最流行的时期是在明清科举时代,几乎每府每县底城市里都有箕坛。尤其是在文风流畅底省份如江浙等省,简直有不信箕仙不能考中底心理。扶箕为问试题,问功名,一次底灵验,可使他终身服膺。^{[11]38}

科举相关事宜按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包括问试题、功名,而《小青仙事》中的扶乩活动虽然与科举相关,即裘可知与杜骥两人在科举上并不顺利,而《小青仙事》中收录的诗文只问及小青身世的相关问题,如《问生平所积束帙》《问生前所消遣》《问年几何》《问当日看牡丹亭记》等,却不问试题、功名,转而关注降乩对象,这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模式。

“怀才不遇”是古代科举制度下,下层文士题咏书写的永恒主题,以此作为精神压抑的消解方式,所以他们往往是通过文献的记载对前代与之遭遇类似的先贤如屈原、司马迁等进行接受,是生人对于死者的单向对话。明末才女冯小青以诗名世,而所嫁非类,在其去世后,便被广泛传播接受,时常被文人类比为屈原云“姬好为影语,此千一奇情。汨罗问天,青而呼月,略得此意”^{[9]79},嗣后成为“怀才不遇”的典型形象之一。按《小青仙事》卷前的两篇序,裘可知和杜骥的科举之路皆不顺利,二人通过降乩的方

式,或成为被降乩者,即死者进行自我诉说,如《愁里句》中的《写恨》四首、《写怀》二首、《幽怨》、《小青仙集》中的《写恨》五首等;或直接与被降乩直接对话唱和,如《愁里句》中的《杜允良和韵》《裘玉清和韵》,《小青仙集》中的《附刻杜允良和韵》等,形成一种“超现实”的交互式接受模式。这种接受模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而《小青仙事》则为研究的典型文本。

其次是鬼神视野下以扶乩为媒介的地域文化书写。地方人文景观和文化活动的文学书写,是地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诗歌别集一样,《小青仙事》中也包含了大量地域书写,主要围绕钱塘和富春两县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活动展开,涉及钱塘县的如《冬日重经孤屿》《即景三首示洪载之》《题西湖南山馆》《孤山林处士》《孤山景二首》等,涉及富春县的如《富春八景》《又蝶恋花词八首》《富春山中》《雪里望子陵钓台》《富阳八景》《严子先生祠》等;文化活动如《周斗三邀董次公乔千里张梦珠凌巨先陆梦鹤张幼青集黄元辰绮石斋次梦鹤韵》《勉周汝佩》《赠钱塘张斗山父母》等,涉及地方官员、文人。这些作品单从题材上说,自然与一般的杭州地域书写诗作没有区别。但是,若从作者的身份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考查,可以发现:首先,其以乩仙的身份进行创作的作品,实际上是鬼神视野下的书写,其中的内容会出现不同于文人地域书写的差异,如上文对《忆小六娘》的分析。其次,从篇题中可见杭州府上至知府,对于扶乩活动的接受度很高,降乩并且无关占卜、具有文学性创作甚至成为了名流交游中的组成部分。《小青仙事》中这种鬼神视野下的地域文化书写,呈现了扶乩与文学间的特殊关系,值得进一步深究。

3 结论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便是成就卓越的学者,也难免出现学术研究上的失误,潘光旦的《书〈冯小青全集〉后》即是。潘光旦因未见到全本《愁里句》,

而误判《愁里句》截抄本《冯小青全集》为伪作,且得出诸多错误的推论。所幸与《小青仙集》合刻的《愁里句》今尚在,可知潘光旦所见的《冯小青全集》实际上是一部乩诗别集,并不存在真伪的问题,而集中呈现的信息也足以论定辨正潘文中的所有推测。“当今与扶乩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俗学和社会学。由于扶乩这一现象主要出现于说部,因此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研究。如陈蕾的《金圣叹话语权力的多维生成探究——以“扶乩降神”与“小说评点”为考察对象》(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金圣叹的扶乩降神活动及其影响》,数量不多,乩诗方面的研究更是未见。”^[13]《小青仙事》作为一部乩诗别集,其科举视野下以扶乩为媒介的接受模式呈现,与鬼神视野下以扶乩为媒介的地域文化书写,为乩诗与文学之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参考文献:

- [1] 吕文浩. 潘光旦传[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9.
- [2] 潘光旦. 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 [3] 裘可知,杜骥. 小青仙事[M]. 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本.
- [4] 陆樾. 富春西邨陆氏宗谱:卷四[M]. 2004 年重修本:25b.
- [5] 施闰章. 施愚山集 4[M]. 合肥:黄山书社,2014:6.
- [6] 朱熹. 大名府志[M]. 咸丰三年刻本.
- [7] 张廷玉. 明史:第 6 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6:4243.
- [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3:27.
- [9] 郑永辉. 冯小青集[M]. 扬州:广陵书社,2023.
- [10] 智旭. 楞严经文句[M]. 北京:线装书局,2016:65-66.
- [11] 许地山. 扶箕迷信底研究[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 [12]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 梦溪笔谈校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10.
- [13] 郑永辉. 乩诗总集《北山诗存含山语录合编》考述及价值[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23,41(3):49.

黄自的抗战歌曲研究

李浩然*, 张永芳

(蚌埠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黄自的抗战歌曲在烽火硝烟中诞生,是歌曲艺术在时代下的呐喊,体现中国人民坚决捍卫领土完整,抗争到底的不屈的民族意志和英雄气概,已融入时代之中,成为统一战线里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自抗战音乐中保家卫国的音乐思想、传统文化与抗战主题的结合、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分析黄自抗战音乐中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主题,突出黄自抗战歌曲的民族大义与历史价值,并以《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抗战代表歌曲为分析本体典型,梳理黄自的民族音乐语言与抗战主题相互融合,最终升华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英雄形象。

关键词:黄自;抗战歌曲;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37-06

Research on Huang Zi's War of Resistance Songs

LI Haoran*, ZHANG Yongfang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Huang Zi's War of Resistance songs emerged amidst the flames and smoke of war, serving as an artistic outcry of their time. They reflect the Chinese people's unwavering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resist to the end, embodying an indomitable national will and heroic spirit. These works becam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era, forming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sistance culture within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epochal themes contained in Huang Zi's resistance music through three aspects: the patriotic musical ideology of protecting home and country,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resistance them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highlights the national righteousness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Huang Zi's resistance songs, taking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h as Song of Resisting the Enemy and The Flag Flutters Proudly as core analytical subject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d how Huang Zi's national musical language merged with resistance themes, ultimately sublimating into a heroic im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steadfast resistance.

Key words: Huang Zi; War of Resistance songs; national spirit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以抗日救亡为主题,涌现出了众多的抗战歌曲,这些歌曲的出现不仅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且对最终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与中国传统音乐所展现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抗战歌曲“以爱国精神为唯一价值标准,抗战超越了派别,抗战音乐汇集了全民

族爱国志士的声音,诠释了团结、自强、自尊、勇敢、乐观等民族品格,彰显了抗战音乐之伦理价值的巨大动能。”^[1]抗日救亡歌曲的诞生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而言意义非凡,其极具号召性的音调,不愿做亡国奴的不屈的呐喊,回荡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受压迫的国人心中,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

收稿日期:2025-05-3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重点科研项目(2024AH052812);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3zybj054)。

作者简介:李浩然(1986-),男,安徽霍邱人,讲师,博士;张永芳(1972-),女,安徽寿县人,教授,博士。E-mail: lhr@bbc.edu.cn

推动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民众纷纷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救亡歌咏应运而生。同月,黄自所在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组建了抗日救国会,以反抗日本侵略者、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为主题,黄自亲自作词创作了四声部合唱曲《抗日歌》,但由于当局不许提及抗日之事,所以这首歌被改名为《抗敌歌》,而且第一段歌词里的“倭虏”也被迫改成了“强虏”,由此掀开了抗日救亡歌曲的浪潮。

1 保家卫国的音乐思想

黄自是我国最早探讨如何发展民族音乐的理论家和作曲家,是我国民族音乐的带路人,其作品以爱国歌曲为主,从作品的旋律、和声等音乐织体中,不难找到黄自运用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法与我国民族思想相结合的重要线索,这种尝试为后来的作曲家对于现代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蓝本。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以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在这个时候,我国音乐的发展缓慢且不成熟,尚处于雏形阶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大规模地侵占我国领土,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不断加深,这进一步促进了抗战救亡歌曲的产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作曲家的愤怒,并纷纷以抗战歌曲的形式横空出世,其中以黄自的抗战歌曲最具有代表性。比如其创作的《抗敌歌》就是以“九一八”事变为时代背景,歌词表达了作曲家满腔的悲愤;1932年淞沪战役的爆发,黄自创作的《赠前敌战士》,是献给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们,激励和鼓励战士们英勇抗敌;随后又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旗正飘飘》《睡狮》《九一八》《民谣》等。这些歌曲音乐形象鲜明,风格典雅精致、旋律简洁流畅、结构工整严谨,使倾听者热血沸腾、产生强烈的爱国热情。

1.1 众志成城《抗敌歌》

《抗敌歌》原名为《抗日歌》,是我国第一首抗日救亡题材的爱国歌曲,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诞生,该曲响应时事,旨在唤起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斗志,鼓舞人们积极斗争,众志成城反抗侵略者,号召广大青年以守护故土、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为己任,团结一心抗战到底。全曲采用进行曲风格的单二部曲式,降B大调的主和弦采用模进手法动机式展开,风格上趋向于统一。A段节奏以雄健有力的附点音

符为主,配合旋律显得更加刚毅,给人明亮积极向上的印象。旋律呈波浪式发展,力度“mf—f—ff”的加强,与节奏相辅相成,进一步突出主旋律,最后落在降B大调的属和弦上。第一段由男低音开始进入,采用一问一答的歌唱形式。一开始就以“谁是中华江山的主人翁?”问句形式出现,“我们四万万同胞”明确肯定了中国人的国家的主人,爱国之心跃然纸上。b句在材料上保持了a句的基本模式,节奏持续以附点节奏和切分音为主,突出切分重音,起强调主题的作用。力度上突出附点长时值,连音、顿音明显,并由原来a句的降B大调转至F大调上,以近关系调主和弦结束A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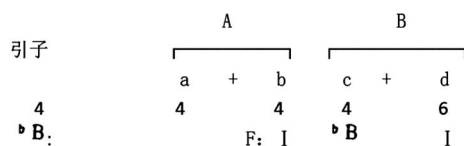


图1 《抗敌歌》结构分析

B段是“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基本采用音节式的清晰写法,体现了中国人民誓死保卫国家的决心,描绘出抗日爱国志士携手并肩、奋起抗敌的爱国情怀。这里先是女高音进入,接着各声部相差一拍先后进入,此起彼伏的旋律增加了音乐色彩,并在钢琴的对应旋律声部使用八度弹奏,以此相互回应,暗喻各界人士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御敌(见图2)。



图2 《抗敌歌》谱例

笔者认为《抗敌歌》充分体现出西方技法在我国民族化的运用,整个作品创作是吸收先进的作曲技术与我国民族音韵相结合,表现为对西方和声功能的吸收,运用大小调并采用和弦的三度叠置来表现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从音乐上来看,作曲家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法,旋律与和声逐渐丰富,注重音乐与诗词并重,旋律与中国语言交相辉映,以展现我国五声调式的线性美。”^[2]黄自先生所说的民族化的新音乐在这首《抗敌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洋为中用的新音乐和黄自先生在民族化音乐道路上的努力和探索。

1.2 《旗正飘飘》保家国

1931 年到 1935 年,日军大规模侵占我国领土,“一二·九”事件爆发,激起了全国爱国青年的救国救亡热情,《旗正飘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并迅速得以广泛传唱,“这首歌曲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这首歌曲传达了中国人民对国家灾难的悲愤情绪和对抗战的强烈愿望。”^[3]

该作品采取混声四声部合唱的形式,以回旋曲式写成,唱出了人民大众保家卫国、坚决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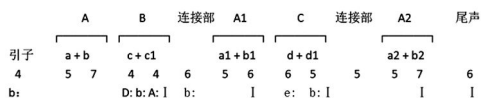


图 3 《旗正飘飘》结构分析

钢琴伴奏以 b 小调主和弦动机式发展,A 段采用非方整性的收拢式乐段。5 小节主题句一开场便气宇轩昂,配合歌词“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热血是狂潮……”极富号召性。按照回旋曲式结构原则,在合唱曲中重复三次,进一步强调主旋律的同时,也反映了时不我待、保家卫国的迫切愿望。节奏以附点节奏为主突出重拍,并以 b 小调柱式和弦为伴奏型,旋律线条呈波浪式发展。力度为“mf—f”,此时旋律、歌词、节奏、力度相互配合,旋律的急速上扬,犹如满腔热血涌上心头,悲愤之情溢于言表。b 句作为 a 句的对比句,增加到 7 小节,基本保持 a 句的节奏,连音、断音突出,钢琴伴奏的主旋律以纯八度进行,增加和声色彩,突出主旋律(见图 4)。



图 4 《旗正飘飘》谱例

B 段采用二句式重复材料的方整性乐段,在材料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c 句 8 小节由 b 小调转至平行大调 D 大调上,随后又转到 A 大调上,调式的

不稳定增加了旋律色彩上的对比,以及男声齐唱与四声部混合演唱形式的对比。歌词重复旋律的变化,最后停在 A 大调的主和弦上。连接部 6 小节,力度渐弱,演唱速度渐慢,在作品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为接下来叠部的发展做准备。A1 段是 A 段的变化再现,保持 A 段的主导乐思,没有太多的变化音,结构相同,在 b 小调主和弦上结束。

C 段采用 d 句及其反复,男高声部以悲怆的声音进入,歌词“国亡家破,祸在眉梢”与合唱部分“要生存,须把头颅抛”相呼应,此刻反抗的情绪一触即发,节奏上依旧保持附点节奏型。连接 5 小节,齐声合唱,力度“f”为接下 A 段的再现做准备。A2 是 A 段的变化再现,合唱结束,力度“ff—fff”把誓死爱国、不畏艰辛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向高潮。尾声 6 小节,与引子织体一致,以主题核心动机结束,使作品更加完整,主题进一步深化,结束该作品。

《旗正飘飘》这部“以爱国主义为题材,以西方音乐作曲技术手段与中华民族传统戏曲音乐文化相融合,反映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史实的合唱作品,更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宝库的一部合唱珍品。”^[4]这是西方作曲技术与我国民族音乐相结合的经典作品之一,旋律、和声、主复调的交替运用,激昂的旋律、奋勇的歌词使聆听者身入其境,心血澎湃,历经半个多世纪仍被广为传唱,足见其作为民族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2 老根生新芽:民族传统文化与抗战主题的融合

在我国音乐发展的历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创作的融合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抗战时期,这种融合更具深刻的意义。黄自先生的音乐创作便是这一融合的典型范例,他的作品犹如璀璨的明珠,在音乐星空中熠熠生辉,展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抗战主题相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黄自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主题表达,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合唱创作,引导了中国合唱作品在内容和思想上的升华,使其成为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5]

2.1 黄自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文化根基

黄自先生自幼对诗词歌赋的喜爱奠定了他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黄自从小喜欢阅读,他的涉猎范围很广,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于古诗词有着特别的喜爱,因此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古代诗词相关。”^[6]诗词与音乐在他的创作理念里有着密切的联系,诗词用于表达歌词内容,而音调和旋律

则是对诗词内涵的生动诠释。这种运用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中音乐与文学紧密结合的特点。

黄自在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作曲技法训练,但他并没有单纯地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积极探寻将中国优秀民族元素与之相结合的道路。他将西洋调式灵活运用至中古调式中,深入挖掘民间戏曲、歌谣、民歌中的精华,找到能够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元素,如五声调式等,与西方的作曲法、和声学、演奏法进行融合。这一过程使得他创作的音乐不仅仅是所谓“灵魂是中国,躯干是西方”的简单拼凑,而是真正实现了民族化的音乐创新。

例如,黄自注重三和弦以及七和弦的运用,且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创作艺术性歌曲(见图2、图4)。这种创作方式既保留了西方音乐理论中的和声结构优势,又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音调色彩。这表明他在吸收西方音乐技法的同时,始终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让民族文化成为创作的核心根基。

2.2 钢琴伴奏在民族化音乐创作中的角色

钢琴伴奏是黄自歌曲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再仅仅扮演衬托和辅助的次要角色,而是上升到歌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面参与到内容表达和形式构建之中。

以《抗敌歌》为例,其钢琴伴奏大多采用柱式和弦为伴奏型,有力地突出了上方主旋律。在歌曲段落的编排上,第一段由男生声部演唱,采用应答式的形式,而第二段由女生声部演唱,其他四声部以弱起两拍前后加入。这种创作手法使得各声部之间互不干扰,能够保持良好的音程进行。黄自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将西方和声技法运用到作曲当中,并进一步对和声民族化作深入探索。他大胆打破西方固有的和声技法框架,赋予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和声色彩,使作品在情感表达上更加贴合本民族的审美和情感需求。

2.3 声韵与音乐的结合

在声乐作品中,音乐与歌词文字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微妙的联系。以他的清唱剧《长恨歌》第三乐章男声四部合唱《渔阳鼙鼓动地来》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中一种非常独特且值得深入探讨的创作手法,在此乐章中存在着与文字发音紧密结合的典型用法。例如“兵威惊震哥舒翰,举手破潼关”一句。其中“震”字为去声调,作曲家黄自依据这个文字的声调走向进行音乐创作,并确定了音乐发展方向。从句中的“惊”字开始便已经埋下伏笔,在旋律上从还原G到F再到“震”字所属的还原E,这种音乐发展处理展现出高度的艺术性。这种处理方式并非随

意为之,而是精心构思的结果(见图5)。黄自在音乐创作中对歌词声调韵律等语言因素的尊重与巧妙运用,通过将音符的高低走向与文字发音中的声调起伏相契合,增强了音乐作品的表现力。这一做法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表达作品的情感内涵,使演唱与聆听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作品所营造的氛围。同时,也反映了作曲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中文字音韵学的深刻理解。



图5 《渔阳鼙鼓动地来》谱例

2.4 音乐作品中的抗战精神与民族情怀

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清唱剧《长恨歌》,取材于白居易同名长篇叙事诗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寓意。其中唱段“六军不发无奈何”充分表达了作曲者面对现实悲剧时的无奈和悲愤之情。而当唱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则充满了一种民族大义在前的豪迈气概,那种除尽天下贼寇、还我壮丽山河的壮志豪情。“《长恨歌》中的‘社稷残’和‘家散人亡’,是和当时‘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的形势相联系的;《长恨歌》中的‘珍重江山’,是和‘报国’的壮志相联系的。”^[7]正如居其宏先生所说,《长恨歌》“是一部借古喻今之作,如其中有‘袖正翩翩,哪管它社稷残。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之句,直接讽刺了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8]作品希望人们能够以史为鉴,唤起忧心国事的意识。这部清唱剧借助民族化的和声,将中华民族不屈的英雄气概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黄自先生的音乐创作在民族传统文化与抗战主题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从根基上汲取民族文化养分,在创作手法上巧妙融合西方技法并加以民族化创新,同时在作品内涵上融入抗战精神和民族大义等深刻的思想情感。他的音乐如同大树,民族传统文化是其深埋地下的老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萌生出充满生机与力量的新芽,这些新芽在抗战主题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来者在音乐创作中如何实现民族文化遗产与时代主题表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典范。这种融合不仅体现了音乐的艺术价值,更承载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

貌和文化自信。

3 黄自抗战歌曲的历史意义

3.1 抗战歌曲促进抗战胜利、彰显民族精神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和 1937 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民众被抛入了苦难的深渊。东北危急、华北危急,那声声急迫的呼喊回荡在空中,从而拉开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大幕,让全国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激昂地寻求抗战救国。这一时代的召唤,促使抗战歌曲萌发,就像星星之火四处蔓延开来。抗战歌曲唤起了民众沉睡的意志,激励着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志士,鼓舞着千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坚定地与侵略者对抗到底,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永不言败、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九一八》大合唱(见图 6)。



图 6 《九一八》谱例

《九一八》以其悲怆的基调、戏剧性的张力、象征性的意象和群体性的呐喊,将民族的伤痛、愤怒与不屈的抗争意志高度艺术化,宛如一座由血泪铸就的音乐纪念碑。

首句歌词以“九一八,血痕尚未干”直白开场,“血痕”这一触目惊心的意象,将历史伤口具象化,奠定了全曲悲怆的基调。乐曲起始采用低沉、缓慢且带有呜咽感的旋律,如长音下行、半音进行,搭配厚重的小调或复杂和弦,似在模仿哭泣与叹息,生动营造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氛围,深刻体现了民族所遭受的巨大创伤与深重苦难,这正是抗战精神的情感基石。

中句的“海可枯,石可烂”为全曲情感的冲击高点,也是情感高潮的爆发点。由 c1 音持续上行,以渐强的力度攀登至最高音 e2,和声进行稳重而有力,使用强力的属和弦到主和弦的进行,以支撑和声的坚定感,整体坚定有力、振奋人心。

结束句则号召国民勿忘国耻,抗日战争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将救国的责任提升到每一个公民肩上。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体现,强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旋律上采用一字对一音的音节式处理,清晰有力,配合“ff”的力度,全曲的情感再次得以升华,和声上以属七到主和弦的柱式和弦进行,在整体上营造出庄严、肃穆、不可撼动的终止感,象征着抗战信念的永恒与必胜决心。合唱形式本身也强调整体性,是“万众一心”精神的直接体现。

全曲采用进行曲风格的四二拍子,这不仅增强了音乐的号召力,也象征着国民抗敌救国的队伍在坚定不移地前进。前半部分旋律在较低音区徘徊,沉痛而压抑。到“海可枯,石可烂”处,旋律线陡然向上跃升,音域拓宽、音量增强,将情绪推向高潮。最后的“国民责任未完”,旋律落在稳定而坚决的主音上,给人以不容置疑、必须完成的坚定感,配合伴奏上模仿沉重的鼓点与风的呼啸,用密集的和弦渲染苍凉、紧迫的氛围,与声乐旋律共同构建起英雄人民重整山河的决心。

《九一八》绝非简单的哀歌,而是由血泪、愤怒、钢铁意志和必胜信念交织而成的民族精神的交响。它精准捕捉并放大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大地上奔涌的民族情感,从震惊、悲痛到愤怒、觉醒,最终凝聚为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钢铁洪流,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最震撼人心的音乐宣言,永远昭示着那段历史中不屈的民族魂。

3.2 抗战歌曲创作开创新乐风

抗战歌曲以服务抗战为宗旨,契合人民的精神诉求与抗战需求,这推动了抗战歌曲的蓬勃发展,歌曲创作中的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创作者。他们的创作题材较为集中,这源自广大民众的各种情感体验,贴近群众生活,能鼓舞大众积极投身抗战,并且传播极为广泛,数量可观。每一首曲子都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承载着人民的心声,这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新文化思潮之下新音乐建设取得的成果。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音乐大量涌入,作曲家们开始关注我国音乐的发展,重点探讨中、西音乐呈现一盛一衰局面的问题,其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方面,有些人觉得音乐的发展同社会、民族、民众息息相关,爱国就必须抵制外来音乐理论与创作技巧。他们认为西方的音乐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及关于人的观念与我国有差异,所以音乐发展的趋势必然不同。这种看法从根源上否定借鉴西方音乐

的可能性,属于保守复古的观念。

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早就远远落后于西方音乐,要想振兴本国音乐必须以西方为榜样奋起直追。他们提倡通过“容纳”和“汇通”的方式来改良国乐,常被称为西化派。黄自先生在《怎样才能产生吾国音乐》一文中就曾指出这两种倾向:“一部分人觉得旧乐已经腐朽不堪、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推翻,然后用西方音乐代替。”^[9]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音乐是民众真实情感的映照,源于民众,也不能脱离民众,这是国乐民族性的体现,所以不应采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复古、抵制西方音乐文化才是振兴国乐的爱国之举。”^[9]这同样不可取。他认为音乐文化的交流本不应受到国界限制,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黄自在音乐创作、研究与整理国乐中注重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术,打造出新颖的民族音乐风格,以此开创西学中用的新乐风。

贺麟先生的观点到是佐证了黄自的作曲理念:“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10]

黄自借鉴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汲取我国民族音乐中的精粹,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为后来作曲家的创作构思奠定了基础,带动了我国民族化音乐不断向前发展。

抗战歌曲的创作不能只是照搬外国音乐,而是要融入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推动民族化抗战歌曲的发展。抗日战争虽已过去多年,但抗战歌曲依旧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强音,通过抗战歌曲我们能缅怀那个热血染就的时代并从中获取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下,我们依然要弘扬民族精神,作曲家应投身时代洪流,深入民众,与民众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质朴的民族音乐有其独特的节奏与旋律,我们应当扎根于民族文化,适当借鉴国外的音乐理论和技术,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的作品。

4 结论

黄自创作的抗战歌曲展现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精神,是艺术性与民族性有机融合的时代强音,彰显出中国民众坚决守护领土

完整,战斗至最后一刻毫不屈服的民族意志与英雄气魄。通观黄自先生的创作,其作品在情感表达上主要集中于三类主题:悲剧性、怀旧思绪与奋发励志。其中,《长恨歌》尤为深刻地展现了前两种情感,而《抗敌歌》和《旗正飘飘》则强有力地传递出坚韧不屈的民族觉醒意识。其经久不衰的作品已然深深扎根于那个时代,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中抗战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类抗战时期的音乐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更直接地激励了广大抗日将士奋勇作战,既真切表达了民众的集体情感,也彰显了崇高的民族气概与时代风貌。

在我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中,黄自是一位极为重要的构建者,是一位接受过西方作曲创作训练的音乐家,在将我国优秀民族音乐与西方先进作曲技术相融合方面,作出了诸多重要的尝试。全面剖析和探究黄自抗战歌曲的艺术特征就会发现,黄自先生所创作的作品不但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更是民族音乐文化里的珍宝。他的创作理念开辟了新的音乐风尚,开启了我国近代音乐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 [1] 曹玲玉. 论中国抗战歌曲的伦理价值[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 [2] 赵鑫怡. 黄自合唱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以《旗正飘飘》为例[J]. 当代音乐,2025(3):148-150.
- [3] 邹若琬. 黄自抗战歌曲《旗正飘飘》艺术特征与演唱分析[J]. 剧影月报,2025(1):78-80.
- [4] 马宝艳,翟继峰. 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经典作品——对作曲家黄自先生的《旗正飘飘》赏析有感[J]. 音乐创作,2009(4):101-103.
- [5] 伊品. 黄自合唱作品的民族性体现及历史影响[J]. 嘉应文学,2024(13):33-35.
- [6] 周文林. 浅析民族元素在黄自艺术歌曲创作中的应用探究[J]. 戏剧之家,2020(30):73-74.
- [7] 钱仁康. 黄自的生活与创作(续)[J]. 音乐艺术,1994(1):32.
- [8] 居其宏. 黄自合唱曲及清唱剧《长恨歌》今日谈——为纪念黄自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J]. 歌唱艺术,2025(1):40-44.
- [9] 上海音乐学院《黄自遗作集》编辑小组. 黄自遗作集[M]. 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74.
- [10] 贺麟. 文化与人生[M]. 北京:商务印书局,1947:1.

文旅融合背景下大禹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李振浩

(蚌埠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大禹文化元素应用于文创产品开发,能够丰富产品的人文内涵,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推动地方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大禹文化相关文创产品开发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分析,提出蚌埠市大禹文创产品设计的开发策略,从充分挖掘文化元素、精准定位用户需求、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建立协同运行机制、创新产品营销模式等,更好地发挥丰富大禹文化资源对社会和经济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大禹文化;文创设计;开发策略;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43-05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Dayu Cultural Ele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I Zhenhao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Dayu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enrich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of the products, achiev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Through research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lated to Dayu culture, it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is paper for the design of Dayu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Bengbu City, including fully exploring cultural elements, accurately positioning user needs, deep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nnovating product marketing models, to better leverage the rich Dayu cultural resources to driv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Key words: Dayu cultu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development strategy; cultural inheritance.

随着国家文旅融合的深度推进,人民消费的需求逐渐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有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旅游文创产品更加受人青睐,这已然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战略方向,将文旅融合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1]。在此背景下,蚌埠市先后出台《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加快建设高品质文旅强市

的实施意见》《蚌埠市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提出建设“淮河文化之都、大禹文化之乡”的发展目标,持续推动大禹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为蚌埠的文旅文创开发提供了详细发展目标和制度保障。

大禹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先民所创造的卓越文明成果,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根据近年来文献分析,有学者提出传承发展大禹文化符号对树立中华

收稿日期:2025-06-30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24SK07);校级科研团队:数字艺术与民俗艺术衍生科研团队(BBXYKYTDxj12);蚌埠学院校级教学团队“数字艺术创新教学团队”。

作者简介:李振浩(1992-),男,安徽蚌埠人,助教,硕士。E-mail:595885881@qq.com

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有学者通过研究大学生对大禹文化认同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高校培养优质人才提供新思路^[3]。另有学者指出运用游戏、多媒体和信息技术为大禹文化传播提供新的媒介和路径^[4-5]。还有学者着眼于大禹文化在城市品牌的塑造、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创新应用^[6]。但总体来说,虽然现有研究注意到了大禹文化的重要性,但蚌埠市大禹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开发的研究较少,故本文从文旅融合的语境出发,探讨以大禹文化融入蚌埠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有效路径,为大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创新思路,以期使大禹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1 蚌埠市大禹文创产品开发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从现实意义角度思考,将大禹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当中,不仅有利于拓展大禹文化创新传承载体,让大禹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焕发新的光彩,还可以使文创产品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提升产品的文化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1 丰富文创产品的人文内涵

文创设计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文化解构与审美重构的综合性创作过程,具有文化、艺术、经济、历史价值。设计需要运用创意手法,将地域文化与当代设计语言巧妙结合,创造出人文内涵丰富、文化特色鲜明的优秀文创产品。蚌埠市大禹文化包含了众多神话传说以及各类物态的、精神的文化,如“涂山联姻”“三过家门而不入”“禹会诸侯”和“禹王庙会”等,其中蕴含了自强不息、以民为本、因势利导等优秀的中华民族智慧品格,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标准与思想、精神内涵,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设计、运用好大禹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和时代价值,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表达精神寄托,不仅有助于丰富文创产品的人文内涵,提高设计品质,还可以通过产品传达的文化寄予,与大众的文化认同产生强烈共鸣,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1.2 拓宽大禹文化的传承路径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也逐渐增加,国潮风格相关的文创产品设计的“火热出圈”,彰显此类产品深受青年人群的青

睐。像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各种文创设计,在传承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很多潮流元素,萌态十足的故宫猫系列(见图1)、幽默风趣的雍正御批折扇等文创产品,在文创产品市场上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广受消费者好评。从故宫文创产品的成功可以看出,大禹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元素蕴含优秀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血脉,可以为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设计与创意源泉,通过产品销售实现向消费者文化传递、情感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大禹文化的广泛传播。



图1 故宫淘宝推出的《名画记》故宫猫系列文创产品

1.3 助力文创产业的创新发展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文创产品的创作形式、传播方式和用户体验,AR、VR、H5 互动展示、AIGC 内容生成等新兴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文创产品的开,创新了文化的数字叙事表达,打造影视、艺术、游戏、展览等各类产品,给用户带来多元文化体验,促进了新型文化业态发展。蚌埠市首届大禹文化节上,历史文化场景数字化还原技术得到充分运用,中共蚌埠市委宣传部、蚌埠日报社出品《探寻禹迹》宣传片(见图2),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大禹治水的故事的可视化呈现。通过大禹文化元素与创意设计、数字技术深度结合,设计出特色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获得满足,推进蚌埠市文创产业向高质量、创新性发展。



图2 中共蚌埠市委宣传部、蚌埠日报社:《探寻禹迹》宣传片

1.4 发挥大禹文化的经济价值

文化资源在当今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我国文旅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升级趋势,文创产品作为文化旅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推动着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业创新。大禹文化作为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蚌埠市的文创产品开发应深入挖掘大禹蕴含的传说故事、历史符号与文化底蕴,将优秀的文化资源融入设计中,创作出鲜明设计风格和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并运用媒体传播和营销推广,可以极大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和文旅产业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了解大禹文化历史和地域人文景观,游客的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文创产品销量,推动地方住宿、交通、餐饮等其它行业的兴盛,形成大禹文化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故宫文创、成都大熊猫文创、三星堆考古盲盒等为代表的景区文创产品,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当代潮流元素,形成了极高的品牌效应,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推动了当地旅游及周边产业的消费。

2 大禹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开发现状与困境

蚌埠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近年来,蚌埠市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全域升级,为构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开展大禹文化节、大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等,并依托“禹会村遗址”等历史遗存,深挖大禹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创意三大产业协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大禹文创开发作为蚌埠旅游产业链的延伸,与蚌埠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开发与营销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限制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1 文创设计形式同质化

在文创设计开发热潮下,各类地方文化和非遗文化纷纷融入文创设计当中,市场上产品数量众多,但普遍面临同质化问题。蚌埠市大禹文创在设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突出自身文化特色,将难以在市场上形成强烈的品牌辨识度和记忆点。目前市场上一些大禹文创的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产品多为帆布包、冰箱贴、马克杯、抱枕等常见的设计形式,种类较为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和需求。一些马克杯、盘子的文创产品,仅在产品外观印上图案或 LOGO,不仅设计款式相同,同时也不便

携带,没有充分考虑游客的真实需求与地域文化特征,同一题材被机械套用,损害了文创产品的文化属性与特点,也导致游客产生审美疲劳,不利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2.2 文化内涵挖掘浅层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超越了满足吃饭穿衣的低层次期待,从物质需求提升到精神需求^[9]。人们期待文创产品能既满足精神需求,也符合当代审美标准。因此,当代文创设计运用的文化元素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形”的套用与模仿,而是要将传统文化精髓的“神”融入其中,结合当代设计元素,进而设计出优秀的文创设计作品。蚌埠市拥有大禹文化、双墩文化、花鼓灯艺术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商家与设计者开发出了大量的旅游文创产品,但部分文创产品多停留在符号化借用层面,设计上存在元素复制与拼接的现象,缺乏对文化精神内核的深度解读。例如,一些大禹文创产品只是简单地将大禹治水等图案印在产品外观上,设计者对大禹文化理解不够深入,设计缺乏深度创意和文化内涵,叙事设计不够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没能在消费者心中引发强烈的文化共鸣。

2.3 文创营销渠道单一化

新媒体时代下,信息技术为文创产品提供了丰富的数字资源,拓展了宣传和营销的渠道,使大众可以多维度地接触到文创产品。目前蚌埠大禹文创及相关蚌埠文创已经注意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成立了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但通过调研发现,部分文创产品未能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优势,平台活跃度不高,销售方面主要依赖景区和博物馆的线下售卖,与线上平台推广没有充分结合,品牌影响力较小,与国内知名文创品牌影响力差距较大。从截至 2025 年 6 月蚌埠文创(含大禹文化相关主题)在新媒体平台的部分数据统计(见表 1、表 2)可以看出,大禹文创及相关蚌埠文创平台起步较晚,存在作品内容较少、用户活跃度不够、平台影响力较小等问题。另外在线上营销方面,与国内著名文创品牌差距较大,暂未利用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销售产品。相比之下,故宫淘宝截至 2025 年 6 月粉丝达到 1031 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和销售,并建立会员制度,增加文创用户粘性。

表1 蚌埠文创(含大禹文化相关主题)
与国内著名文创品牌的抖音数据对比

抖音平台名称	作品/个	粉丝/个	获赞/次
蚌埠文创	111	711	4713
上新了故宫	943	641000	1556000
敦煌文创玉石旗舰店	746	149000	274000

表2 蚌埠文创(含大禹文化相关主题)
与国内著名文创品牌的小红书数据对比

小红书平台名称	作品/个	粉丝/个	获赞/次
蚌埠文创	129	1868	5601
上新了故宫文创	672	78000	278000
敦煌文创官方旗舰店	660	9270	13000

2.4 文创用户定位模糊化

目前,蚌埠大禹文创产品的开发体系仍不成熟,文创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并未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一些文创产品在设计与价格定位方面存在偏差,价格与质量严重不匹配,同时没有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合理进行产品细化,相关大禹文创产品针对的用户人群比较宽泛。用户调研是文创开发和营销的前提,如果文创产品开发缺乏用户调研数据,没有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进行设计,将不利于文创产品建立粉丝用户,无法形成品牌效应,最终导致产品销量较小,影响了大禹文创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3 蚌埠市大禹文创产品的开发路径

目前文化资源和旅游文创设计受到各界关注,文创开发者需要深入挖掘大禹文化内涵,了解消费群体需求,建立协同运行体系,并借助数字技术和现代媒介进行推广,以促进大禹文创产业健康发展,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

3.1 充分挖掘文化元素,打造特色文创产品

文创设计是把文化与形式、艺术与商业、平面与立体相结合,旨在为产品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满足人们与日俱增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设计师需要深入发掘文化内涵,将其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最后通过赋予产品文化内涵来淡化其所带的商业属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融入大禹文化元素不等于简单照抄一些图样和纹饰,而是需要设计师对文化有着全方位的认知,包括历史传说、地理遗迹以及文化符号等方面,科学运用产品设计语言来展现文化内涵,打造特色的文创产品。同时,为避免大禹文化

与文创设计的融合过于牵强,设计还要有针对性提取文化元素,找到文化与产品本身的共通之处。例如,敦煌博物馆与沸点品牌联合推出《飞天滑板》,产品外观运用飞天胡旋舞的文化元素,巧妙地结合了舞蹈的旋转文化特征与产品特点的共同点,并引用时尚、潮流的设计元素,文创产品符合了当代年轻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让古老的敦煌飞天文化通过产品焕发出新的活力(见图3)。



图3 敦煌博物馆与沸点品牌联合推出的滑板文创产品

3.2 精准定位用户需求,增强文创受众粘性

市场上不同的消费群体对文创产品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目前大禹文创产品形式、种类过于单一,无法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因此,大禹文创在设计过程中需考虑用户的消费需求、文化多样性、身体机能等方面,设计出符合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文创产品,如为老年人设计怀旧易操作的产品,为青年学生设计时尚趣味感的产品,为女性设计精致并富有美感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此外,随着精神需求不断提高,人们也越发青睐于个性化的文创产品设计。像苏州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时空喵旅 DIY 印刷术套装》,产品将苏州博物馆的建筑和馆藏文物元素融入“雕版印刷”而成的木刻版画中,套装中还提供了木刻刀、木刻版等制作工具,让用户可亲手发挥想象参与刻印,这种参与式设计一方面让消费者在动手的过程中领略到雕刻印刷的文化魅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情感需求。

3.3 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文创跨界创新

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文化创作的环境与方式不断变革^[10]。敦煌研究院开发的“数字敦煌”项目融合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交互式现实三大核心技术,将敦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跨越时间、空间的界限,满足大众所需,开创数字文化新业态^[11]。因此,大禹文创设计要与时俱进紧抓数字时代的契机,促进产品跨界创新。一方面,设计时可运

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表现大禹文化内容,还原文化的故事场景,让用户能够沉浸式地感受到治水精神,加强文化展现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商家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获得用户实时反馈,运用大数据对用户反馈意见进行采集与分析,信息系统进行问题解答和售后服务。通过数字化的反馈机制帮助设计实时优化文创产品的策略与功能开发,降低市场风险。

3.4 建立协同运行机制,助力文创产业发展

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不仅需要文化与设计的完美融合,也要各环节开发主体打破壁垒形成合力。目前蚌埠市大禹文化产业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文创产品的开发迫切需要构建合理、科学的运行机制,建设“产-学-研-用”一体化开发模式,为大禹文化产业发展搭建起广阔的合作平台,加强政府、高校、企业的协同联动,利用制度保障、宣传激励、物质支持、平台建设、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等形式,实现各环节的深度融合。政府通过政策扶持、产业基金引导、公共平台搭建,营造良好的文创产业发展环境;高校聚焦大禹文化元素的内涵挖掘、文化创意、数字技术应用研发等领域,为文创开发提供技术支撑与人才储备;企业则发挥市场运营与生产制造的优势,将文创设计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共同为大禹文创开发注入强劲动力。

3.5 创新产品销售模式,拓展大禹文创市场

蚌埠市大禹文创产品的营销是实现产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必由之路,在开发大禹文创产品设计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创产品营销方式的创新。大禹文创的营销方式越多,消费者就可以更加方便了解历史文化与产品属性,吸引他们进行主动消费,促进大禹文化的价值转化。大禹文创门店可以定期开展线下主题展览与举办文化节,吸引游客参与进来,在文创的设计上留有一定空间,让消费者进行二度创作,从而更加了解文化历史和民族精神,形成“展览吸引流量、活动沉淀用户”的运营闭环。同时,大禹文创商家应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构建包括淘宝、抖音、京东等线上营销体系,定期在不同新媒体平台推送文创产品相关的趣味信息,增强用户对产品的文化认知和认可度,形成新的粉丝经济,提升文创产品的营销效果。

4 结论

随着消费趋势的转变,文化产业逐渐受到大众

关注,也为大禹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将大禹文化应用于文创产品的开发,为产品注入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也促进了蚌埠市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社会意义。此外,大禹文化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融合,不应是图案、形式的简单复制与模仿,需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通过挖掘文化内涵,结合当代设计手法与审美理念,使大禹文化与文创产品完美融合。同时,充分利用政府、高校、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密切协同合作机制,推进大禹文创的人才链、专业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贯通融合,实现学校、企业、地方经济等多方共赢发展。最后,大禹文创产品开发还需实现线上线下的营销联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认可并了解大禹文化,助力大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EB/OL]. [2022-08-30].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07278.htm.
- [2] 肖燕. 浅析大禹文化符号的形成[J]. 文史杂志, 2024(5): 84-88.
- [3] 魏玉梅, 甘婷.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大学生大禹文化认同感现状[J]. 黑龙江科学, 2024, 15(21): 99-101.
- [4] 广李枚株, 赵宏艳. 基于橙光游戏和短视频平台的大禹文化传播路径研究[J]. 新楚文化, 2024(5): 78-80.
- [5] 刘梦焯, 魏国彬. 场景化视域下蚌埠涂山大禹文化艺术传播研究[J]. 铜陵学院学报, 2022, 21(3): 78-81.
- [6] 殷文朔. 地域文化视角下城市品牌的塑造与传播路径研究——以蚌埠市为例[J]. 黑河学刊, 2023(5): 21-25.
- [7] 曹劲松. 文化自信: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1): 1-9.
- [8] 李可可, 范颖, 刘刚. 大禹治水的文化探寻[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04(6): 42-44.
- [9] 齐卫平.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与时代使命[J]. 理论与改革, 2025(2): 1-11.
- [10] 孙大东, 杨子若. 数字创意产业融合视角下档案文创产品开发产业化的两条路径[J]. 档案与建设, 2023(2): 33-36.
- [11] 曲梦鸽, 臧勇. 价值重构视阈下的博物馆数字文创设计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4, 31(9): 77-83.

长三角跨区域结对合作帮扶下虚拟产业集群建设研究

郑晓奋

(蚌埠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皖北省际合作产业园在结对合作帮扶政策支持之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压力,虚拟产业集群为其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突破“地理区位”限制,基于先进数字技术下省际合作产业园的虚拟产业集群构建,提出皖北依托现有实践基础构建虚拟产业集群的产业选择、模式选择,并由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培育链主型平台企业、建设虚拟资源共享平台、共建虚拟创新联合体、建立虚拟治理平台和机制。研究结论可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结对合作帮扶;虚拟产业集群;集群构建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48-07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Industry Clusters under Cross-regional Pairing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ZHENG Xiaof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The paired cooperation between Cities in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assi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 provinci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 in Northern Anhui. However, there is also pressure from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virtual industry clusters have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industrial and mode choices for building virtual industry clusters in Northern Anhui are proposed based on existing practical foundations. Based on thi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cultivating chain owner platform enterprises, building virtual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s, jointly building virtual innovation consortia, establishing virtual governance platforms and mechanism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large market.

Key words: paired cooperation assistance; virtual industrial cluster; cluster construction

沪苏浙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合作共建皖北省际合作产业园区10个,在产业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招商引资、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区域内合作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实战经验,有力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政策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缩小长三角区域内发展差距,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差距是“发展”的差距,而非单纯的GDP差距。实现这一政策的目的需要通过产业、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提升皖北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省际合作帮扶借助跨区域资源转移、跨区域合作治理等途径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1],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看,此类帮扶需要

收稿日期:2025-06-2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2022AH051906)。

作者简介:郑晓奋(1967-),女,浙江杭州人,教授。E-mail:zxf_162@sina.com

树立“共存是存在的前提”理念^[2]。因此,在此背景下共建的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有别于以往的对口援建。在对皖北城市省际产业合作园区调研中发现,存在行政协调困难、市场动力不足、管理机制不完善、园区承载能力较弱、产业配套服务弱、产业合作松散、产业链低端徘徊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省际产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

虚拟产业集群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组织方式变革形成的新型产业集群形式。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和资源壁垒、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分工及供应链协作的虚拟产业集群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虚拟产业集群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做强做大、实现跨区域合作帮扶目标指出了一条新路。利用数字技术跨区域延伸产业链、重组产业资源,形成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虚拟产业集群。再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使得虚拟产业集群与地理集聚的集群互动融合,从而影响、重塑集群成员区域空间的塑造路径与分布格局。这是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加快产业及省际产业合作园区转型升级,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进而促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必然选择。

1 文献综述

1997年由欧盟EU-SACFA计划资助的网络化研究课题组首次提出虚拟产业集群概念(Virtual Industrial Cluster)^[3]。2013年Davidovic提出了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E集群(E-Cluster)概念^[4]。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将互联网技术与区域产业集群结合起来研究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Molina认为中小企业要提升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必须通过虚拟集群的方式建立产业集群^[5]。Nicolai等提出传统的产业集群是企业在真实空间下通过地理上接近形成的,当市场需求不足时会引发产能过剩风险,也会因路径依赖、外部资源约束导致技术创新不足,威胁到集群生死存亡^[6]。国内学者也将目光转向虚拟产业集群,试图找到数字技术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新路。谢丽彬等认为传统制造业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驱动下从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开展变革,制造业集群在新发展阶段会采取具备打破地理界限、分工协作等诸多优势的虚拟集聚方式^[7]。

虚拟产业集群如何运行?其动力机制、知识共享、群内技术创新风险又是如何发生?王能提出自组织协同形成虚拟产业集群,其稳定发展是政府、行业协会等他组织调动自组织的结果^[8]。庞俊亭等

提出虚拟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具备不同的特征,能够规避传统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9]。黄昕怡则认为由于社会环境和集群机构的复杂性使得虚拟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风险呈现多样性特征^[10]。李尧建议通过建立信任机制、提高知识共享协同收益以及降低知识共享成本,从而增加制造业虚拟产业集群中企业间知识共享收益并激励其知识共享^[11]。王媛玉和赵儒煜研究虚拟与地理双重集聚视角下区域空间演化动力机制,提出功能圈域化、联系扁平化、结构网络化等区域空间演化新趋势^[12]。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构建虚拟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竞争能力、降低风险、突破资源制约。并且,虚拟产业集群由于打破了地理界限,从而破除了传统产业集群各自为政、注重地区自我利益、以邻为壑的弊病,还能够在现有集群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建立各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提升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然而,在当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关于跨区域合作帮扶下虚拟产业集群的研究很少。如何使得产业集群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园能够跨区域实现合作帮扶,促进集群内部的资源共享,以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地理区位”限制,将皖北省际合作产业园与虚拟产业集群理论相融合,研究基于先进数字技术下省际合作产业园的虚拟产业集群构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区域一体化发展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皖北虚拟产业集群构建的必要性

沪苏浙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共建虚拟产业集群,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顺应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的关键举措。

2.1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压力是首要动因

跨区域共建虚拟产业集群是破解皖北发展滞后问题、实现长三角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尽管通过结对合作帮扶,如共建省际合作产业园、干部互派挂职等,皖北发展取得了进展,例如2025年1-5月,滁州市新签约亿元项目254个、总投资597.6亿元,其中沪苏浙项目占比达46.1%。但产业转移依赖实体园区,皖北在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集聚上仍显著落后于沪苏浙。传统帮扶模式受限于物理空间和资源流动效率,未能解决皖北地区长期面临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资源不足等挑战。若仅依赖传统产业转移,难以实现“后起步高起点发展”。跨区域虚拟产业集群通过数字化平台打破地理边界,可加速资源

全域配置,契合“一体化”和“高质量”两大核心目标。

2.2 皖北产业转型的迫切需要

皖北若仅承接低端制造,可能会陷入路径依赖,陷入产业链低端锁定。皖北产业转型需“四化同步”培育新动能。跨区域虚拟产业集群可推动皖北城市通过共建“科创+产业”等平台实现创新链共享;通过虚拟集群延伸至研发、售后等环节,实现产业链互补;通过 AI 质检、供应链金融等数字化治理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向高端跃升,避免产业链低端锁定;通过匹配沪苏浙风投资本与皖北科创项目推动皖北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通过数字调度维持协作,提升产业集群韧性,优化集群生态构建。

2.3 深化结对合作帮扶的创新需求

当前皖北城市与沪苏浙合作以实体园区共建和产业链局部承接为主,存在多地争抢同类产业等重复建设、皖北产业与帮扶城市资源匹配度不足等资源错配之类风险。由此形成的皖北城市产业同质化竞争可能削弱帮扶效能,导致传统帮扶模式面临瓶颈。跨区域虚拟产业集群通过“云链”整合可突破物理约束,实现:沪苏浙的数字技术赋能皖北传统产业的技术协同;通过科创飞地等虚拟平台进一步降低跨区域管理成本的飞地经济数字化;将诸如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通过“一单制”联运提升效率模式、“港口功能前置”模式降低物流成本等创新方式复制至全产业链,促进降本增效、要素高效流通。

虚拟产业集群是结对帮扶的“升维工具”。通过共建虚拟产业集群,沪苏浙的技术、资本、市场资源与皖北的土地、劳动力、产业基础形成“数字孪生式”耦合,实现三大跃迁:一是空间跃迁,从“物理飞地”到“云上共同体”;二是价值链跃迁,从“产业承接”到“全域创新网络”;三是治理跃迁:从“行政帮扶”到“数字生态共建”。

3 皖北虚拟产业集群构建的可行性

沪苏浙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共建虚拟产业集群,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探索。在政策与产业协同支撑下,共建虚拟产业集群具有可行性。

3.1 政策机制深度耦合

2020 年国家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2021 年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中提出探索发展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加快产业资源虚拟化集聚、平台化运营和网络化协同,构建虚实结合的产业数字化新生态。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具体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指导下,各省市也相继出台配套支持政策。政策层面的支持为沪苏浙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构建虚拟产业集群,推动省际产业合作园区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依据。2025 年 4 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联合启动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发展报告编制,强化了跨区域产业治理的协同性。

3.2 产业协同具有一定基础

一是清晰的产业定位与互补性。皖北产业定位清晰,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传感、智能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智能家电、高端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集群。这些产业定位与沪苏浙重点打造的万亿级、五千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和协同潜力。

二是既有合作园区提供载体,沪苏浙技术外溢需求强。上海张江在萧县设立全国唯一县级“科创飞地”;滁州在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地区建立 7 家科创飞地;宁波与蚌埠共建微电子产业园;淮南—上海闵行科创产业园探索“研发+制造”“总部+基地”等合作路径;淮北挂牌建立沪淮科创协同中心,探索“企业研发和办公在科创中心,注册和后期投产运营在相山经济开发区”的方式。这些合作园区与技术外溢也验证了研发—生产分离模式的可行性。同时,沪苏浙与皖北城市通过干部互派挂职、技术合作等方式,加强了两地的协同创新。例如,蚌埠与宁波科技大市场合作共建蚌埠科技大市场,推动宁波科技成果、专家资源、仪器设备等创新要素共享共用。淮南市产发集团在上海松江 G60 科创云廊建设淮南科创孵化基地,摸排淮南有需求、有意向的企业,制定个性化的人才飞地政策,打造招才引智的桥头堡。

三是虚拟化转型与数字化赋能提供了“数字基座”。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贯通,数字基建赋能,形成“4 小时产业圈”,为虚拟产业集群的要素流动提供物理支撑。沪苏浙与皖北地区积极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虚拟化转型。例如,皖北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和物联网超级中试中心建设,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互联互通,促进多主体在虚拟空间的集聚与协作。六安市引进上海先进的数字

技术,建立上海交易集团六安大数据智算中心;杭州市为宿州市萧县提供技术支持,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通过跨境电商与数字经济平台建设,探索“虚实共生”的双重集聚。如淮南市对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淮北与徐州市共同推进淮北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杭州结对帮扶宿州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寻找区域间的互补点,企业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完成交易活动,同时在实体空间中进行生产,从而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

四是创新跨区域合作机制。沪苏浙与皖北城市通过制定清单化闭环推进机制、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有序推进产业合作园区建设。例如,沪苏浙与皖北城市共同制定了《长三角省际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导则》,创建产业融合型、创新引领型、开放合作型、绿色发展型省际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推进高质量园区建设,打造示范样板。宿州出台《宿州市“科创飞地”管理办法(试行)》,引入杭州智新佑政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宿州-杭州“科创飞地”第三方运营机构,制定“科创飞地”入驻、考核、退出等管理制度,探索税收利益分享等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以确保合作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沪皖以六松现代产业园为试点,率先探索建立跨省利益共享机制,为区域产业转移和利益共享提供了“六松方案”。松江区人民政府、六安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利益共享机制协议,按照“合作共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互惠共赢”原则,由松江区政府及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推动落户六松现代产业园的工业项目,在项目建成投产后5年内产生的税收收入,在六安市、松江区两地分成。六安市金安区实际留存部分按照6:4比例与松江区分成,松江区再依法依规对所在街镇、园区、国有企业予以激励补偿。

3.3 共建跨区域产业集群探索与实践

蚌埠市的探索和实践。2023年4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针对国内MEMS科技产业发展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协同创新不足等问题,联合长三角地区MEMS与传感器8家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发起成立“长三角MEMS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该联盟已有成员单位80余家,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是联盟理事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2024年该联盟获批成为长三角企业家联盟第四批产业链成员单位。

六安市的探索和实践。2024年长三角(含江

西)大飞机先进制造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群集聚了全国超三分之一的大飞机装机配套供应商,产业链相关企业超900家,工业产值超千亿元,是国内创新能力最强、工业基础最好、产品配套最完善的大飞机产业集群。该集群以长三角一市三省及江西省全域为实施范围,以上海临港新片区、江苏无锡、浙江杭州、安徽六安、江西南昌为核心承载区;目标到2027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关键技术自主高地、核心产品供给高地、科技企业集聚高地,打造成为世界级民用航空产业集群。

阜阳市的探索和实践。依托复旦大学,总规模达10万平方米的阜合现代产业园区和复旦大学合作设立的安徽复旦科技园,加入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的研究孵化与产业转化基地,累计招引项目40多个。

上述沪苏浙与皖北城市间跨区域产业集群的探索和实践,为区域产业协同、产业链的延伸和优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实践中,皖北跨区域虚拟产业集群构建尚需突破三大瓶颈:一是区域发展落差制约资源对接。皖北高端人才短缺,研发投入强度低于长三角均值,创新能力不足,人才与技术短板可能影响跨区域虚拟产业集群中技术协同的深度。二是数据共享与治理机制缺位。一方面,三省一市政务数据、产业标准、数据安全监管尚未统一,存在数据壁垒。另一方面,虚拟产业集群依赖跨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但皖北中小企业数字化率低,数字转型滞后,企业数字化能力不足,存在数字鸿沟。三是利益分配复杂度高。尽管六松产业园探索“财税分成+数据分算”机制,但虚拟产业集群的知识产权归属、跨区域虚拟集群的税收分割、GDP核算机制缺失等问题仍需创新解决方案、设计更精细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4 皖北虚拟产业集群构建路径

4.1 产业选择

虚拟产业集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集群内各成员虚拟集聚重组组织架构,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又能够将资源效率利用最大化。虚拟产业集群产业选择与跨区域的可行性与产品种类、运输成本、运营环境、资源禀赋、人力水平等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联。以沪苏浙优势和特色产业集群为主导,基于皖北省际合作产业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愿望和基础,高新技术产业有着知识、技术密集,资源、能源消耗少,研发投入大、初期风险高、增长率高、附加值高

等特点,可以从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与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生物医药与现代中药、数字农业与农业产业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发展对象,通过集中布局、集中资源、集中攻坚的策略,推动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

4.2 模式选择

虚拟产业集群模式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支持下,突破传统地理空间限制,通过虚拟化手段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协作创新和共同发展形成的。其核心在于利用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构建共享平台资源,使具有产业链和价值链联系的企业在

虚拟空间中集聚,形成高效、灵活、开放的产业集群。虚拟产业集群基本模式可分为自组织、他组织两大类型,在基本模式下又可细分多种模式(表 1)。在不断的组织创新下,还将产生新的细分模式。基本模式与细分模式可独立使用,也可组合使用,每种模式都有其特点和优势。这些模式显示,虚拟产业集群构建需要具备链主企业或平台整合资源架构集群生态组织、数字基座跨区域协作、制度突破和政策赋能等要素。皖北城市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和环境,选择合适的模式,以实现企业间的高效协作和共同发展。

表 1 虚拟产业集群模式

模式	类型	案例	表现	特征	优点	缺点
基本模式	自组织虚拟产业集群	海尔卡奥斯(COSMOPlat)平台通过企业间的自主协作,形成有 4 万余家企业的虚拟产业集群	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和网络技术自然形成的一种集群模式。	强调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企业之间通过信息共享、合作创新等方式,自发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	企业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组织协调难度大、成员稳定性差。
	他组织虚拟产业集群	阿里巴巴、京东等消费互联网平台,华为云、徐工工业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	在政府、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外部组织的引导下形成的虚拟产业集群。	通常由一个核心平台或组织发起,通过搭建共享平台,整合资源,推动企业间的协作。	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提升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可能受到外部组织的控制和干预,灵活性较低。
细分模式	基于数字平台的虚拟产业集群	以歌尔股份为核心的青岛市崂山区国家级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	依托数字平台(如电商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实现企业间的集聚和协作。	通过数字平台打破企业之间的信息孤岛,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制造向多维服务转变。	能够实现企业间的高效协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	虚拟现实技术要求高、投入大
	基于生态系统的核心虚拟产业集群	苏州“虚拟”产业园通过搭建网络虚拟平台,实现不同地理区域的企业和机构在虚拟空间中集聚、线上线下融合	通过构建一个高度分工、高度合作的模块化产业集群,实现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搭建网络虚拟平台,推动不同地理区域的企业和机构在虚拟空间中集聚,实现线上线下融合	强调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深度合作,通过共享平台、中介机构等组织形式,形成一个高度互联的生态系统。	能够形成高度协同的生态系统,提升集群的整体创新能力。	对现代信息技术依赖大、组织协调与治理难度大、信任机制缺失
	基于产业园区的虚拟产业集群	淄博博山数字经济产业园(工业元宇宙领域)构建“虚拟园区-实体工厂”柔性生产网络,吸引省内外企业“虚拟入园”	通过实体产业园区与虚拟产业园区的结合,实现跨区域、跨领域的合作。	强调实体与虚拟的结合,通过实体产业园区提供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虚拟产业园区提供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	能够结合实体与虚拟的优势,提升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受平台能级、产业协同效应、盈利模式、契约规则等因素制约

续表
表 1 虚拟产业集群模式

模式	类型	案例	表现	特征	优点	缺点
细分模式	基于知识溢出的虚拟产业集群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华南城数字产业集群、上海商务智能产业集群等	通过知识共享和溢出效应,提升集群的整体创新能力。	强调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共享,通过平台化的知识管理,促进企业间的协同创新。	能够有效提升集群的整体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受知识溢出机制复杂性与识别难度、知识共享与信任机制、知识溢出的边界与范围限制等因素制约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虚拟产业集群	创捷公司基于虚拟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整合手机产业中小企业形成虚拟供应链网络	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供应链金融模式,实现企业间的资金支持和风险共担。	通过虚拟供应链网络,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失、风险控制难度大、法律法规监管缺失、技术瓶颈限制等
	基于区块链的虚拟产业集群	华能信链能源行业数字低碳供应链平台、广州城投·中关村e谷区块链孵化园等	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企业间的信任机制和数据共享。	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提升企业间的信任度。	能够提升企业间的信任度,促进协同创新。	受技术集成与互联互通能力、行业认知与应用深度、信任机制与数据安全、法律与监管环境完善等因素制约
	基于绿色转型的虚拟产业集群	长兴岛碳中和产业集群等	通过虚拟产业集群的模式,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	通过虚拟产业集群的高效资源配置,减少生产中的浪费,推动绿色转型。	能够有效推动绿色转型,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构建门槛较高、组织协调难度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等

4.3 分阶段建设数字化平台强化基础支撑要素

总体设想是:短期,整合沪苏浙实验室数据与皖北生产数据共建行业级云平台。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可将六安已建成的新能源汽车检测基地,升级为区域性共享服务平台。长期对接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构建“产业大脑”,实现创新资源智能匹配。实施中,强化以下要素建设:一是强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速泛在网络、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二是核心数字平台建设。包括:协同平台,提供项目管理、在线会议、即时通讯、文档共享、设计协同等功能的统一工作空间;产业互联网平台,面向特定行业的平台,整合供应链管理、产能共享、订单协同、研发设计、设备远程运维、数据分析等服务;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交换机制和平台,促进成员间必要的数据流通和价值挖掘;创新服务平台,提供在线技术交易、知识产权服务、众包众创、专家咨询、虚拟孵化等功能。

4.4 集聚参与主体与资源核心构成要素

一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集聚参与主体与资源。虚拟产业集群必须能为所有参与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如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拓展市场、加速创新、获取资源等,这是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多元化、互补的参与者网络构成。包括:具备较强行业影响力、技术实力或市场渠道,能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的链主型平台企业;在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特定服务等特定环节具有专精特新优势的专业化中小企业群;能提供知识创新源头、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能提供咨询、金融、法律、财税、检测认证、人才猎头等专业服务的科技服务机构;提供政策引导、规则制定、协调服务和营造环境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具备数字技能、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专业人才。三是清晰的产业定位与互补性。参与者围绕特定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形成连接,成员间在技术、产品、服务、市场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协同潜力,避免同质化竞争。

4.5 形成协同与治理运行机制

一是形成高效的协同机制。包括:标准化与互操作性,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标准和业务流程规范,确保不同系统、不同主体间顺畅交互;信任机制,建立基于声誉系统、信用评价、区块链技术(确保透明可追溯)或第三方认证的信任体系,降低远程协作风险;知识共享与学习机制,鼓励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在线交流、转化与创新,形成学习型网络;灵活的项目协作机制,支持跨企业、跨地域的项目团队快速组建、分工协作和高效执行。二是有效的治理结构与规则。包括:明确的组织架构,确定发起方、运营方、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清晰的成员准入与退出规则,设定加入门槛、权利与义务、评估标准和退出程序;公平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设计合理的合作收益分配模式(如按贡献度)、成本分担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冲突解决机制,建立快速、公平的线上或线下纠纷调解与仲裁程序;数据治理与安全规则,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隐私保护要求和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5 结论

跨区域虚拟产业集群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生”推动皖北从被动承接产业转移转向主动参与价值创造;从“地理相邻”到“数字互联”突破传统结对帮扶的空间约束,形成更开放、动态的长三角创新生态;从“政策驱动”到“数据驱动”以数字化治理提升区域合作效率,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新范式。不仅可以解决皖北产业园的短期发展瓶颈,更重构了长三角产业协同的底层逻辑。虚拟产业集群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跨区域协同推进。建议如下:

一是大力培育链主型平台企业,加强虚拟产业链协同。链主型平台企业是虚拟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沪苏浙皖政府应加强跨区域协作,出台引导性政策,大力扶持链主型平台企业发展并发挥其对跨区域上下游企业的集聚核心作用,推动平台企业搭建包括皖北在内的面向整个区域和行业的、连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虚拟化集群平台。同时,建立完善的平台进入和动态调整机制,形成智能协同的新型平台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强虚拟产业链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协同效率。通过数据互联,将皖北园区嵌入沪苏浙主导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通过订单协同、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等方式,实现跨区域生产调度。利用虚拟集群的灵活性,补链强链,吸引沪苏浙企业在皖北布局制造基地、物流节点等配套设

施。通过长三角一体化电商平台、跨境贸易数字化通道,构建虚拟市场网络,以“飞地经济+虚拟集群”模式联合打造区域品牌。

二是加强虚拟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支持皖北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积极争取省级、国家级层面跨区域支持,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对 5G 基站、智能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智能化改造和在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夯实高速、安全、泛在的虚拟产业集群底层支撑。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关键技术、生产工艺和成果产业化等重点环节,建立专业数据库等大数据平台,高效配置产业资源和快速扩散创新技术,量身定制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支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联动。建立长三角人才共享库,打造虚拟人才池,支持沪苏浙专家通过远程指导、项目兼职等方式参与皖北园区建设。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利用虚拟现实(VR)、在线教育平台为皖北工人提供定制化技能提升课程。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沪苏浙的研发机构、金融资本、高端人才等产业资源与皖北的土地、劳动力、政策优势,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三是共建虚拟创新联合体,弥补创新能力不足。建立跨区域产学研协作平台,通过线上联合实验室、技术众包等方式,推动沪苏浙高校、科研机构与皖北企业联合攻关。营造集群知识转移的浓厚氛围,把握数字化知识溢出效应,利用工业互联网、AI 技术将沪苏浙的先进管理经验、工艺流程标准化并快速复制到皖北园区。通过虚拟集群共享沪苏浙新能源、节能设备等的低碳技术,推动皖北园区绿色化改造。构建产业园区的数字孪生系统,模拟优化生产流程和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试错成本,实现数字孪生赋能。依托虚拟网络减少物理空间限制,推动技术转移、远程协作和柔性人才共享,降低跨区域合作成本。

四是建立虚拟治理平台,优化政策协同与治理机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制定《长三角虚拟产业集群建设指南》,统一数据标准与利益分配规则,制定和完善虚拟产业集群相关政策法规,主动规避虚拟产业集群契约属性下的潜在风险,探索构建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多重治理机制。建立跨区域数据共享和联合决策系统,配套数据确权、跨省统计分算等制度创新。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建立透明的分算机制、跨区域协调机构,确保数据的公开和可追溯性以及统计分算机制的顺利实施,实现税收分成、环保标准、统计考核等政策的动态协调。(下转第 91 页)

基于聚类-AHP 分析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郑 谦^{1,2}, 李海越^{1,2*}, 胡延延¹

(1. 安徽科技学院 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数字乡村建设与治理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数字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其快速发展对数字农业提供方的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科学的评价标准。为此,采用文献分析法初步构建评价指标,形成指标体系的指标层;通过对数字农业使用对象的问卷调查,采用R型聚类分析,进一步提炼出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体系赋权,构建了完整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为提升数字农业服务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将有力推动数字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数字农业;服务质量;R型聚类分析;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3;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55-07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Cluster-AHP Analysis

ZHENG Qian^{1,2}, LI Haiyue^{1,2*}, HU Yanyan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ngbu, 233030, Anhui; 2. 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griculture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service quality of digital agriculture providers and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unified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standard. The evaluation index was initially constructed by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index layer of the index system was formed.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users of digital agriculture, R-type cluster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further extract the criterion layer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index system was weighted by AHP, and a comple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service quality was constructed. The system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igital agriculture services, and will strong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digital agriculture; service quality; R-type cluster analysi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其现代化进程与安全可控性对社会全局发展及国家安全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已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催

生了数字农业这一新兴业态,成为驱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数字农业不仅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程度,还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1]。

收稿日期:2025-04-2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0D15)。

作者简介:郑谦(1980-),女,四川自贡人,教授,博士;李海越(1998-),男,安徽宣城人,硕士研究生。E-mail:1468995465@qq.com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农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各级政府和社会也加大了对数字农业农村的资源投入,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农业的发展具有系统性和集成性特点,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高效的数据服务平台以及配套的金融、教育和人才支持^[2]。学界前期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农业发展水平^[3]或融合水平的评价^[4]。然而在数字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数字农业相关方的服务质量评价问题也日益凸显。数字农业相关方没有明确的定义,目前主要是指为数字农业开展提供软硬件服务的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等,如数字农业技术服务公司、数字农业设备制造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等。我国区域农业种类繁多、范围广泛,数字农业第三方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价标准。这不仅影响了数字农业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也制约了数字农业技术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客观、可操作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能为数字农业服务供应主体提供明确的改进方向,推动数字农业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评价体系还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促进数字农业服务模式创新与转型升级,推动数字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旨在结合数字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一套涵盖技术应用、服务效率、质量安全、经济效益及用户满意度等多个维度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通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为数字农业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为数字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1 文献综述

数字农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业发展模式,正逐渐成为全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数字农业通过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了厘清数字农业发展的现状和方向,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侧重点,国内外学者从指标选取和指标赋权两个维度构建数字农业相关评价标准:

从指标选取来看,欧盟构建了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标(DESI)并广泛用于欧洲各国数字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OECD挑选了38个衡量数字农业

的指标,这些指标涵盖了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赋权、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5]。此后,有关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对数字农业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主要包括:一是从数字农业的内涵和特征入手,侧重从数字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农业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6]。二是基于数字农业技术应用视角,从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农业大数据分析能力、农业智能化装备性能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7]。三是基于数字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视角,从农业产值增长率、农产品质量提升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8]。四是基于数字农业社会接受度与政策支持视角,从农民对数字农业技术的接受度、政府政策的完善程度、社会舆论的积极程度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9]。

在指标赋权方面,国内外学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如文献分析、专家咨询、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定性、定量方法,从评价指标的筛选、权重的确定、评价模型的构建等方面确保数字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1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研究方向对数字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些研究不仅为数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为数字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从数字农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效益以及对环境影响的视角入手进行评价,针对为数字农业提供支撑服务的第三方服务质量的关注不足,缺乏系统化的评价标准。李国英、李健等学者在研究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中,强调要加强数字农业生态链建设,认为其是驱动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关键一环,凸显了数字农业服务供应商的重要作用。数字农业服务供应商的评价指标构建对于规范数字农业服务体系、夯实数字农业发展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农业整体服务水平,规范数字农业服务供应商的行为,引导数字农业支撑体系的健康发展。

2 研究设计

基于我国当前的数字农业服务体系,依托于不同社会个体对数字农业服务的不同诉求程度,根据可靠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易获取性构建原则来构建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数字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在数字技术支撑下,数字农

业服务质量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服务质量本身;二是服务质量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数字农业服务质量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包含功能性、经济性、安全性、时间性、舒适性和文明性等。基于此,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构建适用于我国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1]。

本文研究设计如下:一是采用文献分析法初步构建评价指标,形成指标体系的指标层。二是通过对数字农业使用对象的问卷调查,采用 R 型聚类分析,对上述指标层进一步分析,构建评价的准则层。三是在指标层和准则层构建的基础上,采用 AHP 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确定指标权重,形成完整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2.1 指标设计

国际标准化组织认为服务质量的评估应包括功能性、经济性、安全性、时间性、舒适性和文明性六大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数字农业质量的服务水平。结合数字农业服务主体的信息需求特点,综合考虑数字农业服务的 6 个方面因素和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的指标,借鉴肖艳、闫铁柱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 21 个具体指标,作为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6],如表 1 所示^{[6][12][13]}。

表 1 评价指标表

序号	指标
1	农业机械化设备
2	有喷灌等设施的耕地面积比重
3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4	农业物联网水平
5	生产信息水平
6	农产品合格率
7	农业保险深度
8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9	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
10	有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11	农产品网络销售
12	益农信息社覆盖
13	电脑拥有率
14	智能信息技术提高农产品产出
15	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
16	农业科技服务人员
17	4G 以上网络覆盖

18	数字农业推广应用基地
19	服务获取便捷性
20	制度健全程度
21	平台信息时效性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

在初步构建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明确各指标体系之间的作用关系,适当降维以简化和提炼关键指标。本文以上述 21 个指标为基础,构建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调查问卷。面向数字农业用户进行分析调研,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每个问题项设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并分别赋分 1-5 分。

数字农业用户主要以农业生产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本次调查采用实地采访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主要选取了安徽省内寿县、怀远、五河、长丰、当涂、枞阳、铜陵等地区,覆盖了皖北、皖中和皖南的农业生产地区。为保证调研结果的可靠性,选取的调查对象均使用了数字农业技术,以确保对数字农业技术具备一定的认知水平。共发放了 100 份问卷,回收 96 份问卷,回收率 96%。筛除掉不完整以及无效问卷之后,剩余 89 份有效问卷,总有效率为 89%。调研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名称	选项	频数/次	百分比/%
性别	女	33	37.0787
	男	56	62.9213
年龄	18-35	5	5.6180
	36-55	14	15.7303
	56-60	54	60.6742
	60 以上	16	17.9775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14	15.7303
	高中或中专	39	43.8202
	初中	28	31.4607
从事行业	小学	8	8.9888
	种植业	58	65.1685
	养殖业	31	34.8315

3 聚类分析

3.1 聚类分析结果

聚类分析是科学研究领域常用的对抽象的对象进行分类的方法,不需要任何先验知识,以对象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作为标准,进行对象属性判别分类,确保群组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组间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目前主要分为 Q 型聚类和 R 型聚类^[14]。Q 型变量主要以样本为聚类对象,而 R 型聚类主要以变量为聚类对象。R 型系统聚类适用于变量数量较多、相关性较强的情况,旨在将具有相似性质的变量聚类为同一类,并从中筛选出代表变量,以减少变量数量,从而达到降维的目的。

为避免指标间的相关性导致重复设置问题,本研究运用 R 型聚类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聚类分析。先进行数据标准化,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构建相似性矩阵,采用层次聚类算法进行分析(如图 1 所示)。

考虑到指标体系的简化程度、代表性,采用 4 个聚类标准进行计算,形成涵盖潜变量和测量指标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根据 R 型聚类分析所得结论,参考以往研究文献^[4, 6],本文将聚类分析形成的四个潜变量指标分别定义为服务基础设施、服务易用性、服务有用性和服务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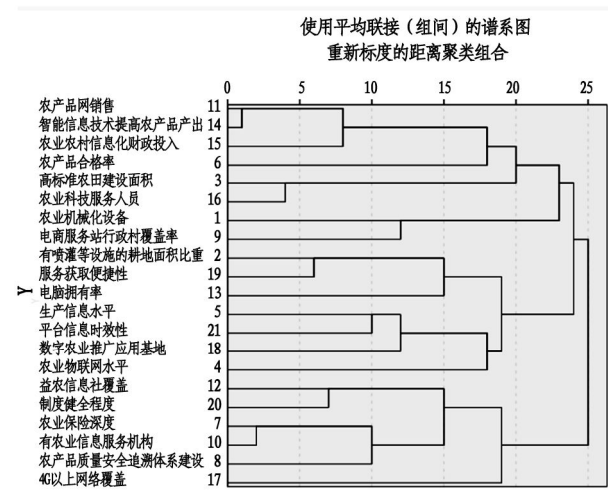


图 1 聚类分析谱系图

表 3 聚类分析结果

聚类指标(潜变量)	测量指标
服务基础设施(B1)	农业机械化设备(B11)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B12)
	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B13)

服务易用性(B2)	有喷灌等设施的耕地面积比重(B21)
	农业物联网水平(B22)
	生产信息水平(B23)
	电脑拥有率(B24)
	服务获取便捷性(B25)
	平台信息时效性(B26)
服务有用性(B3)	农业科技服务人员(B31)
	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B32)
	智能信息技术提高农产品产出(B33)
	农产品网络销售(B34)
	农产品合格率(B35)
	数字农业推广应用基地(B36)
服务保障(B4)	生产制度健全程度(B41)
	4G 以上网络覆盖(B42)
	有农业信息服务机构(B43)
	益农信息社覆盖(B44)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B45)
	农业保险深度(B46)

3.2 信度效度检验

为检验问卷质量和聚类分析后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各测量指标相对于各潜变量指标的有效性程度,本文进一步做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四个聚类形成的潜变量指标的组合信度(CR 值)和 Cronbach'α 值均高于 0.7 的阈值,说明各潜变量内部的各个测量指标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 值)也高于 0.5 的阈值,说明各潜变量的测量指标间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此外,各潜变量指标的相关系数,均低于各潜变量的 AVE 的开方值,说明各潜变量所属的测量指标之间具有显著的区分效度。综合来看,问卷质量聚类后的潜变量指标以及所含的测量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各潜变量指标能较好地代表所含的测量指标。

表 4 信度效度检验

维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		聚合效度 AVE	区分效度			
	CR	Cronbach' α		B1	B2	B3	B4
B1	0.8664	0.8548	0.7345	0.8570			
B2	0.7488	0.7284	0.6341	0.6341	0.7963		
B3	0.7794	0.7268	0.6723	0.6492	0.5023	0.8199	
B4	0.8576	0.8217	0.7286	0.7561	0.4892	0.6794	0.8536

注:区分效度的下半区域数值即为潜变量间皮尔森相关系数,对角线上加粗的数值为 AVE 开方值。

4 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权重计算

指标体系赋权主要包含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主观赋权法主要包括专家打分、层次分析法(AHP)等;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等。层次分析法(AHP)是基于决策者对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主观判断构造判断矩阵来确定权重,对具体的数据量和数据分布没有严格要求,综合定性与定量分析,适用于多目标多准

则的指标体系权重计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是研究农业发展水平评价类问题常用的赋权方法^[15, 16]。基于此,本文采用 AHP 方法进行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权重计算。

4.1.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本文将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目标层,将聚类分析产生的四个潜变量作为准则层,同时将 21 个测量指标作为指标层,构建 AHP 基本分析框架,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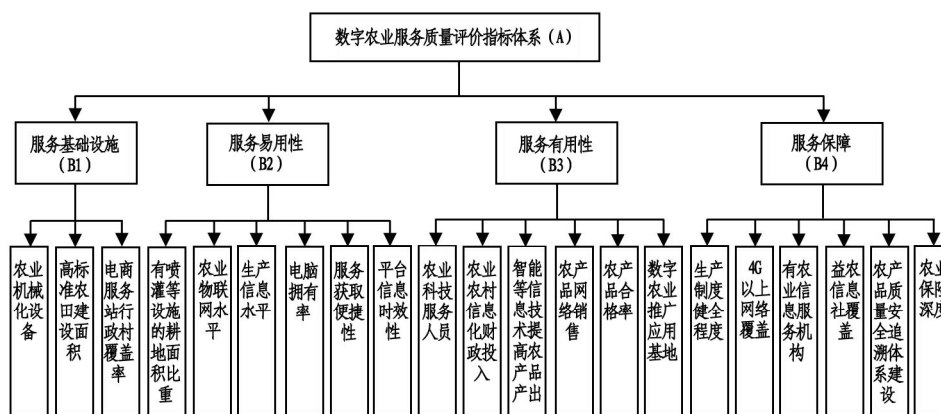


图 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4.1.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首先,为了解各指标之间的重要性程度,本研究邀请数字农业相关领域专家和用户共计 10 人,填写指标重要性程度打分表。打分表采用 Satty TL 设计的“1~9 标度法”,构造各指标重要程度的判断矩阵。其次,根据判断矩阵计算指标体系之间的特征

向量(w_i)和最大特征根($\lambda_{\max}$),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即计算相容性指标 CI 值($CI = (\lambda_{\max} - n)/(n - 1)$),查询对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并计算 CR 值($CR = CI/RI$)。本文采用 spss25.0、yaahpv7.5 软件进行相关计算,计算及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FLNN 训练算法分类

要素	$\lambda_{\max}$	特征向量 w_i	CR	是否通过一致性检验
A	4.2106	(0.4310, 0.0865, 0.1591, 0.3235)	0.0750	是
B1	3.0037	(0.3090, 0.5816, 0.1095)	0.0036	是
B2	3.0037	(0.1159, 0.1670, 0.2764, 0.3070, 0.0844, 0.0486)	0.0036	是
B3	6.4381	(0.2689, 0.1195, 0.0973, 0.0718, 0.2643, 0.1782)	0.0695	是
B4	6.3675	(0.2835, 0.0442, 0.2556, 0.1235, 0.1965, 0.0968)	0.0583	是

根据对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在准则层中,服务基础设施、服务易用性、服务有用性以及服务保障权重分别为 0.4310,0.0865,0.1591,0.3235。准则层各项权重均近似为 0.1 或者超过 0.1,可以看出各个服务要素在数字农业服务体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目标层判断矩阵 A 和准则层判断矩阵 B_i(i=1,2,3,4)的一致性指标 CR 值均小于 0.1 的阈值,说明判断矩阵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相容性,通过一致性检验。

4.2 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表 3)和 AHP 分析结果(表 5),以特征向量 w_i 为各层指标权重,形成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6 所示。采用加权平均法,逐层计算得到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价值 $A(A = \sum_{i=1}^n w_i t_i$,其中 w_i 为对应指标项或准则项权重, t_i 为对应指标项或准则项得分),本研究结果可对不同地区的数字农业服务水平进行测度。

表 6 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w_i	指标层	权重 w_i
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服务基础设施	0.4310	农业机械化设备	0.1332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0.2506
			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	0.0472
			有喷灌等设施的耕地面积比重	0.0100
	服务易用性	0.0865	农业物联网水平	0.0104
			生产信息水平	0.0239
			电脑拥有率	0.0266
			服务获取便捷性	0.0073
	服务有用性	0.1591	平台信息时效性	0.0042
			农业科技服务人员	0.0428
			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	0.0190
			智能信息技术提高农产品产出	0.0155
	服务保障	0.3235	农产品网络销售	0.0114
			农产品合格率	0.0421
			数字农业推广应用基地	0.0283
			生产制度健全程度	0.0917
			4G 以上网络覆盖	0.0143
			有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0.0827
			益农信息社覆盖	0.0399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0.0636
			农业保险深度	0.0313

从表 6 可以看出,服务基础设施(权重 0.4310)和服务保障(权重 0.3235)的权重在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显著高于服务易用性和服务有用性。20 世纪八十年代,帕拉休拉曼等学者提出服务质量差距模型(Service Quality Gap Model),认为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以服务提供者对服务的理解为基础^[17],而数字农业运营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正是这种理解得以实现的有力支撑。良好的

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如农业机械化程度、传感设备、高标准农田等,能够确保供应商数字农业服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完善的数字农业服务保障,如信息安全、农业保险、网络服务等,则能够及时解决用户在使用智能设备、数字农业运营管理等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增强用户对数字农业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目前我国的数字农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速率存在

区域显著差距,整体尚处于发展初期,数字农业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推进速度,尤其依赖于数字农业的基础设施要求和服务要求的满足程度。因此,这两个高权重指标的突出地位,强调了数字农业服务提供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体系完善方面的投入和努力,是提升服务质量的重中之重。

此外,服务易用性(权重 0.0865)和服务有用性(权重 0.1591)的权重略低,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农业产业链上的主要关联群体,多以种养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其整体受教育程度、信息资源富裕度和数字农业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均高于普通农户,成为数字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该群体的数字农业技术的应用门槛相对较低,对数字农业服务供应商的服务易用性和有用性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5 研究结论

数字农业发展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综合了技术应用、服务效率、质量安全、经济效益及用户满意度等多个维度,通过文献分析、聚类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地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从理论上讲,本研究将现有服务质量评价理论拓展和应用到了数字农业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数字农业服务质量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数字农业服务质量提升的核心要素。此外,本文还探讨了数字农业服务质量与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理解数字农业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拓展了数字农业服务质量的理论研究边界。

从实践上看,本研究构建的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指标体系能够为数字农业服务提供商提供明确的改进方向,帮助其识别服务质量的薄弱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该指标体系还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依据,帮助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数字农业发展政策,引导数字农业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提升数字农业服务质量,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蒋团标,何金盛. 农业强国视域下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异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23(5):576-586.

[2] 刘国斌,李岱霖. 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信息化互动发展研究[J]. 情报科学,2023,41(4):127-132,190.

[3] 苏锦旗,潘婷,董长宏. 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及区域差异评价[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3(4):135-144.

[4] 王定祥,彭政钦,李伶俐. 中国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J]. 中国农村经济,2023(6):48-71.

[5] OECD. OECD 报告评述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重点[R/OL]. [2015-09-10]. http://www.casisd.cn/zkdt/gw/201610/t20161017_4678745.html.

[6] 肖艳,徐雪娇,孙庆峰. 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J]. 农村经济,2022(11):19-26.

[7] 李娜,张馨月,张美慧.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5,41(1):135-147.

[8] 钱加荣,赵芝俊,毛世平.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构演变及提升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3(2):132-144.

[9] 范飞,谢治菊. 超越“地域性”: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脱域治理——基于“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的实证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2024(1):41-61.

[10] 王玉珍,宋国靖,窦晓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测度及障碍因素分析[J]. 调研世界,2024(7):40-52.

[11] 韩旭东,刘闯,刘合光. 农业全链条数字化助推乡村产业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改革,2023(3):121-132.

[12] 王温淑. 我国省域数字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D]. 呼和浩特:内蒙古财经大学,2022.

[13] 闫铁柱. 数字化发展对农产品批发经营效率提振效应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23(8):108-111.

[14] 孙永河,张梦迪. 基于 R 型聚类的层次型 DEMATEL 分析方法[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6):42-51.

[15] 张鸿,王璐. 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推进路径[J]. 华东经济管理,2023,37(11):70-78.

[16] 曹子建,吴永常,高文菊,等. 江西省县域农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区域差异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7):227-237.

[17]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BERRY L L.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88,64(1):12-40.

基于儒家文化的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张春强, 胡博涵, 叶皖强*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基于2007-2022年A股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 儒家文化能够显著增加企业财务重述行为, 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提升管理层权力, 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存在关联性。异质性分析发现, 该影响在大型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及低行业竞争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为理解儒家文化对企业治理的影响提供新视角, 对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儒家文化; 财务重述; 管理层权力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5)06-0062-11

Analysi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statements Basing on Confucian Culture

ZHANG Chunqiang, HU Bohan, YE Wanqiang*

(School of Account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Empirical tests based on A-share data from 2007 to 2022 showed that Confuc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rporate financial restatement behavior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enhancing management pow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large enterprises, firms with higher executive shareholding ratios, and those in low industry competition groups. Confucian culture is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restatements of listed companie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offer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s and investors.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financial restatements; management power

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 不仅是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载体, 同时也构成了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在动因。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 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之中, 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和社会行为模式。同时, 儒家文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价值观与原则是企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1-5]。近年来, 学者们对儒家文化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给予了广泛关注, 儒家文化有助于优化企业内部治理, 且多从投资效益、大股东资金调配和董事会构成的多元性等角度进行研究^[1-3],

但目前尚未有研究集中于探讨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财务重述, 作为企业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发生的频率和质量直接映射出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整体健康状况。大量学者就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进行研究, 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包括财务重述时间、重述方向、额外事项报告、审计师启动重述、SEC调查以及董事会批准重述等^[6-8]。尽管这些因素的研究为研究财务重述提供了重要视角, 但前期研究鲜少探讨儒家文化的经济影响。儒家文化对企业内部治

收稿日期: 2025-07-19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D2023D014); 安徽财经大学重点课题(ACKYB24012)。

作者简介: 张春强(1984-), 男, 安徽淮南人, 副教授, 博士; 叶皖强(2001-), 男, 山东龙口人, 硕士研究生。E-mail: 3202300342@aufe.edu.cn

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研究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重述的影响,以丰富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研究。

通过借鉴学者的研究^[2-3],以公司附近固定半径内孔庙(书院)的分布密度作为衡量标准,来评估儒家文化氛围的强弱程度。同时,参考 AMEL-ZADEH 和 ZHANG^[9],当公司在同一年度提交财务重述时,RESTATE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以 2007-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儒家文化促进公司财务重述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强调等级制度,过度的高管权力会增加公司财务重述风险。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规模企业、高管持股比例及行业竞争程度下,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存在差异。

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聚焦于儒家文化对投资效益、大股东资金调配和董事会构成多元性的影响^[1-3]。部分研究者依托儒家文化,探讨社会审计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之间的联系^[10],但并未直接研究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为儒家文化影响公司行为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丰富儒家文化对中国会计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第二,补充了财务重述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表明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包括财务重述时间、重述方向、额外事项报告、审计师启动重述、SEC 调查以及董事会批准重述^[6-8]。但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的讨论仍然存在研究空缺。本文通过分析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得出稳健结论,拓展了财务重述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领域。

1 文献综述

1.1 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

财务重述是企业修正先前财务报表中错误的行为,此前研究主要从企业行为、资本市场、外部监督等方面研究其影响因素。在企业行为方面,许汝俊的研究表明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越差,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高^[11]。万清清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内部治理效应和信息处理效应,数字技术的应用能降低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12]。在资本市场方面,杜勇和胡红燕认为机构共同持股抑制了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并且同时发挥了协同效应和治理效应^[13]。齐鲁光和李曼曼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财务重述概率较大,且股权质押比例越

高则财务重述概率越大^[14]。在外部监督方面,王营和宋增梅认为证监会随机抽查通过释放违约风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抑制了公司的财务重述^[15]。

1.2 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行为和治理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XIONG 等发现儒家文化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及强化创新能力,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TFP)^[16]。PAN 等的研究表明,儒家文化能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这可能是由于儒家文化中的自我约束和谨慎理念有助于缓解代理问题,并减少对企业收益的过高估计^[17]。JIN 等学者针对儒家文化如何作用于高管薪酬体系展开研究^[18],研究结果表明,在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企业内,首席执行官薪酬普遍低于行业水平,且首席执行官与管理团队其他成员的薪资差距显著缩小。徐细雄等发现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占比越高^[19]。CHEN 等调查并发现儒家文化与企业避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0]。林洲钰和陈超红的研究表明儒家文化通过强化企业契约遵守、塑造长期导向和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21]。林琳和刘睿涵认为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熏陶程度越深,企业 ESG 绩效水平越好^[22]。

1.3 评述

现有文献综述表明,财务重述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广泛存在,包括增加融资成本、严格贷款条件等。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在提高企业效率、降低成本黏性和优化薪酬结构等方面对企业行为能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儒家文化如何通过影响管理层权力作用于财务重述行为的研究存在明显缺口。现有研究多关注正式制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路径。本研究拟通过分析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进而探讨其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内在关联,丰富该研究领域。

2 理论分析

儒家文化所蕴含的等级观念与权威导向价值观,通过塑造企业内部权力结构特征显著强化管理层权力,这一过程可用委托代理理论进行解释。从文化嵌入视角看,儒家“君君臣臣”的伦理框架不仅表现为形式上的组织层级,更通过“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内化为员工的行为准则,形成对上级权威的制度性服从倾向。根据周美华等的研究,管理层权力的增强导致内部控制机制失效^[23],高管团队更可

能为谋取个人利益而进行财务操纵,即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大。具体而言,在财务行为层面呈现两条清晰的作用路径:其一,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实施策略性信息披露,通过简化会计政策说明、模糊化关联交易定价依据等方式降低财务报告透明度,这种行为在掩盖经营缺陷的同时,为后续财务重述埋下隐患;其二,管理层通过财务重述调整核心业绩指标,构建业绩稳定增长的虚假表象,以达到谋取个人

$$\text{FinRestate}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f_R}_{i,t} + \sum \text{Control}_{i,t} + \sum \text{Ind} + \sum \text{Year} + \sum \text{Region} + \varepsilon_{i,t} \quad (1)$$

模型(1)以财务重述(FinRestate)作为被解释变量,该变量为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实际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哑变量。若上市公司在财务年度报告发布后,公告了与财务信息相关的重述或更正,则 FinRestate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24-25]。核心解释变量 Conf_R 代表儒家文化影响,其数值等于以企业为中心、半径 $R(R=100, 200, 300 \text{ 公里})$ 范围内分布的孔庙数量^[23-24]。若 Conf_R 的系数(α_1)呈现统计显著性且为正,则研究假设 H1 获得支持。

在模型(1)中,还涵盖了以下控制变量:AGE 代表上市公司年龄,计算方式为企业成立至今的年数减去上市年份^[26]。CFO 指现金流比率,定义为经营性现金流与年初资产总额的比值^[27]。LEV 表示财务杠杆,等于年末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28-30]。MTB 为市账比,计算为股本的市场价值除以账面价值^[31]。SIZE 是公司规模,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30]。DUAL 为虚拟变量,若董事长与 CEO 两职合一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32]。TOP1 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32]。BOARD 代表董事会规

$$C = \cos\beta_1 \times \cos\beta_2 \times \cos(\alpha_1 - \alpha_2) + \sin\beta_1 \times \sin\beta_2 \quad (2)$$

其中 C 表示 A、B 两点间圆心角的余弦值。统计各公司注册地周边 100 公里、200 公里及 300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回归分析中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

3.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2007-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结果的稳健性,对数据实施筛选:排除金融行业公司、ST 及 *ST 标识公司,以及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 31248 个观测值,涵盖 3276 家上市公司。儒家文化数据通过手工方式整理获取,财务重述和公司财务数据均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范围为 1% 水平的缩尾处理。

3.4 描述性统计

利益目的。

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儒家文化通过强化管理层权力,显著促进企业财务重述行为。

3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3.1 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下列 Logit 回归模型以检验假设 1 中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关系:

模,表示为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32]。LISTAGE 指公司上市年限^[31]。TRUST 为省际层面的社会信任指数^[33]。BIG4 是虚拟变量,如果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27]。

3.2 儒家文化的测度

参考金智等的研究^[34],采用上市公司注册地 100 公里、200 公里和 300 公里范围内的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衡量指标。本研究手动收集儒家文化代理变量的步骤如下:首先,通过维基百科和中国国学网查询全国现存孔庙的名称,并借助谷歌和百度搜索引擎确定其具体位置;其次,使用高德地图和谷歌地图获取公司注册地及孔庙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最后,基于球面距离计算公式,逐一计算公司注册地与每个孔庙之间的距离。其中,地球半径 R 约为 6371.004 公里;假设点 A 代表公司注册地,纬度 β_1 ,经度 α_1 ;点 B 代表孔庙,纬度 β_2 ,经度 α_2 ,则距离 Distance 的计算公式如下。

如表 1 所示,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普遍,从 2007 年的 2 个财务重述样本增加到 2017 年的 1000 多个样本,这也反映了研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样本的重要性。根据表 2 描述性统计显示,变量 Conf_100、Conf_200、Conf_300 的均值依次为 6.485、16.700 和 29.510,反映出不同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财务重述(FinRestate)均值为 0.140,说明财务重述样本占总样本数的 14%,这一比例较大,具有研究价值。在表 3 分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财务重述组 Conf_100、Conf_200 以及 Conf_300 的均值显著大于非财务重述组,假设 H1 获得了初步证据的支持。此外,财务重述组和非财务重述组的其他控制变量中,除 MTB 外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1 财务重述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年份 FinRestate	是否重述			年份 FinRestate	是否重述		
	0	1	Total		0	1	Total
2007	955	2	957	2016	1699	422	2121
2008	1063	3	1,066	2017	1252	1136	2388
2009	1156	5	1161	2018	1878	630	2508
2010	1426	5	1431	2019	1966	618	2584
2011	1654	7	1661	2020	2208	495	2703
2012	1814	11	1825	2021	2267	665	2932
2013	1805	21	1826	2022	2059	223	2282
2014	1795	37	1832	Total	26883	4365	31248
2015	1886	85	1971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p50	Max
FinRestate	31248	0.140	0.347	0.000	0.000	1
Conf_100	31248	6.485	4.067	0.000	6.000	24.000
Conf_200	31248	16.700	9.038	0.000	15.000	58.000
Conf_300	31248	29.510	14.850	0.000	28.000	108.000
AGE	31248	9.735	7.416	0.000	8.000	32.000
CFO	31248	0.223	0.536	-25.040	0.140	34.760
LEV	31248	0.432	0.206	0.008	0.428	0.998
MTB	31248	4.334	21.250	0.000	2.791	2789.000
SIZE	31248	22.230	1.365	14.940	22.040	28.610
DUAL	31248	0.292	0.455	0.000	0.000	1.000
TOP1	31248	34.200	15.120	0.290	31.930	89.990
BOARD	31248	8.591	1.727	0.000	9.000	18.000
BIG4	31248	0.069	0.254	0.000	0.000	1.000

表3 分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非财务重述组		财务重述组		MeanDiff	p-Value
	N	Mean	N	Mean		
Conf_100	26883	6.441	4365	6.756	-0.315	0.000***
Conf_200	26883	16.630	4365	17.130	-0.498	0.001***
Conf_300	26883	29.450	4365	29.880	-0.427	0.078*
AGE	26883	9.494	4365	11.220	-1.725	0.000***
CFO	26883	0.230	4365	0.185	0.045	0.000***
LEV	26883	0.430	4365	0.445	-0.015	0.000***
MTB	26883	4.304	4365	4.521	-0.217	0.531
SIZE	26883	22.180	4365	22.490	-0.309	0.000***
DUAL	26883	0.290	4365	0.306	-0.015	0.037**
TOP1	26883	34.40	4365	32.930	1.466	0.000***
BOARD	26883	8.618	4365	8.422	0.196	0.000***
BIG4	26883	0.072	4365	0.052	0.021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主回归

表 4 报告了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回归结果。由表 4 中数据可知儒家文化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显著正相关,说明假设 H1 成立。此外,四大审计师事务所(BIG4)与财务重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周泽将、王兵等研究一致,增加了结果的稳健性^[35-36]。

表 4 主回归

Dep. Var	FinRestate		
	R = 100	R = 200	R = 300
Conf_R	0.021 ** (2.23)	0.014 *** (2.66)	0.008 ** (2.23)
AGE	0.013 *** (3.47)	0.012 *** (3.39)	0.012 *** (3.38)
CFO	-0.159 *** (-3.08)	-0.158 *** (-3.06)	-0.157 *** (-3.04)
LEV	0.439 *** (2.82)	0.436 *** (2.80)	0.431 *** (2.77)
MTB	0.001 (1.50)	0.001 (1.52)	0.001 (1.53)
SIZE	0.024 (0.99)	0.024 (0.98)	0.024 (0.98)
DUAL	-0.061 (-1.24)	-0.060 (-1.22)	-0.059 (-1.20)
TOP1	0.001 (0.50)	0.001 (0.46)	0.001 (0.48)
BOARD	-0.003 (-0.16)	-0.003 (-0.16)	-0.004 (-0.20)
BIG4	-0.516 *** (-4.88)	-0.514 *** (-4.87)	-0.512 *** (-4.84)
Constant	-2.658 *** (-4.62)	-6.688 *** (-7.64)	-6.618 *** (-7.55)
N	31248	31248	31248
Pseudo R2	0.2236	0.2237	0.2236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下表同。

4.2 机制检验

依据前文假设 H1,儒家文化通过强化管理层权力影响财务重述行为。为验证管理层权力的中介作用,构建“儒家文化→管理层权力→财务重述”的传导路径检验模型。借鉴权小锋等、周美华等及郑珊珊的做法^[23,37,38],通过对 5 个关键指标实施主成分分析,构建管理层权力强度的综合指标(Power):

CEO 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当公司 CEO 兼任

董事长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该值越大,表明管理层权力强度越高。

董事会规模:指当年度董事会成员总人数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强度越强。

内部董事比例:计算方式为董事会内部人数除以董事总人数,其中内部董事人数等于总人数减去独立董事人数;比例越大,管理层权力强度越大。

股权分散度:定义为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该比值越大,管理层权力强度越强。

管理层持股:使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进行测量;比例越大,管理层权力强度越大。综上所述,当管理层权力强度综合指标增加时,管理层权力强度相应增强。由表 5 数据可知儒家文化与管理层的权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升了管理层权力,为 H1 提出的“儒家文化→管理层权力→财务重述”传导路径提供了第一阶段经验证据。

表 5 机制检验

Dep. Var	Power		
	R = 100	R = 200	R = 300
Conf_R	0.007 *** (5.96)	0.002 *** (3.04)	0.001 ** (2.18)
AGE	-0.035 *** (-67.60)	-0.036 *** (-67.76)	-0.036 *** (-67.76)
CFO	-0.009 (-0.84)	-0.008 (-0.80)	-0.008 (-0.80)
LEV	-0.412 *** (-18.33)	-0.413 *** (-18.37)	-0.413 *** (-18.39)
MTB	0.012 *** (9.28)	0.012 *** (9.37)	0.012 *** (9.38)
SIZE	0.062 *** (15.83)	0.062 *** (15.90)	0.062 *** (15.90)
DUAL	1.045 *** (128.39)	1.045 *** (128.39)	1.045 *** (128.42)
TOP1	-0.013 *** (-52.15)	-0.013 *** (-52.16)	-0.013 *** (-52.13)
BOARD	-0.464 *** (-198.46)	-0.464 *** (-198.49)	-0.464 *** (-198.57)
BIG4	0.033 ** (2.24)	0.032 ** (2.20)	0.032 ** (2.21)
Constant	3.221 *** (39.31)	3.230 *** (39.14)	3.240 *** (39.23)
N	30310	30310	30310
adj. R ²	0.796	0.796	0.796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4.3 稳健性检验

4.3.1 替换 Y 为财务重述次数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重新构建了财务重述

$$\text{FinRestate_Num}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Conf_R}_{i,t} + \sum \text{Control}_{i,t} + \sum \text{Ind} + \sum \text{Year} + \sum \text{Region} + \varepsilon_{i,t} \quad (3)$$

财务重述次数 (FinRestate_Num) 为公司在一年内对已发布的财务报告进行更正的次数。其他变量和主回归一致,根据表 6 数据可知,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次数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 H1。

表 6 稳健性检验

Dep. Var	FinRestate_Num		
	R = 100	R = 200	R = 300
Conf_R	0.003 ** (2.29)	0.002 *** (2.60)	0.001 ** (1.98)
AGE	0.002 *** (3.69)	0.002 *** (3.61)	0.002 *** (3.60)
OCFR	-0.021 *** (-2.76)	-0.021 *** (-2.73)	-0.021 *** (-2.73)
LEV	0.075 *** (3.04)	0.074 *** (3.02)	0.074 *** (3.01)
MTB	0.000 (0.25)	0.000 (0.29)	0.000 (0.30)
SIZE	0.003 (0.86)	0.003 (0.87)	0.003 (0.88)
DUAL	-0.010 (-1.33)	-0.010 (-1.31)	-0.009 (-1.30)
TOP1	-0.000 (-0.18)	-0.000 (-0.23)	-0.000 (-0.20)
BOARD	-0.000 (-0.02)	-0.000 (-0.02)	-0.000 (-0.07)
BIG4	-0.061 *** (-4.73)	-0.061 *** (-4.72)	-0.061 *** (-4.70)
Constant	0.033 (0.41)	0.025 (0.30)	0.030 (0.37)
N	31248	31248	31248
adj. R ²	0.148	0.148	0.148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变量,用财务重述次数 (FinRestate_Num) 替代原有的财务重述 (FinRestate) 变量。重构回归模型:

4.3.2 替换 X 为距离儒学中心的距离

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孔庙已不复存在,这可能导致使用现存孔庙作为儒家文化代理指标时出现一定的测量误差。为克服这一难题,研究中借鉴了 DU 和饶育蕾的研究成果^[2,26],采用公司注册地与我国 7 个主要儒家文化中心的地理距离来量化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这些文化中心是儒家思想在中国传播长达 2500 多年的历程中形成的,分布范围包括山东的曲阜、四川的成都、河南的洛阳、福建的三明和龙岩、江苏的东台、浙江的宁波和绍兴的东部地域。具体的量化方法如下:

第一步,依据公式(1)计算企业注册地到 7 个儒家文化中心的距离 DIS_N,并按从小到大排序;

第二步,计算 $\text{DIS_N} = (\text{DIS_1} + \dots + \text{DIS_N})/N$ ($N = 1, 2, 3, 4, 5, 6, 7$) (4);

第三步,定义儒家文化的变量为 Conm_N:

$$\text{Conm_N} = \frac{\text{Max_DIS_N} - \text{DIS_N}}{\text{Max_DIS_N} - \text{Min_DIS_N}} \quad (5)$$

在模型(5)中,DIS_N 代表上市公司与最近儒家文化中心第 N 个的平均距离,Max_DIS_N 和 Min_DIS_N 则分别是所有公司按年度分组后 DIS_N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表 7 的结果,Conm_N ($N = 1, 2, 3, 4, 5, 6, 7$) 的系数大多显著为正,这表明儒家文化浓度越高的区域,公司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越高,从而支持了假设 H1。尽管 Conm_4 与 FinRestate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其符号与其他代理变量一致。这些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 (FinRestate)

Dep. Var	N = 1	N = 2	N = 3	N = 4	N = 5	N = 6	N = 7
Conm_N	1.212 * (1.84)	1.834 ** (2.44)	1.369 * (1.75)	1.270 (1.55)	1.477 * (1.79)	1.603 * (1.94)	1.972 ** (2.3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1239	31239	31239	31239	31239	31239	31239
Pseudo R ²	0.2232	0.2233	0.2231	0.2231	0.2232	0.2232	0.2232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4.4 内生性检验

检验儒家文化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之间的统计显著性时,不能忽视可能由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引起的偏差。为了排除这些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事件,考察其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企业迁址通常被视为一个外生冲击,因为它与公司的财务决策过程相对独立,可以作为检验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工具。其次,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并运用 Ivprobit 方法进行检验。

$$\text{FinRestat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Post} + \beta_2 \text{Post} \times \text{Relocation} + \beta_3 \text{Relocation} + \sum \text{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text{FinRestate_Num}_{i,t} = \chi_0 + \chi_1 \text{Post} + \chi_2 \text{Post} \times \text{Relocation} + \chi_3 \text{Relocation} + \sum \text{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构建了两个不同的统计模型,分别标记为模型(6)和模型(7)。两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因变量的定义:模型(6)以财务重述(FinRestate)作为因变量,而模型(7)则以财务重述的次数(FinRestate_Num)作为因变量。在模型中,Post 变量表示标记公司搬迁后的年份;当公司在当前年或之后进行搬迁时,该变量设置为 1。Relocation 变量则代表文化迁移,当企业从儒家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到较高水平地区时,该变量被赋值为 1。

表 8 中第(1)(2)列为 FinRestate 和 FinRestate_Num 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研究发现,企业迁入高水平儒家文化地区后,相比迁入低水平儒家文化地区,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更高,且重述次数显著增多。这一发现表明,在有效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前文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4.4.2 工具变量法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减轻可能由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选择进士人数(JINSHI)作为工具变量,JINSHIB 代表企业所在城市在清代的进士人数。通过使用进士人数作为工具变量,能够更准确地估计儒家文化对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同时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表 9 中

4.4.1 基于企业迁址事件的检验

研究中采集的孔庙建筑数据源自百年前的遗存,其数量作为评估儒家文化影响力的代理变量,以满足外生性条件。鉴于可能存在引发内生性问题的遗漏变量,需对此保持审慎考量,例如公司高管的其他特质可能对财务重述行为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中利用企业迁址这一外生事件,构建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环境,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识别迁入和迁出高水平的儒家文化环境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

第 1 至 3 列展示了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分析显示,JINSHIB 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地为正,这表明清代进士的数量与儒家文化的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 9 的第 4 至 6 列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第 4 至 6 列中,Conf_R(R=100、200、300)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为假设 H1 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先前得出的结论依然保持了其稳健性。

表 8 内生性检验

Dep. Var	(1)	(2)
	FinRestate	FinRestate_Num
Relocation	-0.033 * (-1.72)	-0.043 (-1.64)
Post	0.003 (0.12)	-0.025 (-0.78)
Relocation * Post	0.042 * (1.80)	0.078 ** (2.41)
Controls	Yes	Yes
N	7350	7350
adj. R ²	0.254	0.250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region	Yes	Yes

表 9 工具变量检验

Dep. Var	Conf_R			FinRestate		
	R = 100	R = 200	R = 300	R = 100	R = 200	R = 300
JINSHIB	1.075 *** (64.09)	2.699 *** (72.95)	3.540 *** (57.06)			
Conf_R				0.013 * (1.73)	0.005 * (1.74)	0.004 * (1.75)
AGE	-0.011 *** (-3.12)	0.003 (0.36)	-0.031 ** (-2.39)	0.008 *** (5.02)	0.008 *** (4.89)	0.008 *** (4.94)
OCFR	-0.285 *** (-4.56)	-0.449 *** (-3.26)	-0.461 ** (-1.99)	-0.108 *** (-3.33)	-0.109 *** (-3.38)	-0.110 *** (-3.40)

续表
表9 工具变量检验

Dep. Var	Conf_R			FinRestate		
	R = 100	R = 200	R = 300	R = 100	R = 200	R = 300
LEV	-1.158*** (-7.89)	-0.234 (-0.72)	1.742*** (3.21)	0.219*** (3.03)	0.208*** (2.91)	0.201*** (2.81)
MTB	0.053*** (6.47)	0.025 (1.40)	-0.038 (-1.26)	0.004 (1.12)	0.005 (1.27)	0.005 (1.34)
SIZE	0.202*** (8.08)	0.037 (0.66)	0.241*** (2.60)	0.020 (1.64)	0.022* (1.84)	0.021* (1.79)
DUAL	0.132*** (2.70)	0.006 (0.06)	-0.304* (-1.68)	-0.025 (-1.09)	-0.024 (-1.02)	-0.022 (-0.96)
TOP1	0.005*** (3.32)	0.011*** (3.34)	0.003 (0.61)	0.001 (0.89)	0.001 (0.89)	0.001 (0.96)
BOARD	-0.089*** (-6.64)	-0.135*** (-4.56)	0.009 (0.19)	-0.001 (-0.08)	-0.001 (-0.13)	-0.002 (-0.24)
BIG4	0.382*** (4.18)	0.264 (1.31)	-0.703** (-2.08)	-0.292*** (-6.35)	-0.289*** (-6.28)	-0.284*** (-6.17)
Constant	-2.826*** (-4.64)	-0.292 (-0.22)	-1.399 (-0.62)	-3.385*** (-9.19)	-3.413*** (-9.27)	-3.410*** (-9.27)
N	31152	31152	31152	31152	31152	31152
adj. R ²	0.156	0.174	0.129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4.5 进一步分析

4.5.1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工具变量检验(FinRestate),可见大规模企业组中儒家文化(Conf_R)系数显著为正,而小规模企业组则不具备显著性,且系数值均低于大规模企业组。这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在大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主要原因为:在大规模企业中,由于组织结构更加复杂,信息传递层次更多,高层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这种权力可能会被放大,导致决策过程中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更加不足,从而在大规模企业中更容易出现财务重述行为。

4.5.2 基于高管持股比例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表10,可知高持股比例组中儒家文化(Conf_R)系数显著为正,而低持股比例组则不具备显著性。这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

影响在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可能的原因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采用和谐而非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内部监督问题。当高管持股比例较高时,他们可能更少受到来自其他股东的监督,导致监督机制的弱化。相比于监督较强的情况,在监督较弱的情况下,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更显著。

4.5.3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表11,可知行业高竞争组中儒家文化(Conf_R)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行业低竞争组均显著且系数均大于行业高竞争组。这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在行业低竞争组的企业中更显著。可能的原因为:在竞争较低的行业,企业易构建信息优势,形成信息垄断。信息垄断使得外部监督者难以获取企业全面信息,限制其参与和监督。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内部人员可能因敬畏

高管权威而缺乏质疑和挑战,削弱内部监督力度。儒家文化倡导的集体主义和对内部和谐的追求,可能导致内部人员在面对异议时选择沉默,减少公开质疑。这种文化倾向可能使高管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更易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企业整体利益的决策,如财务重述等。

表 10 基于高管持股比例的异质性分析(FinRestate)

Dep. Var	高持股比例			低持股比例		
	R = 100	R = 200	R = 300	R = 100	R = 200	R = 300
Conf_R	0.017 * (1.90)	0.018 *** (2.63)	0.012 *** (2.85)	0.020 (1.35)	0.010 (1.26)	0.003 (0.55)
AGE	0.010 *** (2.65)	0.010 ** (1.97)	0.009 * (1.94)	0.017 *** (2.77)	0.016 *** (2.67)	0.016 *** (2.67)
CFO	-0.142 * (-1.86)	-0.137 (-1.59)	-0.135 (-1.56)	-0.277 ** (-2.14)	-0.279 ** (-2.16)	-0.279 ** (-2.16)
LEV	0.135 (0.81)	0.141 (0.65)	0.126 (0.58)	0.883 *** (3.18)	0.874 *** (3.15)	0.883 *** (3.19)
MTB	-0.001 (-0.10)	-0.001 (-0.08)	-0.001 (-0.05)	0.003 (0.19)	0.003 (0.23)	0.003 (0.22)
SIZE	0.060 ** (2.31)	0.059 * (1.76)	0.060 * (1.79)	0.005 (0.10)	0.006 (0.13)	0.006 (0.14)
DUAL	-0.021 (-0.40)	-0.018 (-0.28)	-0.017 (-0.27)	-0.155 ** (-1.98)	-0.158 ** (-2.02)	-0.156 ** (-2.00)
TOP1	0.003 (1.61)	0.003 (1.10)	0.003 (1.10)	-0.002 (-0.67)	-0.002 (-0.69)	-0.002 (-0.67)
BOARD	0.006 (0.43)	0.007 (0.31)	0.007 (0.29)	-0.024 (-0.91)	-0.024 (-0.92)	-0.025 (-0.97)
BIG4	-0.481 *** (-4.82)	-0.477 *** (-3.89)	-0.473 *** (-3.85)	-0.738 *** (-3.79)	-0.740 *** (-3.81)	-0.741 *** (-3.81)
Constant	-6.768 *** (-7.53)	-6.952 *** (-6.46)	-6.946 *** (-6.44)	-2.306 ** (-2.11)	-2.334 ** (-2.13)	-2.220 ** (-2.02)
N	20240	20240	20240	9369	9369	9369
Pseudo R ²	0.2154	0.2158	0.2159	0.2124	0.2123	0.212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表 11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FinRestate)

Dep. Var	行业高竞争			行业低竞争		
	R = 100	R = 200	R = 300	R = 100	R = 200	R = 300
Conf_R	0.017 (1.33)	0.011 (1.51)	0.004 (0.87)	0.027 ** (2.00)	0.018 ** (2.56)	0.011 ** (2.32)
AGE	0.009 * (1.68)	0.008 (1.64)	0.008 (1.64)	0.017 *** (3.22)	0.017 *** (3.12)	0.016 *** (3.08)
CFO	-0.127 (-1.29)	-0.125 (-1.27)	-0.124 (-1.26)	-0.212 ** (-2.00)	-0.208 ** (-1.98)	-0.206 * (-1.96)
LEV	0.194 (0.86)	0.190 (0.84)	0.190 (0.85)	0.667 *** (2.65)	0.665 *** (2.64)	0.657 *** (2.61)
MTB	0.009 (0.78)	0.010 (0.81)	0.010 (0.81)	0.002 (0.13)	0.002 (0.15)	0.002 (0.18)

续表
表 11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FinRestate)

Dep. Var	行业高竞争			行业低竞争		
	R = 100	R = 200	R = 300	R = 100	R = 200	R = 300
SIZE	0.058 (1.59)	0.059 (1.60)	0.059 (1.60)	0.015 (0.38)	0.014 (0.36)	0.015 (0.40)
DUAL	-0.053 (-0.82)	-0.051 (-0.78)	-0.052 (-0.80)	-0.053 (-0.74)	-0.055 (-0.77)	-0.051 (-0.70)
TOP1	-0.001 (-0.49)	-0.001 (-0.53)	-0.001 (-0.49)	0.003 (1.14)	0.003 (1.11)	0.003 (1.12)
BOARD	-0.004 (-0.17)	-0.004 (-0.18)	-0.005 (-0.21)	-0.007 (-0.29)	-0.006 (-0.27)	-0.007 (-0.29)
BIG4	-0.654*** (-4.63)	-0.651*** (-4.62)	-0.652*** (-4.62)	-0.406*** (-2.74)	-0.406*** (-2.73)	-0.402*** (-2.69)
Constant	-6.650*** (-6.50)	-6.731*** (-6.55)	-6.623*** (-6.43)	-1.736 (-1.08)	-1.852 (-1.15)	-1.787 (-1.11)
N	16845	16845	16845	13424	13424	13424
Pseudo R ²	0.2249	0.2249	0.2247	0.2104	0.2107	0.210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 2007 - 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第一,儒家文化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显著正相关,即儒家文化能显著增加公司财务重述风险。这一结论在进行工具变量法、DID 和替换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管理层权力在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儒家文化通过提升管理层权力促进财务重述行为。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在大型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在行业低竞争组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对于抑制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在探讨中国企业运营模式、治理结构和财务行为规范时,应当考虑儒家文化在其中发挥的潜移默化作用。理性的管理层应重视儒家文化对公司决策行为的潜在影响,投资者亦需关注儒家文化对高管权力大小、性质等的潜在作用。第二,企业应积极建立

多元化的治理结构,平衡儒家文化中等级与权威观念对财务报告的潜在影响,通过引入独立董事、设立审计委员会等方式分散高管权力,增加决策透明度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第三,鉴于儒家文化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财务准则制定应考虑文化因素对财务报告产生的影响,通过制定更为明确和具体的准则,以减少因文化影响导致的财务报告失真。

参考文献:

- [1] CHEN L, JIN Z, MA Y, et al. Confucianism, openness to the Wes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9, 25(3): 554 - 590.
- [2]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32(4): 661 - 716.
- [3]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board gender divers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6(2): 399 - 436.
- [4] IP P K. Is Confucianism good for business ethics in China?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8(3): 463 - 476.
- [5] MILES L, GOO S H.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n coun-

- tries; Has Confucianism anything to offer? [J]. *Business & Society Review*, 2013, 118(1): 23–45.
- [6] PARUCHURI S, MISANGYI V F. Investor perceptions of financial misconduct: The heterogeneous contamination of bystander fir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58(1): 169–194.
- [7] PALMROSE Z V, RICHARDSON V J, SCHOLZ S.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actions to restatement announcemen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4, 37(1): 59–89.
- [8] ARTHAUD-DAY M L, CERTO S T, DALTON C M, et al.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Executive and director turnover following corporate financial restatement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6): 1119–1136.
- [9] AMEL-ZADEH A, ZHANG 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restat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5, 90(1): 1–29.
- [10] 肖忠意, 陈海涛, 郑国洪, 等. 基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审计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J]. *中国文化与管理*, 2023(2): 151–168, 255.
- [11] 许汝俊. 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与财务重述 [J]. *财贸研究*, 2024, 35(7): 98–110.
- [12] 万清清, 孙光国, 杨金凤. 数字化转型与财务重述 [J]. *会计研究*, 2024(9): 49–60.
- [13] 杜勇, 胡红燕. 机构共同持股与企业财务重述 [J]. *证券市场导报*, 2022(2): 67–79.
- [14] 齐鲁光, 李曼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财务重述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2, 36(7): 118–128.
- [15] 王营, 宋增梅. 证监会随机抽查与公司财务重述 [J]. *现代金融研究*, 2025, 30(7): 57–70.
- [16] XIONG N, DU L. Can Confucian culture promote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2025, 20(2): 745–766.
- [17] PAN A, WANG H, XU L.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st stickiness [J]. *Accounting & Finance*, 2024, 64(3): 3029–3064.
- [18] JIN Z, LI Y, LIANG S. Confucian cultur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3, 31(1): 33–54.
- [19] 徐细雄, 吴林春, 段玲玲. 儒家文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5(4): 3–14.
- [20] CHEN S, XU L, JEBRAN K. The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Ekonomika Istrazivanja*, 2021, 34(1): 1342–1365.
- [21] 林洲钰, 陈超红. 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J]. *当代经济科学*, 2024, 46(5): 105–117.
- [22] 林琳, 刘睿涵. 儒家文化与企业 ESG 绩效——基于 A 股的实证研究 [J]. *科学决策*, 2025(6): 45–65.
- [23] 周美华, 林斌, 林东杰.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腐败治理 [J]. *会计研究*, 2016(3): 56–63.
- [24] 姜富伟, 丁慧, 靳馥境. 参照点效应、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J]. *经济研究*, 2023, 58(10): 191–208.
- [25] 张璇, 周鹏, 李春涛. 卖空与盈余质量——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6(8): 175–190.
- [26] 饶育蕾, 丁庆锋, 陈地强. 儒家文化与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权力距离的视角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72(2): 47–60.
- [27] 杜兴强, 谢裕慧, 赖少娟, 等. 儒家文化与会计稳健性 [J]. *会计研究*, 2023(1): 57–72.
- [28] AHMED A S, DUELLMAN 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3(2–3): 411–437.
- [29] KRISHNAN G, VISVANATHAN G. Does the SOX definition of an accounting expert matt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directors' accounting expertise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25(3): 827–858.
- [30] NIKOLAEV V V. Debt covenant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0, 48(1): 137–176.
- [31] KHAN M, WATTS R L.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8(2–3): 132–150.
- [32] LARA J M G, OSMA B G, PENALVA 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9, 14(1): 161–201.
- [33]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
- [34] 金智, 徐慧, 马永强. 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 [J]. *世界经济*, 2017, 40(11): 170–192.
- [35] 周泽将, 王佳伟, 雷玲. 监事会经济独立性与财务重述 [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2, 36(4): 3–18.
- [36] 王兵, 冯静, 陈紫帆. CFO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影响财务重述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3, 38(1): 11–20.
- [37] 权小锋, 吴世农, 文芳. 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 [J]. *经济研究*, 2010, 45(11): 73–87.
- [38] 郑珊珊. 管理者能力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 [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9(12): 97–110.

生态系统理论下推进安徽“丝路电商”发展研究

丁莹*, 甘志成

(合肥经济学院 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以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系统剖析安徽省“丝路电商”发展的基础框架与生态资源,结合当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点探究安徽省“丝路电商”生态系统内各主体间资源互通、功能互补及协同发展机制,以期推动生态系统各要素高效协同,实现安徽省电商产业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安徽省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核心省份与传统优势产业集聚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进“丝路电商”已成为安徽省链接全球市场、达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而当前其发展仍面临要素适配、数字鸿沟、生态重构等诸多挑战。

关键词:安徽省丝路电商;生态重构;生态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73-06

Development of Anhui Province “Silk Road E-commerce” from the Eco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DING Ying*, GAN Zhicheng²

(School of Business, Hef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efei, 230000, Anhui)

Abstract: Taking the “Silk Road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It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sharing,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mong various entities within Anhui “Silk Road E-commerce” ecosystem. The aim is to promot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among all elements of Anhui ecosystem, thereby achieving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the province’s e-commerce industry. As a core province in the Central China Rise strategy and a cluster of traditional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hui province possesses diverse resource endowmen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dvancing “Silk Road E-commerce” has become a key measure for Anhui to connect with global market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factor alignment,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cosystem restructuring. This study adopted an eco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foundational framework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for Anhui “Silk Road E-commerce”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the ecosystem, it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resource sharing,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mong various entities within the ecosystem.

Key words: Anhui “Silk Road E-commerce”; ecological restructuring; ecosystem theory

“丝路电商”是新时期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新渠道、新亮点、新动能。当前“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1]。2025年4月底,中国已经与世界34个国家达成政府间的双边跨境贸易协作机制,推动国家间的普惠共赢,发

收稿日期:2025-09-05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24jyxm0586)。

作者简介:丁莹(1993-),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E-mail:761813904@qq.com

挥中国电商优势。这一合作不仅能扩大双边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还能带动合作国电商全产业链发展^[2]。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探讨安徽省“丝路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创新与优化路径。“丝路电商”生态系统是以跨境电商为核心,由跨境企业、服务机构、监管主体等多元种群构成,这些种群通过资源交换、功能互补形成有机协同的共生体系,这种体系类似于生物学中多种群的生态共同体^[3]。安徽省处于国家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区域,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丝路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贸易形态,作为重要纽带,它已经成为安徽省深化对外开放、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1 安徽省“丝路电商”发展的基础框架和生态资源

1.1 基础体系的多维构建与制度创新

安徽省“丝路电商”基础体系构建,立足于多维资源整合与系统性制度创新,形成支撑“皖美制造”品牌的国际化复合生态。一是政策与制度层面上,安徽省2025年通过推行《支持“产业带+跨境电商”加快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产业带分类指引机制和阶段性发展目标,致力于搭建覆盖长三角区域的标准化服务体系与跨境贸易便利化机制,形成一批拥有国际美誉度的跨境制造品牌^[4]。二是产业基础维度上,安徽以制造业产业基础和县域特色产业群为依托,通过划分成熟型、成长型与新兴产业带实施差异化培育策略,并编制重点跨境产品目录引导“皖美制造”品牌定向出海,积极探索“AI+跨境电商”创新模式,推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运用大模型技术优化测品、选品精度,发展内容电商和产品溯源直播新业态^[4]。三是物流与通道建设方面,利用新桥空港开通国际货运航线、布局海外仓并为企业提供中欧班列定制服务,构建“陆海空”三维立体物流通道,提高跨境通关效率和物流协同能力^[5]。

作为制度创新与实践载体的集成平台,安徽省举全省之力打造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先后在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宣城、蚌埠设立六个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在区域范围内实行商务、海关、金融帮扶和优惠税收政策。安徽省积极汲取杭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构建“六大体系”和“两个平台”的成功经验,促进了安徽蜀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以及合肥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空港经济示

范区等B2B跨境电商平台对外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6]。综合试验区通过集成政策、服务与技术资源,成为串联政策制度、产业基础与物流通道的枢纽平台,推动“多维协同”向“系统集成”跃升。综上,这一多层次、多主体协同的基础框架,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赋能、通道支撑与平台集成的四维联动创新,为“丝路电商”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系统性基础。

1.2 直播电商的生态化发展与营销模式创新

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促使消费者行为与偏好发生显著变迁,人们愈发注重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性、互动性以及关键意见领袖(KOL)的引导作用。直播电商的生态化发展和营销模式创新正成为推动“皖美制造”品牌国际化的新力量。安徽省为加速融入数字经济,通过政策引导与产业协同,着力构建直播电商生态体系。2024年安徽省商务厅发布《关于支持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安徽省特色直播电商基地,支持跨境企业与专业直播平台机构、供应链服务商合作,形成跨境直播电商的生态系统^[7]。当前安徽省部分大型制造企业已形成生产、销售、服务全周期直播生态,如格力发动经销商、工程师参与直播,美的推出直播合伙人计划,积极与直播平台深度合作,增强交互体验,探索营销模式创新,为安徽省加速融入“丝路电商”打下坚实的基础。

1.3 特色资源数字化开发与价值转化

首先是自然资源的品牌化建设。安徽省在发展“丝路电商”进程中,高度重视将各区域特色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资产,通过跨境供应链实现其市场价值。这一进程发展,以政策引导为基础,数字化技术为驱动,旨在实现从初级产品输出向高附加值品牌输出的转变。安徽省商务厅“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依托茶叶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及文旅资源优势,打造一批具有“皖美”标志和文化内涵的国际品牌^[8]。以“药都”亳州的中草药花茶产业为例,在“丝路电商”布局中推动传统中草药品牌化,对菊杞决明茶、元气四宝茶等原料的种植土壤、灌溉水质、采摘周期等数据进行采集,将非遗炮制工艺变为可视化的视频,利用传统文化故事叙事,实现数字赋能自然资源品牌化的实践。打造“皖美”特色品牌关键在于对安徽省自然资源进行深度数字化开发与价值转化,运用数字技术对特色产品的生长环境、加工工艺、文化故事等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跟踪采集、存储与可视化呈现,从而为品牌注入可信度和叙事深度。同时,数字技术的资源转化还能够有效降低国际市场消费者的信息不对

称,建立品牌信任^[9]。

其次是制造业集群的“丝路电商”电商赋能。安徽省制造业依托跨境电商实现国际化发展的进程,是其积极融入“丝路电商”合作体系的重要实践基础。安徽省汽车配件、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优势制造业集群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实现了从传统代工向品牌出海转变。其中光伏系统和新型储能产品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出口增长尤为显著,2024 年,安徽省光储产业出口额达 438.7 亿元,位居全国第 5 位,电池片、组件、锂离子电池等主要产品出口量增幅均超 50%,展现出强劲外向型发展势头^[10]。同时,通过探索“AI+跨境电商”新模式,制造业企业运用 AI 大模型技术优化测品选品精度,进一步增强了产业链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此外,安徽省注重高标准促进跨境电商载体建设,2023 年度认定安徽省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 4 家;2024 年安徽省计划建设、租用海外仓达到 400 个,争取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 20%,逐步搭建起跨境电商发展载体体系^[11]。制造业与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不仅体现在交易规模的快速增长,更体现在“皖美制造”企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综上,安徽制造业在供应链韧性、品牌国际化和数字贸易能力方面打下的基础,为后续深度参与“丝路电商”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4 物流网络的布局与效能提升

安徽省物流网络战略性布局与效能提升,是支撑“丝路电商”融入全球供应链与对接“丝路电商”的重要基础性设施保障。安徽省“十四五”物流业发展规划指出,安徽省现代物流网络建设遵循“通道+枢纽+网络”的系统性思路,构建内外联通、科技赋能和低碳绿色的现代化物流体系^[12]。一是通道建设发展现状,安徽省规划并推进了“三横四纵多辐”的物流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运输干线,强化与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并贯通全省的辐射型通道。二是优化物流枢纽体系举措,安徽省打造合肥陆港、芜湖港口国家物流枢纽,支持蚌埠、阜阳、安庆等城市物流枢纽建设,通过培育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物流枢纽^[13]。三是安徽省积极拓展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提升合肥中欧班列运行规模和服务水平,开拓至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并支持企业在海外重点市场布局高标准海外仓,完善全球通物流网络。安徽省正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物流网络深度融合,引导企业应用互联网和 AI 技术实现车货匹配、运力优化和运输协同,推广智慧物流基础设

施广泛应用^[14]。安徽省正逐步构建一个高效、敏捷、绿色的智慧物流生态系统。这一系列举措系统地夯实了安徽深度参与“丝路电商”合作的物流基础,为“皖美制造”的全球化流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安徽建设“丝路电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1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产业嵌入机遇与制度适配挑战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安徽省推进“丝路电商”建设不仅面临产业嵌入机遇,也遭遇制度适配挑战。从机遇维度出发,全球生产网络逐步数字化、智能化和区域化的变革,给安徽省龙头制造产业步入中高端市场带来机遇。现阶段,安徽省培育出以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型显示器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化产业群,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奠定坚实基础。从实践案例来看,安徽龙头企业奇瑞汽车建立西班牙海外合资工厂、江淮汽车销往全球各地,安徽省制造业逐步从单纯零部件产品出口向更高技术标准、数字模式等全链条生态输出^[15]。此外,安徽省已顺利获得“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区的建设批复,且被纳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这一国家级示范区平台为省内企业聚集海外资源、开展数字化的产业协作提供了重要载体^[16]。

但是,产业嵌入机遇也伴随着制度适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安徽省现有政策监管体系,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适配性差异,具体体现为安徽监管体系在跨境数据流动、外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与企业通过“丝路电商”走出去过程中对政策协同性及国际规则衔接性的实际需求,存在不匹配状况。跨境企业面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规则衔接和流程适配等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投入。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环境方面具有不确定性,给跨境经营的企业带来巨大的运营风险。最后,制度“软联通”的有效性面临适配挑战。虽然安徽省在推动长三角区域通关一体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但将国内改革经验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制度环境衔接,实现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的跨越,仍是安徽建设“丝路电商”的核心问题。

2.2 数字技术赋能的供应链重构机遇与数字鸿沟困境

安徽省在推进“丝路电商”建设进程中,数字技

术赋能为供应链重构带来显著机遇,但是由于各区域发展不均衡又会带来数字鸿沟困境。数字技术对供应链的重构价值已得到学术研究与实践验证。数字技术重新整合供应链,优化供应商、服务商和制造企业的资源,促成生产知识代码化,构建供应链虚拟数字形象,帮助跨境企业形成全方位认知,有效避免了供应链中的“孤岛现象”^[17]。数字技术不仅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降低企业嵌入全球供应链的门槛,更能给安徽省中小企业加入“丝路电商”贸易带来机遇。根据安徽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24 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达 521.6 亿元,数字技术驱动的“通关 + 物流 + 支付”全链条服务体系对此形成关键支撑,环球“丝路电商”总部基地等载体的建设更推动供应链各环节数字化协同效率提升,使本土优势产业与海外市场形成精准对接^[18]。但是,数字鸿沟带来的发展困境制约了安徽省“丝路电商”建设进程,表现为区域与主体间的数字化能力失衡。安徽省跨境电商存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差,中小微企业缺乏数据整合能力,难以融入数字化供应链体系等问题,而物流设施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使这一现状更加加剧。数字鸿沟不仅呈现出硬件设施落差,更表现为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分层,导致供应链协同中出现“数据孤岛”现象,影响跨境电商整体运转效率。

2.3 区域协同的物流网络优化与枢纽边缘分化

区域协同发展为物流网络优化带来了机遇,而枢纽边缘分化的矛盾则构成显著挑战。区域协同是通过区域内资源整合,以及各类服务互补从而推动物流网络效率提升。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安徽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案(2022 - 2025 年)》明确提出“构建‘一核多极’物流枢纽体系”,以合肥国际陆港为核心枢纽,联动芜湖、蚌埠等区域枢纽,形成覆盖全省、衔接“一带一路”的物流网络。推进区域物流协同需先在战略规划层面打破区域制度性壁垒,统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布局与服务模式,健全协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19]。安徽省依托此模式已实现中欧班列(合肥)与长三角港口群的无缝衔接。但是,枢纽边缘分化会导致物流资源配置失衡,又会制约“丝路电商”的协同发展。在物流网络中核心枢纽与边缘节点的差异会导致资源向枢纽集聚、边缘节点服务能力不足,这一现象在安徽“丝路电商”物流网络中表现突出。合肥、芜湖等枢纽城市已建成智能仓储、多式联运等现代化设施,而皖北、皖西城市仍存在物流节点覆盖率低、数字化水平低等问题。这种分化不仅削弱了

区域协同效应,还导致边缘地区“丝路电商”发展动力不足,形成“枢纽集聚 - 边缘滞后”的循环,成为安徽省“丝路电商”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2.4 绿色低碳转型的生态重构与成本约束矛盾

绿色低碳转型的生态重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的协同需先实现价值层面对接,而将绿色低碳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首要任务便是转变经济效率与生态安全对立的观念。其次,还需将绿色低碳生态价值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推动绿色创新获同等资源配置优先级;构建以可持续性优先的价值秩序,通过制度设计内化可持续性,最终实现二者同频共振^[20]。目前,安徽省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重构传统电商生态体系,但生态重构与成本约束的矛盾仍制约其转型进程。《安徽省电子商务“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构建绿色物流体系、推广可降解包装材料、优化数据中心能源效率等目标,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推动电商产业链的低碳化^[21]。然而,生态重构需投入大量资源,如智能物流网络建设、循环包装技术研发及数据中心绿色改造,短期内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若全面实施绿色转型,中小型企业可能面临破产,这种矛盾在县域经济中尤为突出。

3 安徽省“丝路电商”高质量发展建议

3.1 分层对接与主动塑规战略

在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推进分层对接与主动塑规战略,需锁定多层次主体协同、梯度市场适配与规则话语权建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系统内企业主体、资源与规则的层级互动性,这为“丝路电商”分层对接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推进主体生态分层,依托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构建主链条生态,通过技术溢出、订单赋能带动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步培育跨境支付、海外仓服务等专业服务商,优化生态辅助层的资源补给功能。其次,区域层级对接,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层级差异,对东盟市场倾向于消费品供应链下沉和直播电商,对中东市场围绕技术密集型产品定制化出口,不同层级的市场实行差异化资源配置。其三,规则分层衔接,优先对接 RCEP、DEPA 等区域经贸规则中跨境贸易通关、电子签名等核心条款,同步完善国内监管规则,以国际规则对标和国内规则细化强化合规能力。

但是上述分层对接依旧不够,安徽省必须转变角色,从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主动

塑规是突破发展、占据生态位高点的根本。一方面,输出产业特色标准,包括依托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探索“家电出海”全链条服务标准,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售后溯源、绿色低碳认证,用产业集群实践反向赋能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另一方面,共建丝路区域协作规则,联合长三角“丝路电商”枢纽城市,共建跨省数据流动、税收分成、人才互认等协作规则,借鉴区域生态共建理论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此外,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丝路电商”国际合作论坛等平台,实现从生态“后发者”向规则“建构者”的转变。

3.2 普惠赋能与包容性数字化转型战略

在普惠赋能和数字化转型战略下,安徽省建设“丝路电商”优化路径,应以数字技术发展为方向,构建全方位“丝路电商”技术支撑,推动生态系统“软联通”与数字基建协同发展。安徽省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打造“丝路电商”数字技术应用平台,为其营造开放、智能、安全的贸易环境,同时以技术赋能提升生态系统各种群间协同效率。首先,加强数字贸易“单一窗口”国际合作,落实“一单两报”等贸易便利措施,降低安徽省中小微企业通关成本。其次,支持搭建“丝路电商”跨境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国际数字身份标准对接,增强“丝路电商”伙伴国数字身份信任,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商产业规则和服务标准的跨区域对接,实现信息共享互通,助力不同规模企业公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最后,安徽省需加快推进数字基建合作,依托“丝路电商”数字技术应用中心,为“丝路电商”通关、电子发票、风险监测等环节搭建底层技术框架保障,提供普惠性技术支撑。

3.3 多极智慧物流网络协同战略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系统要素需要互联共生和功能协同,安徽省建设“丝路电商”需发展多极智慧物流网络,以枢纽体系为支点,依托数字技术实现资源整合。一是推动合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通过谋划“丝路电商”中欧班列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快形成以丝路通道带动跨境电商的模式,同时加大丝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协调联动,拓展中欧班列新通道建设,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与共建国家搭建以铁路、公路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二是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贸易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加快构筑国际贸易新通道。全面接入长三角海关“联动接卸”模式,实现皖北皖西货物经合肥、芜湖口岸进出口“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最

后,充分考虑其他运输方式的特点,促进多式联运方式有效衔接,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降低国际运输成本,提升“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水平。

《安徽省综合交通发展能级提升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打造“一枢多极”网络格局,这一布局为多极网络协同奠定了硬件基础,而智慧物流的建设则是打破层级的关键。智慧协同需构建一体化数字赋能体系,破解传统物流的信息孤岛问题。要继续推进信息互享与多式联运工程,业务信息化平台打通关务、物流、资金全链条数据,实现集装箱全过程、可视化管理。持续推动合肥、芜湖等枢纽的智慧平台互联互通,统一数据接口与信息共享,将铁路快速通关、港口“散改集”等创新模式加入多极网络。通过枢纽智慧调度、节点协同响应与末端精准配送三级机制,使多极智慧物流网络成为电商生态系统高效运转的支撑。

3.4 绿色市场化激励与循环降本战略

实施绿色市场激励机制与循环降本战略可以促进安徽省“丝路建设”的进程,解决生态重构与成本约束的矛盾。基于生态系统视角,首先建立“丝路电商”碳数据核算体系,将企业绿色物流、可降解包装等减排行为转化为碳积分,允许在长三角碳市场交易,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转型成本。其次,完善绿色供应链标准,对达标跨境企业实施税收减免与通关优先政策。在循环降本方面,需构建“省级回收中心—城市中转运站—社区回收点”三级逆向物流网络,推广可折叠循环箱替代传统纸箱。同时,开发“丝路电商”碳管理云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碳数据存证,满足欧盟标准要求。此外,联合长三角城市共建“丝路电商”绿色产业联盟,共享海外仓与检测认证资源,推动合肥智能家电、芜湖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建循环经济示范区,提升零部件再制造利用率,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

综上,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安徽省推进“丝路电商”建设可通过四大优化路径实现。一是实施分层对接与主动塑规战略,从主体生态分层、区域层级对接、规则分层衔接入手,同时推动跨境电商角色转变,输出产业特色标准、共建丝路规则。二是推行普惠赋能与包容性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构建数字平台,推进丝路国家数字基建合作,降低企业成本并保障信息共享。三是构建多极智慧物流网络协同战略,依托合肥中欧班列拓展通道,发展多式联运并接入长三角,同时以“一枢多极”为基础,搭建数字赋能体系,实现物流信息互

通。最后,实施绿色市场化激励与循环降本战略,构建碳数据核算体系和绿色供应链标准,开发碳管理云平台并联合长三角共建绿色产业联盟。

4 结论

通过全面分析安徽省“丝路电商”发展的基础框架和生态资源,提出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安徽省“丝路电商”高质量发展建议,不仅有助于安徽省进一步挖掘“丝路电商”的比较优势、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且对缩小丝路沿线国家的数字鸿沟、推动各国产业数字化转型有重大意义。综上,安徽省应利用“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优势,深入推进“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持续发展具有徽风皖韵的“丝路电商”生态,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数字丝绸之路”,促进安徽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期待着安徽省政府、相关跨境企业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抢抓机遇,推动安徽省“丝路电商”持续健康发展,为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 [1] 赵新泉,刘媛媛,林志刚.“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成效、困难及对策[J]. 中国流通经济,2024,38(8):33-42.
- [2] 彭羽,杨碧舟,曾侯哲.“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是否提升了数字服务的出口复杂度——基于协议签署国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2025(5):67-83.
- [3] 杨昊雯.“丝路电商”生态系统构建研究——基于上海市“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案例探索[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12):165-170,21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安徽省探索“AI+跨境电商”新模式[EB/OL]. (2025-07-10)[2025-09-25]. <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182/2025/7/1751335840782.html>.
- [5]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案(2022-2025年)解读材料[EB/OL]. (2022-07-19)[2025-09-25]. <https://fzggw.ah.gov.cn/public/7011/146773441.html>.
- [6] 陈妍. 探析安徽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J]. 商展经济,2022(8):13-15.
- [7] 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促进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2024-02-01]. <https://www.linquan.gov.cn/OpennessContent/show/2378243.html>.
- [8] 安徽省商务厅,中共安徽省委网信办.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省电子商务“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2-11-30]. <https://commerce.ah.gov.cn/public/21711/121323291.html>.
- [9] 熊曦,宁浣. 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区域品牌:作用机制与路径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5,46(4):104-111.
- [10]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徽省能源局.“奋发有为往前赶”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聚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先进制造业集群答记者问[EB/OL]. [2025-04-10]. <https://jx.ah.gov.cn/content/article/149906501>.
- [11]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安徽:推动外贸新业态崛起释能[EB/OL]. [2024-02-06]. <http://www.bengbu.gov.cn/ywdt/ztzl/rdzt/zgahzymysyqbppq/51011127.html>.
- [12] 安徽省“十四五”物流业发展规划. <https://www.ah.gov.cn/group6/M00/05/2C/wKg8Bml6dlCAGy4WAAXITdxuyhA716.pdf>
- [13]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4-12-31)[2025-09-25]. <https://jtt.ah.gov.cn/public/21701/122640251.html>.
- [14]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物流提质增效降本三年专项行动计划(2022-2024年)[EB/OL]. (2022-07-19)[2025-09-25]. <https://fzggw.ah.gov.cn/public/7011/146773281.html>.
- [15]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果新闻发布会[EB/OL]. (2023-11-29)[2025-09-25]. <https://fzggw.ah.gov.cn/gzcy/xwfbh/148954741.html>.
- [16] 安徽省人民政府. 从中部腹地到开放高地——安徽交出一份高分外贸成绩单[EB/OL]. (2024-12-19)[2025-09-25]. <https://www.ah.gov.cn/zwyyw/mtjj/565383721.html>.
- [17] 杨继军,艾玮玮,范兆娟.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的场景、治理与应对[J]. 经济学家,2022(9):49-58.
- [18] 安徽省商务厅.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124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EB/OL]. (2025-09-10)[2025-09-25]. <https://commerce.ah.gov.cn>.
- [19] 庄甲坤. 推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难点问题和重点任务[J]. 中国流通经济,2025,39(6):58-68.
- [20] 杨青. 生态文明建设中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协同的理论重构[J]. 环境保护,2025,53(11):60-63.
- [21] 安徽省商务厅,中共安徽省委网信办,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商务厅中共安徽省委网信办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省电子商务“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4-03-31)[2025-9-25]. <https://www.whjqh.gov.cn/openness/public/6605541/39661142.html>.

从西方译介视角看中国哲学典籍中的国家形象生成机制

毋娟

(1.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2. 郑州西亚斯学院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00)

摘要:借助形象学理论,结合文本分析、语境考察与互文研究,揭示在西方译者翻译中国哲学典籍过程中中国形象生成的机制与特征,指出译者动机、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副文本分析以及社会历史语境和互文语境在形象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将典籍文本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结合互文性的阅读视野进行翻译和研究,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和互镜,可以揭示出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国家形象的塑造日益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深刻影响着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西方译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79-06

The Mechanism of National Image Gener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Translation

WU Juan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 Hen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Sias University, Zhengzhou, 451100, Henan)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magology, combined with text analysis, contextual examination, and intertextual research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mage gen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by Western translators. It points out that translator motivation,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b text analysis, as well as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ter textual context play key roles in image construction. By placing classical texts in a gra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reflec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can be revealed.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mag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cu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deeply influen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s image in the West.

Key words: western transl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national image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翻译实践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1]。“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形象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2]“异国形

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3],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和乌托邦的颠覆功能之间的张力上。“所有异国形象的塑造都是处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之间的想象性(认同)实践。”^[4]“国家形象是一个综

收稿日期:2025-06-11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6-ZDJH-1066);郑州西亚斯学院科研项目(2024XKA003);郑州市社科联调研课题(ZSLX20250852)。

作者简介:毋娟(1987-),女,河南焦作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E-mail:athenawu5028@126.com

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5]国家形象包括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西方历史中出现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乌托邦式的美化、到意识形态的丑化再到两者间相互徘徊的历史嬗变。

中国哲学典籍体量庞大,哲学思想深邃,蕴含着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它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象征和全息缩影,而且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西方译介中国哲学典籍已有4个世纪,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的集体想象物,在肯定和否定之间更迭。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西方译者的翻译生产活动,也清晰地展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凝视、解读和表达。西方译介哲学典籍的过程是他者凝视的过程,其异质化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学术思想造就了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形象。译者动机、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以及社会历史和互文语境,共同构成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维度。

1 典籍英译文本信息与中国形象的生成

“文本内部研究是形象研究的基础,它要回答的是形象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即一部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是怎样的’?”^[6]而文本内部研究的重点在于词汇、文本大的层级关系和故事情节三个层面,此外还有作为情感和思想混合物的形象所折射的多样性特征。关于词汇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单纯的符指过程上,应该突出语言诗学和本体论,注重词语的搭配、上下文语境以及具有无限扩张性的能指,富有创造力的语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不同的文本形象。根据现代形象学来看,文本分析是典籍英译本形象建构的重要关联,这个过程“通常使用叙事学和话语分析工具”^[7]来实现。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中的故事情节、文本的风格特点、翻译策略的选择、副文本的译介特点等都是文本分析的重要观测点,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形象的生成。

1.1 译动机与中国形象生成

译动机与目的一般由译者决定,彰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是译者受时代和历史语境的制约,其译动机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13世纪,马可·波罗等人曾访华,著有《马可·波罗游记》流传于世,游记以华丽的辞藻记录了中国财富浩大、城市繁华、宫殿富丽、交通便捷的景象。16世纪末,大批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华,至此,中国典籍文化西传翻开了新篇章,传教士把目光瞄准中国典籍,努力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挖掘深远的原始基督教教义,他们希望

可以“用《圣经》解释中国典籍,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与传教方式,又可以用中国典籍解释《圣经》,弥合新发现与旧神学之间的裂痕”^[8]。利玛窦将《四书》译为《四经》,率先“开辟了附儒以超儒的道路”^[9],他不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而且吸纳中国士大夫的思想,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说服中国知识阶层。神父柏应理译有《西文四书解》等典籍,他“以全心全意的基督教神学,解释儒家经典;以一知半解的宋明理学,解释基督教神学”^[8]。通过考证中国的纪年,他断言中国历史与《圣经》历史完全相符,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基督教国家。马礼逊于1812年翻译了《大学》,柯大卫于1828年出版《四书》的首个全译本,理雅各于1861年翻译了《四书》。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翻译工作者多为传教士,他们选择译介中国哲学典籍,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确证西方基督教教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现基督教义普适性的世界认同,满足自身和自己国家的利益。从西方传教士的动机中可窥察出他们僵化的二元对立思想,他们似乎必须要寻找一个落后的他者形象,通过丑化、矮化他者来确证自身的优越。可见,早期西方汉学家译介中国哲学典籍,是建立在西方的认知系统和语义框架之下,是为了强调西方文化重要性的一种操纵与改写,他们忽视了中国真实、全面的文化身份,难免造成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误读和偏见。

随着20世纪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到来,西方译者译介中国哲学典籍的动机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有些译者“开始关注哲学思想的本真”^[10],试图维护中国元典的哲学要义,还原其本来面目。也有很多汉学家缺乏清晰的目的,他们译介中国哲学典籍仅是出于个人兴趣和对作品的喜爱。例如,安乐哲是美国著名比较哲学家,深谙西方哲学史,师从学贯中西的刘殿爵。刘殿爵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释、唐君毅“一多不分”的中国古典自然宇宙哲学观、葛兰言的“关联思维”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都间接影响并塑造了安乐哲的比较哲学思想,助力他“形成了专注中国哲学典籍、通过比较哲学视角理解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理解哲学术语、将中国哲学归属过程哲学等哲学研究方法”^[11]。安乐哲认为西方现代化的话语经过翻译植入到中国本土语言之中,在窥探大部分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时,可以“发现西方语言现代性的框架、概念和术语”^[12]植入并重新界定了汉语。安乐哲比较哲学翻译观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本体地位,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注重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阴阳平衡、一多不分。相比于安乐哲、杜博妮、闵福德、白睿文和葛浩文等则坦言译介中国哲学典籍是兴趣使然,并无特殊目的,他们考虑较多的是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需求,他们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做出适应目标语语境的改写,通过选择符合西方的叙事模式,以迎合西方视角下“落后、神秘、野蛮”中国形象的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这种误解虽然有利于快速建构中国形象,但可能令译者忽视中国哲学典籍的文化内涵和深层背景,陷入“东方主义”的陷阱,这样不利于生成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文本甄选与中国形象生成

选择要翻译的原文是所有典籍翻译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任何翻译活动,都是“通过选取源语文化里的某些作品从而屏蔽了其他作品,为该作品在目标语文化中呈现某种特定的文化形象甚至是偏见提供了可能”^[13]。文本选择与译者喜好、翻译目的、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赞助人、译入语国家主导诗学等因素密切相关。译什么和选择什么样的文本涉及典籍本身和典籍底本的选择^[14]。据统计,西方世界翻译与研究中国哲学典籍更侧重思想、文学与历史等领域,《道德经》《四书》等经典居多。其中,《道德经》译本种类多达 140 多,《庄子》译本亦有 30 种,《四书》译本也超过了 100 种^[15]。

早期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倾向于选择对中国人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儒家经典进行译介,儒家经典所蕴含的“道德哲学”,是理性原则、道德秩序的象征,成就了一个明智、宽容、淳朴的文化传统。传教士借助渊博的神学知识,象征性地对中国哲学典籍给予阐释,试图解构中国推崇“道德至上”的文化形象,以期在西方神学认知体系下重新建构中国的形象。例如,利玛窦在译介《四书》时发现了“上帝、神启、爱、天堂”等西方色彩浓厚的象征符号;傅圣泽译介《易经》时,认为那些短线呈现的奇妙数字,具有所谓救世主的品质。他们不远万里赶赴中国,运用基督教义阐释中国哲学典籍,对其进行有意识地操纵与改写,旨在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价值观,扩大基督教神学的普世包容性,实现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的全球认同。而传教士的这一举动,也让中国的“道德哲学”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广泛接受和追捧。17 世纪、18 世纪,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等西方启蒙哲学家籍由传教士的典籍译介,发现了中国宗教宽容、道德高尚、政治开明的孔教乌托邦形象。莱布尼茨推崇中国哲学和宗教,伏尔泰将中国道德和文化理想化,这些西方哲学家通过注视

中国哲学典籍,幻化出理想化的乌托邦形象,表面上看是在美化中国,实际上是通过他者的镜像调整和改造自身文化^[16],在背叛自己的同时完成自我超越,在思想穿越中国的同时完成西方自身的文化觉醒和修正。

19 世纪下半叶 20 世纪初,随着“黄祸”神话在西方流播开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急剧下滑,中国政治开明、道德高尚的形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野蛮、落后、贪婪、有待征服的丑化形象。这一时期,西方译介哲学典籍的规模和数量明显滞后,以美国为例,翻译家只有庞德、卡罗斯等寥寥几人,译作范围也仅限于《诗经》《老子》等。20 世纪下半叶,安乐哲作为比较哲学家,专注用比较哲学的视角研究哲学的行为,翻译选材更青睐中国哲学典籍,诸如《论语》《中庸》《道德经》等,因为这些典籍著作哲学要义和文化内涵较为深刻。

因典籍成书久远,会出现多种底本,底本的不确定性造就了译本的多样性,“对底本的甄别和遴选直接决定了译本是否可以准确再现原文本的思想与文化”^[14]。譬如,《道德经》译介丰富,其成书大约于公元前 485 年,距今 2500 余年,祖本已失,现有三个知名版本:王弼通行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郭店出土的楚简本。相比之下,王弼本迄今为止流传最广,被普遍认可,其特点是浅显易懂,行文流畅。196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出现之后,译介更加丰富,较为突出的有梅维恒 1990 年的帛书《道德经》译本。安乐哲译本的中文底本特点是既采用马王堆本,又融合了其他版本的形式和内容^[17]。他在翻译《道德经》时,运用马王堆抄本作为原文文本,在章节安排上借鉴王弼通行本的形式,前 37 篇为“道”经,后 44 篇为“德”经。底本的选择与编排,为安乐哲比较哲学阐释与翻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是中国形象的生成基础。

1.3 翻译策略与中国形象生成

翻译策略是一个宏观且宽泛的概念,它是“在一定语境下所实施的一种方案”,因此,“它比我们讨论的语言-语篇层面的各种转换现象涵盖了更广的范围”^[18]。翻译策略的宏观性决定了在制定翻译策略时,需要考虑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原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和读者。译者作为翻译的主要参与者,在制定翻译策略时往往体现了一定的主体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会根据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来选择翻译策略。一般来说,翻译策略分为异化和归化两种。异化策略强调译者要向作者靠拢,尽量保留原作的差异性,突出源语的文化特点和

意蕴内涵。而归化策略要求译者向目标语读者靠拢,考虑他们的阅读期待和接受效果,选择译入语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传递源语的信息。

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再到多元化的流变。在西人英译典籍的3个主要阶段(传教士翻译阶段、汉学家翻译阶段和近代哲学家介入的翻译阶段),理雅各、亚瑟·韦利、安乐哲作为杰出代表,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大相径庭。理雅各和韦利倾向于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而安乐哲为了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完整地阐释中国哲学思想,向读者展示真实、立体的中国哲学形象,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在阐释和翻译过程中使用过程性语言体现过程哲学。“在翻译核心术语时,安乐哲进行了音译,即标注该术语的拼音,并附加中文原字,使目的语读者产生一种陌生感”^[19],同时大量运用动词及动名词结构处理原文本,体现中国哲学的事件性和过程性特点。本文以《道德经》中“道”“有”“无”等核心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解析理雅各、韦利、安乐哲和郝大维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探究译者翻译实践背后塑造的中国形象。

例1 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理雅各译: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T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name.

韦利译: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

安乐哲、郝大维译:Way-making (dao) that can be put into words is not really way-making. And naming (ming) that can assign fixed reference to things is not really naming.

“道”是老子思想的基本范畴,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万物之始基。理雅各采用异化的策略,运用威妥玛拼音来译介“道”,做到了中英文概念的统一,保留了源语的意蕴。而“Tao”也被一些英美词典收录其中,作为英语的一个词条专指老子的“道”。理雅各所理解的“道”是一种现象,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没有具体注释的译法会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但却某种程度上促进中国语言结构在西方的传播,有利于塑造完整的中国哲学概念和形象。理雅各也采用“enduring”和“unchanging”来形容“Tao”,意在突出“道”的永恒性和不变性,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不动不变的特点。韦利将“道”译为“the Way”,“Way”

有“道路、途径、方式、原则”之意,与“道”的内涵近乎一致,但该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可能令西方读者联系到上帝之路,而《道德经》中的“道”内涵丰富,兼有本体论、宇宙论、道德、人生等内涵,不可与基督教教义相比附。从韦利对“道”的阐释可以发现他有意遮蔽中国哲学思想,试图在中国哲学典籍中渗透西方基督教教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话语建构和形象塑造。安乐哲、郝大维采用“阐释为主、翻译为辅”的异化策略,选择动名词结构“Way-making”夹注拼音“dao”的方式,体现“道”的创造性、过程性和事件性特点,而拼音夹注也反映了安乐哲试图将“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呈现给目的语读者,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向西方读者展示真实、立体的中国哲学形象。

例2 原文: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

理雅各译:So it is that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give birth the one to (the idea of) the other...

韦利译:For truly, Being and Not-being grow out of one another; Difficult and easy complete one another...

安、郝译:Determinacy (you) and indeterminacy (wu) give rise to each other, Difficult and easy complement each other...

“有”和“无”是老子万物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的思想,“道”是万物之源,“有”“无”是道的两大属性,道是“有”“无”的统一体。对于“有”“无”的翻译,各家有所不同,理雅各译为“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这是抽象的存在论之“有”“无”,而非事物本身的对立关系。韦利译为“being and not-being”,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存在”(being),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认为宇宙的唯一实体就是“存在”(being),being 不动不变、不生不灭。如此看来,being 即是万物之本源,Not-being 与 being 相对,是由 being 衍生出来的,然而《道德经》中所述“有生于无”,“有”是在“无”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无”是“有”之根本和基础。从逻辑上看,英语中 being 与 not-being 的关系与汉语中“有”和“无”的关系正好相反。汉语中“有”“无”作为“道”的两个范畴,是本体论的最高抽象概念。从哲学的角度来看,“not-being”并非“无”,而是“非有”,反之,“非无”也非“有”,将“not-being”译为“无”有似是而非之嫌^[20],韦利这样阐释难免落入西方本体论的窠臼,将中国哲学思想中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道”等同于西方哲学中的“存

在”,虽然这样做更容易让目标语读者理解,但是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置于西方哲学的认知框架,不利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和中国哲学形象。安乐哲、郝大维将“有无”译为“determinacy and indeterminacy”,前者指“具有决定性的性质”,后者指“不具有决定性的性质”,两者属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并非西方所谓的“二元对立”,而是“一多不分”,“一”是万物之始,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具有整体性,“多”是内在浑然一体的万物所具有的多样性^[21],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整体性、多样性的复杂统一。虽然安乐哲认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意在扭转中国哲学思想在西方被误读、被遮蔽的现实,但是选择西方的语词“determinacy and indeterminacy”未必能有效传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选择加注拼音“you and wu”,采用音译法,生成多元的阐释空间,供读者进行多元解读,则有助于还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重塑中国的哲学形象。

1.4 副文本与中国形象生成

副文本是指“言语和其他的非言语材料,它们是介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现象,主要为了呈现作品”^[22],主要涉及文内和文外副文本,具体包含封面、目录、序跋、标题、出版信息、前言、注释等信息^[23]。副文本往往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经译者翻译之后的副文本也传达了译者的意图。形象建构过程中,译文受制于原作的牵引,释义空间有限,无法填充文化信息空白,导致文化误读和形象变形,而副文本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阐释性,大大增强了译文的叙事张力与信息弹性,为译者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释放了空间。

冯家福与 Jane English 在《道德经》英译本中绘制了老子骑在牛背上的图片,彰显了老子“大智若愚”的智者形象。韦利《道德经》英译本在前言部分融入了老子生平、原著阐释、翻译技巧、译本述评、文献爬梳等编者序跋,以期向读者传播具有代表性的译介作品,保证文本正确的解读方式,有助于塑造生动鲜明的老子形象。华兹生在《庄子全集》英译本的封面装帧设计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鲲鹏图案,鲲鹏豪迈高远、自由洒脱的形象象征了华夏神话的雄浑和超然,与源作内容形成了互文,传递出人类不断超越自身、超凡脱俗的精神意志,是庄子哲学形象的表征。华兹生在《韩非子》英译本目录之后增加了特色“年谱”作为副文本,年谱勾陈出公元前 285 年到公元前 214 年古代中国的历史演变,展现了古老中国各个朝代的名号、君主和王朝更迭,这种翻译

实践活动史学底色丰富,大大增强了译本的年代感和历史性。西方读者置于中国历史的语境,从史学的角度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韩非子》的意蕴内涵,这样可以拉近读者与形象的距离,帮助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形象。

2 社会历史语境、互文语境与中国形象生成

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关系甚大,形象是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话语紧密相连。中国的异域形象研究不止局限于文本分析,还关涉形象产生的环境,探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文化。因为“意识形态和历史语境与翻译有某种互动关系”^[16],所以西方译者心中的中国形象难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其互动、互涉的过程直接决定了受众对译本的期待视野。部分西方译者出于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参与译介,但在多数情形中,这种翻译行为服务于其自身文化背景中的认同危机与意识形态需求。因此,其对中国形象的重构未必意在还原中国哲学原貌,而是建构一种符合西方文化期待的“他者形象”。他们受制于所处的历史语境,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操纵下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不断互动和对话的结果”^[13],而意识形态具有整合功能,被当作集体记忆进入到最基本的社会联系之中,是被理想化的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社会的集体想象,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知识与想象体系,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24]。典籍英译形象的研究将文本分析还原到源语和译入语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将文本及其接受历史置于所处文化、历史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就形象塑造和改写等话题展开论述,解释中国形象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变化”^[23]。

西方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研究、评价也为中国形象生成创造了互文语境。互文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不同,强调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25]。在广义的互文语境下,国家形象塑造和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构成一种互文关系,狭义的互文性是从最初的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互文,扩展到同一源语作品不同译本之间的互文,或同一类型文本不同译本之间的互文关系^[24]。中国哲学典籍浩如烟海的译本与元典构成了强大的文本互动网络,多重文本互动、互镜,生成了互文语境。互文语境影响着哲学典籍的译本表达;同时,哲学典籍本身也在映射当时语境。不同典籍之间的渐进延伸、译者在多部译本间的交叉引用与改写,共同构成

了一个系统化的文本互动网络,将各个互文性译本中可能被遮蔽的社会因素彰显出来。例如,传教士译介《道德经》的时期,“共产生了14个英译本,有8部译本有明显的基督教比附,运用了大量基督教概念来翻译”^[26],折射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教意图,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历山大将“道”译为“God”,比作西方哲学和宗教中的“第一因”(First Cause),用“He”这个人称代词指代“道”,对原文内容进行了肆意的篡改,这一翻译行为无疑受到了基督教前见和互文性阅读的影响。

3 结论

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对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本文立足形象学的视域,通过互文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双轨铺陈,描写西方译者在迻译动机、文本甄选、翻译策略、副文本等方面对文本信息的具体处理,揭示文本信息、互文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中国异域形象的生成与传播。西方不同时期的译者怀揣着传播基督教义、西方文化认同或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目的,通过甄选典籍原本和底本,借助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辅以多模态的副文本信息,在互文性阅读前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掣肘下,在他者和自我互动、互补的过程中,生成了“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然而,中国形象的跨语言生成仍在路上,随着大量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译者加入中国哲学典籍的译介工作,中国形象开始从他塑转向自塑,由中国译者主译、西方译者复勘的中西译者合译模式应该是未来中国哲学典籍译介的主流模式,中西合译的模式可以有效落实文化传播和形象优化。

参考文献:

- [1] 巴柔. 形象[M]//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4-155.
- [2] 谭载喜. 文学翻译中的民族形象重构:“中国叙事”与“文化回译”[J]. 中国翻译,2018,38(1):17-25,127.
- [3] 莫哈. 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
- [4] 张月. 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10-114,119.
- [5] 管文虎. 国家形象论[M].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23.
- [6]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M]//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
- [7] 王运鸿. 从翻译中的形象研究到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23,44(3):25-33.
- [8] 周宁. 跨文化形象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44.
- [9] 汪榕培,王宏. 中国典籍英译[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4.
- [10] 毋娟. 中国哲学典籍外译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6):112-117.
- [11] 贺莎莎,葛中俊. 译者身份对翻译选择的影响——比较哲学视域下《道德经》的英译研究[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20,44(5):513-518.
- [12] 常青,安乐哲. 安乐哲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观——从《道德经》的翻译谈起[J]. 中国翻译,2016,37(4):87-92.
- [13] 王运鸿.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41(4):86-93.
- [14] 李征. 中国典籍翻译与中国形象——文本、译者与策略选择[J]. 长春大学学报,2013,23(9):1147-1151.
- [15] 朱振武,袁俊卿. 西人英译中国典籍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形象的异域变迁[J]. 中国翻译,2021,42(2):55-64,190.
- [16] 杨静. 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跨文化形象学视域下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论[J]. 中国文化研究,2014(1):121-132.
- [17] 常青,安乐哲,郝大维英译《道德经》的哲学释义与翻译[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7(5):36-39.
- [18]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2014,35(3):82-88.
- [19] 赵彦春. 对安乐哲中国典籍英译的学理反证[J]. 翻译与传播,2020(1):22-34.
- [20] 吴伟华. 论《道德经》中“有”“无”之意及其英译——互异与互通的统一[J]. 2019,5(3):93-103.
- [21] 郭薇,田辰山. 一多不分:安乐哲中国哲学海外话语建构路径分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4):19-23.
- [22] GENETTE C.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
- [23] 林嘉新,徐坤培. 副文本与形象重构:华兹生《庄子》英译的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5(2):111-120.
- [24] 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 外国文学评论,2004(3):19-30.
- [25] 乔洁. 互文性视域下的文学对外译介与国家形象建构——以1978-1989年间的 Chinese Literature 为中心[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4(5):31-38.
- [26] 刘炜. 互文性理论视域下《道德经》英译的意识形态操控[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33(4):131-134.

多模态视域下葛浩文英译《山海经》的意义建构研究

汪琳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24)

摘要:在多模态视角关照下,通过对葛浩文英译《山海经》的文本分析,发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模态内翻译中,采用了异化文化负载词、重组句子结构以及文化过滤和改写的策略;在模态间翻译中,他又创造性运用语图互文的跨模态意义整合策略,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下的意义建构与协同。研究认为,在多模态文本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模态内翻译和模态间翻译相互协同、互为补充,能够拓展文本意义的阐释空间,对优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葛浩文;《山海经》;多模态;意义建构;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85-07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Shan Hai Jing* from the Multimodal Perspective

WANG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238024,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of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Shan Hai Jing* has been conducted.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in intramodal translation, Goldblatt employs strategies such as foreigniz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 sentence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filtering and adaptation. And in the intermodal translation, he creativel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cross-modal meaning integr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 achieving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synergy acros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within the cross-cultural transfer of multimodal source texts,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intramodal and intermodal translation is helpful to expand the interpretive space of textual meaning, thereby offer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strategies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Howard Goldblatt; *Shan Hai Jing*; multimodal; meaning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外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中华文化译介不仅包括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包括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1]。《山海经》是一部保存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百科全书式典籍,内容涵盖地理、历史、神话、宗教、动植物、矿产、医学等多个方面,是了解中国古代史和文化起源的重要书籍。1978年,美国学者希夫勒(Schiffeler)首次节译该书。此后,国内外其他学

者也复译过此书,包括比勒尔(Birrell)、斯特拉斯伯格(Strassberg)、王宏和赵峥以及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既有全译本,也有节译本,从不同角度为西方读者揭开了这部旷世奇书的神秘面纱。

在诸多译本之中,葛浩文英译的《山海经》(下面简称葛译或葛译本)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最新实践,再次延展了这部先秦古籍的生命周期和国际影响力。从译介效果来看,葛译本自2021年出版以

收稿日期:2025-07-2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2024AH053135);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24dzxkc117);巢湖学院质量工程项目(ch21kcszc01)。

作者简介:汪琳(1980-),安徽和县人,副教授,博士。E-mail:49619641@qq.com

来,全球图书馆馆藏量已近三百本,在亚马逊和好读网上读者评分分别达到4.8分和4.48分,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对葛译本的关注度不高,只有梁林歆和王迪两位学者对《山海经》的复译进行研究中,对葛译本的生产过程及翻译策略做了扼要解读^[2]。事实上,葛译本并非直接译自古文版《山海经》,而是以2015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朱墨版为底本。该底本由画家陈丝雨精心绘制插画,并由国学才俊孙见坤进行白话今译,是典型的图文并茂的多模态版本。为论述方便,下文将此白话文插图本简称为“孙译(本)”,将古文版《山海经》称为“源文本”。这种独特的底本形态使得言语模态不再是表达意义的唯一路径,它还与非言语模态相互协同,共同构建语篇的整体意义。因此,从意义重构的角度去审视葛浩文对言语模态和非言语模态的创造性转换与重构是一种有益尝试。鉴于此,文章拟在多模态翻译理论框架指导下,通过对葛译《山海经》的文本细读,考察葛浩文如何准确传递孙译本中言语模态、非言语模态以及两者协同的多元化意义表达,以期进一步深化前人的研究,为中华文化外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1 多模态视角下翻译与意义建构

多模态指的是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交流和互动。Kress 和 Van Leeuwen 将其定义为“在设计符号产品或事件时使用多种符号模式”^[3],强调语言、图像、声音等不同符号资源对建构意义的协同作用。

多模态在翻译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追根溯源,多模态翻译研究与雅各布森提出的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概念相通,都突破了传统语言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21世纪初以来,多模态与翻译的相关研究逐渐发展和成熟。Baker 和 Saldanha 在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第二版中,首次介绍了多模态的相关术语,如“多模态性质”“多模态方法”等,并讨论了视听翻译和广告翻译中的多模态特征^[4]。Munday 在讨论视听翻译时,引入了多模态的概念,提出了“多模态转录模型”^[5]。Kress 也指出,翻译是一个意义的移动过程,从一种模态转移到另一种模态;从一个模态集合跨越到另一个模态集合^[6]。在国内学界,胡壮麟、张德禄等知名学者^[7-8]亦对多模态论进行过深入探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分析框架。多模态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翻译的本质与内涵。

在多模态视域下,翻译不再是单一言语模态的

符号转换,更涉及对声音、图像、动作、颜色等多种非言语模态的符号转换。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言语模态与非言语模态的符号都是具有意义潜势的资源,“每一种符号模态都不仅能够独立表达意义,还与其他符号模态交互生成语篇的整体意义”^[9]。基于多模态语篇的不同类型,Kaindl 认为多模态翻译可以分为模态内翻译(intramodal)和模态间翻译(intermodal)两种转码形式^[10]。模态内翻译,指同一种模态形式之间的转换,例如将一种言语模态转换为另一种言语模态,或是将一种图像模态转换为另一个图像模态。而模态间翻译,则是指不同模态形式的转换,比如将言语模态译为图像模态、动作模态等,反之亦然。概括来说,不论是模态内翻译还是模态间翻译,都是根据不同文化特征及传播场域的差异,最大程度地调动读者的感官,帮助他们去感知和理解文本中各种符号资源,最终实现整体意义的建构与传递。

葛译《山海经》不仅包含语言的文字叙述,还收录了133幅精美绝伦的插图。这种语图互文的多模态文本,能够“充分利用人体的多种感官接收译本所建构的意义”^[11],为目的语读者感知上古神话中奇珍异兽和神妖形象带来更为直观的视觉享受。诚如葛浩文所言,“those illustrations, rather than the text itself, have become the centerpiece of a sometimes historical, sometimes religious, and, happily, always captivating classic”^[12]¹⁵。可见,《山海经》中的插画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与文字符号一样,都具有信息传递、拓展文本意义的重要作用,成为读者解读源文本意义的重要依据。下面将详细分析葛浩文如何在进行模态内翻译的同时,结合图像模态及其与言语模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不同模态符号相互协同,共同建构意义。

2 葛浩文英译《山海经》模态内的意义重构

葛浩文长期深耕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形成了对中西方语言、思维、文化等的独特见解,以及文学翻译场域下特定的“译者惯习”。这种惯习使得他在处理源文本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关系时,形成了动态性、平衡性的意义建构策略。具体而言,在《山海经》的模态内翻译中,一方面,葛浩文坚持保留中国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目的语中建构源语文化的“他性”意义;另一方面,他又兼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以建构符合目的语读者认知水平和期待视野的意义。

2.1 文化负载词的异化

异化倾向于以源语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为中心,突出文本的异质性,常见的翻译方法包括直译、零翻译、音译等。考虑到音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的语音特色,对传播中国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一些机构和学者呼吁使用更准确、更合适的音译来表达中国文化概念。葛浩文也秉持相同的观点,他在译本前言中明确表示“Modern pinyin spellings have been used throughout”^{[12]17}。为此,无论是精怪神兽这类蕴含丰富文化意象的词语,还是山川河流、地名等具有鲜明地域与文化标识的中国文化专有名词,葛浩文都倾向于使用音译,以传达汉语独特的文化内涵。他甚至摒弃“mountain”对应“山”和“river”对应“水”的常规译法,直接采用拼音“shan”和“shui”进行音译,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中山水文化的特质和鲜明底色。葛浩文明白,《山海经》中的各大山川河流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承载了中国上古先民理解、解释和应对整个世界的全部认知、想象和信仰。因此,“shan”和“shui”更能营造出山川河流在源文本中多功能、复合型的文化符号内涵。

在处理汉字同音不同字的现象时,葛浩文还采取了针对性的策略以规避因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而可能引发的理解障碍。以女娲和女娃(精卫的原名)的音译为例,他分别将其译为“Nüwo”和“Nüwa”,确保其译文在跨文化传播情境下的准确性与明晰性,防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混淆与误解。这充分反映了葛浩文在处理汉语特殊语言现象及促进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专业考量与严谨态度,是对读者负责的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葛浩文在传递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核心概念时,甚至保留汉字的表意符号。请看下例:

例 1:

孙译:这些羽毛上还有花纹,头顶上的花纹是“德”字,羽翼上是“义”字,背上“礼”字,胸部是“仁”字,腹部是个“信”字。^{[13]25}

葛译:Its feathers were patterned to represent written characters; on its head a 德 for “virtue”; on each of its wings a 义 for “righteousness”; on its back a 礼 for “courtesy”; on its chest a 仁 for “benevolence”; and on its belly a 信 for “trust”.^{[12]25}

“德”“义”“礼”“仁”“信”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道德观念,葛浩文在此并没有直接采用音译或是寻找英文中完全对应的普通词汇来替换,而是直接保留了汉字,然后再用英文解释相对应汉字所代表的含义。这既原汁原味地向目的语读者介绍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核心概念,增加了葛译文的异国情调,也准确地传达了这些概念背后的文化意义。

2.2 句子结构的重组

一般认为,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现代汉语可以由许多词语组成长短不一的句段,再由这些句段组成“形散神聚”的句子,完全不同于讲究形式联接,成分整齐、严谨的英语句子^[14]。葛浩文深谙汉英句式之差异,英译时常常重新调整语序,化意合为形合,使句子更加符合英语的语言逻辑。请看下例:

例 2:

孙译:平逢山,寸草不生,山中多砂石。这里住着一位叫驺虫的神,它的样子像是人,但却长了两个脑袋。他是所有螯虫的首领,因此这平逢山也就成了蜜蜂聚集的地方。^{[13]156}

葛译:Jiaochong, a strange two-headed, humanlike god that was in control of insects with stingers, lived on Pingfeng shan, a barren, rocky mountain that w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swarms of bees.^{[12]156}

孙译由三个句子构成,先介绍平逢山,继而引出山中所居之神,最后补充平逢山多蜜蜂的缘由。在葛译中,他巧妙地将这三句话整合为一句,以 Jiaochong lived on Pingfeng shan 为句子主干,然后借助同位语“a strange two-headed, humanlike god”,以及定语从句“that was in control of…”和“that was a gathering place…”分别对神的功能属性以及山的特质进行描述。经过结构整合、语序调适之后,葛浩文文化汉语意合为英语形合,使其译文具有较高的逻辑性与可读性,有效保证了汉语言信息与文化内涵在目标语中的精准传递与顺畅接收。

此外,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常常根据人的思维逻辑来构建语序,这种思维逻辑性主要表现为时序上的先后律、空间上的大小律、心理上的重轻律以及事理上的因果律^[15]。请看下例:

孙译:在舜帝陵寝的东边,湘水的南岸,生活着一种叫兕的猛兽。^{[13]271}

葛译:A ferocious animal called a Si lived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Xiang River, just east of the burial site of the legendary ruler Shun.^{[12]271}

从上面的句子对比可以看出,孙译“将舜帝陵寝的东边”作为首要方为参照,再具体到湘水的南岸,在语序上属于“空间大小律”的表达习惯,即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的顺序。英语则更倾向于先锚定具体的位置,再补充相对次要位置。考虑到湘水是一个相对宏大的地理坐标,葛浩文在确立句子的主谓语“animal called a Si lived”后,将介词短语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Xiang River”置于其后,然后再用同位语“just east of the burial site…”提供更精确的定位,使得整个叙事空间结构主次分明,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认知结构。

2.3 文化过滤和改写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必然绕不开文化过滤,即译者往往会根据目的语文化规范对原文进行选择、增删和变形等。葛浩文也不例外,虽然葛浩文希望“能做到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译文的流畅,但很多时候不能两者兼得”^[16]。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沿袭其在现当代文学场域中采取的文化过滤和改写策略。

其一,他删除了孙译本中地域性较强的文化预设。请看下面两例:

例4:

孙译:它的样子像一个倒过来的沙铍。^{[13]80}

葛译:Its shape was that of an overturned skillet.^{[12]80}

例5:

孙译:这种蛇叫起来,不像一般蛇发出的是“嘶嘶”之声,更像是过去更夫在夜色朦胧中敲击木梆发出的声音。^{[13]99}

葛译:Lacking the forked tongue of earthly snakes, it did not announce its presence with a hiss but produced a muffled thud like the late-night sound of a struck wooden clapper.^{[12]99}

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沙铍”是中国家庭使用的一种器皿,用沙土或金属制成,常用来煎药或烧水,形状像比较高的壶,口大有盖,旁边有柄。考虑到西方读者不了解这一器具用途和形状,葛浩文以西方家庭常见的平底锅为认知参照,将其译为“skillet”,帮助目的语读者重新构建产生相似的视觉联想意义。“更夫”是中国古时民间巡夜的人,他们每天夜里通过敲打竹梆子或锣来报时,具有较强的文化性。如果直接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可能会使读者产生困惑,或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为此,葛浩文在翻译时略去这一文化负载词,只聚焦于句子核心描述的声音部分,让读者直接捕捉到蛇的叫声与某种特定敲击声的相似性。可见,无论是替代还是略去不译,葛浩文都旨在帮助目的语读者顺利进入文本的认知语境,避免因文化隔阂造成的理解障碍。

其二,省略语内译者增加的文化性较强的评注信息。以“夸父逐日”和“刑天舞干戚”的神话传说为例,孙见坤、陈丝雨补充了较多的文化信息,如引

用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诗歌,以示对夸父奋斗不止的精神和气节的赞美;也引用了大量的诗句、典故成语来赞美刑天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些补充信息,葛浩文并未一一译出,而是摘其大意,指出“Kuaifu was a popular figure in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mentioned often for his benevolent act in the service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memorized in verse by poets as celebrated as Tao Yuanming. His legacy was one of a minister who retains his loyalty and high-minded attitude even in the face of failure”^{[12]237}。他更是将刑天执着的精神简化为一句话“In centuries that followed, Xingtian was memorialized by poets, his heroic, unyielding spirit held up as a model”^{[12]217}。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孙译本传递的思想内核,也点明了这些神话人物故事所蕴含的深刻文化性。

3 葛浩文英译《山海经》模态间的意义协同

根据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理论,语言和视觉传达都可以用来实现构成我们文化的“相同的”基本意义系统^[17]。因此,图文关系一直是多模态研究的重要方面,言语模态与图像模态之间的意义协同是翻译研究的关键问题。在《山海经》的模态间翻译中,葛浩文常常结合图像提供的视觉信息,考察文字模态与图像模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意义是否被有效再现。为此,他会有意识地关注视觉模态与言语模态之间相互阐释、印证的逻辑关系,并通过一些策略以实现上古神兽形象跨文化、跨模态意义的准确传递。

3.1 按图释义、锚定语义

“按图释义、锚定语义”可以理解为以视觉线索为锚,将原文的模糊语义转化为译文的显性指称。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文本意义的模糊性、开放性和可协商性。在这种情况下,图画的直观性和在场感恰好能弥补语言的抽象性,为译者提供锚定语义的客观依据。葛浩文作为译者,往往根据插画中各种神兽不同形态的细节元素,深入理解和重构原文中图文模态所传递的深层意义。这一翻译实践机制恰与 Martinec 和 Salway 所提出的图文逻辑语义关系,即详述(elaboration)、延伸(extension)和增强(enhancement)^[18]有着一定的契合度。下面以葛浩文对“牛”的翻译为例作进一步阐释(见表1)。

在奇异诡谲的《山海经》描绘的世界中,虬、狮和夔三种神兽都具有牛的某些外形特征。孙见坤保留了《山海经》源文本的语义模糊性,只介绍了它们

“其状如牛”的共性特征,而未进一步交代它们具体属于何种形态的牛。通过对比图 1、图 2 和图 3 可以发现,葛浩文在英译时,对“牛”的指称意义进行了具象化处理:他将紃的形状描述为“ox(公牛)”,将獬的形状描述为“the Central Asian yak(中亚牦牛)”,而将夔的形状解读为“cow”,与插画中神兽的形态形成图互文的效果。图 1 紃的头部犄角弯曲

程度相对较小,且相对较短,符合公牛的头部特征;图 2 獬的头部犄角从头部两侧向外、向上弯曲生长,且身体前部隐约覆盖着长毛,很贴合牦牛的形态特征;而图 3 夔的头部没有明显的犄角且耳朵下垂,与奶牛的外形更为相似。这种按图释义的模式间翻译既有效地抑制了语言符号的多义性,也提升了目的语读者对神兽形象的认知。

表 1 葛浩文按图释义对“牛”的翻译

神兽名	孙译	葛译
紃	它的形体像牛,叫声也像牛。 ^{[13]8}	The Lu had the horned head and bellowing voice of an ox. ^{[12]8}
獬	……样子像一头牛,但少了一只脚。 ^{[13]124}	The shaggy-haired, horned Yuan, a slimmed-down vers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yak, ...With two legs in front and only one in the rear ... ^{[12]124}
夔	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 ^{[13]320}	Though it had the body of a cow, the Kui had no horns and only one leg. ^{[12]320}



图 1 紃



图 2 獬



图 3 夔

可见,葛浩文基于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互文互释,对孙译本进行了创造性的意义重构。他依据插画中神兽的细节形态特征,为文本添加了新的信息成分,实现了对孙译本中模糊所指更加清晰明确的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延伸”与“增强”两种逻辑语义关系协同运作的结果,彰显了其对延展与强化文本语义的功用。

3.2 据图补义、完善细节

“据图补义、完善细节”可以理解为通过图像中的视觉线索,补充、完善或解释语言符号的未尽之意。《山海经》最早是“以图言说”的,全文文字简短,对神兽外形的描述往往也不够充分。虽然孙见坤的语内翻译增添了对神兽外形的部分细节说明,但读者仍不易窥其全貌。在这种情况下,插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表意模态,其提供的丰富视觉线索,如神兽特定的身体部位、毛发纹理、姿态等,为葛浩文确立神兽形象提供了关键的认知依据。他利用图文间“详述”与“增强”的逻辑语义关系,主动在译文中增加细节描写(见图 2),提高目的语读者对上古神兽

的认知度和理解度。

从孙译和葛译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对神兽外形的描述不是一一对应的,且后者比前者的说明更为详细,与插画的契合度也更高。在描写猾褊时,孙译只说其浑身长满猪鬃,而葛浩文依据插画(见图 4)的视觉细节,对猪鬃的形态进行了补充——“braided and festooned with foraged gemstones”,极大地丰富了“猪鬃”的具体形态。在翻译颙(见图 5)的特征时,他除了保留其“two sets of eyes and human ears”的特征,还增加了“three menacing feet with razor-sharp claws”这一新信息,补全颙的整体形象,使图文意义得以协同共建。不仅如此,图像模态还为葛浩文提供了修正性翻译的依据。在描述肥虫遗(见图 6)的特征时,他将“丰满的羽翼”译为“small wings”。这看似误译,实则是葛浩文在目的语文化中对模态间意义重构的大胆决策。“small”一词的选用不仅突出了《山海经》中神兽“不可名状”的怪异特质,也保证了图文信息在目的语读者眼中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表2 葛浩文据图补义的部分翻译

神兽名	孙译	葛译
猾褢	它身形似人,但全身长满了猪鬃。 ^{[13]21}	It had the body of a tree-dwelling mammal and was covered from head to toe with pig bristles that were braided and festooned with foraged gemstones. ^{[12]21}
颙	……却有一张长着四只眼睛的人脸,还有人的耳朵。 ^{[13]29}	Two sets of eyes and human ears drew the gaze away from three menacing feet with razor-sharp claws. ^{[12]29}
肥虫遗	……名叫肥虫遗。蛇是没有脚的,它却长着六只脚,还有四只丰满的羽翼。 ^{[13]36}	The ancient Feiwei, however, had six feet. They were augmented by four small wings clustered just behind its ferocious head. ^{[12]36}



图4 猾褢



图5 颙



图6 肥虫遗

从葛浩文的模态间翻译可以看出,他通过视觉模态的线索,适当地增补、完善信息,使其译本文字与插画之间呈现出详述、延伸和增强的逻辑语义关系。这种做法不仅实现了对神兽形象的精准勾勒,还强化了文字文本与图像之间互释互构的动态关系,实现了跨符号模态的意义协商与重构。可见,在多模态的文本转换中,源多模态文本与目标多模态文本之间并非单一模态的对应,而是呈现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互动。译者也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者”,而成为“多模态意义协调者”,积极促成源文本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重构。

4 结论

以多模态理论为指导,文章系统考察了葛浩文译介《山海经》时,在模态内翻译与模态间翻译中使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它们对重构文本意义的协同作用。在模态内翻译中,葛浩文通过异化策略保留中国文化专有的语言特质,借助句子结构重组实现汉英语序的逻辑调适,以及通过文化过滤平衡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有效实现了不同语言文化差异下的意义建构。在模态间翻译中,葛浩文利用语图互文的逻辑语义关系,通过锚定语义和增补细节等方法,实现了语图协同意义的建构。

随着信息化和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模态

已经成为意义表达、阐释与接受的基本特征”^[19],“由单一的纯文本翻译模式转向多模态传播模式”^[20]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多模态视角下的翻译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输出过程,而是跨模态意义重构过程,强调语言、图像等符号资源在共享文化意义潜势基础上的协同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影响力,顺应了当下多元互动、多模态协同的传播生态。因此,译者需要探索除言语模态之外,其他模态符号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构建与转换,从而有效激活中国文化在异语文化语境中的动态传播机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可感知、可互动的对话交流。

参考文献:

[1] 许钧. 关于翻译的新思考[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61.

[2] 梁林歆,王迪.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文化典籍复译中的知识建构——以《山海经》英译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6):31-36,110.

[3] KRESS G,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M]. London:Edward Arnold,2001:20.

[4] BAKER M. SALDANHA G.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9.

- [5]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3r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6] KRESS G.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24.
- [7]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1): 1-10.
- [8]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 中国外语, 2009(1): 24-30.
- [9] 牟宜武. 多模态翻译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08-25(5).
- [10] KAINDL K. *Multimodality and Translation* [M]. // Millan C, BARTRINA F.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61.
- [11] 林琳, 周桂君. 《庄子》多模态译本中视觉资源的意义建构[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3): 74-79.
- [12] HOWARD G. *Fantastic Creatur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s* [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21.
- [13] 孙见坤, 陈丝雨. 山海经[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14] 刘必庆. 新编英汉对比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199.
- [15]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 257-273.
- [16]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 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2(1): 57-60.
- [17] 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9.
- [18] MARTINEC R, SALWAY A. A system for image-text relations in new (and old)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J]. 2005(4): 337-371.
- [19] 吴濂. 媒介转向下的多模态翻译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1): 115-123.
- [20] 姜智芹, 鹿佳妮.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提升路径[J]. 外国语文, 2025(4): 1-14.

(上接第 54 页)通过区块链等技术记录跨区域合作贡献,建立基于数据透明的按技术投入、资源贡献比例分成等的收益分配模型,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参考文献:

- [1] 徐明. 中国省际合作帮扶政策的经济效应——对 21 世纪“19 省市对口援疆大型区域扶贫项目”的评估[J]. 经济学, 2023, 23(3): 1202-1224.
- [2] 李瑞昌. 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的保障机制[J]. 学海, 2017(4): 54-59.
- [3] MOLINA A, BREMER C F, EVERSHEIM W. Achieving critical mass: A global research network in systems engineering[J]. *Foresight*, 2001, 3(1): 59-65.
- [4] DAVIDOVIC S. Systemic erythropoietin and its role in diabetic retinopathy[J]. *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2013, 54(15): 35-67.
- [5] VAKOLA M, WILSON I E. The challenge of virtual organisation: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dealing with constant change[J]. *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2004, 10(5/6): 112-120.
- [6] NICOLAI J F. *Towards a 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Firm* [J]. Routledge, 1996(1): 90-141.
- [7] 谢丽彬, 高鹏怀, 徐国立. 数字新基建对制造业虚拟集聚的影响[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5(3): 21-26.
- [8] 王能.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虚拟产业集群演进研究[J]. 经济问题, 2011(3): 66-69.
- [9] 庞俊亭, 游达明. 我国区域产业经济发展风险规避路径研究——基于虚拟产业集群视角[J]. 经济地理, 2011(5): 805-809.
- [10] 黄昕怡. 制造业虚拟产业集群内合作技术创新风险评估研究[D]. 长沙: 长沙理工大学, 2022.
- [11] 李尧. 制造业虚拟产业集群中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激励[D]. 长沙: 长沙理工大学, 2021.
- [12] 王媛玉, 赵儒煜. 虚拟与地理双重集聚视角下区域空间演化动力机制研究[J]. 开发研究, 2025(2): 1-10.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提升策略

曲欣欣*, 孙 超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立足“权威与信服”建强教学内容、“感染与吸引”创新教学方法、“认同与追随”提升教师品格、“人文与化人”优化教学场景、“感悟与践行”抓好教学延伸,多维度探讨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亲和力的有效路径,推进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亲和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92-06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Affinity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QU Xinxin*, SUN cha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Anhui)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 Based on “authority and conviction” to enrich our teaching content, “appeal and attraction” to innovate our teaching methods, “identification and following” to promote our teachers’ character and morals, “humanities and civilization” to optimize our teaching scene, and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our teaching content exten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better realiz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goals and help students in growing into a talent, it can find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new generations featuring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s and labor education to carry on the socialist caus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ffinity; improving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亲和力”源于化学学科中一个概念,指两种及以上物质在结合时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力^[2]。延伸到其他学科,表达为物体或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吸引,或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感染、凝聚、感召等。如在社会学领域,表现为个体在交往时自然亲近感与亲和力;在传播学领域,表现为传播者对受

传者展现的信服感与吸引力。近年来,“亲和力”的有关内涵延伸应用到教育学领域,意指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助于个体之间亲近与结合的某种力量,比如“感染、凝聚、吸引、感召”等^[3]。教育的实施需要有个体的交往,也需要有信息的传递,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在互动基础上实现信息传递、观点渗透与获得理解的过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交往关系,影响到交往信息与情感的传递、彼此间信任感的建立,进而影响到交往的效果与质量。

收稿日期:2025-06-2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2023ausxm002);安徽农业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年度招标课题(ZX2024YB03)。

作者简介:曲欣欣(1982-),女,安徽涡阳人,副教授,硕士。E-mail:984610677@qq.com

思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其工作基础在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立足于教育实施的师生双方,基于思政教育实施的一般规律与主要环节,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品格、教学场景、教学延伸等环节,探寻改革提升高校思政课亲和力的有效举措。

1 权威与信服:教学内容中的亲和力

教学内容是教材内容的转化,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载体,是教育主客体之间交流、交往的纽带。思政课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思政课也天然具有了科学性。但课程自带的科学性并不能在课堂上自发释放出来,离不开思政老师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围绕授课对象与内容所进行的教学设计。

1.1 要维护权威性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学生一旦真切感受到所学内容的科学性,其对课程的信任与依赖必然形成,课程的亲和力也就自然具有。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源自其真理性。所谓真理性,也是思政课的“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5]对于思政课老师而言,既要学透悟透,更要坚信不疑,要理解这个“道”并将其作为彰显教学内容权威的关键。要带着信念学,主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尤其要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政治自觉并转化为外在教学自觉。要带着信仰讲,以坚定信念、扎实态度和有效方法讲好每一堂课、分析好每个观点,向学生传达权威观点、播种信念种子,让学生通过课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感悟真理力量。还要充满自信引导,思政老师除了自己下足真功夫,也要给学生做表率、带好头,由内而外真信、真教、真用,向学生展现其对理论知识的不懈追求、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拥护,通过“教中学、学中教”的双向互动让学生近距离感悟真理的力量,不断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激情和捍卫信仰的决心。

1.2 要凸显解释力

教学内容联结着“教”与“学”这两个主体。内容的权威性除自身真理性外,能解释什么、如何解释也是其中关键因素,关乎如何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个解释力指向的是教学内容对学生所显现的政治性、科学性、价值力,能解释学生困惑、回答学生问题、引领学生追求。通过教学内容所释放的解释力,形成思

政课的亲和力与吸引力,对思政课铸魂育人目标实现具有直接影响。在教学内容设计时,要坚持问题导向,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主题话题的特色、风格、气派进行有效统筹,与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热点关切以及学生思想与现实问题相衔接,把“立德”和“树人”有机整合起来^[6],让学生在读懂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让学生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回答中国当下时代问题的思维与价值优势,在理性思考中正确对待有关现象与问题、有效辨明大是大非,在批判假恶丑中弘扬真善美,坚定自立、自信、自强,帮助大学生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以及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3 要增强贴近性

思政课是育人的课堂,必然要以学生为中心。只有贴近学生才能赢得学生,让学生在信服认可中受教育。思政课要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也是让思政课讲授过程“活”起来的关键。教学内容要贴近当下大学生所处的时代,与大学生所生存、所知所感的时代紧密结合,在深度观照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脉搏中感知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变化;要将基本原理、创新理论与生动实践相结合,在原理、理论中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色,将理论问题与时代问题相结合,引导广大大学生在如何看待、如何解决时代问题过程中看到原理、理论的真理力量;要通过时代性来拓展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既让教学内容与时代热点相结合,也让学生在思政课堂上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而提升课堂的吸引力。除了贴近时代,还要靠近学生。在关注回应时代“大问题”“大事件”的同时,也要关照关切学生的“小问题”“小事件”,由此让学生在身边事中得到教育与成长,让思政课堂成为学生成长发展的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认知上的空白、生活上的困难,让学生能够真实、真切并及时感到学有所获,进而从内心深处形成对思政课强烈的亲近感,从被动灌输变为主动学习。

2 感染与吸引:教学方法中的亲和力

教学方法承载着教学内容,是将教学内容由授体传授给受体的手段与桥梁。对于任何一门课程而言,教学方法都是提升课堂亲和力的重要条件。思政课是公共必修课,所传授的是原理与道理,所培养的是人生观、世界观等。相较于其他课程,一些大学生可能会觉得思政课程不够接地气,实用性难把握,

学习起来会枯燥。对于思政课堂而言,其对教学手段方法方面的改革与创新要求会更加突出。

2.1 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个体属于高校思政课亲和力建设的重要逻辑范畴^[7]。思政课的实效直接体现在学生的真实认可上。关注学生主体需求,也是推进思政课内涵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每个大学生都不是抽象的个体,是可观察且处于发展之中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教学中要尊重他们的认知规律,研究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接受方式。当下大学生更加开放、独立、自我、自信,更加在意个性化的价值表达与自我实现。同时还要看到他们也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压力,更容易出现自我颓废、丧失人生目标的问题^[9],也可能会滋生消失前进动力和人生理想的无意义感。要认真研究每一届大学生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学习习惯,尽可能多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与性格,把握其行为特征与价值取向及其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密切关联性,深入了解发展诉求,摸清楚对于思政课的期待,进而采取他们乐接受、易亲近的教学方式,以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让思政课在贴近学生中更好地围绕、关照和服务学生,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教学方法上做到尊重学生,也会增强其对教学内容的认同度,提升课程的亲和力,提高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2.2 要提升讲授的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0]调研显示,课堂教学方面存在的教学手段待丰富、教学艺术待创新、存在“灌输式”倾向、师生情感交流不足等问题,成为影响思政课堂教学亲和力的重要因素^[11]。有吸引力的讲授方式有助于提升教学内容的穿透力、提高课堂教学的亲和力。要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思政课堂上一成不变的主、客体关系,推动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双向转变,实现课堂翻转、讲授互换。要善于采取启发式、互动式等能够让学生更多参与课堂的教学方式方法,让学生参与教学内容建构与课堂教学实施,并在此过程中引导实现师生“深度对话”。“深度对话”让教师不再是知识唯一传授者,而是与学生共同的知识建构者,尊重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思考,具有重新建构、生成意义的功能^[12]。通过师生之间的深度对话,学生在教师引导下深入思考与探索,不仅获得和吸收来自教师传授的知识信息,更唤起自己的既有观点,也增添新的思想。这种自我建构式教育,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13],让教育不仅是外在施压,更

多来自学生内在的思维自觉和行为主动。

2.3 要强化语言的感染力

教师通过语言打动学生心灵^[14]。人与人之间交互交往的最主要途径是语言。语言相通了,情感上沟通会更容易,思想上联结也会更畅通。“有意义”“有亲和力”的思政课,离不开“有意思”语言的支撑。思政教师要不断锤炼有自己特色的、符合对象特征的有亲和力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这需要老师将理论要点与书面话语在吸收理解基础上进行对象化、学生化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理论要接地气,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理变成基本道理,让根本方法变成管用方法^[15]。思政老师要有用小切口讲大道理的本领,善于将抽象理论转化为通俗的道理、常识,能够将晦涩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易懂的大众话、口语话,更要善于将知识点、理论点提炼为学生喜爱的“金句”。还要善于用艺术化方式表达规范化的语言。艺术化的语言能给学生带来听觉上的享受,更能让学生沉浸于思政课堂。可以采取借代、双关等修辞手法表达,再辅以积极向上的故事案例、轶事趣闻、背景花絮、网络热词等为支撑,让课堂讲授过程“有意思”,让学生易记忆、乐接受。也可发挥语调的力量,灵活运用或高低轻重或抑扬顿挫等多种语调,提升课堂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3 认同与追随:教师品格中的亲和力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实施者,主导着课堂教学,引导着学生学习,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引路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有人格,才有吸引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16]人格魅力是吸引他人的力量,包含性格、气质、能力、道德等方面^[17]。思政课对学生吸引,学生对思政课认可,都离不开对思政课老师的认同与追随。思政课老师所拥有的人格魅力、学术魅力,有助于感染并赢得学生,让课堂有凝聚力,让思政教育有亲和力。

3.1 要以深厚学识影响

讲信仰的人,自己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信仰来自真学、真懂、真信。作为思政课教师,信仰、理想要坚定,要尊重思政教育、尊重思政课,将其当成神圣的事业,将其当作影响大学生一生的关键课程来对待,时刻保持对思政课的执着与激情。要注意加强自身学习与提升,不断丰富理论与知识储备,时刻关注学科专业的发展进展与学术动向,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及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系统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

义文化。还要注重展示在理论学习熏陶中所形成的正向积极的思想观念、志向追求与兴趣爱好等,让理论光芒结合个人魅力实现交互释放,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吸引力与亲和力,进而加持和放大所讲授理论的可信度。思政老师要以深厚的理论学识引领思政课教学全过程,特别要注重在与学生互动中彰显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与科学的价值导向,不断营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思政课话语生态,在学生中形成强烈的正能量思政影响圈,促进思政课话语亲和力的提升。

3.2 要以端正品格吸引

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够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8]。对于思政老师而言,品格魅力是其与学生交往的重要保障。个体优秀的品格能让老师在言传的同时产生强烈的身教和示范作用,这个效果有时会超越理论说教说服的效果。为人要正直,从事立德树人工作的思政课老师有着严格的职业标准,为人品格应当更正直。思政老师要时刻注重养成并维护这一优秀的品质,并将其体现在与学生日常的交往之中,比如对一些不良现象及时斗争、对学生失当行为有效纠正、对事关学生利益公正处理等方面。除了内在品质,思政老师也要注重自己的外在气质,要内外兼修、言行一致,注重培育优雅的形象,着装要朴素端庄大方,待人态度要亲和友善,善于利用表情、眼神等肢体语言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注重在小事小节上体现大志趣、大品格。锤炼思政课教师的优秀品格,要严格执行教师准入制,要在政治方向、道德素养、学科背景、业务能力、职业操守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要把准入筛查贯穿思政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实施全程考核、全程把关,不合格的要果断处理、及时清除。

3.3 要以真诚关怀温暖

除了理论知识传授,有效的思政教育更需要情感上的交互,用真诚关爱打开学生心扉。思政教师要强化人文关怀意识,将关心关怀行为融入思政课堂内外,将理念讲授与困难解决统筹起来,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建立起基于情感沟通、真心交流的新纽带。要配合学校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咨询、压力释放等关怀机制与场所,以有效方式掌握并化解学生心理问题、实际困难,让学生有了困惑困难愿意找教师倾诉、能够在学校化解,信任学校的管理服务,认可老师的教育引导。要激发同学间相互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意识,强化学生集体建设,让学生有集体意识、能感知集体温暖,能够在集体中学会成长、得到鼓励。要保持对学生思想困惑的关注,有效解

答并正确引导学生思想与行为,让思政课走进学生,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浸润学生心田,用系统的理论体系说服学生、引领学生,帮助学生确立崇高的精神追求,养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真诚关爱会让人感受到温暖,而通过思政课堂将关心关爱投射到学生心灵深处,会让学生通过学习感受到心灵上的慰藉、产生情感上的体验,形成对思政老师的信任与肯定,产生对思政课程的亲近与认同。

4 人文与化人:教学场景中的亲和力

教学场景虽不直接传递思政理论与知识,但也是思政教学活动有效实施的条件与保障。思政教育要影响人、塑造人,除日常显性教育外,教学场景所发挥的隐性教育作用也不能忽视。富有亲和力的教学场景,会对学生产生强化认知、感染内心、渲染情感、规训行为等方面的作用,会潜移默化地对教育对象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强教学场景的亲和力建设,有助于更好发挥场景的隐性教育功能。

4.1 要布局科学化的课堂

课堂是直接传播知识的场所。布局科学的课堂会产生隐性教育。这是一种具有感染与渗透特征的教育,它能让思政教育落实在无形之中。课堂教学设施配备、采光通风温度、讲授氛围、师生关系等都会对学生学习产生一定影响。另外,班级规模、座位排列方式等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小规模班级将更有利于师生之间亲密且充分交流,启发式、互动式的翻转课堂对座位排列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采取马蹄式、同心圆等形式,将给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更好讨论创设更具亲和力的课堂环境。这些因素如果布局科学必然激发学生学习欲望、促进师生彼此启发,提升思考的敏捷性与准确度,使得教与学效果双增长。相比科学有序的思政课堂场景,如果教室内灯光昏暗、设施杂乱无序、垃圾随处可见,学生入座随心所欲,课堂纪律松散,没有“抬头”更没有“点头”。如此场景所发挥的必然是负面隐性教育,不仅让老师理论讲授无法有效传递至学生,还会对其他同学产生负面情绪感染,让他们难以认真听讲、潜心思考,还会对老师授课心情产生负面作用,使其找不到上课的成就感,师生共建课堂的效果无法实现,思政课吸引力、亲和力必然大打折扣。

4.2 要创建人文化的校园

在教学场景中,校园对大学生有着深远影响。校园所承载的文化如同无形的教育者,在大学生求学时光里多维度、全方位助力学生成长。保罗·谢巴特曾说,文化就是建筑的产物^[19]。要发掘学校各

类建筑物的历史底蕴,既要找到建筑美学价值,也要赋予文化内涵,让美学育人与文化育人相统一。精神需要是人之根本,是文化的重要内涵^[20]。要提炼并弘扬学校的精神,加强体现学校底蕴和办学特色的精神环境塑造,可将一些历史故事、教学特色、办学成就进行艺术化加工,让学生可看可感可思;也可通过唱校歌、戴校徽等形式,让大学精神时刻伴随学生、随时影响心灵,让学校优良传统在学子传承中发挥隐性教育作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还可以增加绿地、树木、花草、雕塑等,让校园美起来,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当学生置身文化氛围浓郁的校园中,会自觉生发出强烈的归属感,也会对学校的教育行为产生自觉的认同感,能够将思政教育所要传递的信念信仰、道德规范、行为品质等慢慢沉淀到学生心中、落实到言行中。

4.3 要进入泛在化的场域

当下的青年大学生因网络而生存与成长。在网络空间中如何让思政课与大学生建立起较为亲密的交往关系,也是提高思政教育亲和力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思政工作活起来^[21]。要注重加大网络空间正能量信息供给,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主题宣传,加大制发有吸引力、有思政育人功效的优秀网络文化作品。思政老师要积极上网,主动进入青年大学生的网络空间和活动圈群,运用相关新媒体平台,定期推送思政资源,积极开展互动,以有效的键对键互动赢得心与心的交流,让有情感的交流互动进入泛在化的网络场域,让思政课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与学生网络行为同步。积极推动“互联网+”教学方法创新,以“数字思政”整合、转化各类思政教育资源^[22],让传统教学与现代技术有机衔接,不断提升思政课吸引力。打造学生喜爱的师生互动网络社区,建好用好学校各类在线服务平台与网站,延伸学校教育功能,让教学场景拓展到各类网络空间、覆盖到学生网络行为上,让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外也能够感受、感悟到思政教育,让思政教育内容多维度流入学生内心深处、影响至精神世界。

5 感悟与践行:教学延伸中的亲和力

每个人都生存在社会中,社会也是个体成长的大课堂。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既可以辅助校内思政课的开展,也可以延伸学校思政教育的实施。要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加强思政课堂所学、印证思政老师所讲,深度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细致践行课堂所学所

思,让大学生感受超越课堂的更深体验、超越理论知识的全新收获,让思政课的吸引力与亲和力随着实践拓展而不断延伸。

5.1 引领学生在实践中感悟

多样的校外实践是高校与社会对接与整合的有效载体。深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积极创设各类“第二课堂”,让更多课堂外元素参与到思政教育中,打通高校与社会的“最后一公里”。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开展各类“田野”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将理论所学运用于实践,亲身体验、深入感悟,切实体会到理论的有效性与应用性,不断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可以带领大学生寻访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亲身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魅力和人民情怀,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可以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参观红色文化纪念馆、瞻仰伟人故居等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感悟党的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可以组织参观孔庙、古镇、名人故居等名胜古迹,让学生体验与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还可以利用博物馆、纪念馆、教育基地等公共资源,让学生重温历史、缅怀先烈、接受教育,让大学生沉浸式思考书本上的知识,以社会大课堂的深切体会促进思政小课堂的深刻领悟,让理论在践行中更富亲和力与吸引力。

5.2 规训学生在言行中笃定

思政课是讲道理,要让学生明白道理,更要让学生遵从道理。要引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更要在实践中践行,学习与实践一体化、理论与言行一致化。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全社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以自己所学所悟和所行,积极参与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宣讲,助推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和社会正能量建设,助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创建的示范者、引领者。同时也要敢于澄清、纠正错误的舆论观点,时刻警惕、抵制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各类不良思潮,主动参与规范和整治各种不当言论、不良现象,自觉抵制和主动斗争各类错误价值观念,坚决避免其向校园环境渗透。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通过自己的言行宣传理论、践行理论,能够让教学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衔接,把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社会环境有机融合,让理论、道理“能接地气”和“有人情味”,既让广大大学生在学理层面能学明白,也让学生回归社会后回溯理论时更能悟明白,有更好收获、有更好践行,实现学有所用、用有所得,有成就感和自信心,增强对理论的信任与坚定。

5.3 指引学生在坚定中自信

信任是可亲的前提。思政课的根本属性是意识形态性,功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促成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23]。当代大学生处于“两个大局”“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中,其心态和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更多“平视”世界,看问题“参照系”多元多样。思政课的意识形态需要“灌输”,但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更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探索、自我思考、自我启发,进而水到渠成形成自己的认知与判断。思政课要通过理论教育让学生有坚定的政治自觉、科学的人生定位,更要通过社会实践感悟,找到时代方位及其赋予的时代使命,让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目标与大学生成长成才诉求实现“内在融合”。可遴选或组建一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及沉浸式、交互式实践体验基地,定期让学生进入实践教学基地,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实践、体验等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聚焦服务“国之大者”,以小我融入大我,找准“小切口”展开“大纵深”,把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战略部署,精准锚定人生的发展方向、成长方向,不断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在实践中拉近学生与思政课的距离,让思政课程更有亲和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1).
- [2] 陶志琼. 幼儿教师亲和力的基本要求与培养途径[J]. 学前教育研究,2010(10):46-48.
- [3] 李春. 新时期高校德育亲和力研究[D].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9.
- [6] 龙献忠,刘绍云.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话语亲和力:系统构成、现实检视与提升路径[J]. 大学教育科学,2023(3):32-41.
- [7] 胡艺华. 以“四个结合”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8):50-53.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9] 赵会利. “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22):37-38.
- [10]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2022-04-26(1).
- [11] 祝永秋,徐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亲和力刍议[J]. 惠州学院学报,2022(5):104-109.
- [12] 钟启泉. 社会建构主义:在对话与合作中学习[J]. 上海教育,2001(7):45-48.
- [13] 肖巍,钟玉晨. 内涵式发展视域下思政课教学的五重结构模式探索[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3,9(2):82-92.
- [14] 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M]. 杜殿坤,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57.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0.
- [16]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5.
- [17] 王宇航. 浅析教师人格魅力与师生沟通的关系[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3):24-27.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5.
- [19] 卡斯腾·哈里斯. 建筑的功能[M]. 申嘉,陈朝晖,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8.
- [20] 包庆德. 评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111-117.
- [21]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 (2016-12-08)[2024-03-2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208/c1024-28935841.html>.
- [22] 冯刚,聂小雄. “数字思政”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和实践运用[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1-11.
- [23] 陈锡喜,刘奎.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质、功能及其实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6):100-107.

价值、困境与优化路径：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研究

刘笑*, 苏绍会

(蚌埠学院 体育教学部,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采用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通过剖析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价值,分析其困境,最后提出优化路径。研究指出,通过构建文化调适机制,推动民俗体育在高校教育场域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可持续发展;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人文传承+科技创新”的课程建设新模式;创新场域融合模式,实现民俗体育课程的可持续推广;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实现民俗体育课程的智能化、科学化发展;打造生态化发展平台,推动民俗体育从地域性遗产升华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体育文化符号。总之,通过创新民俗体育项目融入体育课程的形式和方法,最终促进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

关键词:民俗体育;高校体育课程;文化传承;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098-05

Value,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Integration of Folk Sports into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LIU Xiao*, SU Shao-hui

(Department of P. E. Teaching,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By combining specula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analyzed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folk sports into college sports courses in this paper, and analyzed its dilemma, and finally proposed an optimization path. The study pointed out tha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debugging mechanism,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in the field of college education can be promo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form a new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model of “humanistic inheritance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novating the field integration model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promotion of folk sports courses; constructing a pluralistic evaluation system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courses; Creating a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sublimation of folk sports from a regional heritage to a symbol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with world influence. In conclusion, by innovating the form and method of integrating folk sports in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t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sports into college sports at last.

Key words: folk sports;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cultural inheritance; optimized path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为学校和地方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1]。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产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生动映射^[2-5]。然而,随

收稿日期:2025-03-1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23SK08);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23jyxm0824)。

作者简介:刘笑(1994-),男,安徽寿县人,讲师,硕士。E-mail:604597580@qq.com

着文化全球化发展,西方体育文化的入侵,民俗体育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阵地,把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是文化发展所需、国家文化强盛必需。本研究首先剖析了民俗体育文化的独特价值;其次,分析当前民俗体育文化在高校发展面临的困境;最后,论证民俗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优化路径。本研究旨在为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提供参考,并为开发高校体育课程资源提供借鉴。

1 民俗体育价值

1.1 整体性健身价值

民俗体育是民间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传的与健身、娱乐、竞技、表演有关的活动形式,依赖民俗节日发展^[6-10]。民俗体育以其独特的健身价值,成为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竞技,追求体育运动中不断的身心超越。而中方民俗体育等追求的体育文化,则更注重全身的协调发展,强调通过运动达到健身养生和身心协调发展的目的。例如,凤阳花鼓灯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俗体育项目,其动作柔美,注重动作与音律的协调,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等能力。除此之外,民俗体育具有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内容,如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这些项目不仅体现个人力量素质、协调素质和耐力素质的重要性,更加注重个人能力在团队里的配合作用。它们强调“和合共生”的集体主义精神;以竞技形式传递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它们始终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成为代际传承的文化基因。因此,将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可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提升教学质量。一方面,民俗体育项目的引入可以增加体育课程的多样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另一方面,民俗体育项目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体育精神,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此外,将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不仅能够丰富课程内容,增加学生的运动选择,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预防运动损伤,为终身体育打下坚实基础。

1.2 课程思政价值

民俗体育与民风民俗相辉映,彰显民众团结友爱、热爱生活、国富民欢的爱国之情。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庆典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传统性、生活化

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8-14]民俗体育的形成,融入了老百姓的深厚情感,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情感表现,能够很好的激发参与者的激情,迸发强烈的民族团结情感。战乱年代,节日庆典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平年代,节日庆典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国强民安,国富民欢,目睹美好生活的场景,油然而产生爱国之情。当代青年大学生生长在和平幸福的年代,学校应利用民俗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庆祝和庆典活动的情感表达融入爱国情感教育。爱国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大学生就学期间应努力学习为人之道和理论知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例如舞龙舞狮体现团结协作、摔跤、拔河、龙舟竞渡等,能够锻炼学生的意志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民俗体育活动可以引导学生理解民俗体育背后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树立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故将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不仅能够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而且民俗体育的融入还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他们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奠定基础。

1.3 文化传承价值

中西方体育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所不同,西方体育文化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个人中心”“崇尚竞争”;中国体育文化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恪守中道”。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蕴含着人生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及社会审美观,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承载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培养人们的集体荣誉感、勇敢、顽强精神及引导人们怀念先祖、不忘辛劳。中国民俗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对比,其具有“和合共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含有族群认同与社会和谐精神,能够充分彰显民族自豪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将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通过参与民俗体育活动,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5][16]}。同时,民俗体育的融入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为他们成为具有

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奠定基础。

2 民俗体育文化现存困境

2.1 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民俗体育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现代化的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在高校体育课程中融入民俗体育,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的困境。民俗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观、审美观念和行方式与现代文化存在差异。现代文化强调个性、自由和竞争,与民俗体育强调的集体、和谐和合作存在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可能导致学生对民俗体育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其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融入效果。

2.2 民俗体育传承人流失,师资力量不足

民俗体育的传承人流失是当前面临的一大困境。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变迁,许多民俗体育项目的传承人逐渐减少,导致这些项目的传承和发展面临困境。在高校体育课程中融入民俗体育,也面临着传承人流失的问题。一方面,由于高校体育课程对民俗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相关师资力量的缺乏;另一方面,由于传承人年龄偏大、生活压力等原因,他们可能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俗体育的传承和发展中。这种传承人流失的现象可能导致民俗体育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融入效果受到影响。其次,民俗体育项目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进行教学和指导。民俗体育师资力量不足与当下教学架构错位有直接关系,当下体育文化内核及民俗体育地域化特点存在冲突。再者,民俗体育在师资培养过程中,“守艺”和“创新”理念存在断层,导致技艺的削弱和丢失,从而进一步导致高校缺乏具备民俗体育项目教学经验的师资力量。最后,社会对民俗体育传承“陈旧”观念的刻板认知,限制了民俗体育项目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融入程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校需要加强对民俗体育项目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引进力度,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2.3 民俗体育项目的设施条件不足

民俗体育项目的开展高度依赖特色场地与专用器材,其教学实践需要兼具文化空间承载,例如荡秋千所需的庭院式场地、毽球需要的空旷场地。然而当前高校普遍面临设施供需错位:一方面受限于校园规划理念滞后,多数高校将体育场馆资源向标准化竞技项目倾斜,导致民俗体育场地被边缘化,多为“临时活动区”或呈闲置状态;另一方面传统器械因

缺乏定期维护更新、缺乏与现代安全标准的适配改造,存在教学安全隐患。这种硬件短板与文化特性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为了改善这一现状,高校需要加大对民俗体育项目设施条件的投入力度,建设和完善相关设施条件以满足教学需求。

2.4 民俗体育项目的融入形式及评价体系单一

目前高校民俗体育课程的同质化现象显著,传统教学形式多局限于“教师示范-学生模仿”模式,未能充分挖掘其文化交互性与时代适应性。常以零散动作分解为主的教学课程内容,缺乏对民俗体育仪式感(如凤阳花鼓灯舞蹈的队形变换逻辑)、地域符号(如福建“赛龙舟”与宗祠村落文化的空间关联)的系统架构,多沿用现代竞技体育的量化评价标准的教学手段,忽视民俗体育“重过程轻结果”的内在特点。这种单一化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参与动机不足。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高校需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民俗体育项目融入体育课程的形式和方法,如开展民俗体育比赛、组织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等,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和提升教学质量,构建形成“传统基因+现代表达+学生主体=课程”的生态循环课程体系。

2.5 民俗体育项目的认知度不高

目前,部分高校对民俗体育项目的认知度不高,缺乏对其文化内涵和健身价值的深入了解,导致民俗体育项目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融入程度较低,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高校需要加强对民俗体育项目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民俗体育需要高校从“静态展示”拓展到“动态参与”,不能如以往般沉浸在“文本式”的传播,而是需要打破“静固”壁垒,构建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态化”传播范式,以此提高师生对民俗体育项目的认知度和兴趣度。

3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优化路径

3.1 构建文化调适机制,推动民俗体育在高校教育场域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实践路径需构建“文化解码-价值重构-教学创新”的系统性框架。首要前提,需理清民俗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的通融点。从而通过创建“传统-现代”文化对话机制,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民俗体育进行三重解码,例如将祭祀仪式的步罡踏斗转化为团队战术矩阵、木鼓节奏重构为生物力学训练节律器,进而实施差异化教学策略——竞技类项目(舞龙舞狮、毽球)可借助采用运动生物力学轨迹捕捉技术或动态动作捕捉技

术分析后,利用戴明 PDCA(管理学法则:计划-执行-行动-检查)循环训练提升运动表现、仪式类项目(祈福仪式)通过 VR 场景重建保留原真性展演或创建场景剧汇演,展现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追求。其次,创新价值转化范式,编制理论书籍,系统阐释民俗体育在心理调适、社会适应等维度的当代价值,开发“民俗体育文化+”跨学科课程包(如凤阳花鼓灯和音乐剧或者舞台剧的结构优化),实现文化基因与科学教育的深度融合。再其次,依托双师协同机制(民俗体育学者+体育教师)与智能监测技术(三维动作捕捉、生理负荷监测等),形成“文化转译-功能验证-教学优化”的闭环系统。最终,通过动态评估文化忠实度与教学实效性,推动民俗体育在高校教育场域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3.2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人文传承+科技创新”的课程建设新模式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实践路径需构建“师资协同-数字赋能”双轨驱动体系:通过实施双轨师资建设工程,设立“n+1”的团队制度,即 N 个教师+1 位民俗体育传承人,传承人负责文化基因解码与原真性展演指导,教师主导运动项目与课程结合及运动科学化训练。另外,需同步建立民俗体育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将传统技艺传承纳入高校继续教育学分体系,破解师资结构性短缺难题;同时推进数字化传承网络构建,运用三维动作捕捉技术建立高难度动作数据库(如舞龙舞狮表演动作的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轨迹等解析),开发 AR 实时反馈教学系统(如龙舟划桨轨迹的数字化纠偏指导、毽球抛物线运动的可视化优化),实现传统技艺传承从经验依赖向科学化、标准化转型。二者通过“文化解码-技术赋能-教学实施”的闭环机制协同作用,既保障民俗体育文化的原真性传承,又通过提升其教学转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最终形成“人文传承+科技创新”的课程建设新模式。

3.3 创新场域融合模式,实现民俗体育课程的可持续推广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创新路径需构建“空间重构-安全保障”双维支撑体系:通过弹性空间营造方案,运用模块化教学空间设计理念,结合 VR 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民俗运动场(突破场地时空限制,模拟花鼓灯巡游、龙舟竞渡等大场景教学),破解高校场馆资源约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重构工程,建立“产学研协同”的安全规范体系,联合器械制造商研发陀螺缓冲层材料、蹴鞠减震结构等新型防护装置。同步开发智能监测系统,基于物联

网的秋千摆幅实时预警、毽球飞行轨迹纠偏算法,形成“风险预判-动态调控-损伤预防”的全流程安全管理机制。二者通过“物理空间再造+虚拟空间拓展”“传统技艺改良+智能技术赋能”的协同创新,既能延续民俗体育文化本真性,又构建符合现代高校教育规范的安全教学体系,实现民俗体育课程的可持续推广。

3.4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实现民俗体育课程的智能化、科学化发展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实践路径需构建“多元评价-动态追踪”的闭环赋能体系:通过三维评价模型应用,形成多维度评估机制——技能维度引入 AI 动作识别系统进行标准化量化分析,例如舞龙舞狮腾跃高度、毽球抛物线轨迹的精准测算;文化维度设置“民俗符号阐释”答辩环节,考察学生对祭祀仪式等文化基因的解码能力;创新维度鼓励传统项目现代改编,如将民俗体育表演类步伐融入现代舞蹈步伐创编,实现文化遗产与创造性转化的双向驱动;同步推进动态成长档案建设,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个人民俗体育学习履历(记录学生学习进度及掌握技能进度等微观数据)。协同开发跨校学分银行系统,实现民俗体育成果的等价转换,构建“过程性记录-跨域互认-终身追溯”的数字化成长轨迹。二者通过“技术赋能评价革新”与“数据驱动成长管理”的协同作用,既保障民俗体育教学的文化本真性,又形成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个性化培养体系,最终实现民俗体育课程的智能化、科学化发展。

3.5 打造生态化发展平台,推动民俗体育从地域性遗产升华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体育文化符号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创新路径需构建“产教融合-国际传播”双轮驱动体系:通过产教研协同创新体建设,成立民俗体育产业学院,孵化社会脸谱文创产品、龙舟模型制作等产学研项目。建立“高校理论研究-社区活态传承-文旅产业转化”的三级联动机制,例如联合当地政府开发民俗体育非遗研学路线、文旅演艺项目,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步推进国际传播矩阵构建,开发多语种数字课程包,如英、法、西语版舞龙舞狮运动项目课程,通过慕课等数字平台全球推广,组建留学生民俗体育社团,开展“一带一路”国家传统体育文化节,形成“数字传播+实体体验”的跨文化交流模式。二者通过“本土创新”与“全球对话”的协同共振,既构建起民俗体育的现代教育生态系统,又形成“文化传承-产业反哺-国际输出”的可持续发展闭环,最终推动民俗体育从地域性遗产升华为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华体育文化符号。

4 结论

民俗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健身价值。将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能够丰富体育课程内容,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民俗体育在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为了推动民俗体育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有效融入和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优化措施:如构建文化调适机制,寻求发展突破点;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破传统技艺传承人短缺壁垒;创新场域融合模式,破解场地局限,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完善评价体系;打造生态化发展平台,让优秀文化知名化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和推进,可以为民俗体育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融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高校将民俗体育融入体育课程之中,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综合素质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期待看到民俗体育在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eb/ol]. (2017-02-13)[2021-06-06].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213/C385476-29075643.HTML](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213/C385476-29075643.HTML).
- [2] 钟秉枢,李楠. 体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基本理念与具体路径[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4(1): 1-7.
- [3] 吴颖冰,陈霞霞,戴羽. 文化传承视角下山西民俗体育高校课程化路径研究[J]. 武术研究, 2023, 8(3): 80-83.
- [4] 卜宏波,王树明.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意涵特征、时代诉求及建构路径[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4(6): 1-9.
- [5] 李文,公胜男,吴锡坤,等. 体育与健康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理念诉求与教学策略[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4, 26(6): 169-172, 176.
- [6]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6.
- [7] 沈丽玲. 江西省中小学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05: 1-9.
- [8] 何标,刘光启. 论民俗体育的迁移——以河洛和皖南民俗体育为例[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7(5): 72-74.
- [9] 王承轩. 云南省民间民俗体育项目及文化生态调查研究[G].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2017: 1-5.
- [10] 卢从飞. 民俗体育融入高校体育的社会价值与责任分析[J].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2017, 19(6): 86-88.
- [11] 崔江. 论中西方传统体育的文化意蕴[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7(4): 66-68.
- [12] 唐智明. 地域性传统文化背景下民俗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海安花鼓为例[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5(4): 46-47, 61.
- [13] 童城旺,罗平. 吉安鲤鱼灯的价值及其发展对策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 2017, 7(33): 173-175.
- [14] 李拥理. 从传统到现代:广西藤县舞狮变迁研究[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019: 1-2.
- [15] 阳波,朱海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分析、价值定位及发展路径[C]. 2024年第二届国际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2024: 5.
- [16] 李孟华,朱红彩,郭振华.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标识研究[J]. 武术研究, 2024, 9(11): 7-9.

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探究

徐桂林^{1*}, 徐济益²

(1. 中共安庆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 安徽 安庆 246000;
2. 安徽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要:以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推进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从思想引领、机制重塑、平台构建、资源共享4个维度探索赋能的实践路径,提出夯实数字党建理念与治理共识、构建数字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区治理、完善数字党建平台与制度保障、数字党建资源整合与人才支撑联动等措施,以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迭代升级,提高基层社区治理工作质效。

关键词:数字党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103-06

Practical Path for Empowering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Digital Party Building

XU Guilin^{1*}, XU Jiyi²

(1. Department of Marxist Basic Theory, Anq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qing, 246000, Anhui;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Anhui)

Abstract: Digital party building can empower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empowerment from four dimensions: ideological guidance, mechanism reshap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t proposed measures in this paper such as consolidating the concept of digital par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consensus, building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gital party building, improving digital party building platform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integrating digital party building resources and linking talent support, etc. These measures aim to empower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digital party build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work.

Key words: digital party building; party leadership;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practical path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已深刻影响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在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面临着社会管理日益复杂、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的现实需求。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数字党建”主要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依托智慧党建平台,形成以“互动、智能、

收稿日期:2025-05-1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D2023D047);安徽工业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DT18100030)。

作者简介:徐桂林(1987-),女,安徽庐江人,讲师,硕士;徐济益(1978-),男,安徽合肥人,教授,博士。E-mail:1109917044@qq.com

共享”为特征的党建新模式,体现了数字化技术与党建工作的深度结合。当前,数字党建正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1]。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推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愈发显现。数字党建作为党建工作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了新动能。当前,基层社区治理面临着资源分散、信息孤岛、权责不清等问题,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治理需求。数字党建通过构建大数据平台、优化治理流程、整合多元主体资源,使党组织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社区问题,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为此,从思想引领、机制重塑、平台构建、资源共享4个维度,系统探讨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1 思想引领:夯实数字党建理念与治理共识

1.1 数字化党建引领嵌入基层社区治理

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演进的背景下,信息技术与数字化手段的迅猛发展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深刻影响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治理模式。党的意识形态是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数字党建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创新载体,通过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实现了理论宣传、思想引领与实践落地的有机结合,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构筑起坚实的治理共识^[2]。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党组织能够构建全覆盖、立体式、互动型的数字党建平台,突破传统宣传方式的时空限制,把党的理论成果、政策主张和核心价值观传播到基层社区,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思想,提升思想认同与政治认同。传统党建模式依赖面对面交流,信息传递滞后、覆盖面不足,数字党建则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优势,精准把握基层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通过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及时发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和思想动态变化,形成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和事后评估的全流程治理机制。数字化赋能使党建工作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更具精准性和针对性,提升了工作实效性,也在社会中形成了共同遵循的价值导向,为基层社区治理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数字党建平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起到了连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3]。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党员、居民、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各司其职,但信息壁垒

和沟通不畅常导致治理碎片化。数字党建平台通过高效整合和共享信息资源,促进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推动基层治理意识形态的统一。平台上的在线学习、讨论、问答等功能,使党员和居民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共同探讨社会热点、分享治理经验,在互动中凝聚共识,进一步强化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数字党建凭借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等传播渠道,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形成群众自发参与、广泛讨论的良性局面。通过互联网的广泛影响力,基层党组织能够将党的声音传递到社区每个角落,借助数据化和图像化表达方式,使理论内容更加生动易懂,提升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多角度、多形式的传播,数字党建有效塑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意识形态氛围,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保障和思想支撑。

1.2 基层社区治理目标与数字党建的理念耦合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本单元,其核心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促进居民自治以及构建和谐社区,而数字党建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前沿探索,不仅在技术手段上实现突破,更在理念上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社区治理目标的深度耦合^[4]。数字党建采用搭建智能化平台和数据共享机制,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与社区治理的精细化目标有机结合,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基层社区治理实现了信息实时采集、风险预警和精准服务,进而为居民提供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数字党建使得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形成了实时沟通和互动协作机制,有效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的治理难题,确保治理目标在各个环节得到有机落实。数字党建在理念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与基层社区治理追求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目标高度契合,数字技术为基层社区治理带来的不仅是信息化手段的升级,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转变——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转向自下而上、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模式^[5,6]。基层党组织利用数字平台,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居民意见和诉求,及时调整治理策略,确保各项治理政策更加贴近民心、顺应民意。以数据为依据、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治理模式,既体现了党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也有效激发了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数字党建与基层社区治理目标耦合的重要体现还在于公共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共享,现代社区治理要求信息、服务和资源的高效流转,而数字党建平台恰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

打破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信息壁垒^[7]。通过构建开放、共享、互动的数字平台,党组织不仅能够将先进的治理理念传递给每一位社区成员,更能在实践中将治理目标与实际需求精准对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能提升。数字党建与基层社区治理目标的深度耦合,不仅有效解决了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还为治理体系注入了持续的动力与活力,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公平正义、治理效能提升以及群众满意目标的实现。理念与技术的耦合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与社区治理的精细化需求紧密结合,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管理向共治共享转变,为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路径。

2 机制重塑:构建数字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区治理

2.1 数字党建与基层社区治理组织结构适配

在信息化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党建通过重构传统治理体系,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组织形态向动态化、协同化转型。传统层级式、网格化的治理架构因信息传递迟滞与主体协同不足,难以适应快速响应、精准决策的现代治理需求,亟需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组织结构的数字化适配^[8]。组织结构适配过程本质上是将党建的政治引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扁平化网络,形成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治理体系,最终实现党建引领与治理创新的双向赋能。数字党建通过技术嵌入重塑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流程,基于数字党建云平台与智能分析系统,基层党组织可实时整合党员信息、社区动态及服务需求数据,构建覆盖党员管理、矛盾预警、服务调度的全要素数据库。数字党建平台的深度适配,不仅实现了居民需求与治理资源的精准匹配,而且提供舆情监测与数据分析,这为党组织提供决策支持。技术赋能使传统党建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既增强了党组织对基层社区治理的统筹能力,也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了服务供给与治理需求的动态平衡。基层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转型需突破传统层级壁垒,建立多主体协同的网络化架构,依托数字平台构建的“党建+治理”一体化系统,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等垂直体系与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等横向主体深度适配,形成虚实交织的治理网络^[9]。多维治理网络的构建依赖于数字化治理中枢的支撑,通过搭建集成政务数据、社会资源与市场要素的协同平台,党组织可统筹调度分散的治理力

量,形成“政治引领—技术驱动—多元共治”的联动模式。区块链技术的引入进一步优化权责分配机制,通过智能合约固化治理规则与协作流程,打破传统治理中的“信息孤岛”与“责任真空”,使党组织能够穿透行政层级,直接触达基层社区治理末梢,实现全过程政治引领^[7]。在线协同系统的部署实现了跨部门决策的实时协作,智能预警模块则通过机器学习预判社区矛盾演化趋势,触发预案生成与资源调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深度适配,使得智能决策支持系统通过挖掘历史治理数据,构建社区治理效果评估模型,使党组织能够通过仿真技术推演预判治理方案的实施效果。技术驱动的基层社区治理组织结构适配,不仅实现了治理资源的动态配置,更实现持续学习机制推动治理规则的迭代升级,使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区治理始终与时代需求保持同步进化。

2.2 数字党建与基层社区治理权责边界厘定

基层社区治理涉及党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及志愿者等多主体协同,然而权责界限的模糊性常导致“数字错位”“数字残缺”“数字失败”等问题^[10]。数字党建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核心引擎,通过技术赋权实现制度重构,为基层社区治理权责边界的科学厘定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9]。党组织作为政治引领核心,需依托数字技术明确自身在战略规划、组织协调与政治动员中的引导权责;政府部门需聚焦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与公共服务监管的职能边界;企业和社会组织需在市场服务与社会服务中明确服务边界;居民与志愿者在参与治理决策中明确自治权利义务。数字党建平台的权责边界厘定,本质上是将党建的政治引领优势转化为治理规则,通过平台构建权责清单的动态映射机制,确保基层社区治理在协同治理中“各归其位、各尽其责”。数字党建平台采用技术赋权与制度设计的双重路径来推动权责边界的精准厘定^[4]。一方面,通过语义建模技术对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解构,形成包含主体角色、权限范围、行为规范的知识图谱,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智能合约,将制度要求转化为数字党建平台可执行的数字契约,固化党组织、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权责关系,使权责关系显性化、结构化与可操作化。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数据—算法—场景”三位一体的协同中枢,整合 12345 热线、网格巡查、舆情监测等多源数据,构建社区矛盾预测模型与资源调度方案,为权责动态调整提供量化依据。同时,数字党建平台还需要对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

数字化重构。

通过构建基层社区治理行为数据库,对积极履行责任、参与数据共享和提供优质服务的主体给予政策扶持、资金奖励或荣誉表彰。同时,建立健全问责和考核机制,对于因推诿责任或协同不力导致的治理问题,及时进行追责和调整。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双重作用,能够确保各主体在明确的权责框架下积极协作,形成良性循环,增强整体治理效能。数字党建与基层社区治理权责边界的厘定,最终指向基层社区治理的长效运行。利用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对治理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建立权责关系的自适应调整机制,当平台监测到基层社区问题持续高于阈值时,则自动启动优化程序,结合历史数据采用机器学习推演,生成新的治理方案。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使得新的治理方案可以在虚拟社区中完成压力测试后再在实践中应用。因此,数字党建平台搭建的“监测-优化-迭代”社区治理模式,有助于基层社区治理的权责边界始终与治理环境保持动态适配,实现信息对称、协同互动、资源互补,推动基层社区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确保党组织在治理中引领作用的发挥。

3 平台构建:完善数字党建平台与制度保障

3.1 数字党建平台建设与社会治理功能集成

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数字党建平台已成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数字党建平台集成党务管理、思想引领和服务功能,实现与社会治理系统功能深度融合,形成资源共享、协同运作的治理共同体,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支撑^[11]。通过统一数据接口和信息交换标准,平台能够整合居民基本信息、社会服务资源、矛盾纠纷调解、环境监控等数据,形成全景式治理与精准研判能力,为党组织决策提供实时支撑^[12]。在功能集成上,数字党建平台的“党建+治理”协同机制,将党员在线学习、交流、监督和服务与社会治理信息模块深度融合,引入智能网格管理、群众诉求采集、志愿服务调度、公共事件预警等功能,使党组织能够第一时间介入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6]。线上互动平台、电子议事会、政务服务窗口等工具的应用,推动党组织、居委会、物业、志愿者及社会各界协同作业,实现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区治理效能与居民满意度双提升。用户体验与信息共享机制的完善是平台建设的关键。数字党建平台设计需兼顾技术先进性与基层用户习惯,通过简洁界面、便捷操作与直观信息呈

现,提升使用效率,设置“党建动态”“社区服务”“在线问答”“意见反馈”等模块,确保党员与群众能够快速获取所需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的建立,保障党建与治理数据的规范采集、存储与共享,在数据安全前提下实现资源互联互通,为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因此,数字党建平台的集成功能需具备动态适应性与智能升级能力,通过模块化设计与开放 API 接口,平台可根据实际需求扩展功能模块,实现与政务平台、社会服务平台的联动,构建多维协同治理体系。现阶段要大力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使数字党建平台能够实时监测运行数据,结合群众反馈与治理效果不断优化功能,形成“自学习、自适应”的智能化平台,持续推动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

3.2 数字党建制度运行规范化与监管智能化

基层社区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数字党建平台不仅要构建先进的技术系统,还需建立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并利用智慧监管手段对制度运行全过程进行监控与评估,确保各项工作依法依规、高效透明地进行,为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提供重要保障。数字党建制度运行规范化是平台高效运作的基础。基层社区治理涉及党组织、政府、社区组织、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过程中常因权责不清、流程不规范导致效率低下。因此,需要构建适应基层社区数字化治理需求的制度体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流程标准和绩效考核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操作规程、数据共享协议、协同工作流程及应急预案,实现从党建工作到社会治理全过程的标准化运行。传统的监管依赖人工检查,往往存在周期长、效率低、容易遗漏等问题。数字治理环境下,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构建全过程、全时段的智能监管系统。数字党建平台实时采集并分析党建、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环节的数据,利用预警模型发现异常情况,通过智能报警和自动反馈机制及时通知责任主体进行整改,从而提升治理透明度与效率^[13]。数字党建“线上监督”板块,可以将党建工作、社区治理绩效、公共服务质量等关键指标公开,形成多方参与的监督网络。信息公开机制不仅能提升政府与党组织的公信力,也能激励各主体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同时,数字党建平台的智能化绩效评估系统根据海量大数据,智能地对各项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形成奖惩依据以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各主体重视政策执行和治理的效果,形成良性循环的治理生态。此外,数字党建平台还需要强化动态反馈与持续改进能力,通过实时数

据监控、线上问卷调查、专家评审和公众评论等多渠道收集治理反馈信息,结合大数据分析结果及时修正和优化制度规范及监管流程,进而实现“事前预防一事中监管一事事后问责”的全链条监管^[14]。数字党建平台借助动态反馈与持续改进,不仅能够实时响应基层社区治理环境的变化,还能以数据驱动制度优化,确保平台运行和过程监管始终与基层需求同频共振,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持。

4 资源共享:数字党建资源整合与人才支撑联动

4.1 数字党建数据共享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

数字化时代催生了数据资源的爆发性增长,数字党建是党建工作新的重要载体,其核心优势在于数据的集成、共享与智能运用。构建数字党建数据共享机制,实现数据与基层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既是提高基层治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党建引领作用落地生根的关键路径。数据整合是数字党建数据共享的基础,需要打通信息孤岛,实现资源共享。在传统的党建和社区治理工作中,数据质量不高、数据价值低、数据格式不统一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数字资源无法高效共享^[15]。因此,数字党建数据共享的首要任务是整合党务管理、党员动态、思想理论学习、基层矛盾排查、社区服务和居民诉求等多源数据,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协议,打通各部门、各领域的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部门、全领域、全事务、全流程的数据资源库^[16]。这不仅为党组织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使治理措施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精准匹配治理需求成为数字党建数据共享的根本目的。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党组织、政府部门等主体需要应对居民诉求多样、问题复杂、矛盾交织等实际情况。数字党建平台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及时捕捉社区治理中的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对居民投诉、矛盾纠纷、公共服务评价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动态预测,形成问题预警和决策支持机制。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党组织能够基于数据反馈精准调动资源,优化治理流程,从而实现从“宏观管理”到“精准服务”质的转变,使基层治理工作更加科学有效^[17]。为了确保数据共享机制的长效运行,数字党建平台作为数据资源共享的枢纽,必须依托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撑。所以,基层党组织需要在治理区域内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通过建立数

据共享协议、制定安全标准和隐私保护措施,确保党组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主体在信任的环境中共享数据资源,借助前沿技术智能地实现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和分析。技术平台与制度保障的双驱动,确保各项数据高效流转共享,同时规避信息泄露和滥用风险,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实时、准确、全面的数据支持。

4.2 复合型党建人才与技术专才的协同培养

数字党建不仅要求党组织具备坚强的政治领导能力,还需要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有效治理。培养一支既懂党建理论、具备政治敏感性,又熟悉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同时充分发挥技术专才在数字平台建设、数据治理和智能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4]。复合型党建人才培养需突破传统党建工作的知识边界,建立“政治素养+数字素养”的双重知识结构。高校、党校、培训机构等人才培养单位在保留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公共政策等理论课程基础上,增设大数据分析、智能系统操作、网络安全等数字化必修模块,同时要求学员参与数字党建系统建设、治理数据标注等实操项目,践行“理论授课-技术实训-场景模拟”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18]。在技术专才培养方面,需注重技术能力的专业化与深度化,培养一批精通数字平台建设、数据治理、智能监管的技术骨干。技术专才的培养应聚焦于技术前沿,强化其在数字党建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可以联合为技术专才配备党建理论导师与技术专家,通过项目制、实验室共建等方式,提升技术专才的实践能力与治理能力,使其在数字党建研发中深刻理解基层社区治理需求,实现技术与党建的深度融合^[19]。为了推动复合型党建人才与技术专才的协同培养,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和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机制。构建以“党建+技术”为核心的协同培养机制,组织政治理论、信息技术、公共管理、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社区治理实践者定期交流与合作,共同研制复合型与技术型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人才共享平台”,推动高校、党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信息互通与人力资源共享,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激励机制与长效保障是人才培养的环境基础,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项人才激励政策,对在数字党建与社区治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复合型人才与技术专才给予荣誉表彰、职称评定、奖金奖励等激励措施,激发人才积极性与创造力。同时,

建立人才发展规划与职业成长机制,为人才提供定期培训、进修、国际交流等机会,促进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复合型党建人才与技术专才的协同培养机制,不仅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与技术保障,更推动了数字党建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与效能提升,为完善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思想引领、机制重塑、平台构建、资源共享4个维度,探讨了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首先,思想引领夯实了数字党建理念与治理共识,理念与技术的耦合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与社区治理的精细化需求紧密结合,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管理向共治共享转变,为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路径。其次,机制重塑聚焦构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依托数字技术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效能和响应速度,完善了组织结构适配、权责边界厘定的治理共同体的迭代升级。最后,平台构建为完善数字党建平台与制度保障提供了持续的动能,确保平台运行和过程监管始终与基层需求同频共振,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撑。尽管现有的研究对数字党建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进入数智时代,如何进一步地有效提高基层社区治理工作质效,仍然是学界和实务界需要思考的议题。

参考文献:

- [1] 人民网. 数字党建赋能社区治理现代化[EB/OL]. [2024-06-17]. 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24-06/17/content_26064024.htm.
- [2] 王延隆. 数字化改革促进社区治理的组织优化与功能更新——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J]. 学习论坛, 2023(6):87-93.
- [3] 谢志崙,倪晓锋. 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 理论视野,2024(8):66-71.
- [4] 周济南.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要素激发、现实制约与优化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2024(6):134-148.
- [5] 杜晓燕,吴倩,徐乐. 人民城市理念下数字赋能社区韧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优化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3):115-124.
- [6] 谢小芹,任世辉. 双轨融合治理: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模型建构[J]. 中国行政管理,2024,40(5):51-63.
- [7] 陈军亚,李慧宇. 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与逻辑——以湖北省武汉市J社区的实践探索为例[J]. 理论与改革,2024(6):81-90,173-174.
- [8] 罗敏.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25(3):35-45.
- [9] 张春满,王秀. 数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技术与组织互构的理论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2024(5):101-109.
- [10] 杨海涛.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数字化陷阱”[J]. 社会科学研究,2024(6):100-106.
- [11] 吴新叶,郑天一. 数字向善与共同体愿景的交互: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J]. 江淮论坛,2024(4):5-12,193.
- [12] 赵聪. 数字党建赋能城市社区治理——基于组织、技术、情感的分析框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9-77.
- [13] 卢文刚,谭喆. 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研究——以广东省“红色物业”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2024,40(6):156-160.
- [14] 张国磊,刘俊茹. 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与基层网格化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桂东P区的调研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24(9):32-41.
- [15] 徐明.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化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2024(5):126-133.
- [16] 郁建兴. “最多跑一次”改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282.
- [17] 施生旭,张向向. 数字技术驱动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构:现实困境、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学习论坛,2024(5):39-50.
- [18] 曾毅,刘中兴. 党建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J]. 理论视野,2024(9):87-92.
- [19] 何静,袁子凌. 数据要素赋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作用机制、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径[J]. 城市发展研究,2024,31(12):134-140.

新时代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何承凤

(安徽农业大学 学报编辑部,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青年编辑作为编辑出版事业中的新生力量,肩负新时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重任。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既是青年编辑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要求。青年编辑因政治素养不够全面、理论学习积极性不高和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其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存在不足。从期刊社党支部、期刊社、社会与个人等层面探究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培养路径:强化政治引领与监督、构建制度性培养框架、营造协同育人生态和激活内生学习动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编辑出版;青年编辑;意识形态;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109-06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Screening Ability Cultivation for Young Editors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New Era

He Chengfeng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nhui)

Abstract: As the new force in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young editor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publishing cause in the new era.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reening ability of young editors is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need of their personal career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cause. Due to insufficient political literacy, low enthusiasm for theoretical study, and weak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young editors have deficiencies in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reening abi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path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reening ability of young edi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journal's Party branch, the journal, the social level,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building a systematic training framework, creating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cosystem, and activating internal learning motivation.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young editors; ideology; cultivation paths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做好的战略任务。学术期刊作为科学文化的传播阵地之一,承载着传播科学成果的任务,同时也肩负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阵地安全的使命。学术期刊编辑是党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守护者,青年编辑作为编辑队伍中的

新生力量,是未来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中坚和接续力量。因此,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尤为重要。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既是青年编辑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需要,也是学术期刊维护意识形态阵地安全的必然要求,同时还是促进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融媒体、数字出版、知网首发等新技术、新手段的出现与广泛运用,出版事业发展迎来了新时

收稿日期:2025-06-1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编辑科研基金项目(IAUJ2023Y-01)

作者简介:何承凤(1990-),女,安徽六安人,编辑,硕士。E-mail:hcf@ahau.edu.cn

代,学术出版的方式开始变得日益多元化,学术期刊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2]。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更要对线上、线下所发表内容的意识形态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学术出版方向的正确性。

目前,学界关于编辑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主要聚焦于阵地属性、风险防控与治理创新等维度。一是从阵地属性角度,讨论如何加强高校学报意识形态阵地建设^[3],分析建设意识形态阵地的关键点并指出对策^[4],以及探讨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前沿阵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5]等;二是从风险防控角度,关注在学术出版过程中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强调出版单位必须强化导向意识^[6],编辑人员必须深入理解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7]并尝试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8],出版单位和编辑人员均需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9],以有效防控风险;三是从治理创新角度,关注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创新与实践,如数字出版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0]、出版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研究^[11]、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12],以及在融媒体背景下编辑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13]、编辑工作的意识形态安全把关^[14]与意识形态提升能力研究^[15]等。综上所述,学界在编辑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接下来开展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关于如何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全方位提升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研究较少。基于此,研究拟从新时代培养学术期刊青年编辑人才角度,综合现有研究文献,探讨新时代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培养路径。

1 提高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重要意义

学术期刊在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发表学术科研成果、传承社会文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肩负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阵地安全的使命。做好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在出版业的现实需求,因此,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1 是对期刊工作者的本质要求

学术期刊出版是一种精神文明产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事业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正确社会舆论以及传播社会主义科学研究成果的重任。出版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如《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中均强

调编辑队伍从业人员要守好政治关,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作为学术期刊青年编辑必须政治素养扎实,具备意识形态把关的能力,这样才能真正把好出版工作意识形态关,确保期刊出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同时实现高质量的学术传播。

1.2 是打造期刊思想阵地的需要

学术期刊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传播载体,肩负着宣传思想战线、传播优秀科研成果和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的责任。例如,每年定期开展的期刊社会效益评价工作,第一条评价标准便是意识形态导向性,实行一票否决制,可见意识形态工作在编辑出版领域的重要性。期刊出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方向和价值取向,一旦出现意识形态把关不严的情况,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一是传播错误的政治导向,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二是变成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传播渠道,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三是误导科学研究方向,破坏学术生态,损害期刊公信力等。意识形态把关不严,小到编辑个人职业发展受限、编辑部进行整改,大到党和国家利益受到危害。因此,青年编辑处在期刊意识形态工作把关的第一道关口,初审阶段需要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维护好学术出版思想阵地的安全。

1.3 是建设高水平期刊的必然要求

在新时代学术出版工作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建设高水平期刊的根本前提。青年编辑作为学术出版全流程中的第一道防线,其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直接关系到期刊的学术安全。例如,涉及历史学领域的稿件,青年编辑必须对可能隐藏的歪曲历史事实和淡化民族英雄伟大奉献的内容做出敏锐的意识形态判断;在涉及国际政治、社会热点等敏感选题的稿件时,需要青年编辑准确识别稿件中可能存在的片面观点和错误思潮等。因此,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是建设高水平期刊的必然要求。建设世界高水平一流期刊,传播中国声音、说好中国故事,努力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同样需要青年编辑练就过硬的政治本领、培养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鉴别力,确保其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

2 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存在不足的原因

2.1 政治素养有待加强

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队伍的学科专业化

特征日益显著,即编辑的学科专业背景与期刊栏目所涉及的学科高度匹配。这种专业化的人才配置,能够确保编辑人员对稿件学术质量的精准把控,但也存在编辑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现象。青年编辑在本专业领域具有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在涉及意识形态判断的综合性议题时,往往因为缺乏扎实的政治理论素养而难以形成准确判断。例如,有稿件以学术交流为名,片面引用西方经济观来评价我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或在涉及民族发展研究类的稿件中,出现将经济发展不平衡归因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不够的论断,完全忽视地理和现实的客观原因。处理此类稿件,要求青年编辑全面系统地掌握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等。青年编辑要深刻理解学术自由,必须首先遵守学术出版纪律。守好学术期刊这一意识形态阵地,期刊编辑的政治能力是最核心的能力^[16]。因此,新时代的青年编辑必须全面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政治理论基础,切实提升意识形态把关能力。

2.2 理论学习积极性不高

目前,国内高校学报普遍存在“小编部大工作量”现象,即编辑部人手少、稿件业务多。在此背景下,青年编辑职业发展的初期往往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稿件的编校工作,更多地关注业务能力的提升,如编辑加工能力、选题策划能力等;另一方面,作为数字时代的出版从业者,青年编辑通常还承担着编辑部的新媒体平台建设等工作,以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因此,青年编辑往往在业务实践和理论学习的时间安排上存在一定的矛盾,容易出现“重工作、轻学习”的情况,忽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青年编辑容易将主要精力专注于完成手头的编校工作,而对于业务工作需求以外的意识形态相关的理论学习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主动学习、钻研的热情和持续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忽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2.3 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青年编辑作为学术期刊队伍的新生力量,处在期刊出版工作中意识形态防范第一线,然而,青年编辑在意识形态把关工作中普遍存在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一是囿于自身专业积淀不够,青年编辑认为自己意识形态把关能力有限,从而陷入期刊的意识形态把关工作是“主编责任”的认识误区;二是面对敏感选题时,青年编辑常有“敏感选题不敢碰、不愿意碰”的心理,未能形成自己是期刊意识形态责任第一道防线的主体意识,严重削弱

了意识形态把关的主动性;三是继续教育的学习形式有限,多数以会议学习、集中培训为主,形式上较为单一,互动不够。传统的培训学习未能激发青年编辑的内在学习积极性,另外,培训内容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案例教学较少,导致青年编辑难以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具体把关能力。

3 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培养路径

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政治学习、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等全方位的培养体系。在这一培养过程中,既要求青年编辑夯实政治理论基础,又需要其学会将意识形态把关能力运用到工作实践中。现有研究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也有了新的变化。罗重谱认为,新时代学术期刊应在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学术评价和学术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17];白风认为,新时代的学术期刊编辑承担着众多的社会责任,包括政治责任、学术责任、法律与道德责任、人才培养责任^[18]。青年编辑作为编辑队伍的生力军,其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直接关系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程度。青年编辑也需要完成从传统的“单一专业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的转变,提升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守好学术出版的意识形态关。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培养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具体而言,以下将从期刊社党支部、期刊社、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展开探讨,研究提高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具体路径。

3.1 期刊社党支部层面:强化政治引领与监督

期刊社党支部是提升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核心力量,具有政治引领与监督保障作用。强化政治引领,开展理论学习活动,提高青年编辑的政治素养;构建常态化意识形态教育机制,引导青年编辑准确把握出版导向,筑牢思想根基;注重实践指导,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防范意识,切实履行意识形态主体责任。

一是开展理论学习活动,提高青年编辑的政治素养。作为编辑人员,首要素养就是政治素养^[19]。期刊社党支部培养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必须从提高青年编辑的政治素养入手。政治素养是编辑人员把握稿件内容政治性的基础,是确保出版导向正确的关键所在。期刊社党支部通过定期开展理论学习活动,带领青年编辑深入学习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的二十

大重要精神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期刊社党支部通过常态化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帮助青年编辑准确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准确识别和抵御错误思潮,系统提升其政治素养。

二是筑牢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根基。出版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党建制度化引领期刊制度化^[20]。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培养,期刊社党支部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培养责任。期刊社党支部作为学术期刊构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要载体,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工作要求,积极推进期刊社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确保党支部在期刊社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期刊社党支部以党建工作为重要抓手,积极深入开展和强化期刊意识形态工作,组织青年编辑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强化其政治敏感度。打造学习型期刊社党支部,将意识形态学习常态化,不断加强青年编辑思想建设,筑牢其意识形态根基。

三是培育青年编辑的职业使命感。期刊社党支部组织开展意识形态专题党课、交流研讨、特色实践等活动培育青年编辑的职业使命感,强化其深刻认识学术期刊作为党的宣传思想阵地的重要属性,鼓励青年编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同时,期刊社党支部充分发挥优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青年编辑作为学术传播的“职业守门人”,鼓励青年编辑个人职业发展与期刊事业相结合,进而培育青年编辑的职业使命感,增强其对出版事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真正激发其投身于高水平学术期刊建设的内在积极性。

四是定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一方面,对于期刊近期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总结,并针对拟刊发稿件进行意识形态审读,引导青年编辑在审读工作中培养政治鉴别力;另一方面,组织青年编辑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中央重要文件及会议精神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等,不断提升青年编辑对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思想认识,有效筑牢初审环节的意识形态责任防线。

3.2 期刊社层面:构建制度性培养框架

期刊社作为青年编辑职业生涯成长的重要平台,肩负着培养青年编辑的责任与义务。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这也要求期刊社必须构建制度化、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符合新时代出版要求的人才队伍。对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这既是青年编辑职业成长的必然要

求,也是推动期刊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支撑。

一是期刊社构建意识形态工作全流程把关机制,引导青年编辑全流程参与把关工作。在稿件“三审”环节,严把稿件质量关,特别加强意识形态审查工作,重点审查稿件内容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在编辑加工环节,加强对稿件的结构框架、逻辑表达、语言风格等内容的审查,重点关注有无因作者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理解不到位而出现的内容阐述偏差、表述不严谨等情况,以防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例如,在某篇自由来稿中,文字表述部分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很明显作者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了解不够全面,随意引用截取部分内容导致出现意识形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稿件校对环节,着重校对稿件中关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内容、政策表述等引用是否规范、有无描述性错误、引用性差错或者前后表述不一致等情况,确保出版内容无政治性差错和政治性隐患。

二是期刊社梳理“意识形态风险识别”案例库,常态化开展典型案例的学习活动。梳理编辑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案例,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表述等方面的典型案例,为青年编辑提供可学习、参照的案例样本。青年编辑需要及时关注国内外时事政策的变化,及时掌握战略或政策等重要表述的变化,避免稿件中出现与国家路线、方针、政策不同的表述和提法。例如“新农村建设”现表述为“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应避免表述为“战略”。若青年编辑未能准确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表达,就有可能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出现因表述不当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隐患,进而对期刊的政治导向产生不利的舆论影响。

三是建立期刊社内部意识形态专项培训机制。开展文字表述规范、地图使用规范、民族宗教政策解读等专项培训,旨在全面提升青年编辑的政治鉴别力和洞察力。通过此类培训,帮助青年编辑深入理解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要求,增强其对出版内容的政治判断力,能够识别某些表述背后可能隐藏的政治性差错,从而有效防范因表述不当或政策理解偏差所引发的政治性差错。尤其是关于国家领土主权、港澳台问题、民族宗教事务类等敏感话题,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

确保政治立场正确。例如,某篇自由来稿,文中出现“港澳台”与“中国”并列的情况,严重违背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严重的政治性表述错误;某篇稿件中出现“日本向朝鲜和台湾转移生产技术”这样的错误表述,将“台湾”和其他国家并列,属于政治性差错;另外,在涉及少数民族、宗教相关内容时,编辑人员应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尊重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避免使用不当称谓或者引发歧义的表达。

四是设置“互校+交叉通读”环节,及时揪出可能隐藏的政治性差错。为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期刊社可以增设“互校+交叉通读”环节。在稿件终校阶段,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编辑人员共同参与校对工作,查找可能存在的隐藏性意识形态差错。在“互校+交叉通读”环节,不仅是从文字表述中判断文章的主旨观点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问题,还要从图表数据中查找可能存在的隐患,避免出现由于意识形态把关不严而造成的差错情况。不同学科背景的编辑人员优势互补,校对工作交叉进行,有效避免因专业限制而被忽视的政治性差错,有利于青年编辑深化对意识形态审查的全局性认识。

3.3 社会层面:营造协同育人生态

社会层面构建协同育人体系,为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提升提供系统性支撑。借助高校、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营造有利于青年编辑成长的职场氛围,推动形成导向正确的出版生态。通过组织专题培训、学术交流、知识竞赛等活动,强化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

一是学术出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青年编辑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练就鉴别西方意识形态的眼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其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办刊宗旨,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刊物的党性原则。再次,青年编辑学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编辑出版工作,确保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正确。最后,青年编辑应善于运用辩证法的观点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断积累编校经验,尽快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水平,切实提高意识形态把关的能力。

二是加大出版行业对青年编辑的培养力度,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定期举办专业培训、继续教育、学术研讨等活动^[21],内容包括马克

思主义出版观、意识形态案例分析、出版行业新标准解读等。建立编辑出版行业内部交流机制,引导青年编辑主动与同行交流,分享办刊经验与体会,帮助青年编辑了解学术前沿的热门选题和学科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在线教育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学习活动,如行业标准解读、办刊经验分享、特色栏目策划等。青年编辑参加各类行业培训与交流活动,深化关于出版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

三是推动高校和行业组织合作,建立审读专家智库和审读经验共享平台。借助高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才资源,遴选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编辑出版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建意识形态领域审读专家智库,为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工作提供智力支撑。青年编辑遇到不能准确做出政治性判断或者稿件态度不明朗的情况,可以及时通过智库获取相关领域的专家信息,向他们寻求帮助和建议;或者通过审读经验共享平台查找类似案例的处理经验,从而有效解决审读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高校和出版行业组织的联动合作,系统性地构建多方位青年编辑培养体系,既能为青年编辑打造良好的外部成长环境,又能筑牢编辑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防线。

3.4 个人层面:激活内生学习动力

青年编辑的成长离不开期刊社党支部的政治引领,离不开期刊社的规范培养,离不开社会层面的栽培,同样也离不开青年编辑的自我成长。青年编辑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自我培养,是编辑职业的本职需要,也是建设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必然要求。青年编辑需要深度理解“学术守门人”的职业角色,“当好意识形态的守门人”^[22],确保编辑出版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是编研结合,业务和科研相互促进。编辑是杂家,鼓励青年编辑朝着编研结合方向发展。朱剑认为,回归学术共同体是学术期刊发展以及编辑身份构建的根本途径^[23];向美林等认为,要成为学者型编辑^[24]。学术期刊要求编辑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出版专业知识,还要掌握相关栏目领域的学科基础理论。这就要求青年编辑要朝着编研结合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另一方面提升个人编辑出版方向的科研能力,最终实现以业务促科研、科研带动业务发展的良性互动。青年编辑能够结合工作开展编辑出版方向的学术研究,独立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努力成为“学者型编辑”^[25]。这种编研结合发展路径,为确保新时代学术出版意

意识形态的安全提供了人才支撑。

二是学习掌握新媒体技术,加强新媒体内容把关。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构建网络舆论环境的基石^[26],必须维护网络安全,建设好思想阵地。数字出版、融媒体、网络出版等新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学术期刊的传播方式变得多元化、便捷化。学术期刊快速、多样的线上发行形式,使得其面临着更大的意识形态防控风险。因此,青年编辑应积极掌握新技术、学习新技能,提升新媒体素养,主动担起线上出版内容的审核把关任务。首先,积极学习新媒体技术,创新学术期刊的传播形式,推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增强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其次,树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严格把关新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坚守新媒体意识形态阵地,防止出现网络传播内容不规范、不严谨、不文明等现象;再次,注重网络用语的规范性与严谨性,与读者、作者的线上交流互动做到文明礼貌,保持良好的学术期刊形象;最后,网络发文必须落实“三审三校”制度,尤其是印刷版转换为数字格式(如XML格式或者流媒体格式)时容易出现数字断行、转接错误、人名地名错位等问题,避免出现数字媒体安全问题和政治性差错。

三是积极参加相关竞赛活动。鼓励和号召青年编辑积极参加编校知识竞赛,例如,中国高校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大赛、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中国农业期刊网编校大赛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竞赛活动。青年编辑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可以快速对行业标准规范、出版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编校知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党的二十大重要精神等内容进行全面复习。通过参加竞赛活动,青年编辑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素养;同时,有机会与行业前辈学习交流,拓宽编校视野,激发学术热情。

4 结论

学术期刊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其出版质量事关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事关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7]。学术期刊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将意识形态工作抓好、抓稳,确保出版内容思想性和政治性正确。新时代学术出版呈现出数字化、多元化、融合化等特征,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意识形态风险多样化、隐蔽化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青年编辑作为学术出版的新生力量,其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提升成为编辑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

能力,需要期刊党支部、期刊社、社会以及个人等主体协同发力。构建多主体、多元化的培养体系,培养有政治觉悟、政治担当的青年编辑队伍,全面提升青年编辑的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坚决维护好学术出版的政治安全,充分践行期刊工作者在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共产党员, 2022(21): 4-26.
- [2] 孙晓红, 张改侠, 郭现轻. 新时代科技期刊编辑的角色定位及核心素养[J]. 编辑学报, 2024, 36(S2): 174-178.
- [3] 高文祥. 试论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意识形态阵地建设[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 42(5): 42-44.
- [4] 陈南希, 姜文琪, 韩鹏, 等. 筑牢医学科技期刊意识形态思想阵地建设关键点及对策探讨[J]. 中国医药导报, 2025, 22(4): 193-196.
- [5] 刘清田, 谢富胜. 出版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路初探[J]. 出版广角, 2023(10): 31-36.
- [6] 张晶. 出版单位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的探索与措施[J].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8(4): 42-44.
- [7] 梁超. 论编辑人员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及其体系建构[J]. 中国编辑, 2018(6): 59-62.
- [8] 张宏亮. 论图书出版领域编辑意识形态的建构[J]. 新闻研究导刊, 2019, 10(15): 183-184.
- [9] 蒋冉. 医学学术编辑落实出版意识形态工作浅谈[J]. 今传媒, 2025, 33(5): 57-59.
- [10] 敖永春, 王鹤天. 数字出版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治理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视角[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4, 32(10): 25-32.
- [11] 梁乐欣. 融媒体时代编辑人员维护出版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研究[J]. 传承, 2021(3): 93-98.
- [12] 王海晨.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J]. 文化学刊, 2024(10): 101-104.
- [13] 杨茜麟. 期刊编辑与意识形态传播的互动研究[J]. 新闻文化建设, 2024(19): 76-78.
- [14] 孙红丽. 编辑工作中的意识形态安全把关[J]. 大众文艺, 2023(11): 70-72.
- [15] 赵沐霖. 医学编辑在继续教育中提升意识形态把关能力的对策研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4, 15(8): 216-219.
- [16] 龙杰, 孙莹. 出版新业态下编辑队伍建设的创新路径[J]. 中国编辑, 2023(3): 46-54.

论梅尧臣的淮河行旅与书写

时俊龙

(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梅尧臣在景祐元年(1034)至嘉祐元年(1056)的22年间,至少进行了8次淮河行旅并创作了70首书写淮河的诗篇。分析作品可知,梅尧臣的淮河书写突破了前代相对类型化的意象模式,构建了一个兼具“清境”自然特质、深刻情感联结与厚重哲学思考的独特文学地理空间,展现了其在淮河行旅中获得的澄澈的多感官体验,因频繁行旅与人际交往而形成的情感寄托与地方认同,以及由淮河景观与历史遗迹触发的历史感悟与生命哲思,推动了淮河诗歌的质变。

关键词:梅尧臣;淮河;质变;文学地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115-07

On Mei Yaochen's Travel and Writing along the Huai River

SHI Junl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Anhui)

Abstract: From 1034 to 1056, during a period of 22 years, Mei Yaochen made at least 8 trips along the Huai River and composed no less than 70 poems about it. His depictions of the Huai River broke through the relatively stereotyped imagery patterns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creating a unique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that combines the natural qualities of a “clear realm”, profou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It showcases his clear multi-sensory experiences gained during his travels along the Huai River, the emotional attachments and local identity formed through frequent travels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life philosophies triggered by the river's landscapes and historical relics, thus promoting a qualitative change in Huai River poetry.

Key words: Mei Yaochen; Huai River; qualitative change;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行旅对诗人而言意味着空间转换,令诗人得以涉足广阔地域,游观山川风景,赏味各地风俗。诗人在行旅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地方体验与认知等,进而影响其诗歌创作,并为后人留下独具诗性的人地关系图景。从景祐元年(1034)秋初次沿汴河入淮、赴任建德(今安徽东至)时“朝来汴口望,喜见淮上山”^{[1]70}(《初见淮山》)的新奇与欣悦,到嘉祐元年(1056)暮年自扬州(今江苏扬州)北归汴京(今河南开封)、夜泊洪泽湖时“宦游常作客,未息为贫催”^{[1]852}(《宿洪泽》)的感慨与回望,梅尧臣在22年

间至少进行了8次淮河行旅并留下70首淮河诗歌。根据《梅尧臣年谱》^[2]等相关资料,可知梅尧臣一生足迹遍及淮河中下游干流,并延伸至汴河、大运河、颍河等相连水系(见表1)。这8次行旅性质多样,或为赴任(建德县令、湖州监税、颍州签判、陈州签判),或为归乡省亲、奔丧、护柩归葬(皇祐元年奔父丧、皇祐五年护嫡母灵柩归宣城),或为公务往来、调任返京(嘉祐元年自扬州归汴)。梅尧臣在行旅中有着明确的纪行意识,如嘉祐元年(1056),其在楚州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作《过山阳水陆

收稿日期:2025-08-14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青年项目(2024CXQ06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科研项目(2024AH053245)。

作者简介:时俊龙(1991-),男,安徽利辛人,讲师,博士。E-mail:1104291880@qq.com

院智洪上人房》言“十载七来此”^{[1]851},即指庆历六年(1046)春就婚刁氏至正阳(今安徽寿县正阳关镇)之外的7次淮河行旅。

表1 梅尧臣淮河行旅简表

序号	时间	行旅性质	核心路线	相关作品举例
1	景祐元年秋 (1034)	由汴京赴建德任	泗州-楚州	《初见淮山》《旌义港阻风》《依韵和刘六淮潮》《和才叔岸傍古庙》
2	庆历元年秋 (1041)	由汴京赴湖州监税	颍州-寿州-濠州-泗州-楚州	《望仙亭》《陪淮南转运魏兵部游濠上庄生台》《淮上杂诗六首》《淮南遇梵才吉上人因悼谢南阳畴昔之游》《次韵和长吉上人淮甸相遇》
3	庆历六年春 (1046)	就婚刁氏至正阳	颍州-寿州	《早至颍上县》《正阳驿舍梦郑并州寄书开之即三山图也》
4	庆历八年夏 (1048)	由汴京归宣城省亲	颍州-寿州-濠州-泗州-楚州	《淮雨》《舟次山阳呈王宗说寺丞》《昭信淮上》《小村》《九山》《淮岸》《浮来山》《濠梁感怀》《泊下黄溪》《舟上采菊》《朝暮》《荆山》《涂山》《晓日》《鸡声》《采芑》
5	庆历八年秋(1048)	由宣城赴陈州签判	楚州-泗州-濠州-寿州	《施景仁邀咏泗州普照王寺古桧》《涡口》《过涂荆二山遇暗石》《九日次寿州》《泊寿春龙潭上夜半黑风破一舟》《槽淮鮑》《杨公懿得颖人惠槽鮑分餉并遗杨叔恬》《和杨秘校得槽鮑》
6	皇祐元年正月 (1049)	由汴京奔父丧归宣城	颍州-寿州-濠州-泗州-楚州	《寒食日过荆山》《涡口得双鳊鱼怀永叔》《岁寒亭》《澄虚阁》《舟次泗上逢黄令因以诗送》
7	皇祐五年冬 (1053)	由汴京至宣城归葬嫡母	泗州-楚州	《过淮》《使风船》《淮阴侯庙》《又平律一首》《入满浦》
8	嘉祐元年秋 (1056)	居丧期满回汴京	楚州-泗州	《过山阳水陆院智洪上人房》《淮阴侯》《闰三月八日淮上遇风杜挺之先至洪泽遣人来迎》《宿洪泽》《泗州郡圃四照堂》《泗守朱表臣都官创北园》《依韵和诚之淮上相遇》《阻浅挺之平甫来饮》

值得注意的是,梅尧臣的淮河书写并不仅限于行旅途中,他在汴京及其他地方亦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涉及淮河。或送友人赴淮(如《送张秀才之淮南》《送新安张尉乞侍养归淮甸》《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送毕郎中提点淮南茶场》《送寿州司理张元兴》),或与友人唱和淮河相关景事(如《和寿州宋待制九题》《依韵和杭州梅龙图入淮见寄》《酬杨愈太丞之寿州见别》),或异地感怀淮上风物人事(如《次韵临淮感事》)。这种异地咏淮的现象,说明淮河对其创作激发之频繁和重要。其行旅次数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书写之频繁、视角之多样(亲历者、送行者、唱和者、感怀者)在北宋诗人中实属罕见,并构成其与淮河间密切而独特的人地关系。

唐代淮河诗歌以旅愁或望乡为主题,以悲哀或忧愁为基调,类型化色彩突出^{[3]77}。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4],梅尧臣是唐宋诗学转型的关键诗人,其对北宋淮河诗歌具有开创之功,体现在淮河行旅不仅是其南北奔波的生命轨迹,更是其观察自然、体验

人生、思考历史、抒发情感的创作源泉,使其得以超越前人对淮河相对笼统、类型化的书写,而将个人真切丰富的感官体验、深沉复杂的地方情感,以及由此生发的深沉哲思,熔铸于对淮河景观、水文、风物、人事的观察与描绘中。正如内山精也指出的,梅尧臣是“淮河诗之质变的最初的关键人物”^{[3]84},其淮河书写呈现了独特的景、情、思,具有重要的淮河诗史价值。因此,对梅尧臣淮河行旅与文学书写的探究,不仅是对梅尧臣生平研究的新的切入点,也是对淮河地域文化在宋代诗文中生成价值的阐释。

1 行于清境

“清”字的本义是水清,由此引申出诗学概念“清”,其基本内涵首先体现为整体意境上的澄澈洁净,其前提则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超越^[5]。梅尧臣笔下的淮河,最为明显的空间特征是“清”,多以“清淮”指称淮河,如“我来清淮侧”^{[1]364}(《正阳驿舍梦郑并州寄书开之即三山图也》)、“清淮渺然去”^{[1]474}

(《昭信淮上》)、“清淮行未尽”^{[1]477}(《涡口》)、“头尾接清淮”^{[1]509}(《杨公懿得颖人惠糟鲋分饷并遗杨叔恬》)、“清淮直上水连天”^{[1]705}(《使风船》)等。实际上,对于梅尧臣而言,行于淮上就是行于清境。这种清境书写源于其数次舟行淮上时,身心沉浸其中所获得的融视觉、听觉、味觉于一体的多感官体验。需要注意的是,清境并非孤立、客观、静态的风景,而是与其具体的行旅事件、人生境遇紧密相连,融入了仕宦奔波的辛劳、归乡情切的焦虑,乃至对民生现实的深切关注,从而具有了明显的叙事性和情感倾向。

1.1 清境景观

淮河之“清”,首先在视觉层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景祐元年(1034)梅尧臣首次入淮,《初见淮山》开篇便奠定了其淮河视觉书写的基调:“断岭碧峰出,平沙白鸟闲。”^{[1]70}“碧峰”之青翠与“白鸟”之素洁形成鲜明而和谐的对比,“出”字赋予静态山势以动态的生机,“闲”字则精准捕捉了水鸟栖息的从容姿态。青碧与洁白的色彩搭配,断岭的嶙峋与平沙的舒展构成的空间张力,共同营造出一个澄澈、明净、生机盎然的淮河初印象。此时诗人因“游宦久去国”^{[1]70}的庙堂疲惫,对“水云间”^{[1]70}的江湖空间产生天然亲近,“南归不厌远,况在水云间”^{[1]70}的喟叹,将地理空间的视觉之“清”与精神状态的闲适向往相联系。无论是宦所建德,还是京城汴京,均属于庙堂,是充斥着利益纷争的政治空间,而淮河是具象化的自然空间,属于隐逸之所。明代胡应麟《诗薮》言:“清者超凡绝俗之谓。”^[6]舟行淮上,喜见淮山,远离人事纷争的自然空间令梅尧臣心清,以清心观景,触目皆清,诉诸笔端,即为淮河清境。

梅尧臣对淮河清境的书写融入了其多感官的淮河行旅体验,在视觉之外,还有听觉、触觉之清。在听觉上,他注意到淮河特有的清寂。景祐元年(1034)作《依韵和刘六淮潮》写道:“后夜人无寐,遥听入浦声。”^{[1]71}夜深人静,唯有潮水涌入河汊清晰可闻。以动写静,潮水的声音在无边的寂静中更显悠长清越,成为触动旅人思绪的清声。嘉祐元年(1056)作《宿洪泽》言“夜潮同雨来,寒声相乱急”^{[1]852}则将潮声与雨声视为寒凉清冽的声响感受,既写自然声响,又暗喻了旅人内心孤寂。在触觉上,他注意到淮河秋冬的清寒,如《淮上杂诗六首》其四“苦寒非塞外,霜落夜淮清”^{[1]189},其“清”既指秋夜淮河视觉上的澄澈空明,亦蕴含着霜落大地带来的触觉上的寒凉之感,自然之清与羁旅之寒在此交融,暗含着远离朝堂纷争、人世喧嚣的孤寂清寒,是淮河

行旅中独特的清境体验。

随着行旅次数的增多,梅尧臣对淮河的视觉观察愈发细腻入微,并逐渐形成一种以白色意象凸显清境的书写策略,如白鸟、白鱼、白露等。庆历八年(1048)夏归宣城途中,梅尧臣作《淮岸》一诗聚焦河岸细节:“下过白鱼尾,上有苍獭迹。”^{[1]476}“白鱼尾”瞬间一闪与“苍獭”在岸边留下的细微痕迹,反衬出淮河沿岸的清寂氛围。《舟中采菊》“白露夜正霏,黄菊寒更发”^{[1]478}则捕捉秋夜淮河的清冽氛围:白色的露水在夜色中弥漫,黄色的菊花在寒凉中绽放。白与黄的冷暖色调对比,露水的弥漫与菊花的绽放形成的视觉张力,凸显了淮河秋夜的清寒。

1.2 清境险情

淮河清境中的感官体验并非是纯然美好的,作为一条实际通航的河流,淮河水文状况复杂多变,行旅充满不可预知的艰险。梅尧臣以其亲历者的视角和实录精神,将行舟淮河遭遇的风波险阻纳入了淮河书写范畴,这是其超越前人的重要突破,也是淮河清境特质中不容忽视的现实维度。景祐元年(1034)初入淮河不久,他便在旌义港(属今江苏淮安)附近遭遇了惊心动魄的风暴,初次体验到淮河险情的恐怖,其《旌义港阻风》诗言:

清晨下长淮,忽值秋风恶。渺弥云雾昏,掀合鱼龙作。方惊白浪高,又以寒潮落。远渚时出没,轻舟自前却。^{[1]70-71}

秋日清晨,舟行淮上,突然之间狂风骤起,云雾弥漫,白浪滔天。梅尧臣置身轻舟,被颠簸到视线模糊,远方沙洲时隐时现。这次停泊荒港躲避淮河风浪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令其见识到淮河狂暴的一面。

庆历八年(1048)秋梅尧臣赴陈州途中,舟行至涂山与荆山(属今安徽蚌埠)相峙的险要河段,写下《过涂荆二山遇暗石》,言:“淮流两山间,势束秋涨急。聚石如伏兵,敛敛波下立。”^{[1]478}精准刻画了淮河受两山约束、水流湍急、礁石潜伏的地貌特征,呈现了暗石险情的空间特征。顺流而下,夜泊寿春龙潭(今安徽凤台黑龙潭)时遭遇的“黑风破舟”事件,其《泊寿春龙潭上夜半黑风破一舟》诗言:

盲风吼空来,不识前山遮。回激入湾口,暗浪腾水涯。喧闻破我船,沉没惊一家。晦昧若涂漆,心绪如乱麻。灯光不出户,鬼火空照沙。百物任漂荡,薄命谁怨嗟。^{[1]482}

狂风如盲,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巨浪在湾口激荡翻腾,邻船倾覆的巨响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惊恐,将黑夜的恐怖和诗人及家人的绝望无助刻画得淋漓尽致

致。灯光在风中熄灭,唯有“鬼火”(磷火)在沙洲飘忽,更添诡异凄惶。这场生死一线的经历,是清境中潜藏凶险的极端体现,打破了淮河作为平静水路的想象。若非亲身经历且善于书写,很难呈现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效果。

嘉祐元年(1056)秋自扬州归京,于泗州(治今江苏盱眙)作《闰三月八日淮上遇风杜挺之先至洪泽遣人来迎》,言“晓出淮口时,夜来风已止”^{[1]852},晓出淮口时风平浪静;“半路逢怒号,客心愁欲死”^{[1]852},半途却突遭狂风,令人窘迫,感叹“忠信虽可仗,鱼鳖将异此”^{[1]852},在自然之力面前,人显得渺小,舟船随时有倾覆之虞。

正如沈扬所指出的,“宋人既承认遭遇舟阻是一次水上历险,又视之为一场造奇体验,他们以猎奇审美的心态,力图展现造物馈赠的难以言说之美”^[7]。梅尧臣淮河舟行经验十分丰富,对于淮河险情能够以猎奇心态,从奇观塑造的角度缘事造境,诉诸诗篇,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这种清境险情的意境塑造展现了淮河作为实际交通要道的复杂性和行旅者的真实困境,“……具有目光从奇、描写细密精确的特点,使得诗歌成为反映日常生活的镜子,甚至具备私人生活史、心灵史的性质”^[8],开拓了淮河书写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思路,丰富了淮河文学空间的现实内涵。

1.3 清境沉吟

在梅尧臣之前,诗人较少关注淮河的日常生活景观,其淮河书写与两岸民众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梅尧臣的淮河行旅,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闲暇的游览,而是奔波于仕宦之途或归乡(奔丧)之途。这种特定的行旅性质,使其目光在流连于自然清境之余,也投向了淮河两岸的社会现实。儒家士大夫的情怀,驱使他在舟行清淮时,敏锐地观察并深切地关注着沿岸的民生疾苦,这构成了其淮河书写中尤为可贵的社会维度,也是行于清境的深刻延伸。

庆历八年(1048)夏归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省亲途中,舟行淮上,他写下了著名的《小村》:

淮阔州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1]475}

正如近人陈衍所言:“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9]这首诗宛如一幅聚焦于淮河洲渚贫瘠乡村的特写镜头。“淮阔州多”点出淮河两岸的地理环境,“忽”字暗示了村庄的偏僻。“棘篱疏败谩为门”写房屋的简陋破败。“寒鸡得食自呼伴”以禽鸟得

食呼伴之“乐”反衬出淮岸农民的艰辛。“老叟无衣犹抱孙”,衣衫褴褛的老翁在寒冷中本能地紧抱孙儿取暖,令人心酸。“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进一步描绘环境的荒凉破败。废弃的小船上鸟儿站立,只剩下断掉的缆绳;被河水侵蚀的枯桑树,只剩下危危欲断的根须。最后两句“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处在如此困苦的生存状态,他们却依然被登记在朝廷的户籍册上,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徭役,其中的“谬”字包含了诗人对淮河两岸百姓的深切同情。这幅淮河岸边贫困凋敝的民生图景,与“白鱼跳”“平沙白鸟闲”等清境安逸形成强烈反差,揭示了淮河清境中的民生疾苦。

更早的庆历元年(1041)《淮上杂诗六首》中,虽以描绘自然风物为主,但其三“橡子随薪束,蔬科带土携”^{[1]189}、其四“苦寒非塞外,霜落夜淮清”^{[1]189}等句,也隐约透露出行旅者生活的艰辛与环境的清寒。嘉祐元年(1056)《宿洪泽》“宦游常作客,未息为贫催”^{[1]852},更是直接道出了自己为生计所迫、常年漂泊宦游的无奈,这种个人的漂泊感,也使其更能体会底层民众的艰辛。

总之,行于清淮,梅尧臣以其敏锐的感官、切身的体验和儒者的情怀,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清境空间。这里有澄澈的视觉意象(碧峰、白鸟、白鱼、白露、黄菊、绿荫),有清寂或寒冽的听觉与触觉感受(入浦声、寒潮、霜落);这里有淮河本真的纯净美好,更有其作为自然力量的狂暴(黑风破舟);这里不仅有诗人个体的行旅体验,更有其目光所及、心之所系的淮河两岸民生百态(《小村》的破败凋敝)。这些基于真实行旅、多感官交融、饱含现实关怀的书写,共同奠定了其淮河诗歌深切感人的坚实基础,超越了前人对淮河的符号化、类型化表达。

2 情因淮生

频繁的淮河行旅使梅尧臣与淮河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感联系,淮河成为其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淮河逐渐从异乡河流升华为承载其情感慰藉与地方认同的“有情之河”。

2.1 淮上友情

淮河作为南北交通要冲,是士大夫宦游往来的必经之路,这为梅尧臣在淮上或与淮河相关的交往提供了契机,这些交往成为其淮河情感认同的重要起点和核心内容。庆历元年(1041)秋赴湖州(今江苏湖州)任途经寿州(今安徽寿县),时值知州宋祁修建亭台(后成“寿州十咏”之景)。梅尧臣与宋祁同游唱和,作《望仙亭》云:“公来有馀乐,所乐为郡

间。讼稀聊自适,静胜以纾颜。”^{[1]188}此诗既赞美宋祁治政清明,更表达了对宋祁超脱官场喧嚣、追求内心适意境界的共鸣。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共同向往,使淮畔寿州成为他们思想交流的场域。随后创作的《和寿州宋待制九题》组诗则是对这次交游的回想。其中《狎鸥亭》借“鸥鸟忘机”典故,以“然此海客心,还应无有愧”^{[1]210}互勉,淮畔亭台(狎鸥亭)成为象征友情与隐逸理想的物质载体。

在淮河行旅中,与友人不期而遇是梅尧臣最为开心的事情之一,比如其与欧阳修在涡口(涡河入淮处)的偶遇。皇祐元年(1049)正月,梅尧臣奔父丧南归,行至涡口,正值欧阳修自扬州北上赴颍州(今安徽阜阳)任。《涡口得双鳊鱼怀永叔》记录了戏剧性的一幕:“我今淮上去,沙屿逢钓翁。因之获二尾,其色与昔同。”^{[1]513}19年前洛阳初识的欢愉,与19年后淮上涡口相遇的丧父之痛和重逢之喜碰撞。仆人恰在此时献上两条鳊鱼,其色泽(“其色与昔同”)勾连起往昔回忆。涡口这一淮河节点承载了人生大悲(丧亲)与大喜(重逢)的极端情感,成为友情在命运无常中迸发光芒的见证地。这些淮上或与淮河相关的友情互动,使淮河成为充满人情温度的诗性空间。

2.2 亲情羁绊

在梅尧臣与淮河间的人地关系中,亲情是重要因素。皇祐元年(1049),他在奔父丧途中,经过淮上名山荆山,写下《寒食日过荆山》:“山邮虽禁火,岭树自生烟。呜咽同归橹,悲哀欲问天。泣亲非泣玉,流泪剧流泉。春勒横刀脍,何心更食鲜。”^{[1]512}父亲去世的深沉悲哀浸染了感官世界中的淮河风物,梅尧臣看到山上的烟雾,听到船橹的呜咽,念及卞和泣玉于荆山,心中悲哀愈发浓烈,泪如泉涌,毫无食欲。得益于淮河的“江山之助”^[10],受到淮河两岸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文化底蕴的感召,梅尧臣在一种适宜的人地关系中,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诗中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人地对话关系,借由淮河倾诉悲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亲人离去对其的精神压迫。

又如皇祐五年(1053)秋,梅尧臣嫡母去世,他送灵柩归宣城,途中作《过淮》:

侍亲数数来浮汴,护柩迢迢复渡淮。旨蓄曾无御寒具,细君唯有隐居钁。月衔远入鱼衔浪,潮退长汀蚌阁崖。素服华颠色相似,青铜不忍见形骸。^{[1]704}

过去多次陪同亲人乘船往来汴河、淮河,如今却要通过汴淮护送灵柩归乡,诗人心中满是哀伤,诗歌开篇便是人间生离死别的悲哀。置身宦所汴京与家

乡宣城中间的淮河,诗人内心情感展露无遗,不仅有着嫡母去世的悲痛,更有近乡忧愁和暮年哀伤。

2.3 地方认同

梅尧臣对淮河的情感,经历了一个从疏离到认同、最终升华为精神归依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他对这片土地日渐深化的地方认同。景祐元年(1034)初入淮河,《初见淮山》中“南归不厌远,况在水云间”^{[1]70}虽流露出对江湖空间的向往,但“南归”二字仍带有明显的客居心态,视淮河为通往江南故乡的必经客途。随着行旅次数增加,特别是庆历八年(1048)一年内两次密集往返后,这种心态悄然转变。《淮岸》中对“白鱼尾”“苍獭迹”^{[1]476}等生态细节的细致观察和精准捕捉,显示他已能超越匆匆过客视角,开始用近乎“本地人”的眼光去审视和感受淮河的生命律动。

晚年,淮河逐渐成为其漂泊生涯中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嘉祐元年(1056)《宿洪泽》篇末叹道“宦游常作客,未息为贫催”^{[1]852},道尽宦游的疲惫与无奈。开篇“舟子起添缆,夜潮同雨来”^{[1]852}的描写流露出一种默契:舟子夜间起身加固缆绳的动作,夜潮与雨声交织的自然声响。这些淮河行旅中的寻常细节,已成为他生活经验的一部分。《阻浅挺之平甫来饮》中,在绿榆荫下与友人置酒共饮让他在困境中体会到“引觞吞日光,耳热不复叹”^{[1]855}的片刻欢愉,表明淮河已开始成为其“忘忧之地”。这种地方认同在嘉祐五年(1060),即其生命最后一年的《酬杨愈太丞之寿州见别》中达到了极致:

眼见荣华能几日,心知富贵只秋毫。淮南鱼美香粳滑,饱去清吟岂不高。^{[1]1143}

面对生命终期,诗人将“庙堂”的虚幻荣华与“淮南”生活的现实美好(“鱼美”“香粳滑”)及精神自由进行对比。此时的“淮南”已非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象征着远离政治纷争、享受自然馈赠、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生活空间,是“清吟”所代表的精神家园。从“异乡客”到“精神归依”,对梅尧臣而言,淮河最终完成了从地理水道到情感空间再到理想家园的升华。友情的热度、亲情的牵绊,以及个体在奔波中对安顿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都在淮河空间里发酵、深化,最终凝聚为梅尧臣对这条河流独特而深厚的地方情感。淮河成为其生命中一条流淌着温度与记忆的“有情之河”。

梅尧臣对淮河的地方认同更渗透于对具体风物的细腻感知中,最为显著的体现是其对淮河白鱼的喜爱。“作为南方人,梅尧臣在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南食的偏爱之心和宦游各地时对南食的想念之

情。”^[11]他自称“楚客”(《送张秀才之淮南》“聊为楚客唱”^{[1]132}),有时以楚水称呼淮河(《舟次山阳呈王宗说寺丞》“月照楚水滨”^{[1]454}),将糟白鱼称作楚糟(《杨公懿得颖人惠糟鲋分饷并遗杨叔恬》“楚糟增味爽”^{[1]509}),即其将淮河白鱼当作南方美食,自己家乡的美食。

这种联结背后是梅尧臣对淮河的地方认同。一方面,梅尧臣对淮河白鱼的喜爱远超其他鱼类。如《和杨秘校得糟鲋》“食鱼何必食河鲂,自有诗人比兴长。淮浦霜鳞更腴美,谁怜按酒敌庖羊”^{[1]509},直言淮河白鱼比河鲂更美味,甚至能与羊肉媲美。这种对淮河白鱼的高度赞誉,并非单纯的味觉评价,而是融入了他对淮河的归属感。另一方面,淮河白鱼在梅尧臣的诗中是淮河地域文化的符号。如《糟淮鲋》“寒潭濯浅濑,空潭多鲋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1]501},描绘了淮河白鱼的生长环境与捕捞食用场景。他特意提及“昔闻渔父贤,尝勉楚人鲋”,将淮河白鱼与楚地文化典故相联系。身为楚客的他,把淮河称作楚水,把糟白鱼称作楚糟,显然是将淮河白鱼纳入了南方饮食文化体系,视其为家乡美食,这是对淮河地域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同。

王立增关注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地方性特征,认为地方认同是其情感取向,诗人对景物的审视和选择,基于对地方的认知和感受,把自己认为最能体现地方特色和契合当时心理情境的部分写入诗歌,并通过不断调适人地关系,最终实现了对地方的部分或完全认同^[12]。梅尧臣的宦游经历充满漂泊感,而淮河白鱼带来的味觉体验,成为他在漂泊中寻找安稳的寄托。《依韵和杭州梅龙图入淮见寄》中“白鱼已荐糟增味,红稻新炊粟厌怀”^{[1]995},将白鱼与红稻并提,勾勒出淮河岸边富足安宁的生活图景。这与他在京城等政治空间感受到的利益纷争形成鲜明对比,让他在淮河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他对淮河白鱼的喜爱,实则是对淮河所代表的那种远离纷扰、自在安宁生活的向往,是对淮河的地方认同。

3 临水而思

舟行淮上,面对两岸的先贤遗迹,遥想历代英雄的成败兴衰,感怀于河水的永恒流动与人生的短暂漂泊,梅尧臣的淮河书写由此被赋予了独特的思想深度,“临水而思”成为其淮河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升华维度,其淮河书写展现了现实观看与历史沉思交融的时空特色。

3.1 圣贤智慧

淮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两岸

遍布着承载历史记忆的遗迹。濠州(治今安徽凤阳)的庄生台(濠上观鱼处)和涂山(相传大禹娶妻及会诸侯处)是触发梅尧臣哲学思考的重要节点。庆历元年(1041)秋,梅尧臣陪时任淮南转运使的魏兵部同游濠上庄生台,写下《陪淮南转运魏兵部游濠上庄生台》:

周当战国时,何为守静正。干戈既日寻,仁义固不竞。……是将万物齐,不顾千金聘。所以忘形骸,所以保性命。安能小仲尼,岂不识世病。我从魏公来,访古停乌榜。^{[1]188}

开篇将庄子“守静正”的思想置于“干戈既日寻,仁义固不竞”的战国乱世中,凸显庄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是将万物齐,不顾千金聘”概括了庄子哲学的核心——“齐物论”与“逍遥游”。“所以忘形骸,所以保性命”点明这种思想对个体生命与精神自由的关注。尤为深刻的是,梅尧臣并未将儒道对立,言“安能小仲尼,岂不识世病”,认为庄子在乱世中的超脱出世与孔子的人世情怀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极高的智慧。“访古停乌榜”,不仅是停船登岸的驻足,更象征着与庄子跨越时空的对话。

庆历八年(1048)秋,舟过涂山,梅尧臣写下《涂山》:

古传神禹迹,今向旧山阿。莫问辛壬娶,从来甲子多。夜淮低激射,朝江上嵯峨。荒庙立泥骨,岩头风雨过。^{[1]479}

此诗由眼前涂山勾连大禹治水的远古传说,展开对人生功业的思考,颂美大禹治水的意义。其中“夜淮低激射,朝江上嵯峨”两句以淮河昼夜不息的奔涌,隐喻大禹功业的永恒性。结尾“荒庙立泥骨,岩头风雨过”言供奉大禹的庙宇终会荒废,泥塑神像终将朽坏,但是涂山岩石历经风雨依然矗立。这暗示着外在的纪念物终将消失,但大禹治水所体现的顺应水性的智慧与自然同在,是永恒价值的一种体现。

3.2 英雄成败

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作为淮河下游重镇,是汉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地,也是其人生悲剧的起点与终点。淮阴侯庙成为梅尧臣凭吊英雄、反思历史兴衰与命运无常的重要场所。皇佑五年(1053)冬,归葬嫡母途经淮阴,梅尧臣作《又平律一首》与《淮阴侯庙》,表达了对韩信命运的深沉慨叹。其《又平律一首》言:“乡人奏箫鼓,舟子赛豚鸡。”^{[1]706}描绘了民间祭祀韩信的热闹场景。结尾“不改寒潮水,朝平暮复低”^{[1]706}尤为警策:寒来暑往,淮河的潮汐永恒地涨落(“朝平暮复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这永恒的潮汐,映衬着英雄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悲剧命运的不可逆转,赋予历史兴衰以一种超越性视角——个人的荣辱成败终将湮灭于时间长河。

《淮阴侯》则更直接地叩问英雄的命运。“功既高天下,身何不自防”^{[1]851}直指韩信政治智慧的缺失与悲剧的根源。“空名流未竭,淮水共汤汤”^{[1]851}则将韩信身后流传的空名与汤汤流淌的淮河水相联系,揭示出英雄的永恒不在其功业本身,而在于其命运所引发的后世无尽的历史思考与人生喟叹,如同淮河水般奔流不息。淮河在此,既是英雄悲剧发生的具体空间,也成为其历史意义永恒流淌的象征。

3.3 顺应之道

淮河本身的流动性,其昼夜不舍的奔流、潮汐的涨落、行舟的顺逆,最终成为梅尧臣思考人生际遇、安顿个体生命的哲学隐喻。频繁的行旅体验,尤其是一次次的阻风、阻浅,使其对人生的顺逆有了更深的领悟。皇祐五年(1053)作《使风船》以行船为喻:

清淮直上水连天,坐看高帆后复前。自是乘风有迟速,不由人力爱争先。^{[1]705}

在开阔的淮河水面上,船只航行快慢全凭风势,非人力所能改变,诗人以此隐喻人生顺逆成败取决于时势机遇,而非个人的主观意愿。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与其庆历元年(1041)《次韵和长吉上人淮甸相遇》中“尚忝齿纓绶,终年趋路岐”^{[1]193}所流露的早年对宦途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随着淮河行旅的逐渐增多,其人生心态的愈加成熟。

嘉祐元年(1056)《阻浅挺之平甫来饮》则将这种从淮河行旅中悟出的哲思推向极致:

泛淮忌水大,我行浩以漫,溯汴忌水浅,我行几以干,偶与困滞并,将独为此难。……引觞吞日光,耳热不复叹。俯仰已陈迹,未可忘兹欢。谁思费生术,幻惑宁盘桓。^{[1]855}

行舟淮汴,在淮河担心水大浪急,在汴河又苦于水浅难行,如同人生一般困滞难行。在这困境中,好友意外来访。在淮河堤岸的绿荫下,梅尧臣与友人置酒共饮,暂时忘却了行旅乃至人生的愁苦。酒酣耳热之后,他悟出“谁思费生术,幻惑宁盘桓”,大叹功名利禄的虚幻和焦虑徘徊的徒劳,要顺应当下的境遇,寻求心灵的安顿。淮河流淌以其自身特性,启示了梅尧臣领悟到在人生困顿中保持通达、在世事无常中寻求安顿的生命哲学。

4 结论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言:“文明之发

生,莫要于河流。中国者,富于河流之名国也。”^[13]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与黄河、长江、淮河、大运河等河流所提供的水源、交通条件等不无关系。淮河在北宋的交通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淮河等河流的文学研究,并具体到梅尧臣等个案,是探寻中华文明奥义的有益尝试。淮河对于梅尧臣而言,远非一条客观的地理水道,而是其宦海浮沉中的精神慰藉之所和生命体验的特殊空间。梅尧臣通过其淮河行旅与书写构建了充满鲜活生命体验的淮河文学地理空间,突破了此前诗歌中淮河书写相对单一、模糊、类型化的局限,作为关键诗人推动了内山精也所言的“淮河诗之质变”的实现,为后世树立了融景、情、思于一体的行旅书写典范,使淮河从地理意象升华为一个承载复杂生命体验与文化记忆的文学地理空间。对梅尧臣淮河行旅与书写的研究,或可成为探究北宋文人与河流互动关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 [1] 梅尧臣.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 朱东润, 编年,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2] 吴孟复. 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6: 155 - 232.
- [3] 内山精也. 庙堂与江湖: 宋代诗学的空间[M]. 朱刚, 张洵, 刘静, 等, 译. 慈波, 校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4] 刘克庄. 后村诗话[M]. 王秀梅,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1.
- [5] 王晓骊. 澄江霁月清无对——论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J]. 兰州学刊, 2011(5): 113 - 117.
- [6] 胡应麟. 诗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78.
- [7] 沈扬. 困程的诗意: 宋代文人的舟阻体验与诗歌书写[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46 - 54.
- [8] 梅国春, 柏红秀. 梅尧臣“水上诗路”书写的叙事性及其诗史意义[J]. 江淮论坛, 2025(3): 171 - 177.
- [9] 陈衍. 宋诗精华录[M]. 高克勤, 点校, 集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41.
- [10]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135.
- [11] 苏碧铨. 友情·乡情·雅情: 梅尧臣礼物酬答诗的情感析微[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5): 30 - 37.
- [12] 王立增.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地方性特征[J]. 江淮论坛, 2025(3): 162 - 170.
- [1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饮冰室文集之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78.

《泗虹合志》的成因与文献价值析论

谢添*, 曹金发

(淮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泗虹合志》是《泗州志》与《虹县志》的合并编纂,在旧志编修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泗州与虹县方志内容的分合记载,对旧志内容的详实考证以及更正讹漏,增减门类内容,采取更为符合的体例。作为清代安徽唯一一部合志,《泗虹合志》在成书原因方面主要涉及全国性志书的编修、泗州治所的迁移、《泗州志》编修的前例等多个方面。其收录的丰富文献,在方志合并编纂、泗州历史地理变迁、境内水系变迁以及地区捻军史的研究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关键词:《泗虹合志》;《虹县志》;成因;捻军;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6-0122-07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Literature Value of Sihong Combined Gazetteer

XIE Tian*, CAO Jinf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The Sihong Combined Gazetteer* is a compilation of the *Sizhou Gazetteer* and the *Hongxian Gazetteer*, featur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vision of old gazetteers. It primarily manifests in the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ntent from the gazetteers of Sizhou and Hongxian county, detailed verification and correction of errors in the old gazetteers, as well as adjustments to categories and formats to better align with contemporary standards. As the only combined gazetteer in Anhu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ihong Combined Gazetteer* wa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mpilation of national gazetteers, the relocation of the seat of Sizhou administration, and precedents set by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zhou Gazetteer*. The rich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t contains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ombined gazetteer compilatio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in Sizhou, transformations in water systems within its terri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ianjun army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Sihong Combined Gazetteer*; *Hongxian Gazetteer*; cause; Nianjun army; literary value

我国早在隋朝时期就组织官方力量编写地方志,至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地方志。当时地方志编修的方法和编纂的体例已经较为成熟,不过地方志主要是以记载某一地区为主,合志的数量很少。合志是指两个地区合并编纂在同一个方志中,如清代陕西的《咸宁长安二县合志》、江苏常州的《宜兴荆溪合志》、安徽的《泗虹合志》等,上述都是两个地区合并编纂的地方合志。其中《泗虹合志》是清代

安徽唯一一部合志,也是全国合志中体例较为完备的一部。学术界关于泗州地区方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关于泗州地区方志的整体论述^①;关于康熙《泗州志》的研究,包括成书背景、编纂人员、文献价值^②。通常学者较少关注《泗虹合志》,因此本文从《泗虹合志》的编纂为切入点,探讨其成因和价值。

收稿日期:2025-03-17 *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谢添(1999-),男,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E-mail:1035141668@qq.com;曹金发(1971-),男,安徽宿州人,教授,博士。E-mail:jinfacao@163.com

1 《泗虹合志》编纂概述

《泗虹合志》成书于清光绪年间,泗州知州方瑞兰负责编纂,泗州岁贡生江殿曜、虹乡廪生许湘甲负责执笔,在乾隆时期叶兰《泗州志》的基础上,并入虹县方志编纂而成。同时,方瑞兰等人参考了其他史书,用来补充和修订叶兰《泗州志》的缺失。如“叶稿仅三册,诸多未详,兹志为卷十九列门十二,较增什之六”^[1],方瑞兰对建置、职官、学校、人物等内容进行补充,舆地、水利、食货、艺文则仍以旧志为

主。

光绪《泗虹合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编纂体例与前代不同,《泗虹合志》是《泗州志》与《虹县志》的合并编纂。体例是志书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著述的表现形式,它对志书起到统领作用。正如方志学家李泰棻所说:“体例之于方志,如栋梁之与房屋,栋梁倒置,房屋安的稳固?”^[2]因此一部志书的质量往往通过体例反映。将《泗州志》与《泗虹合志》体例对比,见列表1。

表1 乾隆《泗州志》和光绪《泗虹合志》体例对比

乾隆泗州志目录	光绪泗虹合志目录
序	序
	卷首 街名 序
卷一 舆地 舆图、沿革、分野、山川、形胜、风俗	卷一 舆地志 图考、沿革表、至到、分野、山川、形胜、风俗
卷二 建置 城池、公署、坛壝、祠庙、邑里、保甲、马递、关津、桥梁、古迹、陵墓	卷二 建置志 城池、公署、坛壝、祠庙、邑里、保甲、关津、桥梁、古迹、陵墓
卷三 水利上 河总、淮河、洪泽湖、汴河、濉河 水利下 堤堰、沟围、三县河道、泗虹河总论、淮河论、濉河论、淮黄考、洪泽湖考	卷三 水利志上 河总、淮河、洪泽湖、汴河、濉河
卷四 轺卹 祥异、蠲赈、	卷四 水利志下 堤堰、沟围、三县河道、泗虹河总论、淮河论、濉河论、淮黄考
卷五 食货 户口、田赋、盐策、积储、物产	卷五 食货志 户口、田赋、漕运、盐策、积储、蠲赈、物产
卷六 学校 学宫、祀典、书籍、弟子员额、学租、书院、义学、乡饮酒礼	卷六 学校志 学宫、祀典、书籍、学额、学田、义学、书院、试院、附各礼仪
卷七 秩官 官制、秩官年表。营制、卫制	卷七 武备志 兵制、兵事、驿传、铺递
卷八 选举 进士、举人、贡生、荐辟、武科、武勋、勋封、恩荫。应例杂职	卷八 职官志上 官制、文职表一、文职表二、武职表三
卷九 名宦 汉、南北朝魏、北齐、唐、宋、元、明、本朝	卷九 职官志下 名宦、政绩
卷十 人物上 乡贤、乡宦、乡饮宾、文苑、孝义、善行、隐逸、耆寿、流寓、方技、方外 人物下 列女	卷十 选举志 选举表、文武进士表、文武举人表、诸贡表、杂进仕宦表、武阶附表、封荫附表
卷十一 艺文 自唐起	卷十一 人物志上 乡贤、乡宦、忠节、文苑、武功
	卷十二 人物志下 孝友、义行、隐逸、方技、乡饮宾、耆寿、流寓
	卷十三 列女志一 录前志
	卷十四 列女二 已旌录
	卷十五 列女志三 待旌录
	卷十六 艺文志一 文一
	卷十七 艺文志二 文二
	卷十八 艺文志三 诗一
	卷十九 杂类志 祥异、仙释、摭佚、辨伪

通过对比发现《泗虹合志》有着以下的特点:第一,内容分合记载。《泗虹合志》的编纂,与前志有着明显的不同。《泗虹合志》是泗州与虹县两个地区方志的合并编纂,方瑞兰根据:“‘分土不分民’和‘史分则分’的分合原则”^[3],采取分与合的方法。有关民众的内容合并记载,如户口:“虹归泗,其泗、虹两境户口合并开报。是年泗、虹共十三万六千一

百四十一户”^{[1]119},以及《人物志》中合并记述泗州与虹县乡贤人物等,有关民生的内容一目了然。而有的内容不加区分记载,导致虹县方志内容的遗漏,因此将泗州与虹县区域划分以及历史上分开的内容,分别记载。如卷一《輿地志》中的历代分属沿革表,就分述记载泗州和虹乡的建制沿革(见表2)。

表 2 泗州与虹县分属沿革表(部分)

后周	唐	明	国朝
泗州 并朱沛,入高平,改曰:“泗州”,泗州之名始此	至德初,仍为泗州,隶河南道	仍为泗州,属凤阳府……领县二:盱眙、天长	乾隆四十二年,州治迁于虹,……称新州,辖县如故
虹乡 改潼州为宋州,领县曰:“晋陵”	贞观八年,……以虹隶泗州。乾元元年,割隶宿州	洪武四年,改隶中立府,即今凤阳府	乾隆四十二年,县裁归于泗,为虹乡

除建置沿革外,《水利志》中分述“泗病在淮,虹痛在濉”,《职官志》中分述历史上泗虹两地职官等。虽为合志,浑然一体。

第二,详实考证,更正讹漏。乾隆《泗州志》中有不少的错误之处,方瑞兰等人都进行了修正,正如方瑞兰在《泗虹合志》凡例中所说:“叶稿各门类,或考严未确,或疏漏未载”^{[1]1}。如在卷二“古迹”中记载:“濠城即洩城在城西南……即虹之濠城也,汉有洩侯。应劭曰:‘洩水,南入淮’。”^{[1]76}方瑞兰等人根据考证发现,濠城更名为洩城,过去属于虹县,后经区域划分,将濠城划归灵璧,并在灵璧县志中找到相关证据,用小字注明,“按:濠城,古虹地,今属灵璧县,《灵璧志》云:‘古之洩,今之沧也’。”^{[1]76}同时,方瑞兰等人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于编修时增补的字,用小字加以注明,不会干扰后人的判断。如卷二“关津”:“二城沟渡州,东南一百七十里”^{[1]73},记载二城沟渡州时,会在下面注明小字“今废”;方瑞兰补充《泗虹合志》内容时,抄录其他书籍的地方,也会在书尾注明出处,如卷五“漕运”中:“泗州衙赋役”下面注明来源,“据泗衙乾隆五十二年,印册条列”^{[1]132}。

第三,增减内容,体例精严。乾隆《泗州志》一共分十一卷,下设门类七十二个。光绪《泗虹合志》一共十九卷,下设门类八十一个。相近或相同的一共六十四个。删去了洪泽湖考、营制、衡制、应例杂职等,新增漕运、兵制、兵事、驿传、铺递、政绩、辩伪等内容。对乾隆《泗州志》体例中的优点进行吸收。如《泗虹合志》凡例中说到:“国朝乾隆四十二年,虽裁虹归泗,而田赋、户口、学额诸大端,泗虹仍不相紊,故于数门中,记载亦从其分。”^{[1]1}而在前志的基

础上增削,体现了光绪《泗虹合志》的革新意识,尤其是《泗虹合志》在版心中增加卷数和名称,如“泗虹合志,卷三,汴河,一。”^③这种方法使得每卷内容一目了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泗虹合志》不是简单地将《泗州志》与《虹县志》合并,而是对叶稿旧志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补,编纂而成。修改的范围涉及体例、内容、分类等。《泗虹合志》在编纂的同时,注明修补的内容,不破坏前人的成果。

2 《泗虹合志》成书原因

作为清代安徽唯一一部合志,《泗虹合志》是对泗州和虹县两个地区地方志的合并编纂。在地方志层出不穷的清代,方瑞兰作为泗州知州,为什么要将两部方志合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从清代的修志传统、泗州治所的迁移、《泗州志》的编修进行探讨。

2.1 全国性志书的编修为《泗虹合志》成书提供契机

清朝时期,修地方志是每个官员的重要任务,来源于康熙时期。康熙初年,要求各省编纂通志,汇编为《大清一统志》,朝廷下令,“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饬禀高才生以从事”。^{[4]1}康熙十一年及次年,就有《广东通志》30卷、《高唐州志》12卷等省府、州、县志出现。“廷议有修志之举……促修之檄频至,其责又无可辞,遂不得已,勉为修辑。”^{[5]2-3}《虹县志》也在此背景下于康熙十一年成书,“康熙十二年知州李德耀主持编修《泗州志》三十卷”。^[6]三藩叛乱,使得修志活动中断。三藩叛乱平定后的次年,朝廷再次下令命各地为《一统志》继续编纂地方志,“今上御极之二十一

年,命使臣纂修《大清一统志》,诏天下府、州、县各以其志来上。”^{[7]15}康熙二十二年,又令通志三月成书。命令下达,通志编纂加速。

康熙二十五年,朝廷正式启动《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加速了地方志的编纂效率。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有大量的方志刊刻,其中《泗州志》也于康熙二十七年完成编纂,康熙《泗州志》志序中有“今天下车书万,国化洽四海,天子命儒臣纂修一统志。”^{[8]1}《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泗州志》编纂的直接原因。

清代三修《大清一统志》,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多次发布修志诏令,对清代地方志的普遍编修,起到了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十一年到道光二十二年共约修成省、府、州、县志 3201 种,其中,三部《大清一统志》纂修期间约纂有 2519 种,约占现存清代方志 4889 种的 52%”^[9]。地方志的编修,作为一种文化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和编纂过程。其中编修两三次方志的不在少数,如泗州地区,分别在康熙十二年、康熙二十七年、乾隆五十三年、光绪十三年修志,其中“嘉庆十八年,州守左辅,曾修一次。同治九年,州守王希,曾又邀泗贡生许培森、虹乡贡傅俊章,续修一次”^[11]。方瑞兰秉承这一修志传统,并通过修志为泗州治理提供依据,如《水利志》对淮河、汴河、濉河、洪泽湖四大水系的流向、分段长度、土方量以及历代水患治理的记载,为治理泗州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工程数据;《食货志》记载的土地分配和赋税制度,为泗州官员调整税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参考。

清代泗州曾修志六次,不仅是由《大清一统志》编修而形成的泗州地区修志传统,还紧密结合泗州治理的实际需求,为《泗虹合志》的成书提供了契机。

2.2 泗州治所的迁移为《泗虹合志》编修提供了地理因素

“泗州城位于淮河北岸今盱眙县境内”^[10],泗州之名起始于后周,唐朝时期,泗州与临淮县同一治所,宋朝时期,泗州因地跨汴河两岸而兴起。至清朝康熙时期,泗州仍属凤阳府管辖。“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并将五河县划归泗州管辖,此时泗州管辖三县,盱眙、天长、五河。康熙十六年(1677 年),靳辅治河,“大修高家堰,南抵翟家坝,北迄烂泥浅,并大辟清口,挑引河四五道”^[11]。康熙十九年(1680 年),泗州州城淹没于洪泽湖,“靳辅主持的这次河工是泗州沉没的直接原因”^[12]。随后,“官民均采取选择高阜地区避难的临时措施”^[10],州治所暂驻

于盱眙,因旧城被水淹没,无法退水,后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州治迁于虹,士民乐之,称新州,辖县如故”^{[1]40},将治所迁于虹县。清朝时期虹县隶属于凤阳府,“乾隆四十二年,县裁归于泗,为虹乡”^{[1]40}。至此,泗州与虹县的合并完成了。

虹县并入泗州,使得泗州疆域发生了大的变化,“居然郡国规模,近复并虹为治,划疆分野,迥异从前”^{[1]1},泗州治所迁移前,辖三县,疆域规模已经达到郡国级别。虹县的并入,使得泗州治理范围也发生了变动。原有的旧志,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如康熙时期,莫之翰编修的《泗州志》,记载的范围只包括盱眙、天长两县。而泗州在雍正二年(1723 年)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分别并入了五河县与虹县。地理位置的变动和治所的迁移,要求编纂新的方志。

《泗虹合志》序有:“自泗城沉于水,旧志罕有,有亦残缺”^{[1]1},因旧城的淹没和治所的迁移,导致泗州方志受损严重。以至于重修地方志时“索州志书吏,皆曰‘无之闻’,而愕然”^{[1]1}。泗州知州方瑞兰从当地士绅口中得知,泗州城被水淹没后,旧志已丢失大部分,仅存的只有乾隆时期叶兰编纂的《泗州志》三册,并且有许多未详细的地方。方瑞兰在重新编修泗州方志时,要重新考虑虹县的合并问题。而合志“它最大的长处是适用于‘本处一地,史事难分,撤并频繁,建置较迟’的地方”^[13],方瑞兰采用合志的方式,反映泗、虹合并后的地理、人文与经济状况,编修时整合泗、虹的历史与现状,并以“分土不分民”的原则实现了行政与文化的整合。

因此,泗州治所的迁移、虹县并入泗州,为《泗虹合志》的编纂提供了地理因素。

2.3 《泗州志》编修的先例为《泗虹合志》编修提供了示范

清代《泗州志》,编修始于清康熙年十二年(1673 年)泗州知州李德耀。当时,虹县未归并泗州,时任虹县县令龚起翬也编修了《虹县志》。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治所迁移至虹县,以及虹县并入泗州。时任泗州知州叶兰,决定重修《泗州志》,“考泗旧志,修于康熙戊辰,距今百余年,升直隶州,辖县三,与夫裁虹移泗,皆其所不及载”。^{[14]1}一方面,认为旧志距今已有百年,泗州升为直隶州,将五河县纳入管辖范围,裁撤虹县并入泗州,迁移治所至虹县等,都是旧志所不记载的。“邑疆或数年而变,或数十年而变,于焉□其播迁,考其规划,辨风土,以续成新志,官斯土者之任也。”^{[15]1}另一方面,叶兰认为疆域的变化,有必要重修新的方志,并且认

为这也就是作为地方官员的责任之一。

将虹县编纂进《泗州志》中,从叶兰开始。《泗虹合志》凡例有“洎并虹为治,州守叶公,始就各志汇纂之,合泗虹为一书”^{[1]1},叶兰将泗州与虹县合并在一志中,“未竟其事,而去噫”,但因叶兰中途离开,方志未完成,故仍以《泗州志》命名。至光绪时期,方瑞兰接任泗州知州,想重修泗州方志,“叶公去后,转瞬百余年矣,过此以往,重修未卜何日。时愈远则稽考愈难,慨然。欲补叶公未了之愿”,“嘉庆十八年,州守左辅,曾修一次。同治九年,州守王希,曾又邀泗贡生许培森、虹乡贡傅俊章,续修一次”^{[1]1}。但鉴于泗州历史上方志多次修志未果,如乾隆时期叶兰,嘉庆、同治时期左辅、王希等知州也未能完成续修。为了完成叶兰等人没有完成的遗志,因此,方瑞兰在编修泗州方志时,则仍以叶兰的《泗州志》为主体,将泗州与虹县分合记载于同一方志,并更名为《泗虹合志》。

《泗虹合志》凡例中,对于将泗州与虹县合并于一志中也有相关记载:“盱、天、五三县,既为属邑事迹,按门分载。”^{[1]3}方瑞兰认为,盱眙、天长、五河三县,作为泗州管辖已久,应分别记载。虹县划归泗州时间较短,所包含内容较少,应该合并一起,“惟此志,专为泗、虹而设,采访俱属近事,故只就田赋、户口、学校、职官、兵事诸大端,关教养同休戚者,采附州志,其余则有各邑乘在,兹不复赘列。”^{[1]3-4}方瑞兰也表明,《泗虹合志》所记载的属于距离时间较近,并且关于田赋、户口、学校等重要的事情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泗虹合志》的成书是方瑞兰为填补泗州方志的长期空白,继承前人的修志遗愿,将泗州与虹县的方志内容更好地结合而采用合志的方式编撰起来的。

3 《泗虹合志》的文献价值

地方志作为地区文化、风俗等反映,对地区的价值是巨大的。《泗虹合志》序有:“郡邑皆有志,非独资考镜,识变迁,亦人心风化所紧也”^{[1]1},清代普遍修方志的背景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志。《泗虹合志》不仅为地方的治理提供借鉴,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区域文献史料,是泗州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价值。

3.1 《泗虹合志》存录方志合并编纂的文献价值

《泗虹合志》作为清代安徽唯一一部合志,其编纂体例和内容整合体现了创新性和系统性,是其独特的文献价值。体例方面,分合有序的合志模式既独立记述泗州与虹县历史,又整合区域共性,遵循

“分土不分民”“史分则分”的原则,形成有机整体。如对两地的“建置”“职官”等独立记载,保留各自发展脉络,详见表2。将泗州与虹县的建置分开记载,即遵循“分土”原则。对于涉及民事的内容合并记载,如“水利、田赋、物产”等跨区域事物统一记载,《水利志》中,将泗州、虹县共享的汴河、濉河等治理经验合并分析,如“泗虹水利议”“泗、虹河道总论”等,即遵循“不分民”的原则。

另有层级分明的纲目结构。全书分十二门八十一目,涵盖建置、水利、食货、学校、武备等,层次清晰,详见表1。《泗虹合志》整合细分众多门类,原“祥异”“蠲赈”列入“轸恤”门类,合志删去了“轸恤”之名,并将“蠲赈”内容并入“食货”门类,“祥异”内容并入“杂志”门类。《职官志》中名宦,无论有无祀典,都记载其中,并且在《职官志》中另设政绩类,增加记载人员的范围,“凡未入祀,而有循绩可考者,入之”^{[1]2}。针对无祀而有成绩,并可以考证的人,也统统列入其中,从而扩大记载范围。同时,改变了旧志中列女放在《人物志》中的做法,将列女作为单独的一个门类。泗州地处战略要道,针对旧志缺少武备的内容,合志新增了《武备志》。泗州地区水灾频发,合志将河道丈量的尺寸方土,详细记载于《水利志》,保存了部分资料。《泗虹合志》整合众多门类,有所分合,一目了然,便于资料的整理和分类。《泗虹合志》的体例,为合志的编纂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3.2 《泗虹合志》存录泗州历史地理变迁的文献价值

“方志是记录特定区域某一时期地情的资料性的官修史书”^{[15]16},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泗虹合志》记载范围,涉及泗州地理、历史、物产、风俗、人物等方面,内容丰富,保存大量区域文献。《泗虹合志》中,卷一“沿革表”,记录泗州和虹乡从夏以来至清乾隆时期区域变化。如“后周:高平改曰‘泗州’,泗州之名始此。唐:开元二十三年,徙治临淮”^{[1]36-37},“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并以五河县来属。乾隆四十二年,州治迁于虹。乾隆四十二年,县裁归于泗,为虹乡”^{[1]40}。据此,可以了解泗州政区变化的详细信息。此外,《泗虹合志》记载泗州地理变迁也较为详细,合志对虹县旧志的考证:“虹县故城,在五河县城西,东晋废……唐,武德四年,于今县南百里,故虹城重置虹县,贞观十三年,移于夏邱城。”^{[1]78}合志同时记载了泗州旧址,如“泗旧城始于宋,面临淮水,距盱山二里,原有东西二城。”^{[1]57}《泗虹合志》的相关记载,为了解泗州与虹县历史地理

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3.3 《泗虹合志》存录泗州水系的文献价值

地方志为地方的生产发展服务,“它是经过筛选、整理、加工,具有系统化、条理化的特点,体现出一定的规律,具有较高的实用性。”^[16]地方志中记载的灾害,为防灾抗灾提供了重要数据。地方志对灾害的记载,具有区域性、连续性以及可靠性,对于掌握本地的自然灾害提供了重要资料。泗州地区靠近淮河、汴河、濉河、洪泽湖,水患不断。因此《泗虹合志》中,河流和水利建设有着专门的记载,“州境诸河已见山川门,兹更专为一编者,以泗历受河害也”^[184],《泗虹合志》的山川河流在卷一《舆地志》中,设有山川这一目,负责记载泗州境内的水流,但是泗州水患严重,因此专门设立《水利志》。《水利志》分为上下两卷,《水利志上》记载泗州境内所有河流概况,《水利志下》记载河道建设和堤堰等水利设施,以及治理淮河、濉河等经验。《水利志上》单独列出淮河、洪泽湖、汴河、濉河等河流流向,如“淮自桐柏逶迤至五河县,约千余里。始入州境以嶠石山与盱眙县之浮山为第一门户”^[185],“泗虹地势平坦,伏秋淫涝,堪虞诸河道应行挑濬之处,曾经分段丈量,故将尺寸方土详载于水利门,以备异日兴修之助”^[112],将过去疏通过的河道,分段丈量,详细记载。如对汴河下游工段的记载:“汴河下游工断。一段:自岔河口起,至城二头止,计三千二百八十弓,约开十丈宽,五尺深,该土五万七千四百方。二段……三段……四段……”^[198],并且论述了淮河、濉河等水患规律,归纳“然而黄水日高,清口虽辟,惟有入江一线之流。此临淮以下,所以岁虞水患也”^[1113]的规律,具有防灾的实用价值。合志中的《艺文志》有明进士常三省的《上北京各衡水患议》一文,记载了历代淮濉水灾情形。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水利的宝贵资料,《泗虹合志》的相关文献记载,为了解古泗州区域内的水系变迁,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3.4 《泗虹合志》存录泗州地区捻军活动的文献价值

泗州为清代皖北战略重地,该地区曾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活动,方瑞兰等人鉴于“淮泗为自古用武之地,国朝咸同间曾重兵戍守,历年桃、宿接壤处,又时复不靖,而叶稿无武备,故特为补增”^[112]。新增的《武备志》中详细记载了泗州地区捻军的活动,如捻军兵事:“咸丰六年二月朔,捻首陈秃手等率众千余,自灵璧乘夜突窜至虹西北乡,焚房大庄集左右数十里,练总郭得澡,邀集乡团数百人,截剿至杨庄集,遇匪迎战,死之。”^[1207]据此可以

了解咸丰时期泗州地区捻军的活动。至同治时期,泗州的捻军活动亦愈发激烈。如:“同治元年二月戊辰,巨捻张落刑由州东南窜扰双沟镇,图攻葫湫套……阵亡练丁共五百九十二名,殉节妇女共四十名。”^[1211-212]此外,《泗虹合志》中对捻军的称呼也不相同,如:捻首陈秃手,巨捻张落刑,老捻张起,西捻等。据此,可以了解捻军不同的称呼与捻军规模的情况。同时,泗州地区组织团练进行抵御,抵御过程中伤亡的人,会被记录在《泗虹合志》中,正如方瑞兰所说:“绅民团练抵御,其时,殉难诸男妇指不胜屈,不为志之久将湮没,何以慰贞魂,而励风化,兹查案牘与夫父老,见闻者,四乡采访,来告者备搜事实,详录姓氏,为邦国光焉”^[113]。如:“二月乙丑,副都统伊兴额,总兵滕家胜,剿捻匪,山东汶上之沙河店阵亡,伊兴额于宿州,滕家胜于泗州灵璧,并建专祠。”^[1209]《武备志》中详细记载的捻军的人物活动,为研究捻军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4 结论

通过对光绪《泗虹合志》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朝时期地方志的普遍编修,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实的记载,对地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泗虹合志》采用合志的体例,将《泗州志》与《虹县志》合并编修成书,是泗州地区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清朝要求地方普遍编修地方志,然后汇编为《大清一统志》,在此期间,泗州地区曾六次编修方志,从而为《泗虹合志》的成书提供了契机。泗州旧城被水淹没,泗州治所迁移至虹县,并将虹县并入,泗州地区治所的变化和管辖范围的变动,为《泗州志》与《虹县志》的合并,奠定了地理条件。乾隆时期,叶兰编修《泗州志》时,虹县并入泗州地区未久,但编修方志时,仍将虹县一并纳入《泗州志》中,为光绪《泗虹合志》的编修提供了编修前例。《泗虹合志》保存了泗州历代数量巨大、类型多样的文献,涉及合志体例的编纂、建置沿革、地理变迁,收录的泗州境内淮河、洪泽湖、汴河、濉河等水系资料,以及捻军的活动资料,不少文献为《泗虹合志》所仅见,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注释:

- ① 关于泗州方志整体性研究的论文,如罗志《历代泗州方志考述》,《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2期;晁成林《〈江苏艺文志·淮阴卷〉辑补》,《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3期。
- ② 关于泗州方志部分研究的论文,如张乃格《亲历者的记

忆——康熙《泗州志》》，《江苏地方志》，2011 年第 2 期；罗志《康熙《泗州通志》考述》，《史志学刊》，2015 年第 1 期。

- ③ “泗虹合志，卷三，汴河，一”为《泗虹合志》第三卷，《水利志》的汴河目，《水利志》的第一页。

参考文献：

- [1] 方瑞兰. 泗虹合志[M]//安徽历代方志丛书.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 [2] 李泰. 方志学[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31.
- [3] 刘尚恒. 安徽方志考略[M]. 长春: 吉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85: 116.
- [4] 张九征. 镇江府志[M]. 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
- [5] 龚起翬. 虹县志[M]. 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 [6] 罗志. 历代泗州方志考述[J]. 江苏地方志, 2015(2): 54 - 58.
- [7] 张可立. 兴化县志[M]. 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 [8] 莫之翰. 泗州志[M]. 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 [9] 庄威风.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J]. 中国地方志通讯, 1984(2): 8.
- [10] 李德楠. 小冰期背景下苏北群发性“沉城”现象及迁治模式[J]. 中原文化研究, 2022(1): 102 - 108.
- [11] 武同举. 江苏水利全书(第二编): 卷 5[M]. 南京: 南京水利实验处, 1950: 1.
- [12] 马俊亚. 明清运河东移与淮安水患成因[J]. 江苏地方志, 2024(3): 17 - 24.
- [13] 丁剑. 试论“合志”[J]. 中国地方志, 1984(2): 51 - 54.
- [14] 叶兰. 泗州志[M]. 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 [15] 沈松平. 方志发展史[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16] 尚越. 浅谈地方志在地区发展中的指导作用[J]. 沧桑, 2014(1): 24 - 25, 29.

(上接第 114 页)

- [17] 罗重谱. 新时代社科类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0): 173 - 180.
- [18] 白风. 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8(4): 91 - 96.
- [19] 郭晓勇. 文化强国背景下编辑的核心素养与培养路径[J]. 出版广角, 2022, 404(2): 55 - 58.
- [20] 汪全伟, 龙娅丽, 张海东. 科技期刊党支部引领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J]. 编辑学报, 2022, 34(5): 479 - 482.
- [21] 李英. 青年编辑的职业规划与发展路径[J]. 编辑学报, 2024, 36(S1): 200 - 205.
- [22] 刘静. 加快构建“三大体系”视域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角色定位与核心素养[J]. 传媒论坛, 2024, 7(13): 111 - 114.
- [23] 朱剑. 如影随形: 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 - 2017 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1 - 35.
- [24] 向美林, 单秋艳. 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角色定位探析[J]. 科技传播, 2025, 17(1): 73 - 77.
- [25] 刘普, 郭泉. 科研人员融入学术期刊编辑团队现状、挑战与对策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0(2): 225 - 234, 242.
- [26] 许丽娜. 加强导向意识, 做好期刊意识形态工作[J]. 出版广角, 2019, 354(24): 47 - 49.
- [27] 姜昕. 稿件编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修改举隅——以《大连大学学报》为例[J]. 大连大学学报, 2024, 45(6): 115 - 121.